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碧血丹心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长江出版社
CHANGJIA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血丹心 /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23.11

ISBN 978-7-5492-9224-0

I . ①碧… II . ①中… III . ①中国共产党 - 地方组织 - 党史 - 武汉 IV . ① D235.631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224328 号

碧血丹心

BIXUEDANXIN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责任编辑: 李海振

装帧设计: 刘斯佳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 430010

网 址: <https://www.cjpress.cn>

电 话: 027-82926557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开 本: 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92-9224-0

定 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编辑部

主 编 张学锋 郑水平 田子渝

副主编 王怀卓 宋 健 李福珍
文道贵 张秋实 张 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庆鸿 刘桂芳 许雁晴 孙 勐
张向东 张志宏 陈 磊 陈祖勇
周 鹏 袁 琳 袁亚妮 贾 宁
夏伟平 高万娥 黄文艺 曹 波
彭 红 彭长征 傅 俊 曾宪松

《碧血丹心》

编写组

主 编 王怀卓 宋 健

副 主 编 刘桂芳

顾 问 李婉霞

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蔚青 刘桂芳 许雁晴

孙 勔 芮 鹏 李 滢

李婉霞 吴园志 邱继初

何利平 宋 健 陈 磊

郑巍宁 饶 翬 涂天向

詹 慧 谭继明 熊 婕

熊俊潇 戴定凯

目 录

001	名将出江城	/ 陈 磊 李婉霞
017	江汉壮歌	/ 朱蔚青
027	珞珈碑路的“赵先生”	/ 宋 健
037	斗争怒潮再起	/ 孙 勤
050	震寰血案	/ 朱蔚青
059	董必武脱险记	/ 郑巍宁
066	年关喋血	/ 宋 健
073	龟山脚下的一家人	/ 陈 磊
082	裕泰客栈的诱捕陷阱	/ 孙 勤
096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 饶 翠
104	潇湘女英杰 丹心照楚天	/ 熊俊潇
113	白色恐怖下的红色战士公墓	/ 熊 婕
120	百折不挠	/ 涂天向 刘桂芳
133	历尽苦难初心不改	/ 宋健 戴定凯 詹 慧
148	前仆后继	/ 刘桂芳
157	地火奔腾	/ 熊俊潇
166	木兰烽火	/ 谭继明



176	水乡英烈昭千秋	/ 许雁晴
187	不灭的火种	/ 邱继初
194	将星初升	/ 芮 鹏
213	红色堡垒	/ 李 滢 吴园志
228	浴血斗争	/ 刘桂芳 李婉霞
249	惩奸除恶	/ 孙 勔 李婉霞
261	铁骨傲霜信仰坚	/ 何利平
275	惊天之变与艰难苦斗	/ 宋 健
285	战斗在敌人心脏	/ 涂天向 宋 健
295	红军威震新洲	/ 涂天向
305	将军山上红旗飘	/ 涂天向
314	一二九运动在武汉	/ 陈 磊

名将出江城

千里寻党的将军书法家唐天际

多年前，在湖南省安仁县一带，曾流传着一首《十字歌》：“四字写起笔连笔，安仁出了唐天际。发动农友打土豪，跟着朱德上江西。”歌词中的唐天际文武双全，一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9 年 2 月 20 日在北京病逝，享年 85 岁。

唐天际原名唐时雍，1904 年 10 月 22 日出生于湖南省安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 岁时，由于全村没人识字饱受地主恶霸欺负，天资聪颖的唐天际在村里人的共同支持下进入私塾读书，并练就了一手好字。中学时，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 年 7 月，唐天际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唐天际参加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立下赫赫战功。

1926 年 6 月 2 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就任国民革命军



唐天际



第八军军长，唐天际奉命调往唐生智部做宣传工作。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唐天际积极练兵习武，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北伐战争打响后，唐天际参加了攻打汀泗桥、武汉、鸡公山等战役。在战斗中，唐天际总是冲在最前面，表现神勇。在汀泗桥战役中，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胸，幸好被武装带挡住，子弹头嵌进肉里，鲜血不断往外涌。战士们见状，连忙呼叫卫生员。唐天际咬咬牙，用力从肉中抠出这颗子弹，仍带队往前冲，虽然流血不止，唐天际依然带领着战士们奋勇杀敌。战争胜利后，由于工作主动，作战勇敢，唐天际被调到三十六军十一旅担任政治指导员。

在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下，唐天际更加成熟。鉴于他出色的政治素质，在战场上、在工作上的杰出表现，党决定吸收他为党员。1926年9月，在广水火车站，由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熊受暄、邵杰生介绍，唐天际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入党后的唐天际踌躇满志，立志要有一番大作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唐天际满怀喜悦，憧憬着革命胜利后的美好生活。突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紧接着，李济深、杨森、夏斗寅等也相继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1927年6月10日，唐生智在郑州和汪精卫、冯玉祥密谋反共。6月14日，唐生智回到汉口，一改以往的所谓左派面目，公开压制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运动，并开始清除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当时唐天际在唐生智部三十六军一团三营任党代表，部队正在由河南撤回汉口的途中，得知不少共产党员被抓、被杀的消息后，唐天际知道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决定连夜转移。而这时铁路沿线都已经被反动派控制，车站附近更是布满了军警，盘查很严。

夜幕降临，唐天际悄悄来到广水火车站。由于良好的军事素养，盘查的士兵没有发现他。唐天际正准备去铁路工会找寻党组织，却远远看见几个工人提着马灯朝他走来。走近时，一位认识唐天际的工人招手喊他，惊讶地说：“你还不快走啊，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原来唐天际在广水车站做过群众工作，那里工人觉悟高，不少工人听过唐天际的演讲，认识他，这个工人这时发现唐天际，特别为他的安全担忧。“我刚从柳林跑到这里，

想回汉口，特意来找你们。”唐天际说道。“往南开的都是军用车，恐怕坐不上。”那个跟唐天际相识的工人面有难色，其他工人也紧锁眉头，表示为难。唐天际见状，说：“那我就走小路吧！”“那哪行？沿路都在查，步行很不安全。再说，那要走多久呀？”一位火车司机这么一说，在场的几位工人都沉默下来，顿时觉得无计可施。过了一会儿，这位司机突然灵机一动，低声对唐天际说：“给你开个单车头走吧！”其他人顿时拍手叫好，都说：“对，就这样走！既秘密，又快。”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到这些并不是特别熟的工人在自己危难之际热情地帮助自己，唐天际深刻意识到共产党人在劳苦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也愈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他激动地拉着工人们的手说：“太谢谢你们了！”“事不宜迟，快走！”开车的司机催促道，大家急忙跳上火车头。随着一声汽笛声划破夜空，唐天际的“专列”快速开出了广水。

在疾驰的火车上，唐天际回首往事，愤慨不已。唐生智表面上唱着东征讨蒋的高调，暗地里却规定政治人员不得带兵，不得单独召开会议，一切活动都得听军事人员指挥，最后还强令共产党员退出军队。现在自己被撵出来，性命难保，要是党掌握了军队，自己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狼狈。正当他陷入沉思之际，火车头突然“咣当”一声停住了，打断了他的思绪。唐天际抬起头，只见那位面相憨厚的货车司机抱歉地对他说：“前面就是花园车站，不能再往前开了。天亮前我还得赶回去，你一路小心吧！”唐天际点点头，跳下车，说声“谢谢”后就和工人们分手了。

回到汉口，唐天际找到了党组织，诉说了自己跑回来的情况。通过刘力劳的介绍，唐天际来到贺龙的第二十军。马日事变后，贺龙部队成为共产党人的避风港，两湖许多工农运动骨干在本地不能立足后都来投奔贺龙，另外贺龙还将第二十军的军旗挂在武汉工农运动组织的门口，以防反动派破坏。他欣慰地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共产党给我补充，把工农同志送到我这里来了。”

见到仰慕已久的贺龙，唐天际异常兴奋。贺龙听完刘力劳对他的介绍后，上下打量着这位英武壮实的少年，说：“嘿，是个能带兵打仗的料。欢迎你！”



只是我这里僧多粥少，暂时委屈你到警卫一连当个副连长吧！”唐天际听后很高兴，向贺龙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谢谢军长，只要能拿枪杀敌，莫说当副连长，就是当士兵我也干。”贺龙听后很欣慰，自己没有看错人。

加入贺龙部队后，唐天际随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打下南昌后，唐天际担任南昌卫戍司令部部队副官长。按照前委指示，8月6日，唐天际随最后一支部队撤离南昌。临行前，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急匆匆找到他，说组织上要唐天际留下来了解敌人的一些情况，并设法和即将从袁州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取得联系。彭干臣还交给他一封与江西省委联系的信件。

送走彭干臣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唐天际手下的士兵突然通报敌人已经进入南昌城，需要赶紧撤离。情况紧急，唐天际身着便衣向门外走去，发现街上到处是敌人，正在满城搜捕共产党人。情急之中，唐天际躲进了一家瓷器店，在店主刘老板的掩护下机警脱险。

在抚州，唐天际追上部队，被安排在粮秣处任副官长。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遭到广东军阀的围追堵截，部队被冲散，唐天际再次与部队失去联系，躲进了一片甘蔗地里。衣衫褴褛的唐天际在躲避完敌人的搜捕后，从甘蔗地里爬出。身无分文的他正一筹莫展，一位放鸭子的老汉迎面走来。唐天际对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老汉非常同情，将自己仅有的十一枚铜圆送给他，分别时还鼓励他好好干革命。

和老汉道别后，唐天际辗转潮阳、汕头，在汕头一家商店门口找到起义部队的两名同志，三人决定乘船去找党组织。可悲的是，三人的钱凑在一起只够买一张船票，于是就趁着人多混上了船。这艘船是日本人开的，查票很严。唐天际没有船票，只好躲在货仓底下，忍饥挨饿，靠好心人施舍的剩饭挺着。有一天，唐天际还是被查票的人发现，被捆在船上的一根铁栏杆上，受尽百般凌辱。面对如此窘迫的境地，唐天际隐忍不发，心中的信念仍然是一颗红心永远向党，尽快找到党组织。

唐天际三人经过颠沛流离，来到了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在这个繁华喧嚣的地方，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仍在持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漫步

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他们始终没有遇到一个熟人。穿着破烂的草鞋，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在饥肠辘辘之时，唐天际甚至被一个店老板当成乞丐，满脸憎恶地扔给他一枚铜圆打发。在三人狼狈不堪之时，唐天际突然遇到一位以前在三十六军共过事的党代表，迫于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这位党代表给了他点钱便匆匆离去，也没顾上说两句话。靠着这一点钱，唐天际三人在上海吃了两天饱饭，又连续找了几天都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头，最后决定乘船回汉口。

回到武汉，唐天际通过林日新同志终于找到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找到党组织的唐天际心情特别高兴，几个月的流浪之苦一扫而光。他来不及休息，急切要求党分配工作。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唐天际回湖南发动农民运动，组织暴动，联络代号为“湖伟”，唐天际的军旅生涯再次开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天际的军旅生涯中，笔迹和足迹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稍有空闲，他都会奋笔疾书，大江南北留下了他不少“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刚劲有力的宣传标语，他也因此成为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将军书法家。

红军队伍的第一个女司令员胡筠

1926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和大革命失败后向土地革命和独立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转变。在这伟大的时代潮流中，涌现和锻炼出党的大批军事骨干，他们在江城武汉初露锋芒。从武汉出发后，他们驰骋疆场，抛头颅，洒热血，有的英勇牺牲，有的成长为党的高级将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防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平江一女雄，革命打先锋。焚舍从军去，双枪建伟功。献身加入党，矢志为工农。冤屈终昭雪，英名贯碧穹。”这是开国大校黄吉民对胡筠的称赞，也是她短暂一生的真实写照。

胡筠，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商人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



偏爱《水浒》《精忠岳飞》和《木兰辞》等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和精忠报国之类书籍，不但是才女，还练就了一身武功。19岁时，胡筠由父母包办婚姻，嫁给大地主的儿子李积琦为妻，婚后育有一子。

1925年底，胡筠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富家女正式成为一个革命者。北伐战争中，胡筠曾担任独立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奔赴北伐前线参加运输、救护和战斗。

1926年底，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收女兵的消息传开后，胡筠毅然离家别子，在党组织推荐下热血参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称武汉的黄埔军校，在这片革命热土，胡筠积极接受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因为有武术功底，胡筠在学习操练、射击等军事技术方面尤为突出，并在实弹打靶时，以“神枪手”闻名于全校，位于武汉黄埔“四女杰”之首。同时，胡筠积极参加军校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1927年5月，军校师生参与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准备南下讨伐夏斗寅叛军。在操场上待命出发时，胡筠即兴赋诗一首，抒发战斗豪情：绿荫深处无暑炎，席地看报也谈天。男女穿上军装服，革命阵营意志坚。保卫后方有责任，支援前线毋稍延。三镇基地金汤固，快听貔貅奏凯旋。

在参加平叛夏斗寅的战斗中，胡筠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革命精神受到进一步洗礼，她由一位能文能武的女生，正式蜕变为一个文武兼备的革命女军人、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

七一五“分共”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提前毕业。按照党的指示，胡筠回到平江虹桥，准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为了革命，胡筠把婆家作为第一个斗争对象，引起公婆和丈夫李积琦的强烈不满，之后儿子被丈夫偷走。1928年，经组织批准，胡筠与李积琦离婚。

在湘鄂赣边幕阜山一带的万山丛中，胡筠运用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来的政治理论、军事谋略和军事技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政权。胡筠组织成立了平（江）湘（阴）岳（阳）游击纵队，后经上级批准，改称平江工农革命军，胡筠任司令员。恽代英向她祝贺：“你可是红军队伍中唯一的女司令，敌人闻风丧胆，我们却为之欢呼雀跃。”

1928年7月，彭德怀和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克了平江县城，部队随即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7月23日，胡筠率队与彭德怀、滕代远会师，协助作战，后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并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两军配合作战期间，彭德怀对胡筠十分尊重和信赖，每逢研究作战方案，他都认真听取胡筠的意见。1931年，胡筠任红八师师长，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女师长。同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胡筠为省委委员，并担任妇



胡筠

女部长。她的妇女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湘鄂赣边区20多个县，各级都有妇女组织。胡筠英勇善战，除了政治与军事方面，她在文学与艺术上也颇有才干。胡筠既是编导又是演员，组织创作了大批深受苏区军民喜爱的歌舞节目，并以早期平江县委书记罗纳川烈士为原型，创作《李更探监》故事，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1928年，胡筠与共产党员张警吾结婚。1929年7月的一次战斗中，身怀六甲的胡筠不顾同志们的再三劝阻，毅然率领部队亲临一线指挥战斗。战斗过程中，曾腹部多次隐隐作痛，却一直不愿离开火线。28日凌晨，胡筠再次组织部队打退敌人的又一次进攻后，感到腹部剧烈疼痛，最终在火线上生下了女儿，为婴儿做了简单的包裹处理，便将孩子托付给一位逃难路过此处老妇，自己则拖着虚弱的身子被战友们抬在箩筐里继续战斗。最后，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还歼敌数百。战斗后，老妇和孩子早已不见踪影。直至牺牲，胡筠再未和女儿见过面，这一别竟是永别。

1933年10月，胡筠在万载县小源参加湘鄂赣省第三次工农代表大会期间，被诬为“AB团”分子，突遭逮捕。胡筠在关押期间，写了数十页纸的《狱中自白》，回顾了自己在党的领导下由一个豪门闺秀成长为党的干部的整个历程，其中写道：“牺牲换人间幸福，奋斗是吾辈生涯。”这是



她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也是她留下的遗言。1934年1月，胡筠被秘密处决，年仅36岁。彭德怀听闻噩耗十分悲恸，对天长叹：“天理难容啊！天理难容！”三个月后，胡筠的丈夫张警吾也遭到杀害，那个出生在战场上的女儿也杳无音讯。

1945年，党的七大上，胡筠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8年彭德怀重返平江时，谈到当年的平江起义时感慨地说：“胡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很有能力，打仗很勇敢，是个难得的女将。”

2014年清明节，平江新烈士陵园举行了胡筠烈士的遗物安葬仪式，胡筠这位出身豪门的女英雄终于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以身许国的红军优秀指挥员王尔琢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视察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他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时，十分焦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王尔琢是何许人也，竟让总理念念不忘？今天，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王尔琢这个名字。他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是朱毛红军赫赫有名的参谋长。在红四军前委排名中，他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排第四位，是和朱德、陈毅一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3位领导人之一。

王尔琢，字蕴璞，1903年1月23日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一户小康人家。9岁起，王尔琢开始在村里读私塾，1918年考入石门县立初级中学，1920年7月，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王尔琢在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期间，立志实业救国，学好工业知识，打算将来办工厂为国出力。1922年春，湖南省劳工联合会的负责人黄爱、庞人铨等被军阀杀害，党领导长沙人民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反对资本家压榨工人的斗争，并派人到甲种工业学校发动学生举行抗议活动。王尔琢与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的暴行。在斗争中，王尔琢目睹了劳苦工农的贫困和统治阶级的腐朽，他最终放弃了“实业救国”的理想，确立了要实现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实行革命的思想。为了唤起同学的觉醒，王尔琢与校学友会负责人以学友会名义在校

内开设了一个出售进步书刊的书店。

1924年暑假期间，王尔琢得知广州黄埔军校招收学生的消息，他立即赶赴长沙参加初试，他的文章《试述入黄埔军校之志愿》受到了主考官何叔衡的赞赏，并顺利通过考试。随后他又筹足路费，奔赴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的入学复试，主持考试的恰好是毛泽东。王尔琢再次通过考试。就这样，王尔琢被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式录取。在校学习期间，他追求进步，学习刻苦，



王尔琢

各个科目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当时，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王尔琢极为赏识，经常找他谈话。1924年末，王尔琢在周恩来的直接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1月30日，王尔琢从黄埔军校正式毕业，周恩来就让王尔琢留校，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分队队长和党代表职务。在粉碎商团叛乱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中，王尔琢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由连党代表提升为营长。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开始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清除共产党员。因为王尔琢才华出众，蒋介石有意拉拢他，但王尔琢果断地回绝了蒋介石。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经过扩充，改编为北伐军东路先遣队，共产党从黄埔军校中抽调40多名优秀党员到该军去开展工作，王尔琢被委任为第九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六团团长。第九师师长李明扬是个无党派人士，为把这支老牌的赣军改造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军，王尔琢同其他党员一道，通过李明扬团结进步力量，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东路先遣队中开展得较为顺利，派去的党员均安置在各团、营、连担任党代表。在上面要求报部队中共产党员名单时，王尔琢机警地只报了在黄埔军校时众所周知的十几个人的名单，其余的都打了埋伏。

在东路先遣队中，王尔琢凭借卓越的战功，被提升为第九军党代表。身为东路队总指挥的蒋介石，对王尔琢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欲割难舍，忍



不住再度拉拢收买他。他派亲信找到王尔琢，转达口信：“总司令准备扩充四十个军，要提升你为军长，不知你对此有何打算？”一听这话，王尔琢冷笑一声说：“请转告总司令，军长太小了，最好给个军阀。”来人见话不投机，只得悻悻而去。蒋介石闻言，大为恼怒。

李明扬与王尔琢相处日久，关系很好，他对王尔琢的人品才华极为佩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冒着风险将蒋介石欲对王尔琢不利的密令拿给王尔琢看，说：“事已至此，你只有离开才能免遭不测。”王尔琢谢过李明扬，带领所部共产党员迅速离开东路军先遣队。1927年4月底，王尔琢来到上海，向老师周恩来汇报了情况，并留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周恩来计划经武汉去南昌，但手中没有路费，他知道王尔琢与李明扬不是一般的关系，便通过王尔琢找李明扬借路费。在到处布满反动派走狗的上海，王尔琢不能直接找李明扬，便通过徐彬如向他转达意思。李明扬二话没说，当即拿出500大洋。

5月20日，王尔琢随周恩来离开上海，几经周折到达武汉。原来离开了东路先遣队的一部分中共党员也先后来到武汉，王尔琢对他们都做了妥善安排。在武汉，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王尔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忘我地工作，甚至来不及同从湖南老家赶来的妻子郑凤翠和女儿桂芳见上一面。

来到武汉之前，王尔琢托同乡好友宋人杰在武汉黄土坡21号租了一间房子，并给妻子郑凤翠写信，要她带着从未见面的桂芳到武汉会面。郑凤翠母女一行辗转来到武汉后，却一直不见王尔琢回来。在武汉住了半个多月，日夜苦盼，也没有丈夫的一点消息。眼看相聚无望，团圆无期，郑凤翠只好带着女儿桂芳回到家乡。

望着黄土坡21号那空荡荡的房间，想着从未谋面的女儿粉嫩的笑脸，看着妻子留下的略带哀怨的信，王尔琢难过得泪如雨下。但面对身边不断传来革命同志牺牲的消息，王尔琢迅速从儿女情长中走了出来，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

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谋一面，深为憾事。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上海、长沙烈士们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儿一般。

不孝男 尔琢

拜上

信后，他还附了一句话：“看后立即烧掉。”

七一五“分共”后，王尔琢毫不犹豫地跟随周恩来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撤出南昌后，他跟随朱德激战三河坝、智取宜章城、登上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1928年8月，在攻打郴州失利后，王尔琢带着红二十八团准备重回井冈山。此时，二营的营长袁崇全突然叛变，还带走了两个连。当时，林彪等人主张把袁崇全打回来，而王尔琢则主张去把他们叫回来。大家一再劝说王尔琢：“既然袁崇全已经叛变，你这一去恐怕会有危险。”但王尔琢坚决地表示：“都别说了，我必须把他们带回来！”王尔琢只带了一个警卫排去追，后来也真如他所说，两个连大部分的士兵都被劝了回来，为革命保存了力量，只是他自己却再也没有回来，倒在了叛徒的枪口之下。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以身许国的人生誓言。

王尔琢牺牲后，战士们围着他的遗体，泣不成声。朱德闻讯赶来，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在王尔琢身旁肃立默哀很久。他布置战士们把王尔琢的遗体安葬在思顺圩外的虎形岭，全国解放后，江西崇义县人民政府为王尔琢立了一块墓碑，肖克将军为墓碑题字。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来，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1928年10月中旬的一天，红四军军部在宁冈砦市草洲上为王尔琢举行了追悼大会，战士们



临时搭了座小台子，中间挂着大横匾，匾上用棉花精心缀成“赤潮澎湃”四个大字，两旁挂着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的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追悼会由陈毅主持，朱德致悼词。毛泽东的一句“留却重任谁承受”高度肯定了王尔琢的历史功绩。的确，王尔琢的红二十八团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老部队，后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 1900 多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战斗力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相抗衡。

2009 年 9 月，王尔琢入选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舍生忘死的新兵营虎将张宗逊

1998 年 9 月 14 日，91 岁的张宗逊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9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宗逊同志逝世》的消息，对将军的革命生涯给予了高度评价：“张宗逊同志在战争年代舍生忘死，临危不惧，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在和平时期，他刻苦钻研现代军事科学，注重调查研究，为我军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张宗逊 1908 年 2 月 7 日出生在陕西渭南赤水镇堰头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2 年 7 月，他进入赤水职业学校学习，在同乡王尚德和叔父张浩如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王尚德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1924 年 5 月，张宗逊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协助团支部兴办了“平民教育服务团”等群众团体，在赤水镇一带先后办起了十几所平民夜校，建立了好几个农民协会，并联合渭南县的一些中小学教职员创办了“教育促进会”。

国共合作后，中共中央决定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之建立地方组织，中共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内起骨干作用。1925 年 9 月，中共党组织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张宗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 年 1 月，张宗逊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2 月，如愿考入黄

埔，编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二营五连，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策划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张宗逊毅然决定退出国民党，并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后，张宗逊随入伍生部分学生调往东江，执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同年9月入伍生团回到黄埔，正式编在第四期政治科第二队。



张宗逊

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前线急需大批政治干部，北伐军总政治部命令黄埔军校政治科调往武汉。张宗逊和政治科全体教职学员一起，于1926年12月初出发前往武汉。到达武汉后，政治科驻扎在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1927年1月，政治科并入正式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习惯上仍称黄埔军校分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科目增设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内容，政治活动比在广州时活跃得多，张宗逊在这里通过学习，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

1927年4月中旬，张宗逊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师（师长李云杰）第九团（团长周希武）的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任干事兼第二营政治指导员。九团的二营驻防在岳阳城陵矶，这里是洞庭湖出口与长江的汇合处，军事位置非常重要。

这一时期，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接连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在张宗逊的驻防地岳阳，表面上还有点革命气氛，实则暗流涌动，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越来越嚣张。5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后方空虚之际，进攻武汉。张宗逊所在的第九团第二营营长涂卓深夜秘密乘船与叛军联络，好在叛军被叶挺指挥的武汉卫戍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师生改编的中央独立师击溃。

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长沙一带一片白色恐怖。马日事变后，岳阳的革命形势也日益严峻，国民党岳阳县政府以各种借口逮捕共产党员，当地中共党团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团体都被迫转入地下，张宗逊所在的第九团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张天一离开岳阳到武汉躲避，张宗逊奉命代理团政治指导员。6月中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取得二次北伐的胜利，在“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中，武汉的革命形势表面上有所缓和。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关系破裂。7月16日，张宗逊所在的第三师政治部接到中共中央从武汉通过有线电报局发来的密电，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王文海向张宗逊传达。大意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除少数可以继续留下做隐蔽工作外，其余陆续撤离国民党军队。张宗逊听完传达后想，他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在部队中也不是太“红”，不太引人注目，但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曾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广州四一五政变的幸存者，如果继续隐蔽，存在很大隐患。张宗逊把想法告诉了王文海，王文海同意他离开部队前往武汉找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当时，第三师里除共产党员外，其他人员还不知道汪精卫叛变。

情急之下，张宗逊以父亲过世，家中困难为由，申请回老家料理后事。集团军政治部批准他7月17日回家，并派了一连人列队为他送行。当天，张宗逊从澧州到达津市，与张天一会合。从张天一处得知，津市只有到长沙的客轮，而长沙被许克祥控制，还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从长沙乘火车到武汉有巨大风险。经过深思熟虑，张宗逊和张天一决定搭客轮，半路到沅江县下船，再换乘长沙往武汉的客轮。就这样，二人先到沅江，等了两天才搭上由长沙去武汉的船，于7月20日到达武汉，临时住在张天一的岳父（银行职员）家里。

根据党组织的通知，党中央的联络处设在武昌黄土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留守处的政治部。张宗逊前往那里报到，请求组织

分配工作。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回西北工作，二是留在南方继续革命。张宗逊认为当时西北的冯玉祥正在“礼送”出境共产党人，革命形势正在恶化，西北的革命力量不如湖南、湖北发展快，权衡利弊，还是留在南方更好。党组织听完他的想法汇报后，分配他到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任中尉排长。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只有一个新兵营，成员多数是马日事变后逃往武汉的湖南农民和农运干部。

1927年7月下旬，第二十四师新兵营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三营，张宗逊任第十连副连长。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他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警卫团迅速赶到南昌和第二十四师会合发动南昌起义。临近出发时，卢德铭又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命令，要警卫团到九江集中。卢德铭断定，如果到九江，部队八成会被黄琪翔吃掉，于是决定7月31日晚紧急出发，沿长江东下。部队到达江西奉新县时，了解到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在估计已经不可能追上起义部队的情况下，警卫团按照卢德铭的指示在修水休整待命。

1927年9月9日，张宗逊随警卫团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由警卫团改编而成）参谋。按照当时中央制定的起义计划，各团由东向西攻击，目标是夺取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指挥员大都缺乏实战经验，起义进行得很不顺利，部队损失严重，团长卢德铭不幸壮烈牺牲。战斗中，张宗逊率领一连兵力，向西攻击时，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担任后卫。十来天连续战斗，张宗逊初步展露了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才干，受到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关注。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果断决定转兵井冈山。经过十多天艰苦转战，9月28日，起义军余部终于摆脱了强敌的追堵，进至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对所剩部队进行了整编。由于部队建制单位大量减少，干部大都降职任用，张宗逊被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和团部安全，张宗逊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任务，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当毛泽东知道他是陕西渭南人时，风趣地



说：“啊，你来自八百里秦川，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嘛！”张宗逊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是报以微笑来答谢毛泽东的信任。

张宗逊身材魁梧健硕，高大威猛，虽然时年不到20岁，但已是一个有两年多党龄的党员和一名干练的初级军官了，由他领兵直接护卫毛泽东，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到处是反动武装和土匪，内部也时有动摇分子和叛徒闹事，随时需设岗布哨，严防不测。从三湾改编到转兵井冈山，张宗逊与毛泽东形影相随，动辄并肩行军打仗，歇则同宿一个屋内，经常是毛泽东睡在铺板上，张宗逊等打地铺睡在旁边，随时守护。

在张宗逊戎马倥偬的一生中，许多时候都是与护卫党中央、毛泽东联系在一起，所以军史研究者雅称他为“禁卫上将”。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陈 磊 李婉霞）

江汉壮歌

血花世界溅血花

1927年8月4日，位于汉口闹市区的新市场门口，突然响起枪声。一位书生模样的青年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时围观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位青年的身份，更没有人意识到这枪声标志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即将结束。

中共湖北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记载了这位青年的姓名和牺牲情况。他叫宋继武，是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青团江岸区委组织部长。1927年7月13日，他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后被武汉卫戍司令部杀害，成为大革命失败前夕最早将一腔热血洒在江城的共产党人。中共湖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记录了宋继武在生命最后时刻英勇悲壮的一幕：“他赴刑场时，沿路高呼：打倒反动的国民政府！共产党万岁！”当要枪决时，仍慷慨热烈地向群众讲演，听者无一不愤激。湖北省委的报告还说：“自此以后，几乎每日武汉三镇均有枪决共产党员的事。”

宋继武牺牲的地点在汉口新市场，该地始建于1919年，位于汉口中山大道繁华地段，大革命时期改称血花世界，后来又称人民俱乐部、民众乐园。血花世界的“血花”二字取自廖仲恺的“烈士之血，主义之花”两句题词，其意义在于动员广大革命者为革命不惜流血牺牲，用鲜血浇灌出



宋继武



主义之花。宋继武的牺牲，让血花世界真正名副其实。

出身于小商人家庭的宋继武，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从小被寄予厚望，聪颖好学的他先后就读于私塾、涪陵县立高小和重庆川东联立中学，曾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思想进步，主编过重庆川东联立中学的校友会刊物《友声旬刊》。毕业后，好学的宋继武本打算继续上大学，却由于父母的阻挠在家闲居，之后于1920年与农家姑娘彭志玲结婚。之后他依然时刻向周围的人宣传新思想，时常鼓励彭志玲跟着他妹妹一起读书写字，学习新知，告诉她们作为新时代的妇女要大胆面向新生活，创造新的人生。

1925年7月，21岁的宋继武与共青团员石大城（又名石游、石大成）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涪声报》，宋继武主要负责采访和编辑。他把《新涪声报》作为他传播新思想、反抗旧势力的阵地，勇敢地揭露当地富绅以财势欺压人民的丑恶嘴脸。为此，宋继武被当地豪门权贵恨之入骨，诬其为异党分子。宋继武被迫离开涪陵，到北平就读于法政大学。由于经济上父母不支持，宋继武读了一个学期便返回了。

回到重庆后，宋继武曾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国家主义派在重庆的头目杨叔明的影响和蛊惑，一度误入歧途，在国家主义派受到打击后，他离开重庆去了上海。在上海，宋继武遇到了以前一起办报刊的石大城等涪陵青年，在与他们的辩论中认识到国家主义的实质和危害，逐渐觉悟。不久，宋继武又被介绍到武汉工作。

宋继武来到武汉，开启了新的人生。武汉作为大革命中心，云集了很多四川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他们热情开导和帮助下，宋继武进一步认清了国家主义派的本质，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勇气和才智，积极工作，赢得大家一致赞许。经共产党员阮丹石介绍，宋继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还担任了武汉江岸二七工人子弟学校校长。

1926年底，宋继武遇到了以前的老师罗承烈，罗承烈时任革命军二十四军政治部秘书。宋继武邀请罗承烈参观二七工人子弟学校，向他热情介绍武汉革命事迹，分别时送他一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册子，这对

罗承烈的思想转变起到重要影响。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就大规模地封闭工会、农会，逮捕与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时，党处在极其艰苦的境况下，宋继武仍坚决遵循党中央指示，印制传单在工农中散发，号召工农组织起来继续斗争。为了使党的指示及时深入人心，宋继武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奔走于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8月初的一天，正当宋继武在街上散发传单时，反动军警一拥而上，将他逮捕。敌人使出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宋继武始终没有透露一句党的秘密。后来，宋继武即在汉口血花世界前英勇就义。

誓言如铁志如钢

汉口铭新街13号，是一座带天井的二层楼房。1927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这座小楼就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办公地。一楼是中宣部，二楼是中组部。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的罗严就曾在这里的二楼工作和生活过，这幢小楼里记录着他为党工作的最后时刻。

罗严出生于湖南省常宁县太坪乡周家桥，19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当时充满了热烈而活跃的革命气氛，罗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书刊，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坚定了革命信念。不久，他还加入了蒋先云、贺恕组织的学生进步团体“心社”，并以出众的才能崭露头角，在“三师学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10月，22岁的罗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严

1925年，罗严被选送到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参加培训，由于学习成绩优异，结业后毛泽东亲自推荐他到中央农民部任秘书，实际上主持处理农民部日常事务。他工作兢兢业业，深得党和同志们的信任和称赞。

1927年春，党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罗严仍留守在上海。4月中旬，鉴于上海形势危急，陈独秀发来电报让罗严前往汉口。罗严到武汉后不久，改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职时，党的组织工作正处于大发展和开始规范化的时期，中组部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中央决策部署，开始建立组织工作机构、健全组织工作制度。罗严作为中组部负责实际工作的干部，承担了异常繁重的任务，如为各地来汉的党员干部安排分配工作；落实党中央决策调配和任免干部；按照中共五大确立的组织体系、领导体制推动党的组织机构改组和干部工作规范化；在各个组织中建立党团，发展党的组织，强化党的领导；登记统计党员数量和收缴党费等。尽管组织工作头绪繁多，但罗严始终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件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各级机关开始紧缩并迅速转入地下状态。罗严作为组织部秘书，参与组织分配工作。宋侃夫离开中宣部去浙江前，罗严就曾在铭新街13号的二楼房间里与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后来安排他到浙江工作。聂洪钧从咸宁到武汉，也曾在中组部机关里见到过罗严。安排许多同志转移并分配新工作地点的罗严，却并未给自己提前安排退路，在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形势下，他始终坚持留在武汉继续斗争。他在送别同志们时也许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诀别。

1927年8月中旬，罗严在汉口被反动军警逮捕。当时负责审讯的人听到罗严自报姓名后，不相信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青年就是罗严，大声喝道：“你不是罗严，真罗严在上海，你想冒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罗严大义凛然地说：“我就是罗严，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要杀就杀！”作为中组部工作人员，罗严掌握着大量党的组织情况和核心机密，敌人妄图用高官厚禄和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罗严招供，罗严却始终横眉冷对，没有吐露

任何秘密。恼羞成怒的反动派决定将他杀害。

罗严牺牲的那天，汉口济生三马路刑场军警林立，气氛紧张。罗严身形消瘦，满身血迹，但依然神色自若，毫无惧色，所有的行人都肃然起敬。罗严以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守护着他的铮铮誓言：“对党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

梁前飞燕韶华逝

1927年8月24日半夜，一队国民党反动军警悄悄包围了汉口二中德国球场分部，他们鬼鬼祟祟地缩小包围圈，把学校的宿舍楼团团围住。天蒙蒙亮时，反动军警接到命令，开始上楼抓人。一个青年行色匆匆地从楼上下来，在楼梯中间正巧遇到上楼的军警。反动军警拦住他的去路，从他身上搜出一封电报，电报上赫然写着燕韶九的名字。反动军警便下令将他逮捕，一起被逮捕的还有许多人。敌人为什么会突然包围搜查一所学校呢？

原来，中共汉口第二区委刚刚遭到破坏，区委书记梅中林被抓捕时正在开会，行动计划大纲正放在桌上，大纲里写着下午六时在汉口二中德国球场分部第几楼第几号房间开会，敌人以为这个地点是暴动指挥部，便派军警包围了学校，抓捕了许多人回去审问。在搜查梅中林住所时，发现了许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书上有燕韶九的签名，遂决定逮捕燕韶九，恰巧燕韶九刚收到母亲去世电报准备回家，结果一出门便因这封电报被反动派逮捕了。

燕韶九是郧县城关人，他的祖父燕之铭、父亲燕鸣庄都是清朝的秀才。燕韶九从小在祖父、父亲的熏陶下，博闻强识，能诗会文，才华横溢，有神童的美誉，尤其擅长写一手好文章。

1917年，18岁的燕韶九考入郧山中学，多次考试名列第一。在校期间，燕韶九关心国家大事，思想进步，还常常阅读进步书刊，孜孜以求强国富民之路。1921年，燕韶九考入了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当时在武汉上学的各府各县都组织了“同学会”“同乡会”，用来凝聚、团结各自府县的进步青年，唯独郧阳府和郧县没有，燕韶九就和同乡好友杨献珍等人酝酿商议，



在武昌成立了郧县旅省同乡会，还创办了《郧县青年》和《郧县旅省学会月刊》两份杂志。通过同乡会的活动，燕韶九结识了鄂西北许多革命志士，时常一起抨击时弊，指点江山，不仅大大开阔了政治视野，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社会阅历和知识面。

在进步书刊影响下，燕韶九逐步懂得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同乡好友、武昌商科大学同学杨献珍介绍，燕韶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决心致力于教育救国，为国家发展进步、民族振兴培育英才。1925年夏，燕韶九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毕业后，前往日本考察，回国后留校任教。任教期间，他积极支持商大学生会发动打倒军阀、驱逐吴佩孚运动。

1927年，燕韶九在汉口二中任国文教师，过着清贫的教书育人的生活。但作为共产党员和中共二中支部委员，燕韶九在上课之余还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鼓励引导他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校园大搜捕中，燕韶九与杨献珍等在校师生90余人全部被捕。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杨献珍生前回忆：

1927年我在武汉市二中总部任训育主任，在中共党内任三区区委委员兼二中党支部书记。“七一五”后，我从二中总部搬到二中分部居住。二中分部原名德国中学。8月24日深夜，军警突然包围了这个学校，扣押了在校师生90余人。我本名杨奎廷，在二中使用的名字是杨献珍。审讯时我报名杨奎廷，并以身上一枚印章为证。敌人问我杨献珍在哪里？我说不认识。敌人未多问就草草将我判刑8年，送入武昌模范监狱服刑，1929年经党营救出狱。可是我的郧县同乡、好友燕韶九就倒霉了，他身上一份电报，证实了他就是敌人要抓的燕韶九，审讯时又遇上他的仇人姓侯的，此人正在武汉卫戍司令部工作，他当场咬牙切齿地指证：“他就是燕韶九，真正的共产党。”这样，燕韶九便在劫

难逃了。

燕韶九的这个仇人侯某原来是郧县反动县府承审官，大革命时期燕韶九曾在随县看到他，于是立刻向随县县党部报告，但被他逃走了。大革命失败后，侯某正好在武汉卫戍司令部任职，在提审时，冤家路窄，侯某见到燕韶九。他并不清楚燕韶九的身份，为了报复便一口咬定说燕韶九是共产党。

燕韶九深知自己难以幸免，在狱中积极与好友杨献珍共同商讨与敌人斗争的策略。为保护同志，他把一切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对同志们说：“不要害怕，一切由我承担。”



杨献珍博物馆内的杨献珍像

1927年秋，年仅28岁的燕韶九被反动派枪杀，在这片他曾经挥洒青春热血、英勇奋斗的土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燕韶九牺牲后，他的好友杨献珍为他作了一首悼念诗：“梁前双飞燕，新婚乐未央，甘露润野草，惊魂荡他乡。”

工运领袖“汉阳造”

汉阳兵工厂，原名湖北枪炮厂，由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94年创建。张之洞将这里视为富国强兵的希望所在，它建成之初仿制的毛瑟枪后经改进定型为“七九”步枪，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汉阳造”。

在汉阳兵工厂的车间里，墙上随处可见挂着的藤鞭，这是厂长和工头处罚工人、鞭打学徒用的。工人们整日辛苦劳作，却被欺凌压榨，丝毫没有做人的尊严。胡锡泰也是这些工人中的一员。他是安徽肥东人，因家境贫穷没有念过书，14岁就被父亲送去当学徒，每天要劳动10个小时以上，



汉阳兵工厂旧址

月工资仅有6元。勤奋肯学的胡锡泰当了三年学徒之后顺利升为工匠，在汉阳兵工厂的机关枪厂做工。偶有闲暇时间，胡锡泰就捧起《汉口民国日报》认真阅读。他虽没有上过学，却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期望“军阀

混战，人民受害”的日子早日结束，工人们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1926年北伐军挺进武汉的消息传来，汉阳兵工厂的工人积极分子自发组成侦察向导队，侦察敌人动向，准备里应外合接应北伐军进汉。胡锡泰听到这一消息，心情无比激动，每次有为北伐军占领武汉探路、把厂里的武器偷送给北伐军的任务，他总是最积极的一个。与此同时，从在青工夜校上课的弟弟那里，胡锡泰还听到了许多时事新闻和苏联的情况，了解到“阶级斗争”“工农革命”，大大开阔了眼界，思想也更加进步了。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各种工会连接成立，之前潜伏在兵工厂里的共产党员也活动起来，动手组织工会。在筹备组织厂工会时，思想进步、为人豪爽正派、乐于助人的胡锡泰被步枪分厂推举为工会代表。从此之后，胡锡泰更积极接受党组织的教育，阶级意识更加强烈，后来又担任汉阳兵工厂工会委员长、武汉五金总工会执行委员、湖北省五金工会委员等职务，参加过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在工人中威信极高，很有号召力。

1927年春夏，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分共”，中国革命陷入生死攸关的危难关头。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策应南昌起义，中共湖北省委和省工会决定在8月2日举行武汉三镇总同盟罢工。汉阳县委按照要求以汉阳兵工厂为重点，配合武汉三镇举行总同盟罢工运动。

由于有较好的工作基础，汉阳兵工厂成为这次总同盟罢工的重点。然而，

敌人嗅到了讯息，从8月1日起就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致使总同盟罢工未能按计划全部实现。8月1日晚，党组织找到被兵工厂开除的28名党团员议定工作方案，大家认为虽然风声很紧，但罢工仍要按原计划进行。在布置好罢工的步骤后，需要一个威信高的人出头发动。七一五“分共”之后，厂方已将胡锡泰开除了，但他听说罢工的事情后，挺身而出决定带头发动。有人怕胡锡泰被捕，让他不要去，他却眯起眼，爽朗地笑道：“大家的事要紧，我的一条命值个什么！”罢工前夕，厂长邓演存曾找人劝说胡锡泰：“不要搞了！只要不闹罢工，我不仅可以保全他的生命和工作，当领工也行。”但胡锡泰坚定地拒绝了。

8月2日，胡锡泰穿着工装混进工厂后，接应的工人关上电门，机器一下全停了。胡锡泰跳到三张桌子临时搭起的讲台上，以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对工人们讲话：“工友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出卖了，我们取得的利益被敌人给剥夺了。这些天来，我们的生活苦透了！革命在危急中，工农大众在流血，我们还能忍受吗？”集会的工人们愤怒高呼：“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胡锡泰接着代表罢工委员会宣布：“为了反抗敌人的暴行，我们必须团结战斗，从今天起，汉阳兵工厂举行大罢工！”广场上的工人跟着胡锡泰高呼口号：“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出卖革命！”“反对军人屠杀工农！”“反对封闭工会！”“反对用国库券！”工人们愤怒地高喊着，其间有人拉响汽笛，有人敲钟发信号。炮厂的罢工委员会成员听到警号声也行动起来，转眼间，整个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全停了，4000多名工人全部跑出来了。

胡锡泰领着工人代表们来到厂长办公室前，但厂长早已躲起来拒不见人，门口架着机关枪。工人们集中到兵工厂前的大广场上，何键驻厂的部队包围了会场，架起机枪。兵工厂的共青团员、青年工人也将厂里的机枪抬出来，双方紧张对峙。胡锡泰依然站在高处，激昂地发表罢工鼓动演说。

汉阳兵工厂这次罢工，是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几乎是孤军奋战的艰险情况下进行的。经过十多天的罢工，厂方采取了卑劣手段逼迫工人复工，又开除了大批工运积极分子，还到处贴出告示，悬赏5000元通缉胡锡泰。



胡锡泰离开了汉阳后，被组织安排在武昌武胜门外区委做工会地下工作。他虽然挂念家里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却不能回家。驻扎在兵工厂的三十五军几乎每天都拉人出去枪毙，胡锡泰却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斗争的意志。

8月21日，胡锡泰在武昌第一纱厂附近的一座楼上秘密研究完地下宣传工作后就出去散发传单。按照分工，本应由罗某去散发，胡锡泰为尽早发出去，便主动去发。他们约定各自发完后在武昌大朝街碰头。胡锡泰按照预定路线发完，在快到大朝街时，突然看到罗某带着一群警察朝他扑来。原来，罗某已经叛变了。胡锡泰拔出手枪与警察展开枪战，打伤一名警察后，因子弹用完，寡不敌众被捕。在押往武胜门派出所的路上，他遇到兵工厂工人罗永昌，为了保护同志，他向罗使眼色不要接近，以免被株连。

审讯室里，胡锡泰被严刑拷打，但是他始终不吐露一个字。审讯官叫人拖上来另一个被捕的工人领袖，那个人受不住刑，说了胡锡泰是共产党。胡锡泰于是让别人把责任都推在自己身上，来保护其他同志。面对敌人的审讯，他说：“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不关别人的事！”

胡锡泰先后被关押在武昌卫戍司令部和汉口卫戍司令部，不管怎么严刑逼供，他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编了假名叫“余德生”，一点关于党组织、工会的秘密都不泄露。最后他被处以死刑，押回武昌第一纱厂门前执行。在赴刑场的路上，他一脸从容，还对押解他的刽子手宣传革命真理。这位工人领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高呼“共产党万岁”，牺牲时年仅25岁。除胡锡泰之外，汉阳兵工厂还有雷春堂、白金泉、徐世明等共产党员和工运骨干都在八二总同盟罢工斗争中英勇牺牲。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朱蔚青）

珞珈碑路的“赵先生”

“赵公馆”的秘密

位于汉口闹市区原俄租界的珞珈碑路（今江岸区珞珈山街），坐落着一排红色砖墙的西式花园洋房，于古朴凝重中透出优雅宁静之气。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陷入白色恐怖下的血雨腥风之时，一对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年轻“夫妻”住进了珞珈碑路12号的楼房中。男主人自称姓赵，因而被人称为“赵先生”。

“赵先生”夫妇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殷实富裕之家，他们家中经常接待宾客，还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洗衣做杂活的女工。实际上，这个化名“赵先生”的青年，就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而扮演“赵夫人”的则是中共湖北省妇委委员、省妇女协会负责人李哲时（李文宜）。这个“赵公馆”实际上就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驻地，后来又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所在地。罗亦农这位曾经在大上海叱咤风云的湖南青年，究竟在“赵公馆”中忙碌什么呢？

在中共五大上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罗亦农，会后曾被党中央派往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大约



汉口珞珈山街12号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旧址



两个月后，当他再次回到江城武汉接替张太雷担任湖北省委书记，这里已经风云突变。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失败，昔日的革命中心变成了“分共”清党的龙潭虎穴，几乎每日武汉三镇均有枪决共产党员的事发生。

然而，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血腥屠杀所吓倒。在陈独秀离职后，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迅速做出了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三大决策。按照五人临时中央的决策，罗亦农受命于危难之际，毫不犹豫地团结带领湖北省委成员投入了新的战斗。

鉴于白色恐怖给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罗亦农首先是设法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转移和保存革命力量。他深入到武汉的工厂、码头、街道了解情况。当时，武汉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实力锐减，党员人数从 8000 人下降到 1269 人，不仅组织涣散，而且群众恐慌动摇，一些干部也畏缩不前。在中国济难总会编撰的小册子《牺牲》中，有一篇《罗亦农传》记载：“亦农处斯绝境，加倍努力，召集活动分子大会，大加训练，终日舌敝唇焦汗流遍体，消沉者多被其鼓动，遂能举行武汉市三镇总同盟大罢工，以反抗反革命的国民党国民政府。”

为配合响应南昌起义，罗亦农在白色恐怖严重、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的恶劣形势下，冒着危险走街串巷，设法恢复组织、联络党员、动员群众。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省总工会制定了罢工计划，对发动武汉三镇总同盟大罢工进行了具体部署。当罢工计划被反动当局侦悉，武汉三镇戒严，总同盟罢工面临流产之时，罗亦农又和省委工委书记李震瀛、工委常委黄五一等巧妙地因势利导，秘密召开了三镇工会活动分子会议，把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这一意外发生的群众自发性抗暴斗争作为推动八二总同盟罢工的“导火索”和突破口，最终在武汉三镇掀起了以汉阳兵工厂为中心、有 7 万以上工人参加的罢工大潮，牵制国民党反动派兵力，破坏敌军的军火供应，有力地配合响应了南昌起义。就连素来心高气傲的郑超麟在回忆往事时也心服口服地称赞罗亦农：“有很大的才干、很强的领导能力、很好的斗争

艺术，我不能望其项背，我甘愿接受他的领导、他的批评”。

就在汉阳兵工厂罢工如火如荼进行之时，罗亦农在分析湖北省实际情况后，已打算将党的力量和工作重心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湖北农村。他在向中央提出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后湖北党的策略》中，分析了南昌起义和武汉八二总同盟罢工后的形势，提出党在武汉三镇只能“作持久作战，继续不断扰乱和动摇武汉政府的政权”，当前党的工作主要是响应南昌起义军，多作政治宣传，在行动上牵制武汉政府出兵攻打江西；准备第二次总同盟政治罢工；发展并扩大工人的经济罢工等。同时“准备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开展土地革命。

为了发动湖北农村秋收暴动，罗亦农与省委常委兼农委负责人任旭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派 500 人到湖北各地农村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到秋收暴动前，实际派出人数达 360 多人。省委将全省划分为鄂南、鄂北、鄂东、鄂中、沿京汉路和襄枣共六个区，并在每个区成立特委，作为湖北各地秋收暴动的集中指挥机关。对暴动的策略、方法、组织、口号、人员等都作了详细部署安排。

正在忙碌之时，罗亦农又接到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通知。这位隐居汉口闹市的“赵先生”，在中共交通员带领下秘密进入位于汉口三教街 41 号的怡和新房出席会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在这个力挽狂澜的重要会议上，两位湖南湘潭籍代表的发言都充满了“辣味”。毛泽东的发言妙语连珠，批评了中央在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罗亦农在会上的发言也十分劲爆，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对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估量太高，党成了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他甚至还对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指出：“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他还对修改《告全党党员书》，尤其是在组织上和指导问题上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意见。随后，罗亦农参加了



曾任湖北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罗亦农



湖北省妇女委员会委员李哲时
1928年1月正式结为夫妻。

对《告全党党员书》和职工运动、农民斗争、党的组织问题三个议决案的讨论和表决，并在中央临时政治局选举中，以18票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后，湖北省委“近水楼台先得月”，省委书记罗亦农没有等会议文件印出，就迫不及待地分批召集在汉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开会，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

珞珈碑路12号的“赵公馆”在此前后变得热闹起来。“赵先生”隔三差五地“请客打牌”，“赵夫人”则在门口和客厅迎来送往。外人并不知道，这对“恩爱夫妻”应酬接待的宾客中，既有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常委如任旭、黄五一、李震瀛、郑超麟等，也有瞿秋白、李维汉、王一飞等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其中有些客人，“赵夫人”李哲时并不认识。有一次，罗亦农曾向李哲时介绍了一位湘潭同乡，他就是毛泽东。罗亦农幽默地说：“他就是我们的农王，不是海里的那个龙王，是专搞农民运动的大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默契配合的革命工作，让罗亦农与李哲时这对男女青年心意相通、情投意合，最终弄假成真，在

尽管“赵公馆”的伪装隐蔽工作做得近乎天衣无缝，但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依然出现过险情。一次，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股负责人李强在“赵公馆”担任警戒保卫工作时，偶然发现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

和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李合林在附近游荡。李强立即通知“赵公馆”中的领导同志迅速转移，同时自己设法“调虎离山”，引开李合林，最终化险为夷。

就在罗亦农领导湖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计划，积极准备发动全省秋收暴动之时，党中央于8月15日召开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两湖暴动先取得两湖中心的武长铁路，取得岳州、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动摇湖南政权，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广东取湖北。



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股负责人
李强

不但中央改变计划将湖南作为暴动中心，湖北的形势此时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的湖北秋收暴动计划是想依靠国民军方振武部队中共党员张兆丰掌握的一个师，以鄂北为中心举行暴动，结果张兆丰被免职并遭到通缉，兵变计划落空。面对风云突变的形势，湖北省委迅速果断调整了湖北秋收起义的重点区域，把鄂南调整为暴动中心，一方面连接策应湖南的秋收起义，一方面引发湖北全省普遍暴动。

夜袭中伙铺，打响了秋收暴动枪声

1927年8月下旬，蒲圻（今赤壁市）莲花塘村一户简陋的农家小屋中，突然来了不少穿着打扮各不相同的客人。这些神秘的客人来此并非访亲会友，而是秘密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就是在八七会议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而参加会议的则有省委常委兼农委负责人任旭、中共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和鄂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罗亦农和任旭等此次来到鄂南，是专门指导、检查鄂南秋收暴动相应准备工作。因为早在半个月前，罗亦农就领导湖北省委制订了《鄂南



农民暴动计划》，将蒲圻、咸宁、通城、崇阳、通山、嘉鱼、武昌七个县作为鄂南暴动区域，并规定暴动日期为9月1日至5日之间，暴动军事方面以农民革命军鄂南总司令名义，政权组织则在革命委员会湖北分会领导之下，党组织由湖北省委直辖的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随后，湖北省委先派出符向一作为全权代表赴鄂南开展暴动组织准备工作。8月中旬，湖北省委又派遣吴德峰担任中共鄂南特别委员会书记，正式组建成立鄂南特委。此后，因形势变化，湖北省委将鄂南改为全省暴动中心。于是，罗亦农冒着酷暑于8月下旬和9月上旬先后两次来到鄂南，召集六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布置、检查、指导暴动准备工作，建立了鄂南暴动指挥部。随后，罗亦农



赤壁市莲花塘村鄂南秋收暴动会议旧址

还在武汉向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要求他们制订黄麻起义计划，回去准备起义工作。8月2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修改通过了由罗亦农起草的两湖暴动计划，正式形成《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决定于9月10日湖南、

湖北同时发动暴动。暴动后的革命武装统一称为工农革命军。

出人意料的是，鄂南崇阳、通城、通山三县的共产党人还没等到中央作出决议，就提前积极行动起来。

8月20日上午，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带着十几名团丁押送一名“犯人”来到通城县城，声称抓到了一名通城的共党分子，要交给通城民团团总刘秀波审讯处置。守卫城门的民团团丁信以为真，便打开城门，带领叶重开等人直奔县衙。不料崇阳县团防局武装居然和通城的中共党组织里应外合，当场活捉了民团团总刘秀波，缴了民团100余支枪，攻占了通城县城。原来，

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是隐藏了真实身份的共产党员，崇阳县团防局和县保卫团也早已改编成农民自卫军，押送的“犯人”是由农民自卫军装扮的。当天下午，通城、崇阳两县农民自卫军召开大会，由王武扬担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第二天，通城县召开全县各区农协代表会，宣布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这是八七会议后中共领导农民举行的第一次成功暴动，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十天后，通山县农民武装也成功举行了暴动，夺取了县城，成立了通山县工农革命政府。这些暴动拉开了秋收起义的序幕。

9月8日，中共鄂南特委获得情报，有一辆载有大批子弹和军饷的火车，在国民党军一个班押运下将由武汉开往长沙。特委决定截击这列火车，夺取枪械饷银，作为鄂南暴动的开始。暴动总指挥、鄂南特委委员黄赤光率领二三百农民，颈上缠红带，于9月8日晚预先埋伏于中伙铺车站铁路两旁，截击从武汉开来的火车。黄赤光率领八九个武装同志上车，随后铁路两旁农民武装一拥而起，以壮声威。尽管上车的八九个人当中连黄赤光在内只有两人会打枪，但黄赤光依然英勇无畏地冲上前，先打一枪，大叫“缴械”，押车士兵惊惶不知所措，都吓得不敢动。而车上竟然有一位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军官竟然也主动站出来，赤手空拳地帮助黄赤光收缴国民党士兵手中的枪支。这名乔装的“军官”名叫刘镇一，是罗亦农派到鄂南去做军事工作的干部。因路上敌人盘查甚严，他就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混上车与押车士兵同坐。听到枪声，他知道是自己同志暴动，就主动里应外合，帮助缴枪接应。随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如燎原烈火迅速蔓延。

长江局首驻大武汉

就在两湖地区秋收起义如火如荼之时，富有城市武装暴动经验的罗亦农却并没有在武汉组织城市罢工和武装暴动。他在中央临时常委会议上代表湖北省委作政治报告，异常清醒、冷静地提出武汉三镇的工作主要有两个：经济斗争和努力作政治宣传，同时开展“造党的工作”和“武装暴动技术



的准备”。他深知敌我力量悬殊，不具备组织城市罢工和武装暴动的条件。

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开始由武汉迁往上海。在这风云变幻之时，罗亦农再次被中央委以重任，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随后又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兼中央军委特派员，负责指导鄂、豫、皖、湘、赣、川、陕、甘八省党的工作。

位于汉口珞珈碑路12号的“赵公馆”此时显得更加热闹，它既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同时又是长江局机关所在地。罗亦农也比以前更加忙碌，虽然他已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但他作为长江局书记兼中央军委特派员，依然坐镇武汉指导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斗争。他汲取了秋收暴动受挫、南昌起义军南下失利的沉痛教训，清醒认识到急于暴动夺取城市建立政权的“左”倾盲动主义危险性，出于对党忠诚和对革命事业负责，他提笔向党中央写下了《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明确提出“此时湘鄂赣豫等省不宜有总的暴动，此时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省委必须在工作的中心区域（即农民暴动中心区域）直接指挥”。

当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来到长江局汇报工作，罗亦农认为驻南昌的江西省委机关已经被敌破坏，江西党组织亟待整顿，需要从根本上改造。他指示江西省委应该搬迁到吉安或者万安，到农民暴动中心区域直接指挥革命斗争。至于九江、鄱阳和南昌，可以划成一个赣北区，同时受长江局直接指挥。江西省委按照长江局的部署，全力指导赣西南农民斗争，取得了万安暴动和吉安东固暴动的成功，并在后来建立了红色根据地。

对于安徽省委的工作，罗亦农指示要特别注意发展芜湖、荻港的工人经济斗争与旌德、寿县的农民运动，他还针对安徽党组织经费困难情况，特别发了百元津贴。

对于河南省委的工作，罗亦农则提出严肃批评，指出“河南省委对于暴动好像看作玩笑！对于党的政策似亦不甚了解”，命令河南省委立即停止全省总暴动，“积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其他关于暴动的准备工作”。10月底，长江局特地发函召集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和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

到武汉，当面解决河南省委和特委在是否举行全省总暴动问题上的分歧。罗亦农在了解到军阀部队密布河南全省，党的力量非常薄弱的实际情况后，肯定了豫南特委没有按照省委规定于10月17日发动暴动“是对的”，并明确指示：河南现在不应有总的暴动，目前主要是游击战争。豫南特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以确山竹沟为中心的游击区。

此外，他还在起草《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和《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等党内文件时，明确提出“长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地发展土地革命”，要求开展“普遍的游击战争”，可以领导农民暴动，“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他还提出农村工作“以游击战争为主要的工作方法”“能割据某几县，成一独立区，如湘鄂赣交界处、鄂西”“要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必须使农民暴动“发展到割据局面”。此时的罗亦农，已经把深邃的目光从中心城市转向偏远农村，产生了通过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设想。

在罗亦农、陈乔年等领导下，湖北省委也积极部署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1927年9月，湖北省委决定将鄂东区分为黄（安）麻（城）、黄（冈）蕲（水）、大（冶）阳（新）三个区，各设特委。其中黄麻区下辖黄安、麻城、罗田、黄冈四县。9月上旬，罗亦农又向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等当面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他们参照鄂南暴动计划，积极准备黄麻起义。11月初，中共黄麻特委正式成立，成为黄麻起义的领导机关。

1927年10月17日，罗亦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指导湖南省委工作。在此期间，宁汉战争爆发，这是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一场争权夺利的战争。中共湖北省委得知盘踞武汉的唐生智军队在 frontline 战败的消息后，决定乘唐军溃败之时，发起



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



武汉暴动，夺取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7年10月28日，罗亦农结束在湖南巡视工作返回武汉。他听取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汇报后，满怀疑惑地问道：“我离开汉口不过十多天，我们的主观力量就可以武装夺取政权了吗？”他认为事关重大，须了解情况后，再开长江局会议决定。经过一番深入了解，罗亦农发现武汉党的组织力量和技术力量准备不够，武装暴动的技术准备几乎等于零，农民暴动还未发展到割据的局面，对群众的政治宣传非常之弱。因此，他认定在这种准备不足、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当然不能即时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他强调不能低估敌人力量，高估自己力量，而发生冒险主义的行动，“把暴动看作玩笑”。在长江局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罗亦农的意见得到了任旭、陈乔年等人的支持，最终长江局通过了《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决定停止武汉暴动。不料，这一决策却在党内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

12月3日，共青团湖北省委负责人刘昌群、韩光汉向团中央、党中央提交了《对唐生智溃败前后长江局及湖北省委负责人指导工作的批评》报告，控告长江局及省委负责同志“实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并有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的表现”，要求党中央“严行考究”“彻底查究”。中央派出了苏兆征、郭亮、贺昌三人组成湖北特别委员会，改组了湖北省委，并对此事进行调查，罗亦农本人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困扰。他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反复向中央申辩，解释在不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是不能举行武汉暴动的。最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1928年1月3日通过了《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肯定了长江局、罗亦农“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至此，一场持续两个月的湖北党组织内部争论宣告结束。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宋 健）

斗争怒潮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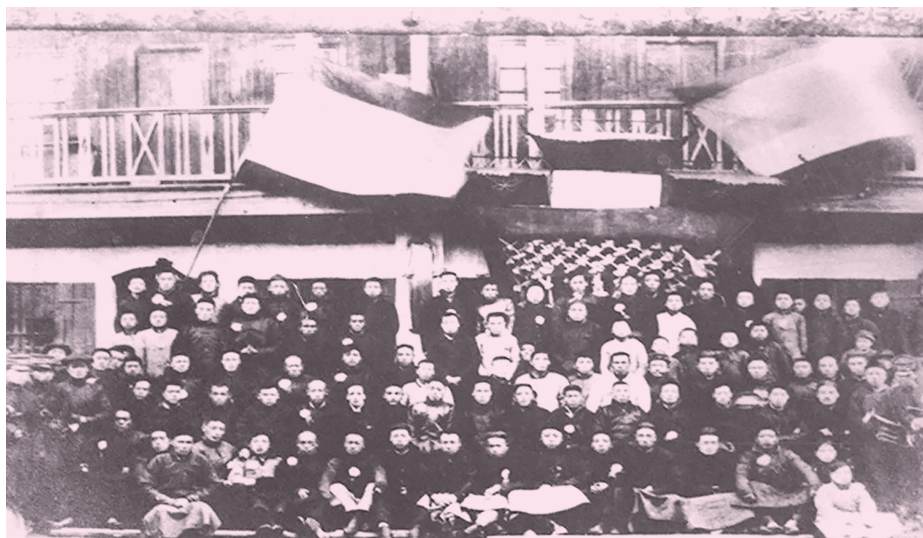
1927年11月中旬，唐生智在宁汉战争中失败并宣布下野，武汉国民党政权出现了一个很短暂的空窗期。在旧的反动政权崩溃时，党领导武汉地区的党、团员和群众，发起了一系列英勇斗争，提振了士气和信心。

铁路工人罢工索薪

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武汉国民政府就开始出现经济困难。宁汉战争爆发前后，由于财经政策失误、宁方实施经贸限制和封锁等原因，武汉地区经济局面更为恶化。粤汉铁路局以此为借口，拖欠武汉铁路工人工资达数月之久。工人的薪资本就微薄，普通铁路工人月薪不过十余元，且武汉国民政府因财政问题大量滥发纸币致使纸币贬值，铁路局又以纸币面额发工资，工人去买生活物资时，市面商家都将纸币面额打了七折，这样算下来，收入又减少三成。就这么一点钱，竟然还长时间不发，完全是在断人生路。此种倒行逆施的行径令工人们怒火冲天，强烈要求路局发薪，一场斗争已迫在眉睫。

1927年11月11日，徐家棚铁路工人因欠薪自发罢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驻汉办事处召集中共徐家棚区委员会（由中共武昌市委领导）常委、湖北全省总工会常务委员、工人领袖余长彬（一些史料中写为余常斌、余向彬、余尚宾）开会讨论工人索薪一事，陈乔年、林育南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出席此次会议。

会前，党组织得到了一个消息：粤汉铁路总工会改组委员会总务叶云卿准备召集群众大会“解决”欠薪问题。叶云卿曾参加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武汉地区的早期党员。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他是湖北省总工



徐家棚铁路工人运动一直受到党的领导，图为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成立时留影

会主席团成员，徐家棚分工会执行委员、委员长。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此人见风使舵，退党并跳到受反动派操纵控制的改组工会一边，变成了工贼。但叶云卿之前毕竟长时间参与和领导徐家棚铁路工人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此时他主张召集大会，必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以解决问题的名义为路局打掩护，敷衍工人，破坏斗争。因此，与会者围绕叶云卿的如意算盘制定了应对策略，决定将计就计，召集工人们参加叶云卿组织的大会，并在大会上坚决要求马上发薪；如果叶云卿反对，就立即发动工人将其打死。其间若有反动军队来镇压，则向士兵做宣传工作，同时号召工人包围路局，向局长索薪。假若叶云卿临时变卦不召集大会，余长彬等工人领袖则立即召集工人代表会，发动索薪等各项斗争。

到第二天，叶云卿来到徐家棚，发现工人们同仇敌忾，大有不拿到工资决不罢休的气势，一旦开起群众大会，绝对不是他所能把持和控制的。果然如余长彬、陈乔年、林育南等人所料，叶云卿见势不妙，仓皇宣布取消大会，以为如此就能解散工人，平息事态。但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不会让他如意，余长彬按照前一日会议上的部署，召集工人代表会，产生工人代表团，正式决定罢工，并在13日发动工人包围路局办公楼，向局长索薪。

工人们的怒火早就按捺不住了，听到工人代表会下了命令，都铆足了劲，到13日上午便成群结队拥向路局办公楼。铁路临时工、党员宁崇溪率领工友们冲在最前面。宁崇溪原是沙市工人，1926年入党，1927年4月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开办的工人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先后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和秋收起义的战斗。其所在部队战斗失利被打散，宁崇溪找不到队伍，就化装成叫花子一路乞讨回到武汉寻找党组织，10月时经工友介绍认识了余长彬。宁崇溪拿出在工人运动讲习所学习的结业证书，介绍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余长彬就将其安排进铁路当临时工，同时向省委报告情况。省委经考查，恢复了宁崇溪的组织关系，并命他在余长彬领导下在徐家棚从事工运工作。

在这次索薪斗争中，宁崇溪一呼百应，数百名工人把路局办公楼围了个水泄不通。路局局长和高级职员早就听到风声避而远之，无人出面回应。工人们见此情况，就在宁崇溪的带领下砸开办公楼的门窗冲了进去，很快就搜出藏在办公楼里的数千元存款。路局明明有钱却不发薪，让工人一直忍饥挨饿的丑恶行径，一下子就暴露在众人眼前，这激起了群众更为强烈的愤怒。工人们把办公楼里的存款散发后，又拥向路局局长的住宅并包围。此时，徐家棚铁路护路队队长和叶云卿在局长住宅临时当起了“护院”，然而众怒难犯，面对团结一致的工人，他们也不敢来硬的，只得连连向群众磕头，放低姿态，请大家息怒。工人们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护路队长和改组委员会头头狼狈不堪的样子，顿觉出了一口恶气，方才慢慢散去。

徐家棚铁路工人罢工索薪斗争发生后，省委立即要求江岸区委向京汉铁路江岸段工人进行宣传，并号召采取一致行动罢工索薪，以互为支援。当时，江岸铁路工会改组委员会成员惧怕共产党和旧工会（七一五“分共”政变前由党领导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成员对其进行报复，纷纷逃跑，形势有利。但旧工会的执行委员忙于恢复机关，没能抓住时机发动群众。省委发现后，坚决要求江岸区委把铁路工人们发动起来进行斗争。

到11月15日，江岸铁路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包围大智门车站，强烈要求路局局长发薪。当天，省委派汉口区委常委、工委书记周兆秋代表七一五“分共”前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向江岸铁路工人演讲。周兆秋算是“老



工运”了，1925 年底武汉工人代表会组建时，他就是负责人之一，1926 年 10 月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更名为湖北全省总工会并选举执行机构，他被选为秘书长。省委原本以为周兆秋应在工人中有较高威望和影响力，可以鼓动起群众情绪，不料周兆秋对工人的讲话却起到了反作用。他的讲话内容现在已不得而知，《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在唐溃败前后，省委指导工作的情况》中记载：“但因周兆秋所说的话离开工人实际要求，同时江岸铁路工人从前对省总也无好感，周兆秋同志去的结果，不但不能鼓动群众，反使群众不满意。”更糟的是，原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周天元也跑到大智门车站演讲，与江岸区委争夺群众。和叶云卿一样，周天元也是早期党员，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表现突出，并长期参与和领导江岸铁路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周天元脱党，并自行组织工会，既不受反共的工会改组委员会控制，也不服从党组织的指挥。周天元的出现，使工人们议论纷纷，思想混乱，斗争的劲头弱了下来。关键时刻，省委另外派人以广水工人群众的名义向群众鼓动，坚决的非要局长立刻发薪不可，才使工人不致受周天元的欺骗，得到相当的胜利。



民国时期的大智门车站

铁路工人索薪斗争获得了胜利，但党组织想利用索薪斗争进一步扩大局面的计划没能实现。11月14日晚，徐家棚区委想利用铁路大队的一部分武器直接攻打路局局长住宅，还打算与武胜门纱厂工人联合行动，结果未成功。到15日，工人自行复工。11月下旬，党组织与余长彬就近期工作谈话，余长彬指出，党在徐家棚铁路工人内的组织发展得不够好，党要通过工会组织来发动群众，还应在斗争中组织和产生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总会，反对改组委员会，并秘密组织工农军，在护路队中加快宣传工作，“徐家棚的工人只要有党即可以动作”。

12月，湖北省委改选，余长彬当选湖北省委委员。同月，粤汉铁路局派来新局长，此人一上任竟宣布对过去6个月未给付的欠薪概不负责。这种肆意欺压工人的恶劣行径自然激起新一轮反抗，余长彬和在索薪斗争中产生出的工人代表团又站在了最前线，引起反动派的极端仇恨和残酷镇压。路局宣布开除包括余长彬在内的200余名工友，并勾结掌控武汉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捕共产党人。1928年1月3日，余长彬被捕，1月10日被敌人杀害于汉口济生三马路，年仅29岁。

武胜门外工潮涌动

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各行各业资本家纷纷反攻倒算，全盘推翻大革命时与工会订立的劳资条约、待遇条件，以各种理由停工或开除工友，支持反动派扶持的“工会改组委员会”，重用那些充任改组委员的流氓、工贼，竭力压迫工人。武汉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都深受荼毒。

当时武昌武胜门外（今积玉桥一带）沿江地区有一纱、裕华、震寰等纺织工厂，工人众多，党组织的基础较好。1927年8月初，一纱、裕华、震寰的纱厂工人参加了党领导的武汉工人同盟总罢工，这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恨和纱厂资本家的不满。一纱党员余昆等6人，裕华纱厂党员李子钧、陈巧英等9人和工友李治友等10人，震寰纱厂党员江大妹等10人先后遭逮捕，党领导的纱厂工会组织被破坏，由“工会改组委员会”取而代之。但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是在大革命的斗争中形成的，而汪精卫、唐生智



和资本家们以流氓工贼充任的“改组委员”则被工人们视为反动派走狗，共产党依然是人心所向。9月初，湖北省委工委领导的工会在一纱、裕华、震寰等纱厂秘密恢复，厂内工人皆为工会会员。从9月下旬到10月，几家纱厂的资本家在反动当局的撑腰下纷纷叫嚣推翻大革命时的工人薪资和待遇，并数次以各种借口停工、减薪，其中一纱每月竟只给工人发两元生活费，想以此胁迫工人就范。纱厂工人们则在工会领导下针锋相对展开斗争。尽管这些斗争没有获得胜利，但工人们都认为共产党又回来了，自己有了主心骨，“武胜门外纱厂工人在政变前罢工失败后，工人群众反较前兴奋”。



武昌第一纱厂办公楼旧址

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下野。但在此之前，武汉反动当局就已人心不稳，其内部都在传言共产党在10日或11日会进行暴动并对国民党政权人员进行报复，因此各类机关从9日起就开始恐慌性搬家和逃亡，到11日基本上人去楼空，武汉市面恐慌情绪达到顶点。11月11日，湖北省委下令由武胜门外纱厂工人趁敌人混乱首先发动罢工，并派省委组织部长汪泽楷到武昌亲临前线指挥。12日，武昌市委决定集合一部分群众和武装力量攻入厂内，解除工厂保安队的武装，号召工人罢工，同时捣毁“纺织总工会改组委员会”。但由于指挥上协调不顺，当党组织的武装准备就绪出武胜门时，已经到了早上工人上工的时间，工厂大门关闭，而大门内有资本家豢养的武装流氓工贼守卫。原计划是党组织的武装趁工

人上班时进入工厂，打死看厂的流氓工贼后马上宣布罢工，可现在工厂大门敌人防备森严，原定计划无法实施，只得暂时偃旗息鼓。13日，省委为了能顺利发动罢工，特地派参加过南昌起义，在海陆丰和广州先后担任农军队长和工人纠察队队长的刘力劳（刘道盛）到武昌，担任罢工总指挥。当天傍晚，枪支被送到厂内同志手上，厂外党组织的特务队也埋伏好了，万事俱备。14日早7时，“啪！啪！”两声枪响划破了工厂上空的沉寂，厂内同志突然发难，击毙一名工贼，打伤一名，全厂工人听到枪声后立即完全罢工，并纷纷拥向工厂外，就等厂外特务队杀进来，解除安保队和流氓工贼的武装。然而不知为何，刘力劳却没有下命令发动进攻，这导致罢工工人群龙无首，不知所措，而工贼流氓和保安队则趁机重新组织起来，镇压罢工。厂内工人同志非常勇敢，在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手持武器与工厂保安队对峙、战斗，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在保安队和“改组委员会”工贼的枪口下。

除了罢工，党还领导工人消灭工贼、内奸。10月2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通过的《目前武汉工人争斗行动大纲》中就提出“厉行赤色恐怖，打杀改委及一切工贼”。10月27日省委《目前紧急争斗决议案》中提出“暴动杀尽工贼改组委员会及一切反动派！”11月初，省委起草政治党务工作方针议决案，提到反对新军阀战争宣传大纲，大纲中明确提出口号：“杀尽工贼！”“打倒改组委员会！”到11月15日，党中央发《中央致两湖省委信》，要求“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工头”。由此，针对工贼、内奸的清算行动，不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起。

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福利部部长的著名女工党员张金保曾回忆，1927年深秋自己被敌人关押在湖北省第一监狱时，有人来探望她，并对她说，裕华纱厂工会被“改组委员会”篡夺后，一个流氓头子当了工会主席，而裕华的老板则对“改组委员”们极为笼络，工会改组那天，老板大办宴席，以示庆祝。正当一班工贼流氓吃得满嘴流油，吆五喝六的时候，中共武汉门外区委员会常委、改组前旧工会的组织部长朱德祥以及田明亮等同志，戴着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毛织套头帽子闯进客厅，掏出手枪对酒桌上的人连



开数枪，打死了胡腊苟等两个“改组委员”，另有几个被打成重伤。随后，朱德祥等人就在工人们的掩护下顺利撤离了，敌人连根毛都没摸到。

11月，震寰纱厂工会“改组委员”朱如铁摔死一名林姓男工，引起众怒，纱厂工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秘密处死了这个工贼。该厂女工听到消息后，高唱《国际歌》，拍手称快。不久，厂方和“改组委员会”蓄意报复，以“剪发就是共党分子”的莫须有理由，开除剪发女工。此事引发了武昌学生声援女工被捕事件。

11月29日中午，在中共武昌市委和武昌市团委的领导下，武昌全市学生举行联合大会。会后，学生列队前往震寰纱厂声援被开除的剪发女工和之前被捕的学生。晚7时，学生到达震寰纱厂，工人们纷纷出厂欢迎并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反动当局逮捕学生，同时宣布恢复七一五“分共”前的省总工会。群众斗争引来了敌人的渗透与破坏，正当大家情绪高昂，庆祝旧工会恢复时，会场上突然响起了刺耳的枪声——原来，雷汉卿、丁白庚、熊良伢、伊春山、伊起发这五个纱厂的“改组委员”混进参会人群，见群众大会上宣布恢复旧工会，竟丧心病狂地掏枪向参会学生和工人射击，以破坏会议秩序，制造混乱。群众见这几个工贼如此放肆猖狂，怒不可遏，当即一拥而上将他们拿下并押到厂后空地。省总工会随即向群众宣布进行审判大会，判处五名“改组委员”死刑，并用从他们身上缴获的手枪当场执行。当众用反动派发给这五名工贼的枪处决他们自己，狠狠杀灭了工贼内奸改委们的嚣张气焰，武汉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者的斗志则为之大振。

英勇劫狱与神奇越狱

当时武昌有两所监狱，一所是位于府后街以南，紧邻武昌县政府的武昌县监狱，另一所是在文昌门正街的湖北省第一监狱（省立模范监狱），其中湖北省第一监狱也是武汉国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委员会”的驻地。七一五“分共”前，这两所监狱里关押的全是在湖北各地被革命政权和工会、农会逮捕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工贼、流氓无赖等各色罪犯。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原来关押的这些罪犯纷纷“扬眉吐气”，被释放出狱；同时，

反动当局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会农会会员、革命群众乃至一些思想左倾的进步人士扣上“反革命分子”或“共产嫌疑”的帽子，大批抓捕，投入监狱。不少革命者被捕后，敌人只草草审讯一番，即提出监狱并杀害。



省立模范监狱，位于武昌文昌门，部分监舍用房保存至今，为武昌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1927年11月9日，唐生智溃败之势已经很明显，湖北省委召开常委会制定斗争策略，在唐生智退出武汉时应进行的工作中，明确指出要“打破牢狱释放一切罪犯”。11日，武昌党、团组织开始着手准备罢工、杀工贼、劫狱等工作。13日，坐镇武昌指挥全局的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汪泽楷和中共武昌市委、共青团武昌市委在中山大学商学院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商讨行动计划并部署任务。团武昌市委方面提出首先应攻打武昌县监狱，并指出，该监狱关押着不少重要同志，而刚刚辞职交任的武昌县县长是自己同志，对武昌县政府和监狱最近的情况很了解，县政府已经人心惶惶，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同时，监狱内被关押的同志也与组织上保持着联系。可以趁黄昏时组织特务队接近监狱大门，朝天鸣枪逼迫站岗哨兵缴械，然后冲进去里应外合，便可成功。当然，还存在一个不利的因素：监狱南边隔着马路



就是一个警察署。如果此警署内有敌人组织起来阻止劫狱，就准备十几个手榴弹，到时候直接消灭敌人。

然而这个方案遭到了汪泽楷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就让几个学生拿着枪去行动是在冒险，“敌人力量太大去不得”。对此团武昌市委方面予以反驳，说胆小怕事是右倾机会主义。双方争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汪泽楷还是同意了团武昌市委的劫狱方案。

11月13日傍晚，由在共青团武昌市委负责军事工作的王达强带队，30余名团员携带手枪组成行动组，按计划直扑武昌县监狱。王达强从1925年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汉口特别支部特派员、共青团汉口部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长，是一名经验丰富并在青工、学生群体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青运工作者。他平时十分关心青年的学习和生活，又豪爽大方、乐于助人，很多青年都将他视作知心朋友，愿意听其召唤和调遣。王达强还积极开办青年培训班，培养出了一批骨干。这次劫狱任务由王达强带队，无疑是最佳选择。

当行动组抵达监狱时，情况和之前预想的一样，县政府官员和监狱的敌人基本上都跑光了，只留下一个兵背着支步枪在守大门。行动队员见势便一拥而上，要求他放下武器，打开监狱。那士兵一看这么多“共党”直接踹上门，上十支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自已，哪里还顾得上为反动派卖命，当即就把步枪丢到地上并打开监狱大门。而马路对面的那个警察署也没有任何人出来过问和拦阻劫狱队伍。“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所在的省第一监狱附近倒是有武汉卫戍司令部的敌兵一部驻扎，若劫狱消息被其侦知，很有可能会派兵来阻止和镇压。但这次行动的保密性和突然性都做得很好，该部敌兵自始至终连武昌县监狱被劫的消息都没听到，自然更不会派人来。王达强率领的行动组，通过这场勇敢而机智的突袭，未放一枪就顺利地救出了关押在武昌县监狱里的百余名同志。武昌县监狱劫狱斗争的胜利，激发了广大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在“镇压反革命委员会”那边，则是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60多名革命者趁敌人防备松懈之机，集体越狱成功。不过，这60多人能从敌人眼

皮子底下跑掉，却与“镇压反革命委员会”主委郝绳祖的成全有很大关系。

郝绳祖，湖北咸宁人，早年在法政学堂学习，成绩优异，是武汉三镇知名的大律师。青年时，他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思想进步。1925年7月，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召开，会上选举产生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陈潭秋、钱介磐、吴德峰、刘季良等11名共产党员当选执行委员、候补委员，还有3名在当时就以左派著称的国民党人当选执委，即张国恩、张朗轩、郝绳祖。从此，郝绳祖开始同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北伐军攻打武汉前后，郝绳祖冒着被军阀抄家杀头的危险，将自己的住宅作为秘密据点，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开会和部署各方面工作使用。

国民政府迁汉后，湖北省政府于1927年4月成立。郝绳祖与邓初民、孔文轩受命组成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起草委员会，并起草《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由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讨论通过。在组建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推定郝绳祖、张国恩为委员。8月，十五军军长、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刘佐龙因擅杀十五军副军长、政治部主任耿丹引发众怒，武汉国民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宣布逮捕刘佐龙，并免去其省政府委员职务。省政府常务委员孔庚遂提出由郝绳祖继任为省政府委员并兼司法厅长，汪精卫点头同意。郝绳祖由此掌握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司法大权，同时还兼任“镇压反革命委员会”主委，控制湖北省第一监狱。

此时汪精卫集团已经反共，武汉街头不时就会响起屠杀革命者的枪声，郝绳祖则依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宽待被捕的党团员和进步群众。据张金保回忆，当时监狱内关押了党团员、农协会员、工会会员、进步人士等近三百人，关押政治犯的牢房白天都是大门敞开，犯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平时在狱内的一般活动也没有看守加以禁止或限制，天气好时，众人能坐在监狱院子里的大石头上闲谈。一位县农协秘书长给大家说《包公案》，说得有声有色。还有一位曾姓教育界人士给大家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列主义，广受欢迎。另外，监狱还允许探视，订报纸。



不过，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郝绳祖也不能表现得太“红”，以免引火烧身，“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抓捕和关押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中华全国总工会福利部部长张金保、汉口第三区委书记龙大道、汉口第三区委委员杨献珍、武昌武胜门外区委干事肖桂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秘书何恐（党员、青运领袖）、湖北省委民中支部委员马子谷（马任之）等大批省市党组织的重要干部相继被捕入狱。何恐就对郝绳祖很不满，在大家聊天的时候痛斥：“他妈的郝绳祖，以前我是他家的贵宾，现在把我当成反革命了。我们不是反革命，他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宁汉战争时，武汉局面日趋混乱，被关押的革命者公推何恐等几名代表，要求面见郝绳祖并提出质问：“一、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二、改善生活，给予自由。”郝绳祖无法回答，只能避而不见。后来局面对唐生智不利，武昌粮食供应日益紧张，直接影响到监狱。被“镇压反革命委员会”关押的革命者每天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于是就又公推代表向郝绳祖和“委员会”抗议：“你们不能把人关在这里活活饿死，如果有罪就枪毙，不枪毙就要给饭吃。”在压力下，郝绳祖通过种种途径弄来粮食，保证了在押人员一天能吃上两顿饭。

到11月初，唐生智败相尽显，省委进行部署，准备里应外合，让省第一监狱里的被捕同志越狱。一方面，省委军委利用监狱管理宽松的有利条件，与在押同志取得联系，并向内偷偷送进工具和武器，要在押同志提前做好破坏和越狱准备工作，同时要注意麻痹敌人。另一方面，省委通过关系，将个别看守人员争取了过来，同时也对郝绳祖做了思想工作，要他届时便宜行事。

11月14日是个阴雨天，也是省委决定发动越狱的日子。在此之前，大家已经做好了准备。女监房临街的一面墙上有个小窗，窗中的一根木格已被女同志用小剪刀割断。但这个窗子较高，翻窗逃跑比较困难，所以男监的同志就在何恐的房间朝外侧装有夹板的墙上设法将一小片墙基挖松动。当天，一个被争取过来的杨姓看守在送报纸时偷偷地告诉在押同志：“郝绳祖已经过江到汉口开会去了，这是越狱的好机会，到时候会有人来接应你们。”

越狱行动开始，众人合力把挖松动的墙推倒，露出了一个不大的洞。因为不清楚洞外是什么情况，身材短小精悍的肖桂昌打头阵钻出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外面是个小院子，有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孩。接着几名男同志带着武器从洞中爬出，暂时将妇女和孩子关在房里看守，然后招呼其他同志一个接一个从洞中往外钻。当张金保等人越狱时，突然发现其他看守注意到了他们的行动，心里顿时吃了一惊。但让他们惊讶的是，那些看守竟然装作无事发生一样，视而不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过了很久之后，张金保等才了解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做通了郝绳祖的工作，而郝绳祖也提前跟看守们都打好了招呼，有意纵容越狱。

在押人员中有 200 余人趁此机会逃跑，但在沿途经过街巷时，因目标太大，不幸被其他反动军警发现，落在后面的同志未来得及疏散，就遭敌人劫回。最后有 60 余人成功越狱，并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安全转移。

武汉反动势力对此非常恼怒，越狱发生后的第二天，武汉三镇的街头和码头就四处张贴着咒骂郝绳祖放跑共产党人的标语。某些反共分子把持的报纸还刊出文章，大骂郝绳祖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胡宗铎、陶钧进占武汉后疯狂反共，大肆搜捕和屠杀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郝绳祖也被明令通缉。危难时刻，他幸得一名之前自己救下的青年军官报信，在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帮助下连夜弃家出走，才躲过这场生死劫。

尽管如此，郝绳祖仍然心向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儿子和女儿长大后都参加了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抗战时期，郝绳祖在北平行医，他的家又成为北平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开医馆各色人等来往频繁的特点为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很巧妙的掩护。可以说，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从武汉到北平，郝绳祖做共产党亲密战友的初心始终不改。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孙 勤）



震寰血案

纱厂工人奋起抗争

武昌临江大道 76 号附近，在现代化居民小区的环绕掩映下，一座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三层小楼静静伫立着，那里曾经是武昌第一纱厂的办公楼，它曾见证 1927 年武汉纱厂工人的血泪与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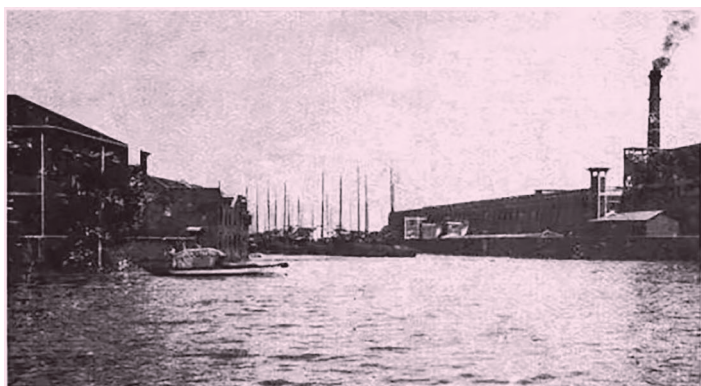
武昌第一纱厂办公楼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取代北洋军阀，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奴役中国的新工具。在新军阀唐生智、胡宗铎的先后统治下，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

群众遭到疯狂屠杀和镇压，武汉工人阶级和各阶层革命群众陷入了白色恐怖的苦难之中。但是英雄的武汉工人阶级没有被武汉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屠杀和嚣张气焰吓倒，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纱厂工人就是其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20 世纪初，厂址位于武昌武胜门外曾家巷码头处的“商办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为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纱厂。在一纱的带动下，武昌沿江一带又相继创办了裕华、震寰等纺织厂，标志着由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武昌纺织基地的形成。在这些纺织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武汉成为国

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纺织工业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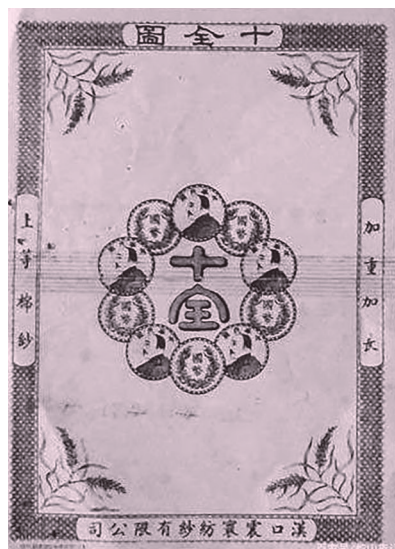


左为裕华纱厂，右为震寰纱厂

然而，纱厂工人的工作环境却十分恶劣。车间里噪音震耳欲聋，棉尘乱飘，空气污浊，令人呼吸困难，甚至导致肺病。即便如此，大部分值机工人为了赶工，连午饭都不去食堂，而是在车间吃“棉绒饭”。到了夏天，纱厂为了保持空气湿度以保证纱布的质量，车间不仅不开窗通风，还要喷射水汽。在七八月的酷暑天气，工人经常热得中暑，童工更是苦不堪言。1927年8月，武昌震寰纱厂发生几起热死工人事件，震寰工会多次向厂方要求缩短工时2小时，厂方却置之不理。纱厂女工中有不少是“小脚”，她们长时间站在闷热的车间里，每人在几个机车前连续不断地重复一系列的机械动作，常常身心俱疲，又因工厂没有安全设备，极易发生工伤事故或患上职业病。还有的女工不得不把尚在襁褓的孩子带到车间照看和哺乳。

工人们不仅在身体上遭受着恶劣环境的侵害，精神上也饱受着严苛条令的压迫与摧残。

工人一般需要在入厂前获得厂内同



震寰纱厂的棉纱商标



乡或工头的介绍，同时找一家愿意为自己作保的店铺，联名与厂方签订“志愿书”“保证书”之类的契约，才能入厂。“保证书”中有“遵守厂内一切规则”“如有违反任凭厂方开除”“遭遇不测，各安天命”等规定，极为苛刻霸道，毫无公平可言。

工人们进厂之后还要遵守厂方制定的各种无理规定。比如工人结束全天工作离厂时要接受搜检人员搜身检查；厂方会克扣工人一定工资以防止工人违纪或转工，还会对工人不严格遵循生产操作规范、迟到、旷工、打瞌睡等罚款。工头手握介绍入厂和解雇工人的“生杀”大权，常常勒索、宰割甚至打骂、侮辱工人，很多工人迫于维持生计，敢怒不敢言。

大革命失败后，反动的武汉国民政府更是颁布了一系列强制工人声明非共、禁止开大会、禁止罢工等反动法令，还派出军队、警察和暗探驻厂监视工人，对工人突击搜身检查，并经常到工厂点名抓人，许多工人领袖和工运骨干惨遭杀害。

不仅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断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资本家也更加猖狂地向工人反攻倒算。他们推翻和废除了大革命时期与工会订立的一切协议，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克扣或拖欠工人工资，还发给工人不兑现、难流通、贬值严重的“国库券”，禁止任何罢工，剥夺工人集会言论自由，还无理开除工人，使数十万的工人失业。他们成立以流氓、工头、工贼为骨干的“工会改组委员会”或“工会整理委员会”，占领了原来革命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又派出大小爪牙霸占控制各产业工会以及各厂工会。“工改会”或“工整会”实际上成为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在工厂的走狗、帮凶和耳目，专门控制、压榨、欺骗工人，从事反共活动，破坏工人运动。一旦有工人反抗“工改会”或“工整会”，卫戍司令部就说他们是“共产党”，并处以拘禁、逮捕甚至枪毙，工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反动当局和资本家的反攻倒算，共产党员们没有退缩畏惧，而是针锋相对展开斗争。

开除剪发女工激起公愤

工会改组委员会和工会整理委员会的恶行让工人们越来越痛恨。1927年11月，震寰纱厂一姓林的男工被工会改组委员朱如铁打死。工人为了反抗迫害，秘密处死了这个工贼。该厂女工听到这个消息，高唱《国际歌》，拍手称快。

工人日益强烈的反抗，让资本家和改组委员会感到惊慌，他们极端仇视这些进步工人，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清除出厂。但是这些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深受工人群众爱护，又很注意工作方法，资本家抓不到把柄，便与诡计多端的改组委员会狼狈为奸，竟以“剪发就是共产分子”为由开除了10名剪发女工。

无理开除剪发女工的恶劣行径让长期受到压迫的工人们义愤填膺。工人们开始罢工抗议，资本家怕造成损失，于是假意答应被开除女工复工，但不肯补发被开除工人的工资。

广大工人积极支持被开除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解散改组委员会，召开工人大会选举自己的工会。

中共武昌市委因势利导，指出震寰纱厂开除剪发女工是清除革命骨干，消灭工人斗争力量，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援助。中山大学党组织和学生会先后开会，积极研究支援办法。经过商量，学生们决定一方面油印传单、标语等宣传品到工厂区宣传，一方面慰问被开除工人和家属，调查她们的具体困难，希望能够团结广大工人和学生的力量为被开除剪发女工争取利益、讨回公道。

1927年11月26日下午，中山大学文学院二楼的礼堂内热闹非凡。武汉市各界妇女近400人汇聚一堂，参加在此召开的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剪发女工大会。大会推举中山大学学生许闻道为主席，并请来震寰纱厂被开除女工代表在会上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工代表走上台，控诉了反动分子和资本家们长期以来对工人们的压迫。她向参会者们讲述了工人



厂里工时长、工作重，还经常以各种理由被罚扣工资、谩骂殴打甚至开除的遭遇，又讲述了资本家以剪发为罪名开除十余名女工以及女工们被开除后生活困难的惨状，讲得情真意切、声泪俱下。参会的同志相继踊跃发言，义愤填膺地高喊：“打倒资本家！打倒改组委员会！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的剪发女工！”大会决议：将到会的女教员、女职员、女同学组织起来，成立“武汉各界妇女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剪发女工委员会”，选出马坤、许闻道、陈慕兰、彭端淑、胡颖傑、黄自纯等十余人为委员，组织力量支援被开除女工姊妹。会议结束，参会人员分成三队，打算分别前往震寰纱厂、第一纱厂和裕华纱厂进行宣传，跟厂方交涉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并补发工资。一位个子很高的女生站出来自荐当临时指挥，她用洪亮的嗓音喊道：“集合！”近400名妇女四人一排，整齐地在横幅大旗后面列队，向武胜门外的工厂区大步走去。

这支400人的队伍喊着口号，举着旗帜，大步前进。在走近武胜门工厂区时，遇到了一队士兵。士兵们在枪上装上刺刀拦住了宣传队的去路。宣传队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走上前跟他们讲道理，说工农兵是一家人，士兵兄弟应该帮助受苦难的工人姊妹。后面的队员们唱起“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士兵们没说话，把枪背到肩上就放宣传队过去，宣传队员们高兴地直奔工厂而去。到了工厂区，三个工厂的工人们列队欢迎宣传队，感谢妇女界的支援。

11月27日下午，宣传队还是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礼堂集合，携带宣传品和旗帜，唱着歌前往工厂。工人群众热情欢迎宣传队，但狡猾的资本家倚仗着有反动势力撑腰，蛮横地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不但不肯补发工资，还扬言谁要补发工资就开除谁。

11月28日下午，这支由武汉各界妇女组成的宣传队依然不屈不挠地按时集合，拿着宣传品和横幅旗帜向工厂区进发。但宣传队走到上新河时，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改组委员、工贼、流氓们手持棍棒跳出来，把宣传队员们打得头破血流。有的眼睛被打肿了，有的手臂被打伤了，还有被工人家属、黄包车夫劝着拉着离开的。工贼们抓走了13名女同学，禁锢在裕华和第一

纱厂的警卫队值班室。

中山大学的女学生回到学校后立即向学生会报告了遭到殴打和有学生被逮捕走的情况，学生们群情激愤，要求到工厂抗议。近千名男同学喊着口号向工厂奔去。当队伍快到达工厂时，改组工会的流氓打手们用皮鞭、铁棍毒打学生，又抓走了 10 位男学生。

11 月 29 日早上，资本家和改组委员会召来全副武装的军警，每两个士兵押送一位青年学生从武昌工厂区渡江到汉口的国民党市党部。改组委员们像一群恶犬一样前后奔走，唯恐有一人跑掉。23 名学生昂首挺胸，面无惧色，虽被军警押送，却像在游行示威一般，一路唱歌、斥骂改组工会。到了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市党部中的国民党左派拒绝把这些青年转送有关方面。改组委员和工贼又把学生转送往武汉卫戍司令部裕润里看守所拘押。

有学生被逮捕、送押的消息传开后，武汉市各界积极开展援救被捕学生的的工作。武汉市学联、中山大学同学会把被捕同学在武汉的家长亲属组成“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女工后援会”。家属们相互支持，各自找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孩子。中山大学的学者、教授等向政府抗议，要求释放无辜被捕学生。湖北省政府的张知本、张难先和驻武汉第十三军军长陈嘉佑等纷纷要求胡宗铎、陶钧释放关押的学生。

震寰纱厂的女工们也开始努力抗争，维护自己的权益。11 月 29 日，1 万名工人和学生在武昌武胜门纱厂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反动当局逮捕无辜学生，要求恢复老工会。震寰纱厂的女工们为复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集合同学和学校职工到纱厂区开群众大会，几个改组委员混入会场，居然掏出手枪，要向群众开枪，当即被工人截住。大会立即宣布了这几个工贼的罪状，当场把工贼雷汉卿、丁白庚、熊良伢、伊春山、伊起发用他们自己的手枪处死了。

工贼的死让资本家们心惊胆战，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兵驻厂保护。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和纱厂工人们依然继续跟改组工会斗争。12 月 16 日，反动派悍然采取武力镇压，用三个营的军队包围、占领了中山大学，逮捕了社会学讲师林可彝和周达山、严大朱、江涛等十余名学生，并将他们在阅马



林可彝

场残忍枪杀。

13名女青年被关在裕润里最末尾一幢楼房的二楼，10名男青年关在对过楼上。陈慕兰的眼睛被击伤，半边脸都肿了，袁仙芝的头发被扯脱两大块，周游、黄自纯的手和腿脚被打伤了。梅玉珂、胡颖傑的头被打伤。刚开始同学会和学生的家属们还被允许送食物、书籍来慰问，到12月1日，看守牢房的士兵们在竖着的铁栏杆上又加

了一层横铁条和一层铁网，也不许外面的人进来探望了。女生们在包烧饼的旧报纸上看到女学生援助被开除女工的新闻报道，新闻透露反动政府准备从男女学生中各挑一个人出来查办，以儆效尤。女生们决定团结一心，同生死共患难，统一口供：一是控告改组委员会无理抓人，应当绳之以法；二是自己承担责任，坚决保护同志。男同学收到这一消息，也表示会紧密团结，同生共死。

23位被关押的学生都是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提审中，他们始终坚持控告改组委员践踏人权，不谈组织和同志的情况。他们的团结一心让反动当局的计划落了空。

丧心病狂的反动当局最终竟以年龄大小来判决，二十岁以上判处死刑；二十岁以下判有期徒刑。

12月18日傍晚，学生们正在吃晚饭，年龄最大的四位男生许白池、吴琼、田常、李子芳和五位女生陈慕兰、马洪、纪李华、许闻道、梅玉珂被士兵们又是推又是拖地带走了，其他人以为又是去提审，便安静地等着。

可过了一会儿却来了一群士兵拿走了他们的被褥、衣服，还谎称是送他们去模范监狱，东西要带走。

九名年轻的战士英勇无畏，他们走在赴刑场的路上依然高声喊着：“打倒国民党！”“打倒工会改组委员会！”“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女工！”“共

产党万岁！”

在汉口德润里空场，罪恶的枪声响起，九名风华正茂的青年被残忍地夺走了生命。其中一名已婚青年被枪杀时还怀着孕，她被残忍枪杀后，肚子里的婴儿还在蠕动，现场惨不忍睹，见者垂泪，闻者伤心。

在牺牲的五位女学生中，梅玉珂曾有过幸免于难的机会。据 1929 年中国济难总会编辑的小册子《牺牲》记载：梅玉珂被捕后，其父多方营救，胡宗铎以湖北黄梅同乡的关系亲自提审，并表示看在同乡情分上，只要梅玉珂自首，就可以从轻发落。不料梅玉珂一见面，便破口大骂胡宗铎反革命！胡宗铎盛怒之下，下令将其绑缚刑场枪决。梅玉珂用她的青春和生命，体现了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在这起震寰血案前后，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领导工人罢工的女英雄王小妹。

王小妹是上海人，在武汉裕华纱厂做工，家中父母与丈夫都是纱厂工人。王小妹很早就展露出领导才能，1926 年加入共产党之前她就多次指导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和第一纱厂的工人开展斗争，为工人争取权益。

1926 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前夕，王小妹积极组织武昌武胜门外 2 万多名纱厂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来迎接北伐军入城，反动政府吓得惊慌失措。北伐军到武汉后，她又领导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后，武汉工人为响应南昌起义和反对暴力压迫，决定举行八二总同盟罢工。王小妹作为纱厂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打倒国民党、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她还担任党的武胜门外区常委、纱厂总工会执行委员、裕华纱厂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奔波在工人运动第一线，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们开展斗争，并一次次取得胜利。因此资本家和军阀对王小妹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7 年 10 月初，王小妹带领工人们刚取得一场发现金运动的胜利，就被捕入狱。纱厂工人们为救王小妹出来，多次关停车间怠工示威，逼得资本家不得不保释王小妹出狱。12 月，王小妹又带领 2 万多名工人群众罢



工示威，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的剪发女工，召集群众大会当场枪毙工贼。面对反动派 200 余反动军警的武装压迫，王小妹指挥若定，毫无惧色，派罢工群众向军队宣传，竟说服了反动军队，工人群众在枪毙工贼后安然散会，被开除的女工也得以复工。

几天之后，王小妹再次被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逮捕，裕华纱厂、震寰纱厂 8000 余名工人怠工，抗议王小妹同志被捕入狱，要求厂主保她出狱，厂主假意答应以缓和工人怠工。但是敌人早已将王小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很快就将王小妹杀害。12 月 19 日，王小妹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依然没有一丝畏惧和屈服，她沿途高呼口号，向群众发表演讲，痛斥反动派的罪行。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惨绝人寰地剥去她的衣服，割下她的乳头，血流遍体。王小妹死后，残暴的敌人还将她曝尸数日，不准收殓，市民见此惨状，无不流泪。

这位从入党到牺牲仅一年时间的女党员，不怕牺牲，团结工人，坚决斗争，至死不渝，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党也没有忘记这位坚贞不屈的好女儿。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曾组织代表为烈士们立传，其中就有《王小妹传略》。她的英名和事迹由此得以永存，一直传颂至今。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朱蔚青）

董必武脱险记

奉命隐蔽勇斗争

1927年6月下旬，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辞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和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的职务。汪精卫假惺惺地要詹大悲转达他的意见：“湖北的事务很重要，董必武同志可以不必辞职”。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

7月中旬，汪精卫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彻底撕掉伪装。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公然进行“分共”，彻底背叛革命。会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就与蒋介石集团一样，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骨干分子，一场腥风血雨的反革命屠杀席卷江城。

根据党的指示，董必武决定辞去湖北省政府常委、农工厅长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等职务。7月19日，董必武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开登报发表辞职书，正式声明：“钧府设立农工厅于各省，原为保护农工之利益，日来工会之被蹂躏者，时有所闻；农民之被屠杀者无地蔑有；听之不忍，救之不能。似此情形，实属有幸重寄。现既不能奉行钧府法令，复无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维，惟有辞职。”

董必武没有被国民党的反动嚣张气焰所吓倒，他清醒地看到，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之后，我们党还没有来得及布置撤退的工作，随时都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董必武认为，为了使党的事业少受损失，有必要利用自己原来的社会关系继续开展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仍坚持留在白色恐怖



董必武

下的武汉继续斗争。

在最危险的日子里，董必武亲自布置党义研究所学员和工作人员的撤退工作，并鼓励他们回到各自家乡去发动群众，坚持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许多参加黄麻起义工农武装暴动的骨干分子就是由董必武直接派遣回去的。董必武、吴德峰等人还千方百计为各地工农武装筹集武器，通过汉口吉庆街德润里等地党的秘密联络点，向许多县市的工农武装提供枪支弹药，鼓励工农武装到“山林”

坚持战斗，武装“上山”坚持斗争，使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火种燃遍全省各地。董必武始终同担任党中央交通的张培鑫、湖北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湖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吴德峰以及钱介磐等保持密切联系，并争取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何羽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24日，董必武出席了在武昌青云桥何羽道家里召开的中共湖北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力量，到鄂东地区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迫害愈加疯狂。董必武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作为南昌起义后选出的革命委员会成员，董必武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形势。他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进入法租界西贡街内熊晋槐家里隐蔽，继续从事地下斗争。八七会议召开以后，活动在黄安、麻城一带的共产党员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冒着生命危险策划举行黄麻起义。董必武虽然没有直接领导黄麻起义，但是黄麻起义党组织利用董必武的崇高声望和号召力，发出布告和传单，号召工农群众实行武装起义。这次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多数是董必武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黄麻起义使用的部分武器也是董必武设法从武汉陆续运送过去的。

潜伏租界巧转移

8月2日，武汉国民政府明令：“共产党员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8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清党”决议，决定通缉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董必武等人。黄安县反动政府通缉的92名共产党员，其中第一个就是董必武。杀红了眼的反动军警头目到处疯狂叫嚣：“宁可枉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不久前赤旗飘扬的大革命中心武汉，霎时间腥风血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不断有共产党员、革命者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少数变节的共产党员公开登报声明“脱党”。但以董必武为代表的多数共产党员仍然意志坚定、对党忠诚，在转入地下之后，仍然舍生忘死地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汪精卫七一五“分共”之后，虽然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双方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7月16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讨蒋，派张发奎部东征南京。不久，李宗仁也表示反蒋拥汪。8月13日，蒋介石被迫在上海发表宣言，宣告下野，并于28日东渡日本。9月11日，国民党宁、汉、沪三方之中央执委、监委在上海开会，议决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9月17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国民党方面的宁、汉、沪三派在反共的旗帜下开始同流合污，桂系军阀一时在国民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0月19日，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的桂系军阀部队向武汉进军。11月15日，桂系军阀的军队攻占武汉。桂系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十八军军长陶钧任副司令。桂系军阀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更加疯狂的屠杀政策，每天都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押到汉口济生三马路刑场和武昌保安门外的刑场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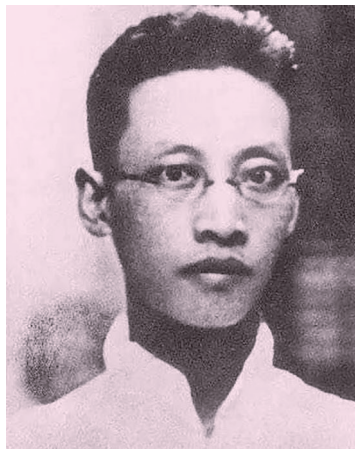
八七会议召开以后，董必武奉命继续隐蔽，在秘密状态下坚持革命斗争。他的同乡好友潘怡如想方设法为他提供掩护。潘怡如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桐柏集，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14年东渡日本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26年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汉提供过重要军事情报。潘怡如将董必武安排



到其汉阳亲戚吴家隐蔽，住了十几天。由于吴家的住宅面积较小，不便长期居住，潘怡如又将董必武转移到熊晋槐家中住了十几天。

董必武的行踪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与熊晋槐并无深交，常常借故到熊家“做客”。潘怡如见董必武的行踪即将暴露，又将董必武悄悄转移到日租界南小路袁范宇家里。

袁范宇系日籍华人，时为日本洋行代理。他曾于1912年加入同盟会东京支部，1915年回国参加中华革命党。袁范宇具有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曾掩护潘怡如从事秘密兵运活动。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极为不满，



李汉俊

因此非常愿意掩护董必武。当胡宗铎得知董必武已经转移，十分恼火。他在向南京汇报董必武的行踪的电报中说：“（董必武）潜伏租界，勾结前省市党（部）共产分子四出活动，请明令厉行清党。”胡宗铎的部下石毓灵更是公开叫嚣：“如果捉到董必武，南京已决定了，要凌迟碎剐！”

12月16日，报纸上披露了董必武“潜伏”日本租界的消息，同样潜伏在租界的李汉俊和詹大悲十分关心董必武的安全，请潘怡如专程到董必武潜伏的寓所，把胡宗铎正全力捕捉他的消息及时转告给他，并提醒他注意安全。董必武也关照李汉俊和詹大悲：你们的危险比我更大，希望好好保重。



詹大悲

12月17日，潘怡如邀约董必武去李汉俊、詹大悲的潜伏住所，董必武十分谨慎，没有前往。下午5时左右，李汉俊、詹大悲穿着睡衣，对弈围棋，潘怡如、危浩生在旁边观战。桂系军阀胡宗铎通过日本驻汉领事，派出兵力会同日本巡捕，把早已

暴露目标的李汉俊、詹大悲、潘怡如和危浩生一起逮捕，押到胡的司令部。董必武闻讯之后大吃一惊，急忙托人找朋友设法营救。

国民党反动当局根本不加审讯，就将李汉俊、詹大悲等人从武汉卫戍司令部押到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当天晚上八时，在凄风冷雨之中，穷凶极恶的国民党桂系军阀匆忙以“共产党首”的名义将李汉俊、詹大悲枪杀。詹大悲在临刑之前，满腔悲愤，用捡到的一根木炭头就地疾书一首就义诗：“一心办‘赤化’，不惜死与生。留得丹心在，永远照汗青。”面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詹大悲痛斥：“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李汉俊临刑前，向漆黑的夜空呼喊：“胡宗铎的手段真是辣啊！”革命者李汉俊、詹大悲在战斗过的江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从被捕至牺牲仅两个多小时。当晚风雨竟夕，两位烈士一夜横尸马路，全身湿透。次日午后4时，反动当局始准许收殓。反动派还把枪杀李、詹的消息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董必武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

化身水手离险境

在李汉俊与詹大悲被捕之时，董必武正在袁范宇家里。何羽道当即找袁范宇商量，要将董必武隐藏到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袁范宇想了一下，决定安排董必武、何羽道住到其岳父万斌成家里。何羽道坚决不同意一起转移，认为两个人一起转移，目标太大，不容易脱险。

何羽道，字翼人，1882年出生，湖北省汉川县人，清朝末年科举秀才，后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回国后，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武昌大学等学校任教授。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参与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共产党人董必武、钱介磐组成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三人常委核心领导，合作良好。大革命失败后，



何羽道



他不受国民党右派拉拢，辞官不做，将老母、妻子安置回乡，坚持在武汉组织地下国民党左派党部、发宣言、传单斥责汪精卫集团反共行为。在革命最危难时刻，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潜伏汉口日租界坚持地下斗争。

袁范宇与董必武一起商量之后，决定乘坐英国轮船“安庆号”离开武汉，先去上海，再设法东渡日本。袁范宇的两个堂弟袁祥福、袁祥寿都在“安庆号”轮上当水手。正巧，“安庆号”轮就停泊在汉口。袁祥福、袁祥寿可以将董必武带上轮船，转移到上海。董必武要求何羽道一起乘“安庆号”轮船离开武汉，理由是何羽道的身份迟早也会暴露。何羽道仍不同意一起离开武汉，他认为：敌人的封锁搜查已经十分严密，两个人一起转移目标太大，自己戴着一副眼镜，不容易化装，容易被敌人发现。袁范宇也表态说分开走会更安全些。董必武想想，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只是叮嘱何羽道一定要尽快离开武汉。

12月17日晚上，董必武随袁范宇悄悄地住进了位于法租界长清里的袁范宇的岳父万斌成家里。何羽道则继续留在袁公馆，袁范宇也按部就班地上下班，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并没有引起便衣密探注意。

当天晚上，袁范宇安置好董必武后，立即去找他的堂弟袁祥福。袁祥福此时虽是“安庆号”轮船的水手长，但没有享受轮船上单人房间的资格，只能和普通水手们住在一起。不过，袁祥寿却负责管理一个堆放水手劳动工具的小房间。这个小房间位于底舱，十分隐蔽。袁祥福、袁祥寿兄弟二人决定把董必武安置在那里，不容易被人发现。

商量停当后，袁祥福马上返回“安庆号”轮船，拿了一套沾满油渍的水手工作服，送给隐藏在万斌成家里的董必武。董必武脱下身上的黑皮袍，穿上这件旧水手工作服，装作是跟班拿包袱的水手，与袁祥福一起雇下黄包车，趁天黑赶往江汉关钟楼下的太古一码头，登上挂有英国国旗的“安庆号”轮船。

袁祥寿带着董必武直奔那间水手工具房，带着歉意对董必武说道：“您是我们的客人，但因情况特殊，只好委屈您啦！白天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开门，因为这条船上的船长、大管轮和二管轮全部都是英国人，他们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董必武见小小的工具房虽然堆满了东西，但剩下的空间足够他一个人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如此条件已经实属不易。董必武感激地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替我操心，担了风险，我一定小心！”12月19日，“安庆号”轮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向着上海驶去。每到中午和傍晚的时候，袁祥寿都假装到小房间里寻找劳动工具，偷偷地给董必武送饭。

董必武乘坐“安庆号”轮船安全抵达上海之后，袁祥福按照事先的计划，到日本领事馆使用化名陈重毕替董必武办了去日本的签证，并帮他买了一张由上海开往日本的“神户丸号”船票。第二天天黑之后，董必武才重新换上黑皮袍，乘上东去日本的客轮，于12月底安全到达日本京都。此后，董必武以化名陈重毕给在汉口工作的袁范宇写信，感谢袁范宇、袁祥福、袁祥寿等人对他的救命之恩。

董必武离开武汉后，12月24日，胡宗铎的宪兵就来袁范宇寓所搜查，他们没有找到董必武，就将何羽道逮捕，关进了武汉公安局。何羽道被捕后，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强迫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他挥笔写下狱中遗言：“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死固宜也。国民党反动派之大屠杀，不过逞一时之快耳。兴中国者，其唯共产党乎！”

由于何羽道特殊的身份，且长期与董必武住在一起，胡宗铎断定何羽道在共产党组织中不是一般的人物。因而，不管谁来说情担保，他都一口回绝。1928年1月4日，何羽道等四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至汉口济生三马路刑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何羽道高举双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何羽道与他的战友们壮烈牺牲。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郑巍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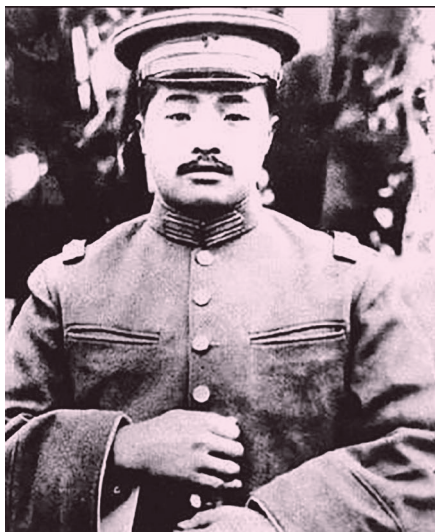


年关喋血

年关暴动流产

1928年1月15日，武汉街头，阴云低垂，寒风凛冽，一位身穿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围着羊毛围巾、戴着深茶色水晶眼镜的“富商”，带着“账房先生”和几位随从，来到了汉口协隆北里，径直“闯”入一栋房屋内。他这一举动，把室内的“女主人”吓了一跳。

原来，这并不是一栋普通的民宅或商铺，而是中共中央暂留武汉交通处秘密联络点。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负责人郭亮的妻子正好在里面，她对这群陌生的不速之客充满警觉，认定是国民党暗探特务找上门来。



贺龙

正在此时，从后屋走出一位青年，看到来客后怔了一下，连忙立正敬礼，兴奋异常地说：“哎呀！总指挥，你怎么来了？”此人名叫刘鸣先，原为叶挺部队的副官长，他认出了这位不请自来的“富商”并不是国民党暗探特务，而是威名赫赫的南昌起义军总指挥贺龙。

原来，贺龙在南昌起义军南下失利后辗转来到上海，和周逸群向中央请求回湘西重新拉队伍，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中央同意了他们

的请求。于是，贺龙化装成富商，周逸群化装成账房先生，带着几名老部下从上海乘船经武汉，准备回到湘西开展革命斗争。到达武汉后，他们想与中共湘西特委书记、正在武汉主持湖北省委工作的郭亮联系。他们找到了汉口协隆北里的联络点，却没有用接头暗号事先联络，由此引起了误会。

贺龙的到来，让郭亮喜出望外。郭亮是1927年12月2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改选省委后，负责代理主持省委工作的。192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庄任湖北省委书记，但刘尚未到任。湖北省委于1月11日发出第16号通告，决定利用农历年关时节举行全省年关总暴动，占据乡村，进攻武汉。

省委通告发出后，参加暴动准备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骨干的情绪“异常激昂”，大家都摩拳擦掌，枕戈待旦。随着年关的临近，武汉武装暴动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暴动需要一名精通军事、有战争经验的总指挥来统一领导。贺龙的到来，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湖北省委便邀请他出任武汉年关暴动总指挥。

据时任湖北省委委员的纱厂工人张金保回忆：“一天清早，湖北省委通知我去汉口宁波里小学地下室开会，那天出席会议的有20多人。主持会议的是省委常委黄五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准备年关暴动。大家兴奋异常，会后我们多方设法搞武器，有的老工纠队员把埋藏的枪支挖出来，有的几个人一伙伺机抢夺单身军人的枪支。我每天跑来跑去秘密串连，上级同我接头的人是龙大道。那时我满脑子巴不得一个晚上革命就成功。记得当时曾接到省委指示说，将于农历除夕之夜，在汉阳龟山上举火为号，三镇同时动作，实行武装暴动。后来省委取消了暴动，我们气得哭了，多年后才懂得取消暴动是对的。”

省委突然取消年关暴动的确事出有因。年关之前，湖北省委印刷机关被敌破获，暴动计划暴露。消息传开，市民们连忙准备水缸、油灯，抢购粮食、煤炭，坊间还盛传贺龙已来汉当司令指挥暴动，董必武、陈潭秋等也都回汉等等，一时全城充满紧张气氛。



此时，宁汉战争已结束，桂系军阀占领武汉，成立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鄂籍桂系军人胡宗铎任司令、陶钧任副司令，这两名以凶残著称、被称为“屠户”的刽子手，在武汉开始了最黑暗、野蛮、残暴的血腥统治。

反动当局获悉年关暴动的消息后，在武汉三镇加强了防范和镇压。从1月起，胡、陶宣布每晚7时后全市戒严，各马路五步一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有时白昼突然阻断交通，搜查行人，对各旅馆、饭店、公开场所举行不定时检查，被认为形迹可疑者即予逮捕，被拘者动辄施以酷刑，惨叫声达于街衢。任意捕人、杀人已是寻常之事。

在浓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省委常委黄五一在出席车夫会议时被捕。1月20日，省委常委黄五一，纺织总工会常委侯步升、冯良翼，裕华工会委员长段良才，震寰工会执行委员马瑞亭，汉口车夫领袖李协臣，武昌洪山农民运动领袖林子良等30多人被杀害。在此前后，省委常委夏桂林、粤汉工人领袖余长彬等牺牲。武汉三镇每天都有人被捕，到处响起杀人的枪声，从汉口宏春里、济生三马路、江汉北路，到武昌阅马场、张之洞路、大东门外，每天血流遍地。仅仅是年关，就有100多名党团员被杀害。192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记载：被杀害的“总计单是我们的同志在三百人以上”“单是在腊月底二十六、二十七日两天，即被枪决七十二个同志（二十六日三十二个，二十七日四十个）。 ”

鉴于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和年关暴动计划已经泄露，中共中央于1月20日（除夕前两天）致信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就地制止武汉暴动。至此，武汉年关暴动宣告流产。

夜台犹有钢筋骨

暴动停止后，穷凶极恶的胡、陶却没有放下屠刀。1928年2月中旬，党的秘密机关和接头机关汉口裕泰客栈、小董家下巷8号、慈德里22号、武昌保安门正街81号等处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王达祥、京汉铁路特委书记邓雅声、鄂南特委书记熊映楚、汉口市委常委胡致中等50余人被捕，40多名党团员被杀害，烈士鲜血染红江城大地。

3月初，团省委军委负责人黄佑南、交通陈沈清被捕叛变（一说黄佑南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捕叛变），供出了团省委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姓名、住址，以及机关地址、通信联络方式等，并出庭指证团省委书记唐鉴等多人，黄佑南还带领特务到车站、码头、茶馆等处守候，指捕共产党人，导致团武昌市委组织系统全部被破坏，又牵连党的武昌市委、省委各部委、省委秘书处及接头机关，党的组织从省委、市委机关到城区各支部基本被破坏。

在这次大破坏中，武昌武胜门党员被捕10余人，四局党员被捕30多人，汉口码头支部被捕40余人；汉口市政、邮务、电源、法院、宁波学校等支部全部被破坏，江岸、硚口两地党组织被破坏无遗。接着省总庶务宋若林等人叛变，省总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级工会组织完全被破坏。在湖北省委第一次大破坏中，310多名党、团干部惨遭国民党反动当局屠杀，其中有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唐鉴，省委常委夏明翰、符向一，省委委员、秘书长任开国，省委机关报《大江报》主笔向警予，汉口市委书记马俊三，硚口区委书记于忠迪，武昌县委书记魏人镜，鄂西特派员杜永瘦等。

唐鉴是被捕牺牲的省委常委之一。他是湖南宁远人，出生于1903年，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全国学联总干事，1927年春赴鄂调查，拟将学联总部迁汉。4月1日，全国学联总会在武昌正式办公。大革命失败后，唐鉴转入地下，参加武汉暴动和年关暴动，任省委常委兼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3月16日在汉口刘家庙召开共青团秘密会议时被捕。他在法庭上怒斥审讯官：“你们是军阀的走狗，我肯做军阀走狗的走狗吗！”国民党又设宴诱降，许以高官厚禄，他猛地掀翻酒桌，慨然说道：“我就是唐



唐鉴



鉴，你们要枪毙就快点，不要絮絮叨叨。”临刑时，笑着与已有身孕的妻子诀别，嘱咐莫哭，并书写“继续奋斗”四字相赠，然后面不改色走向刑场。

马俊三是安徽人，出生年月不详，1925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5月任中共武昌县委书记，此时夏斗寅发动叛乱，兵锋直指武昌纸坊镇、土地堂。马俊三发动武昌县群众侦察敌情，领导农民自卫军配合叶挺平叛部队绕过敌军前哨，占领青龙山制高点，出其不意地向敌军发起进攻。6月后，马俊三任省委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日常工作。1928年2月3日调任汉口市委书记，作出“整顿、发展、健全市、区、支



魏人镜

部的各种组织及发动群众经济、政治的各种斗争”的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到3月，汉口市委所辖支部有100多个，党员300余人。3月13日，他在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后，因不知省委交通站福昌旅馆被敌破坏，仍按约定前往接头，被守候的反动军警逮捕，旋被杀害于汉口余记里空坪。

魏人镜是湖北汉川人，出生于1906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和省委组织部秘书等职，曾回汉川开展农民运动，遭通缉。1927年10月调武昌市委工作，积极支持武胜门外震寰纱厂女工的斗争。1928年1月，在武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组建中共武昌市临时委员会（2月改建为武昌县委），任书记。经过艰苦努力，在武昌城区和农村恢复和清理了一批党支部，寻找到一批党员，总计有150余人。

3月上旬，第二小学（武昌县委接头处）共青团组织被破坏，牵连团武昌县委被破坏。接着，工人代表会通知团组织的纸条被敌特截获，导致各工会6名负责人被捕，并迅速蔓延。3月12日，县委常委办公处被破坏；14日，县委秘书处被破坏，魏人镜在此次大破坏中不幸落入敌手。3月17日，

魏人镜被杀害于武昌螃蟹岬，年仅 22 岁。牺牲后，亲人在掩埋他的遗体时，从口袋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下一首就义诗：“夜台犹有钢筋骨，地下更加奋斗争。寄语党中诸勇士，砍头枪毙莫灰心。”诗句表达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陈声煜

陈声煜出生于 1900 年，汉阳人，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其间加入旅法共产党组织，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23 年，他受党组织指派赴苏联随同鲍罗廷来华，致力于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1926 年参与策动鄂军刘佐龙起义，1927 年任湖北省军委特务科负责人，参与惩处叛徒和内奸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任省军委军械科主任。他化名孙毓、孙云卿，1928 年初在汉口三新街、昇平里建立秘密机关储存武器，动员妻子周其瑜和弟弟陈声炜一起参加秘密斗争，以父亲陈雯青的名义在汉口三新街开设宝记香烟公司，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将自己的父母、妻子、弟妹均安排驻机关掩护。自己则扮作商人四处活动，将购来的军械藏匿于宝记香烟公司地下室，支持各地武装暴动。

1928 年 3 月，叛徒黄佑南带敌破坏了昇平里机关，多人被捕，牵连到三新街机关亦被敌破获，陈声煜的父母及成年堂弟均被捕。陈声煜本人 3 月从河南鸡公山返汉后，在汉口六渡桥中南旅舍门前被黄佑南指捕。陈声煜遭到严刑拷打，仍坚不吐实，5 月 24 日被杀害于汉口榆荫里空坪，“牺牲前沿途高歌喊口号，慷慨激昂，视死如归”。

杜永瘦是湖北荆门人，生于 1906 年，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历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政治指导员、湖北省委军委秘书（军事科主任）、鄂西特派员，1927 年下半年回汉参加年关暴动。1928 年 3 月上旬，他去联系一位同志，不料遭



遇国民党军警正在这里抄家，躲避不及而被捕，3月30日壮烈牺牲，年仅22岁。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称，杜永瘦被捕后“大呼共产党万岁，声震瓦屋，固一时之雄也”。临刑前他给妻子裴韵文留下《遗书》，鼓励妻子坚持斗争，革命到底：“你的前途应当是‘干’！你的责任应当是‘干’！你的命运更使你不得不‘干’！干呵！只有干才是你的出路——人类的出路！”字里行间充满着斗争的激情和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宋 健）

龟山脚下的一家人

劫后余生到武汉

“中国一团黑，悲嚎不忍闻。愿为刀下鬼，换取真太平。”欧阳梅生烈士这首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诗句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初心使命。30年后，他的妻子陶承写了一本风靡全国的革命传记作品《我的一家》，记录了这对革命伉俪及五个子女为革命前仆后继的英雄事迹，震撼了无数读者。



陶承

大革命失败前后，欧阳梅生一家居住在汉阳龟山脚下莲花湖附近泗湾的一座小楼内，他们的家也是当年中共汉阳县委机关所在地。面对白色恐怖，这对革命伉俪和他们的子女毫不畏惧，英勇斗争，他们的英雄壮举成为江城武汉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欧阳梅生，1895年出生于湘潭县锦石阳家湾一户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体弱多病，由祖母抚养成人。1911年3月16日，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欧阳梅生在祖母的操持下和同为孤儿的陶承结为夫妻。婚礼当天，欧阳梅生脸色苍白可怕，嘴唇不停地哆嗦，以至于婚礼仪式还没结束就被搀走，先前素未谋面的新婚妻子陶承这时才知道这场婚礼是为了给自己的丈夫冲走邪祟。



欧阳梅生和陶承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人没有拌过嘴,没有吵过架。闲暇之余,欧阳梅生还教陶承识字作诗。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他们的小家却总是快乐的。从师范毕业后,为养家糊口,欧阳梅生到外县教书度日,陶承带着几个孩子来到长沙,靠做手工维持日常用度。1926年初,欧阳梅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

1927年5月21日晚,长沙城突然枪声大作。有步枪、驳壳枪、机关枪声,还夹杂着一声声沉重的炮声。驻军团长许克祥叛变了。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所有的民众团体及党部机关都被叛军劫掠一空,并贴上封条。枪炮声一夜未停,欧阳梅生急得满屋子打转。他为同志们担心,几次想出去,都被陶承拖住。四处都是枪声,隔窗可以看见熊熊的火光,半边天都红了。马路上不停地传来人群仓皇奔跑的脚步声和妇女孩子的哭叫声。一夜之间,长沙变成了恐怖世界。南门外,北门外,大街小巷,遍地尸体。城墙上贴着大幅布告:“通缉屠杀无辜民众的暴徒分子欧阳梅生!”

悄悄外出了解完情况后,欧阳梅生在夜里回到家。一进屋,他就告诉陶承,党要他马上转移。他饱含深情地说:“眼前是有些困难,慢慢会好的。”“我先到朋友家躲几天,有人来帮你们搬家。环境没有安定以前,我没办法照顾你们。担子是重了点,不过我相信你挑得起来。勇敢一点,坚持下去!总有一天,红旗还要再打起来。”亲完每个孩子,欧阳梅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家门,前往武汉。

马日事变后,长沙城面目全非,好多房屋毁于叛乱,遭劫的人们拖儿带女沿街乞讨,反革命到处捕人、杀人,见穿中山装的,留短发的便说是共产党,不加审讯就拖去杀害。许克祥的“救党办公处”还编了一首反动歌谣,指使一些人沿街叫嚷:“工会你莫凶,三十三团用炮冲。农会你莫恶,我们要你脑壳。”在满城弥漫白色恐怖的长沙,陶承不敢再让孩子们出门,怕被认出闯出祸来。不久,党组织派人将他们安顿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欧阳梅生离开后,陶承一人带着几个孩子生活,日子日益困顿。突然有一天,大儿子欧阳立安哭哭啼啼地回到家,说:“妈妈,我要到武汉去,我真受不了啦!我们的老师被人杀了,我要找爸爸去,我要跟他们拼了!”

陶承安慰孩子说：“眼前这些事，我也难过，可是谁知道武汉情况怎么样？爸爸没安顿下来，咱们去了不拖累他？忍耐点吧！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血不会白流的。如果要走，我们就一起走。你是大哥，应该帮助妈妈……”

欧阳立安听完后，伏在陶承的腿上哭得更厉害了，但懂事的他心里知道爸爸妈妈的苦衷，也不再闹着去武汉了。

眼看家里揭不开锅了，无奈之下，陶承卖掉了几件衣服，凑了两块银圆，到市场上批发了点香烟、麻糖和凉薯，对孩子们说：“爸爸出门了，要忙工作，我们不能叫他操心家务。你们都能吃苦，从今天起，上码头卖东西去吧！”

孩子们高兴地答应了，一来确实待在家里憋得慌，二来自己成了“有用的人”，能够帮助家庭，可以夸口了。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小生意也不好做。欧阳立安和欧阳应坚两兄弟早出晚归，一天也只能卖十几个铜板，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在码头生意无人照料，家里的四女儿欧阳本双病了也没钱抓药的困境中，陶承的内心几乎要崩溃。

一天，两兄弟很晚没回家，陶承前去码头寻找，好在没事儿，但回家后发现四女儿欧阳本双脸色铁青，上气不接下气，手抖得厉害，久病未能得到医治的她终于挺不住咽气了。陶承对着死去的孩子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早晨，她把家里的零星物品变卖了点钱，买了一口薄薄的小棺材，和两兄弟一起抬到郊外，埋在一块清静的地方。

正在陶承一筹莫展绝望之际，欧阳梅生的一个同志前来看望她。他介绍了欧阳梅生在武汉的情况，并代表党组织说会照顾他的家人。陶承向他表达了想去武汉的意愿，这位同志说武汉情况比长沙更糟糕，去了更危险。陶承坚定地说：“那我更要去！我不能让梅生一个人冒风险，我和他是一个人，死要死在一起。大家都在出生入死，我不能在旁边看着。”这位同志最终拗不过她，交出了几个不很确切的地址。

这时已经是11月，天气转凉。陶承匆匆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几个孩子奔向码头。船票是这个同志帮忙买的，驶往武汉的船是不定期的小火轮，等着上船的人很多，在这位同志的帮助下陶承一家终于挤上了船。船舱里挤满了人，简直无法挪脚，陶承一家被挤到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由于天寒水枯，船走不动。到后半天，船索性弯在一个小码头上不动了，一待就是三天。带的干粮吃完了，船上暂时供应一点粗米饭，装在大竹筐里，拿钱只能买一碗，没钱就没得吃。突然船上传来吵嚷声：“打死他！扔到江里去！”原来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双手捧着一把米饭，直往嘴里塞，随别人拳打脚踢也全然不顾。原来他是饿坏了，又没钱，只得抢饭。欧阳立安看到有人行凶，气得呼呼出粗气。施暴的人离开后，他把自己省下的小半碗饭送给了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汉子。

本来两天的路程足足走了六天。好在还比较顺利，陶承一家到武汉后很快和欧阳梅生取得了联系。欧阳梅生身着马褂，戴了一顶礼帽，化装成绅士的样子。当他见到一家人时，满怀欣喜，但在知道四女儿欧阳本双病死后，这位热血男儿瞬间泪如泉涌。

龟山脚下的泗湾，是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欧阳梅生一家搬到这里的一座小楼，这里也成为中共汉阳县委机关的所在地。为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欧阳梅生化名杨福生，对外称是报社编辑，周围邻居称他为杨先生，陶承则被称为“先生娘子”。她既是这栋小楼的女主人，也是县委机关的保护人。他们一家人为县委机关在白色恐怖下的正常运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智勇双全“小交通”

大革命失败后的武汉，白色恐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几个朋友安闲地在室内谈笑，窗口会突然飞来一阵枪弹，人们在血泊中呻吟着倒下了。而第二天，反革命的报纸上却会出现这样的消息：“共产党于某地密谋起事，为自卫团获悉，当场击毙多人。”一个年轻姑娘，仅仅因为扎着一条红头绳，就会被当作“共产党的密探”，而被真正的密探架走。没有多久，人们就在河边发现她的尸体。元宵节，一个住户在门前挂上红灯，竟会被说成是“起事的信号”，于是警察闯进来，主人被捉走了。以后每年这一天，也就成为这一家祭奠死者的日子。

欧阳梅生一家居住的这座小楼，光看外表，是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陶承作为主妇，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护“家庭”的安全。同志们睡了，她

就替他们望风。深夜里听见可疑的脚步声，她马上爬起来检查收藏密件的地方，再到屋前屋后转上几遭。哪个同志外出，要等门，没回来，她就坐到天亮。

在妈妈的耳濡目染下，古灵精怪的欧阳立安形成了随时保守党的秘密的行动自觉。当陶承望风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会跑过来悄声说：“妈妈，你走吧，让我看着。”陶承收藏文件的时候，他不声不响地站在一边放哨。一旦外面有人嚷嚷，就会很警觉地跑出去打探，不一会儿回来说：“没事儿，卖菜的短了秤，跟人吵架呢。”做完一件这样的事儿，他就会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有一天，欧阳梅生把他叫到跟前，问道：“这里有两封要紧的信，派你去送，办得到吗？”“办得到！”欧阳立安欣喜若狂。在小家伙的心中，终于有重要的革命任务要交给他了。临行前，欧阳梅生嘱咐道：“这可不是打弹子。路上不要贪玩，不要多事，天黑以前赶回来。你知道去鹦鹉洲的路吗？”“我知道。”欧阳立安点点头。随后，欧阳梅生告诉他地点和接头人的名字，并把包糖纸大小的信件拿了出来，再次嘱咐：“遇见盘查，要把它毁掉，不能落在外人手里。你打算放在什么地方？”欧阳立安答道：“放在帽檐里行吗？赵大叔就是放在帽檐里。”他说的赵大叔，是常给这里送信的交通员，昨天被抓走了。为确保安全，欧阳梅生告诉儿子：“不行，要放在这块糖里，遇见敌人，就把它吞掉。”

收拾完后，欧阳立安就大踏步走了。陶承这时有些后悔了，思忖着外面这么紧张，不该让个孩子闯来闯去。出了危险，该怎么办？欧阳梅生却说：“现在大人的行动，更引人注意；况且一时也找不到交通员。信不能不送！”

话是这样说，一家人还是为欧阳立安捏了一把汗。到吃饭时间，还不见他



欧阳立安



回家，欧阳梅生就快沉不住气准备出去寻找了，气喘吁吁的欧阳立安跑进屋子，说：“路上又杀人了，不准通行，我是绕路回来的。”虽然回来晚了让家人担心，但陶承并没有责怪他，反而鼓励他的勇敢。疲惫不堪的欧阳立安向妈妈倾诉：“妈妈啊，真太惨了！他们杀的是什么人？一个妇女，还怀着孩子。妈妈砍死了，小孩还在肚子里乱动。过路的人看见也哭了。”陶承望着儿子，坚定地说：“他们作孽的日子长不了。这笔账，总有一天要算清。”

由于小孩子不引人注意，欧阳立安很快就成为“正式的”交通员了。每天，他会把党报和文件送到指定的地点。出门前，陶承把《大江报》折成很小的长条，围在孩子的棉裤腰间，用绳子捆结实，外面把棉袄盖好，一次捆八张，分送到八个地方。

腊月里，寒风刺骨，大雪没过脚踝，欧阳立安行走在冷风中，一天来回几次渡过汉江，到江对面的鹦鹉洲，把报纸和文件送到工人住宅区。一天跑十几里路，欧阳立安对鹦鹉洲一带非常熟悉，每所房子几乎都进去过，跟每个工人都打过交道，成了那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每次回来，都带回一点好吃的东西，都是工人们送他的糖果麻花之类。他舍不得吃，带回来给弟弟妹妹吃。只有一件礼物，他自己留下了，那是一个叔叔送他的一对小斑鸠，褐嘴巴，黄眼睛。他编了一个竹笼，将它挂在屋檐下。

可是，下次再去，那个叔叔已经不在了。欧阳立安推开虚掩的房门，就听见有人吆喝：“站住，干什么的？”墙角冲出一个人，用枪指着。欧阳立安愣住了，但他马上镇静下来，灵机一动，说：“我来收豆腐钱……”“混蛋！”这人打了他一个嘴巴，“谁欠你豆腐钱？”欧阳立安顺势哭着嚷开了：“你不讲理！我爹病了，叫我来收十八号的豆腐钱，呜呜，你不给，还打人……”“妈的！你瞎眼了，这是十七号！再不滚蛋，老子崩了你！”欧阳立安趁势退了出来。因为担心再次遇到敌人引起不测，他赶紧跑到僻静的地方，把文件处理了。随后，他再机警地来到十七号门前，在墙壁上画了个警号。

孩子的表现得到欧阳梅生的表扬。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做得好！”

遇见敌人就得随机应变！万一落在敌人手里，打死也莫说实话！交通员都是这样的。”得到爸爸的表扬，欧阳立安对交通员的工作更有热情了。

喋血年关留遗恨

到了腊月，敌人在武汉加紧了“冬防”。军阀胡宗铎拉夫抽丁，闹得更凶，不问穿的长袍短褂，见人就拉；码头工人，人力车夫，躲都无处躲。四五天内，就拉走了五千多人。胡宗铎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武汉人民强烈愤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而这时，党内陷入“左”倾盲动主义，反对退却，要求进攻。在这种冒进思想指导下，湖北省委发出指示，要求举行年关暴动。

暴动的指示传达下来后，汉阳县委的工作马上紧张起来。在一个下雪天，陶承正在屋里纳鞋底，汉阳县委书记林仲丹（林育英，即张浩）突然从前门闯了进来，吓了她一跳。陶承责备他说：“怎么从前门进来？”

林仲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天下雪了。脚印留在山上，谁给我扫掉呢？你这个细心的主妇，怎么忽然粗心了？”说完，便问欧阳梅生在家不，原来，他是来讨论年关暴动的。

欧阳梅生问林仲丹有没有暴动的消息，林仲丹说：“光有谣言。说共产党要调五十万农民军围攻武汉，贺龙拿来盒子炮三千只，机枪四十架，叫工人暴动……”欧阳梅生说：“我们还没动手，敌人就吓慌了！”“这就是问题！”林仲丹说，“看来敌人已经有准备，这时搞暴动很不利。……但是上级已经做出决议，只有执行啊！”

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了，林仲丹说，今天的会很重要，要陶承注意戒备，到会的人不要抽烟，不要在屋子里留下任何痕迹。林仲丹说完，陶承带着欧阳立安迅速来到房门口，开始清理地上的脚印。雪越下越大，脚印也被迅速清理完毕。

突然，欧阳立安大声叫起来：“妈妈，把铁锹拿来！”这是警号，屋子里迅速鸦雀无声。陶承仍旧把铁锹往墙上捅了几下，叫里面注意，然后才往外走。原来是甲长往这边来了。



甲长是来传达上面的命令的，说共产党要搞大暴动，要每家准备一口大缸，两盏油灯，说完就走了。陶承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有惊无险。

林仲丹他们的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天亮，陶承和欧阳立安在前后门紧守了一夜。累了困了，就不停地用雪团擦脸，时刻保持清醒，确保会议安全。

经过一夜的讨论，暴动计划定好了：夺取电灯公司、电报局，割断电线，控制交通要道，同时攻打军警机关。当前最重要的是搞到武器。

事前，欧阳梅生已经和兵工厂工人接过头，商定起事前从厂里运出二十条步枪，两挺机枪。偷运武器的任务交给了赤卫队员老杨，为了有个照应，临时又派老黄协助他。开头还算顺利。他们把武器运上小船，向鸚鵡洲划去，谁知刚靠近码头，就被敌人发现。两个敌巡逻兵上船搜查，见遮掩不过去，老杨用桨打倒了巡逻兵，自己跳到江里，但武器和船都被拖走了，老黄还在船上。老杨自幼生活在江边，水性好，最终逃了出来。林仲丹安慰惊魂甫定的老杨后分析，根据情况估计，老黄装成“船老大”贩运私货，不会有生命危险，组织上可以花钱救他。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再弄到武器。

在万般无奈之际，林仲丹萌发了自己制造炸弹的想法。一天深夜，林仲丹夫妻空手从后山上逃到欧阳梅生家中。他们告诉欧阳梅生，有位同志在他们家里赶制炸弹，不料雷管爆炸了，惊动了街上的巡逻兵。夫妻俩在敌人包围上来以前，带上伤员翻窗逃走了，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却还留在床上没来得及抱走。

由于情况变化，省委下达指示取消暴动，但为时已晚。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许多党的重要机关被敌人破坏，不少革命者被屠杀或关进监狱。马路上，巡兵和包探比市民还多，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了。林仲丹夫妇不敢回到先前的位置，最终也没能找到他们的小女儿。

深夜里，林仲丹、龙大道和欧阳梅生交换了对当前情况的意见，决定由欧阳梅生向省委写紧急报告。由于操劳过度，欧阳梅生脸色非常难看，让陶承将冷毛巾捆在头上，勉强支撑。当报告写到最后一页时，他晕倒了，半晌才缓过气来，但是仍然双目紧闭，脸色涨红，呼吸急促，林仲丹当即

决定送医院。可是让欧阳立安一出巷口打探，就遇见了巡逻兵退了回来，当时正是五点多钟，还没解除宵禁。

第二天天亮，几经辗转，直到正午欧阳梅生才被送到汉口协和医院。经过急救，依然不省人事。最后，护士告诉陶承：“办理后事吧。”在林仲丹等同志帮助下，欧阳梅生被安葬在龟山脚下。

欧阳梅生逝世后，陶承及其子女继承遗志，前仆后继，为党工作。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欧阳梅生和陶承的长子欧阳立安、次子欧阳应坚、三子欧阳稚鹤相继为革命英勇牺牲。陶承一家为革命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永世长存！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陈 磊）



裕泰客栈的诱捕陷阱

“守株待兔”阴险毒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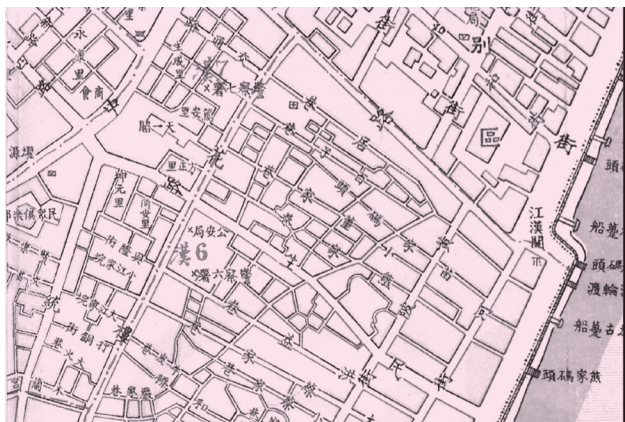
1928年2月中旬的一天，在汉口河街（今沿江大道）的裕泰客栈里，店员、房客正各自忙碌。这家客栈的真实面目，是中共湖北省委的一处联络点，同时兼为秘密招待所和临时开会时的掩护机关，而来住店的“客人”中，有很多都是从湖北各地来汉活动的党、团干部。这一天，客栈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正常，但看似正常的表象下却透出一丝不易被察觉到的凶险气息。在客栈内，一些看上去像房客、茶房、招待，但神情鬼祟的人正死死盯着大门口，眼中闪烁着狡诈、凶残和贪婪。这些鬼鬼祟祟的人是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的稽查员，他们已经布置好了陷阱，等着将前来开会的“共党要犯”一网打尽。

七一五“分共”后，敌人就开始在武汉三镇疯狂搜捕革命者，反动当局的军警、特务、工贼虽然凶残野蛮，但他们毕竟对党的秘密工作方式和工作安排不甚了解，因此时常顾此失彼。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福利部部长张金保在出入武昌后城街三十二号省委秘密机关时就被泰安纱厂工贼“断鼻梁”发现，当天该处机关要召开党团员联席会议，而“断鼻梁”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看到张金保后就急急忙忙叫来军警抓人。张金保被军警抓住后自知难以脱身，故意站在大门口外与敌人纠缠。后来来开会的同志远远就看到张金保被军警扣住，并且张金保还趁军警不注意向其使眼色，便明白机关已遭破坏，纷纷装作路过或买东西的人，安全离开。

1928年年初，国民党特务抓到了共青团湖北省委负责人黄佑南，此人被捕后即叛变，这使得驻武汉的各级党、团组织面临空前严重的危险。

黄佑南将自己知道的党、团组织的工作方法、接头地点、机关地址、人员信息等秘密全部告诉敌人，并带着特务上街到处指捕同志。更为可恶的是，敌人根据他和一些叛徒提供的党的工作秘密，设下了“守株待兔”的阴谋毒计——以往敌人得知某处为共产党机关后就立马上门抓人，这样一是会使机关内的人员千方百计抵抗或逃跑，二是会导致知晓该机关的其他革命者发现异常后迅速躲避，就如张金保被捕时那样。而此次军警特务对裕泰客栈的破坏，一改过去一拥而上闹得鸡飞狗跳惊动四邻的阵仗，采取避免“打草惊蛇”的隐秘行动，上门后迅速从内部控制客栈，同时外围在明面上不布置军警岗哨和封锁线，使得从表面上看，客栈内外一切如常。每当有人进入客栈，伪装成党内接头人员的特务就会用从叛徒那里得知的接头暗语来进行试探，一旦来人答上暗语，就等于自行暴露。特务会谎称带路，将还不知道自己接上了反线的党、团员带到预定抓捕位置，其他伪装成房客或客栈工作人员的特务迅速将其控制并从后门押走，然后客栈内恢复“平静”，等待下一个来“自投罗网”的革命者。

通过这种“密捕”方式和叛徒的告密，敌人在短短几天内相继破坏了汉口裕泰客栈、小董家巷下巷8号、慈德里22号、武昌保安门正街81



小董家巷位于江汉路南，民生路北，东接黄陂街，西通花楼街。民国时期街巷建筑均已拆除，现世纪江尚小区大门和门前花坛的位置即为小董家巷原址



号等多处党的秘密机关，捕获 50 余名党、团干部。凶残的反动派叫嚣：“宁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 C.P.（即共产党）！”仅过了一天，就将这些革命者押赴刑场处决，白色恐怖的血腥气息一时间笼罩江城。

据《申报》当时的报道，汉口卫戍司令部于 2 月 18 日下午 6 点在小董家巷下巷 8 号陈辅记楼上“捕获共党男女七人”，“传即为裕泰栈内人犯所供出者”，其中徐仲明、王煜南、杨吉平、张华“又经讯明……系担任共党交通工作”。由于历史久远缺乏史料，徐仲明、杨吉平的身份和个人经历已难以考证。王煜南又名熊煜南，湖北黄梅人，黄埔四期生。张华又名张子余，湖北钟祥人，因“子”“子”二字极易被他人误认混淆，在革命历史文件和有关当事人回忆中，多以“张子余”出现。张华是武汉地区早期党员，曾参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担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机关报《真报》编辑，并被吴佩孚、萧耀南通缉，后因不服从党组织命令，和他人一起赴张作霖处求援，于 1923 年 11 月被中央开除党籍。尽管遭受如此严厉的处分，张华依然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徐仲明、王煜南、杨吉平、张华被捕后，面对敌人的拷问，干脆利落地承认自己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并且对死亡毫不畏惧，“直认不讳，自应处以死刑”。2 月 19 日，敌人就将他们连同在裕泰客栈抓捕的党、团员干部，押至汉口模范区余记里空坪杀害。

英烈浩气长留人间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缺失，因裕泰客栈遭破坏而牺牲的烈士中，大部分人没有事迹可考，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人所知。现存史料中，目前仅有邓雅声、王达强、熊映楚在被敌人杀害前的事迹留下了点滴记录。但烈士们那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对敌人种种卑劣伎俩的蔑视，至今仍是可歌可泣，荡气回肠。

邓雅声，湖北黄梅人，被捕时任京汉特委书记。1928 年初，他领导农民武装在应山地区发起暴动，处决大劣绅朱文聪，当地反动派、土豪劣绅为之胆战。暴动后，邓雅声接到通知赴省委汇报工作，此时武汉白色恐怖

日益严重，邓雅声曾对来送行的同志说：“今年是个断头年，我可能回不来。”他以党的事业为重，不顾忌个人安危，毅然赴汉，参加省委在汉口铁路饭店三楼召开的秘密会议。由于裕泰客栈遭破坏后敌人侦知了此次秘密会议的地点，邓雅声被捕，关押于汉口卫戍司令部监狱。

邓雅声在大革命时期就声名显赫，曾被推选为湖北省农协秘书长。当时控制湖北的军阀胡宗铎以关心黄梅同乡的名义，故作姿态，亲自到狱中探望，施以笼络，妄图劝降。他对邓雅声说：“人生如朝露，存亡不可知。”邓雅声则不卑不亢地回答：“肝脑涂地死，效民亦心甘。”胡宗铎碰了一鼻子灰，恼羞成怒，严令狱卒酷刑拷打，要邓雅声交代党的秘密。邓雅声强忍剧痛，吟出“平生从不受人怜，岂肯低头狱吏前”的诗句，铁骨铮铮。他自知坚持革命气节必然会遭敌人毒手，在临刑前给自己的恩师熊竹生留下一封遗书：“当雅声致书尊前之日，即在汉口毙命之时。大人素钟爱我，得此惨耗，一定惊倒！……汉朝党锢，明末东林，亘古如斯，而今为烈矣，虽然，雅声非畏死者。‘等闲吾戴吾头去，留些微痕血海中！’‘尚有雄心思马革，不因失志泣牛衣！’此非雅声平日见志之诗乎？



邓雅声烈士画像

在狱无事，惟咏某诗及某歌，慷慨激昂，全无惧色。今日之死，是所甚愿。”并在遗书后附绝命词四章：

呜咽江声日夜流，岂知宏愿逐波浮。
萧然独谢长生去，暮雨寒风天地愁。

平生从不受人怜，岂肯低头狱吏前。
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浩气在人间。



苦虑家中更不忘，谁知今日永分张。
幽魂若不随风散，应念亲衰返故乡。

本来文弱一书生，屡欲从戎愧未曾。
不死沙场死牢狱，三年埋血恨难平。

在遗书和绝命诗的字里行间，邓雅声充分表现出决心为党和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定立场和共产党人在敌人屠刀下宁死不屈，“生为人杰，死亦鬼雄”的高贵品质。

熊映楚，湖北黄梅人，被捕时任鄂南特委书记。熊映楚 21 岁时考入上海大夏大学理科，在当时完全可以学成毕业后找份好工作，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在五卅运动中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熊映楚任中共黄梅地委书记，与邓雅声、石炳乾共同领导农民运动，把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吓跑了国民党右派县长，黄梅被革命者们誉为湖北的“小莫斯科”。

大革命失败后，熊映楚在蒲圻县领导开展暴动，沉重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1927 年 11 月，熊映楚任中共鄂南特委书记，领导咸宁、通山、蒲圻等县的武装斗争。1927 年 12 月 14 日，熊映楚参加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面对一些对上届省委不符合事实的过“左”指责，熊映楚实事求是，秉公发言，为上届省委辩解。会后，他还与邓雅声、张计储、吴致民等联名向中央写报告，批评中央派遣的湖北特委成员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不当言行，一心维护党的事业。

1928 年 2 月，熊映楚奉命赴汉口开会，因裕泰客栈被破坏遭敌逮捕。面对凶恶的敌人，他大义凛然，慨然承认自己就是在鄂南领导暴动的共产党员熊映楚。反动派很快就判处了熊映楚死刑，第二天就将其押赴汉口余记里空坪处决。在临刑前，熊映楚没有丝毫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向行刑队士兵发表了一番情真意切的演讲：“我是大学生，家里有饭吃，为什么要

革命呢？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全世界的一切剥削和压迫。你们当这种兵，薪饷被当官的克扣，还挨打受骂，强迫你们把枪口对准为你们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谋求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想想吧，兄弟们！”这番话人情入理，再加上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洒脱态度，令士兵们为之动容。这是熊映楚在自己生命最后一刻的英勇战斗，实践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1928年2月19日，熊映楚与邓雅声等20余人就义于汉口余记里空坪。



熊映楚烈士像

王达强，在史料中亦被称为王达祥、王大祥，湖北黄梅人，被捕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七一五“分共”后，王达强一直机智勇敢地坚持斗争，在1927年11月武汉反动政权崩溃期间，率领由武昌地区团员组成的武装特务队，打破武昌县监狱，救出大批同志。因其斗争立场坚定，工作卓有成效，1927年12月，他当选为省委委员。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中，王达强经常化装为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人士，坚持开展工作。恰在这时，他接到自己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一再叮嘱他好好升官发财，衣锦还乡。王达强读后十分气愤，立即把信撕成碎片，只写了6个字作回信：“我要福国利民。”

1928年2月中旬，王达强化装为油条摊贩赴裕泰客栈接头，遭埋伏的特务逮捕。反动派知道王达强是省委重要干部，连夜提审，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地下党组织的全部线索。敌人软硬兼施，先是许以高官厚禄企图诱使其“转变”，对此王达强只是鄙夷一笑；见利诱不行，敌人又唱起了白脸，气势汹汹地大喊不投降就枪杀刀剐，妄图在精神上压垮王达强，但王达强



王达强烈士

以明志：

面对敌人的威胁毫无惧色，回敬给敌人的只有从他炯炯双眼中投射出的愤怒和藐视。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遂暴露出凶残本性，对王达强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们用铁钉钉他的手脚，用铁梳梳他的皮肉，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王达强始终没有说出党的秘密。他没有求饶，没有哀号，有的只是对特务、打手的痛斥和唾骂。

受刑讯后的王达强带着皮开肉绽的身躯回到牢房，从破烂的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在狱室的墙上写下感天动地的《七歌》

有客有客居汉江，自伤身世如颠狂。
抱负不凡期救世，赢得狂名满故乡。
一心只爱共产党，哪管他人道短长？
我一歌兮歌声扬，碧血千秋叶芬芳。
有家有家在鄂东，万山深处白云中。
老父哭儿伤无棹，老母倚闾泪眼空。
故乡山水今永诀，天地为我起悲风。
我二歌兮歌声雄，革命迟早要成功。
有友有友意相投，千里相逢楚水头。
起舞同闻鸡鸣夜，击楫共济风雨舟。
万方多难黎民苦，相期不负壮志酬。
我三歌兮歌声吼，怒掷头颅报国仇。
有弟有弟在故乡，今日意料有我长。
昨夜梦中忽来信，道是思兄忆断肠。
可怜不见已三载，焉能继我起乡邦？

我四歌兮歌声强，义旗闻起鄂赣湘。
我五歌兮歌声止，慷慨悲歌今日死。
我六歌兮歌声乱，地下应多烈士伴。
我七歌兮歌声终，大地行见血花红。

这首大气磅礴、悲壮激昂、文采斐然的自白诗，深深感动了狱中难友。难友们看到他受到如此酷刑，无不为之泪流满面；读他的《七歌》，无不佩服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们机智地避开敌人监视，偷偷地把《七歌》全文抄下，暗中传出牢房，以教育后人。

2月18日，国民党军警从监狱押出满身血污的王达强，在龟山刑场枪杀了他。

经验教训字字血泪

由于反动当局疯狂挥动“清乡”“铲共”屠刀，加上党组织在主客观方面都未能做到快速妥善应对极端白色恐怖环境，在诸多工作上存在明显缺陷，导致以裕泰客栈被破坏为祸始，湖北省委、团委在1928年3月、4月底和11月接连遭到敌人三次大破坏，连带武汉三镇基层党、团组织遭破坏；1929年2月省委和武汉三镇党组织又遭空前破坏，几乎损失殆尽。大批立场坚定、忠诚于革命事业、经验丰富的党的领导干部遇难，共产党人的鲜血把武汉的刑场染红了一遍又一遍。惨痛的牺牲使后来人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928年3月22日，省委第一次遭破坏后，省委书记刘伯庄给中央写信，一是提到省委组织存在问题，需要调整：或减少常委数量，或调整组织方式，“组织常委内主席团之类的东西”，以便于接头和开会。省委各机构和机关也应精简，机构机关和人员过多，“不特经济来不及……颇不适宜于秘密工作”。二是在工作人员问题方面，刘伯庄指出，在武汉的工作人员因“历史的关系”，被很多叛徒、敌探认识，无法继续立足，工作人员应在农村和城市间调换，同时也应在省际调换，以免无谓地被捕和牺牲。工作人员



要有职业,需融入当地的环境和群众,“才能取得相当的保护色而便于存在”,同时可以解决基本生计问题。过去不允许同志在社会面找工作,只能当职业革命者,遇到组织上经济困难时,很多人无法维持生活,选择自首叛变,这是此次组织破坏中的一个重要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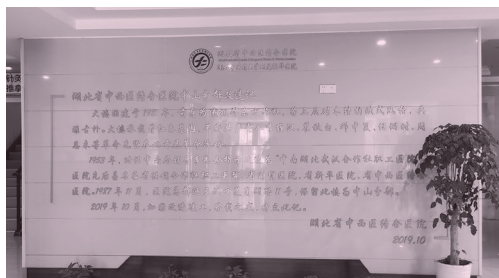
当年5月13日,第二次大破坏发生后,临时省委秘书长余泽鸿给中央写信,总结了两次破坏的主客观原因。主观方面,一是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在湖北发展迅速,这导致很多投机分子在那时混进革命队伍,加上甄别不严,不能及时清除内奸,政治风向一变,投机分子和内奸纷纷反动告密,同时部分忠实同志训练不足,政治素质和能力不高,党员培养和改造工作不足。二是湖北党组织内部因武汉暴动、年关暴动而产生的思想分歧“仍有余波存在”,“左”倾指导路线失败导致在基层党员和群众中党组织的威信降低,不利于团结统一。三是工作方式方法不对,上下级关系疏远,下级问题“久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又多空洞不落实”;财务上无规划,时常导致经济困难;秘密工作方式不适应武汉的白色恐怖环境,党组织与社会完全隔离。客观方面,一是敌人在改进侦探手法,加强利用叛徒,制造外松内紧的局面。二是湖北各地农村地区斗争激烈,导致敌人惊恐,加剧镇压。三是武汉三镇地域不大,不利于隐蔽。四是反动当局掌权者多黄安、黄冈人(胡宗铎是黄梅人,陶钧为蕲水人,黄梅和蕲水均属黄冈),黄安、黄冈地区是党领导农民斗争较活跃的地区,这更加引起敌人的惶恐和仇恨,遂以屠杀共产党人为报复。由此,余泽鸿提出了六条建议:一是最好让湖北工农同志组织省委,并将机关设在外县。二是改变过去脱离实际的工作方式,并由省委亲自解释和督促落实。三是派人进入武汉三镇工厂当工人,从基层开始建立组织。四是加强武装工作,集中力量于数县,同时以团组织发动群众斗争。五是在工人运动中采取上海式工作方式。六是抓紧兵运工作,并惩处叛徒内奸。七是根据实际情况,以京汉铁路为首要目标,逐步恢复工会组织。

6月15日,鄂南特委书记曹振常给中央写信,在报告湖北过去工作的缺点时,也同样谈到了之前余泽鸿所论述的党组织在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说到“技术工作太坏”（即保密工作不好）时，还专门举了裕泰客栈遭破坏的例子：“接头处日必数十人，进的进，出的出，并且各处来的人即介绍他在接头处（如裕泰栈）住下。交通人员并不少，然而从来不见一个交通下乡。接头处已破获，各区还不知道……分而上午六、七点钟即一批一批的会客，凡此一切都可证明技术工作太坏了。”从曹振常的描述中能发现：首先，接头处每天进出的人太多，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第二，裕泰客栈既是接头机关，又作为秘密招待所使用，用途混杂，这本身就存在风险。第三，省委机关几乎不派交通员下到各地，以至于机关遭敌破坏后各地来汉人员不能得到警报，继而纷纷“自投罗网”，造成无谓牺牲。在信的结尾处，曹振常还提到：“武汉还有几个同志，在武汉没饭吃。望中央早日解决湖北问题，以使我们早日返鄂。”这说明到6月时，省委的财政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由于依然没有完全适应当时武汉地下斗争的总体形势，领导机关组织架构调整、党员干部和机关做好社会化职业化伪装、寻求群众支持和掩护、培养和选拔思想政治坚定分子、增强保密和地下工作本领等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充分有效，加上叛徒告密出卖和敌人全方位强化军警统治，不断掀起白色恐怖狂潮，当年11月和次年2月，省、市两级党、团、工会等组织连续遭大破坏，人员损失惨重。《湖北革命文件历史汇集》（乙种本）里载录了一篇1929年4月形成的报告，内容是地下工作方法、扑灭内奸及内奸名单。这份报告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胡陶屠夫统治武汉时地下工作相关各方面的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

报告首先介绍了当时汉口和武昌在行政区划上的大体情况和旅馆情况。之所以要先介绍这方面内容，是因为湖北各地革命者不可避免地要来武汉接受指示、开会、领取经费和物资等，而自裕泰客栈被破坏后，敌人对旅店行业的检查极为严格，党组织想建立起新的招待机关非常困难，因此只要来汉活动，就必须特别要注意住宿问题。报告中介绍，汉口、武昌的华区旅馆，除少数是豪绅官僚地痞流氓寻欢作乐的场所，其他的都会被军警严格检查，有些地方想入住需要铺保、机关单位保条或熟人介绍，且不少



东方旅社旧址现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山分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山分部改造记”中提到医院大楼前身为俄租界东方旅社

一旦有风吹草动便日夜检查，反复盘问住店客人，客人稍有疑点就会被拘走。旅馆的茶房账房等工作人员往往也受敌人雇佣指使，若是态度惊惶言语支吾使其生疑，他们很可能会向敌人告发。因此，住店时态度一定要镇静从容，来历要填写明白，报告还专门提示来历万不可写学界和四川人由上海来，因为在当时敌人眼中，“学界”和“川人由沪来”有高度“共党嫌疑”。一切会让敌人怀疑的信件、书籍、便条等都不能随意带在身上或放在容易被发现的地方。不要整日整夜都待在客房里不动，否则也容易让人起疑。总之，只要言行举止得当，又不被找出证据，军警不会随便拘捕抓人。

在住房子问题上，报告指出，无论在哪里租房，都需要五户联保、铺保，在租界要受巡捕房调查来历，在华界需向军警机关呈报，手续异常烦琐严格。同时，由于以往的斗争经历，武汉三镇的民众对什么人是什么人很有认识和经验，这是不利于隐蔽工作的。因此，必须以合法职业掩护自己，在生活工作和日常活动上要社会化，不能引起房东、邻居的怀疑。同志间除必要工作外尽量少往来，在琐事细节上也要时刻小心，不能露出一一点与党的

旅馆的茶房、账房等工作人员都受到敌人威逼利诱充当侦探或眼线。租界内的旅馆亦有特务活动，档次越高的旅馆相对而言特务活动也越少，军警一般也不敢检查，但消费非常高。

介绍完基本情况，报告重点论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住旅馆问题、住房子问题、接头的问题、机关破坏的预防、扑灭内奸的问题。报告从这五个方面总结了大量经验教训。

在住旅馆问题上，报告指出，敌人平时检查并不认真，

活动相关的证据，更不能大大咧咧言行随意，让周围人产生“此人是共产党”的感觉。

在接头问题上，报告指出，敌人知道武汉三镇的各种公共场所都可能是共产党的接头地，但他们不可能时刻检查或蹲守抓人，所以依然可以在这些地方接头，但须特别注意技术问题。要不断更换接头地点，接头时谈话尽量简短，时间不宜太长。短时接头要在市区内繁华热闹的地方，市区内僻静的地方由于敌人侦探也经常活动，不能去。若需要长时间谈话或开会，要去郊外找僻静地方。从各地来武汉接头的同志必须根据住旅馆要注意的问题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尽量以正规职业掩护。负责接头的省委工作人员，服装举动状态等要与接头对象大体切合，不能相差悬殊，并要牢记接头对象的信息。接头时间尽量选在上午9—10点或下午5点，因为这是大部分敌人吃饭的时间。切忌遇军警盘查时举止失态、在公共场所活动时东张西望、频频回头张望以及随身携带党的文件、纸条等。省委要迅速解决各地同志的问题，不可长时间拖延，以免滋生负面情绪，进而引发不测。

在预防机关破坏问题上，报告指出，不能有某个机关不要紧或某个同志很忠实，被破坏、被捕都不会影响全局的错误思想，更不能在机关被破坏后不通知、不隐蔽，坐以待毙。应预先约定好报警信号，一旦出现破坏，立即用信号向其他同志报警，不能只有几个知道破坏消息的人自顾自跑掉而不向他人告警，导致大范围的破坏和大批同志被捕被害。同时也要迅速通知各地党组织，各地党组织遭破坏时亦应迅速向省委报告。其他机关和同志隐蔽搬迁时，要注意敌人警戒状态，是否会仔细盘查路人，不得已时行李放在下一步，先做到人员脱险。对被捕同志，尽可能找到其亲朋好友出面去营救，敌人在金钱上非常贪婪，利用其贪污徇私，有机会救出同志或是至少不判枪决。同时要设法打入“清乡”督办署、稽查队、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等敌特务、警备机关，以便探听消息。

在扑灭内奸问题上，报告指出，叛徒内奸是湖北党的工作的巨大障碍。他们为虎作伥，帮助敌人破坏党的机关和抓捕杀戮大量同志，还将党的秘密工作方式方法全都出卖给敌人，并且向被捕同志宣扬敌人假惺惺的“仁



义道德”，引诱被捕同志中意志不坚定者自首叛变，极为可恶。省委遭第三次大破坏时，以黄佑南、宋若林为首的叛徒特务们上蹿下跳为敌人出谋划策，威逼武汉三镇各工厂、学校千余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自首“转变”，不自首者不是遇害就是被迫逃亡。报告还提到省委之前已形成计划，并准备好了炸弹和手枪用于锄奸，但不幸在锄奸行动发动前省委即遭破坏导致计划失败。报告建议指派一位同志专门负责调查叛徒的住址，并列出了黄佑南、宋若林等 20 余名叛徒当时的职业、住址、籍贯等信息，最后强烈要求必须想方设法消灭叛徒内奸。

尽管屡次遭到敌人的破坏和摧残，但在如此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党依然在武汉、在湖北不懈地开展斗争。虽因“左”倾错误路线和种种工作上的不成熟、失误，导致付出高昂的代价，大量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但这也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的压迫剥削和炮制出的社会恐怖气氛相较于旧军阀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共产党则真正敢于同新旧军阀、封建地主、帝国主义等反动压迫势力斗争到底，只有共产党才是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希望所在。1928 年 12 月，日本驻汉海军陆战队炮车故意撞死人力车工人水杏林酿成惨案，全市工人和民众群情激奋对日总罢工，而胡、陶御用的“罢工指导员”竟然拿着棍棒帮日租界驱赶和殴打中国民众，反动当局对罢工斗争假支持真破坏的嘴脸暴露无遗。武汉民众纷纷议论，都提起一三惨案和收回汉口英租界之事，说水杏林案斗争若由共产党来领导，不难收回日租界。而敌人对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非常忌憚，水杏林案期间民众乐园召开所谓“反日运动大会”，到场的只有反动当局指派的“各界代表”十几人而已，即便如此，当局生怕共产党来“捣乱”，竟派出 100 多名军警去现场弹压，一时间被传为笑柄。甚至连敌人暴力机关内的普通警士、兵士，都感受到被国民党新军阀欺压的痛苦，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共产党产生同情。省委遭破坏后，敌稽查队的兵士在押送和看管被捕党员时，竟然有人主动和“共党要犯”们搭讪和聊天，大倒苦水，并请求介绍自己加入组织。由此可见党在普通群众中享有怎样的威望。

可以说，党在这段时期的英勇斗争，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既为后来的党组织留下了字字凝血的宝贵经验教训，也在岁月中升华为武汉人民、湖北人民的丰厚精神财富，先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如同熊熊火炬，永远为后人照亮前路，指明方向！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孙 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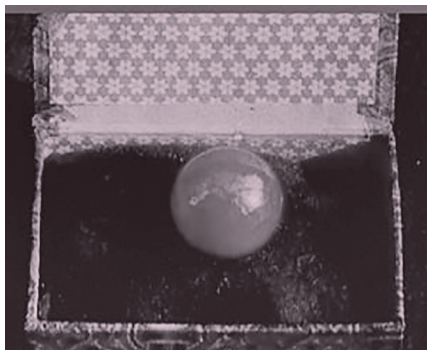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1928年春节前夕，春寒料峭，武汉笼罩在蒙蒙的烟雨中。汉口街头，荷枪实弹的士兵正来回巡逻，江汉关沉闷的钟声里不时夹杂着阵阵枪声，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一艘轮渡船缓缓靠岸，巨大的人流从码头涌出，一位青年男子随着人流走出。他戴着黑框眼镜，瘦削的身体显得长衫空荡荡的，腋下夹着一个账本，看上去像是年前来武汉收账的行商。他顺利地通过了军警的搜检，出了码头，便住进了一家湖南商号。其实，这位“湖南行商”的来头可不小，1927年初，他曾协助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武汉筹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全国农民协会，并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结业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定，学员们奔赴各地开展农民革命运动。随后，他到湖南工作，任湖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平浏特委书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半年后，他又接受党组织的安排，紧急回武汉开展湖北的革命工作。他，就是夏明翰。

“湖南行商”临危受命

此时，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反革命气焰空前高涨，武汉正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明知武汉的形势严峻而充满危险，接到组织调令的夏明翰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胆怯，不顾农历春节将至和妻子分娩不久，毅然告别妻女，匆匆从长沙赶赴武汉。其实，此时的夏明翰还是“戴罪之身”，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夏明翰等人被指出犯有右倾错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夏明翰受到撤销湖南省委委员的处分。从湖南省委常委降

为了普通干部，夏明翰并没有因为受到错误的处分和不公正的待遇而消沉，依然保持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临行前，他买了一颗红珠送给妻子郑家均，并赋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抚幼女继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小小红珠寄托了夏明翰对妻子的无限眷恋，也寄托了对妻子的殷殷嘱托：永怀红心，忠心向党。郑家均怎能不明白丈夫的心意？她紧紧握着丈夫的手，坚定地说道：“明翰，你放心吧，我一定永远怀着一颗红心，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不管有多么严峻的考验，我都永不变心！”郑家均小心地包起红珠收藏起来，心中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强忍夺眶的泪水，默默地为丈夫收拾行囊。夏明翰抱起摇篮中还在熟睡中的幼女，捧着女儿红扑扑的小脸蛋亲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不得不出发了，他又赶紧走到妻子身边，把郑家均紧紧地搂在怀里，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最后，他头也不回地向火车站奔去了。



夏明翰送给妻子的红珠

夏明翰装扮成行商，从长沙动身，经岳阳，到汉口，寻找党的省委机关和地下工作同志。其实，时任湖北省省委常委、分管工人运动的黄五一同志正热切盼望与夏明翰的接头，他安排自己的交通员宋若林不断到东方旅社查看有没有旅客名牌是“夏明”（夏明翰的化名）的。由于夏明翰来汉后就直接住进了一家湖南商号，因此一直未能接上头。当时统治武汉的是以胡宗铎、陶钧为首的国民党桂系鄂籍军阀，他们疯狂叫嚣“治乱世，用重典”“宁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共产党”，还大肆破坏中共的地下机关，搜捕日紧。为执行“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作为武汉年关暴动总指挥的黄五一根据省委指示，积极组织工人开展暴动准备工作，却于1928年1月19日在参加汉口车夫工会代表大会时不幸被捕。次日，他在汉口济生街三马路刑场被枪决。这样一来，他还没来得及与夏明翰接头就牺牲了。除了黄五一之外，还有粤汉铁路工人领袖、湖北省省委常委余长彬，汉口人



夏明翰

力车工运领袖、湖北省委委员夏桂林，泰安纱厂工会委员长侯步升，女工领袖王小妹等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骨干先后被杀害。长江两岸到处都是杀人的枪声，武汉沉浸在血泊之中。从汉口宏春里、大智门、球场街到武昌阅马场、大东门外，每天都有革命者在喋血。仅仅在年关时，被敌人杀害的革命者达 100 多人。

夏明翰不放过每一处能找到组织的地方，但总是失望而归，因为他找到的几处地址，门上不是贴着十字封条，就是贴着“此人已迁别处”的字条。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才在汉口协隆北里 17 号的秘密机关与湖北省委主持工作的郭亮见了面。夏、郭两人曾在湖南省委共过事，此时异地重逢，倍感亲切。郭亮告诉夏明翰：1927 年 12 月，他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工作，按上级部署，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年关暴动”。没想到在年关前夕，武汉国民党当局破获了中共湖北省委地下印刷机关，得到了湖北举行年关总暴动的消息，便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并进行了血腥镇压。郭亮对夏明翰说：“现在的工作是要重建党的地下机关，恢复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帮助同志转移，发展武装力量等。”夏明翰说：“任务你只管分配，再重的担子我跟你一起挑，再大的逆流我跟你一起顶！”

除夕之夜，郭亮带着夏明翰和原中共湖南区委的妇委书记熊季光，来到汉口法租界的一家旅馆，会见一位“上海坐号商人”。此人头戴瓜皮帽，蓄着长胡子，身穿长袍马褂，带有水烟筒和算盘。夏明翰与此人相视一笑，原来这个化了装的商人就是自己的老领导——原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巡视员的李维汉。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四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以搓麻将为掩护研究当前的革命工作。李维汉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因广州起义和长沙“灰日”暴动的失败，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此前的认识与部署，反对即刻举行总暴动，要求李维汉就地加以制止。他们根

据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一致同意取消以武汉为中心的“年关暴动”。决定迅速通知各地党组织，扎实做好各自的恢复和巩固工作，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活动。郭、熊走后，李维汉又拿出一瓶白兰地，和夏明翰推杯换盏，促膝谈心，看上去就像商人喝酒应酬的样子，实则两人正在秘密研究党的工作。一瓶白兰地喝完了，天也亮了，虽一夜无眠，夏明翰却很兴奋，他匆匆洗了一把脸，就继续紧张地开展革命工作去了。

不久，李维汉所住的旅馆就被武汉卫戍司令部的人盯上了，李维汉向中央请示后决定回上海，临别时嘱咐夏明翰注意安全。

以野蛮凶残著称的桂系军阀正在疯狂搜捕共产党人，许多被捕人士未经审讯便被处决。湖北省委损失了不少骨干，深感人手不足。特别是省委常委黄五一牺牲后，他负责的工人运动无人补缺。鉴于夏明翰同志具有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湖北省委向中央提出增补夏明翰为省委常委的请求。1928年1月30日，中央作出“夏明翰加入湖北省委”的决定。于是，夏明翰接替黄五一主持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担任湖北省委委员。

夏明翰就职后，继续以行商的装扮出没于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硚口和武昌的纱厂、江岸和徐家棚火车站、码头等武汉三镇工人群众聚集的区域进行调研，掌握工人斗争动向，并会同熟悉武汉工运工作的总工会干部施季高、肖朋正等人，在极其秘密状态下为省委写出了《湖北两月职工运动计划》《武汉失业工人骚扰周行动大纲》等工人运动指导性文件。随后，在夏明翰的主持下，省总工会筹备了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工作，会议于2月7日秘密在武昌召开。

湖北常委一贫如洗

不久，夏明翰以商人身份从湖南商号搬到了汉口东方旅社。这里是中共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当时还有几名同志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郭亮和夏明翰商量后，准备分别找他们研究党的宣传工作和筹备经费的问题。

2月下旬，湖北省委常委王达强被捕牺牲，湖北省委拟增补夏明翰为省委常委。2月23日，湖北省委常委第26次会议在一只游弋在长江僻静



东方旅社旧址

段的大篷船上秘密召开。主要议题是“暴动中心问题和省委常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和确保省委负责人的安全，这次会议参加者一律使用化名，夏明翰化名为“一羽”。夏明翰在这次会议发言不多，即使一些同志认为“政治中心与割据中心应分开”，但夏明

翰根据自己跟随毛泽东同志多年革命的实践经验，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中心和割据区域应为一”的观点，强调了农村武装割据的重要性。在谈到常委人选问题时，夏明翰明确表示：人的问题，我可以不参加。会议对夏明翰是否担任常委有过讨论，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最后会议通过决议：因工作需要，“一羽照常参加常委”。

3月上旬，共青团湖北省秘书处被破获，导致湖北省委机关及武汉三镇党团、工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省委常委仅余下三人。这时，作为省委常委的夏明翰力主省委书记刘伯庄（郭亮调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

这天，夏明翰刚回到东方旅社，就有人来敲门，自称是黄五一的交通员宋若林，于是夏明翰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革命同志”。其实宋若林此时对革命已经动摇，来找夏明翰是另有企图。

原来，黄五一牺牲后，交通员宋若林对时时处于危险之中的革命工作充满了恐惧。他本是黄五一的同乡，在黄五一的劝说下来湖北从事地下工作，如今觉得干革命既无钱又无权，还危险重重，便想逃回湖南老家，但苦于没有回家的盘缠。于是，他想到了夏明翰。按照黄五一对他的交代，他日日在东方旅社蹲守，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总算在旅牌上看到了“夏

明”的名字！宋若林大喜过望，赶紧登门拜访。他首先亮出自己湖南老乡的身份和夏明翰套近乎，然后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黄五一牺牲后，自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钱开展革命工作，想找夏明翰讨点钱。夏明翰想了想，给了他一些经费。然后，夏明翰来到谢觉哉住处，告诉他省委机关被破坏了，不少同志下落不明，让谢觉哉要小心。谢觉哉则提醒夏明翰，裕泰客栈（湖北省委的交通机关）已经被敌人破坏了。夏明翰想到东方旅社有个茶房的伙计是裕泰过来的，认识自己，再联想到宋若林和自己见面时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也有些可疑，凭着多年的革命经验，夏明翰觉得东方旅社已靠不住，决定搬离。

3月18日，当夏明翰回到东方旅社，正在烧毁最后一份机密文件准备转移时，国民党的密查长、中共叛徒黄佑南带着手下闯进了他的房间。黄佑南原是共青团湖北省委军委委员，因负责多批党、团员的军事训练，认识人较多。他于1928年初被捕，很快就叛变了。他不仅积极指认、抓捕革命同志，还恶毒地向敌人建议，利用中共叛徒来破坏中共组织。于是，敌人成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稽查队密查班，委任黄佑南为上尉密查长，网罗了一批熟悉中共地下活动规律的叛徒任密查员，专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那么，黄佑南是怎么查到这里来的？是谁出卖了夏明翰呢？

原来宋若林到码头买船票时被黄佑南发现了，因为两人以前干革命工作时曾经接过头，黄佑南知道宋若林是共产党，于是就把宋若林抓捕了。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宋若林很快也叛变了，而且为了尽快“立功”，宋若林便首先把共产党的“大官”夏明翰的住址说了出来。敌人以为在这个共产党要员的住处一定会大有油水可捞，于是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结果仅仅找到了一只手电筒、一块怀表和一副近视眼镜。

“一门五烈”血铸忠魂

夏明翰被捕后，被关押在汉口铭新街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的榆荫里看守所，敌人给他戴上了重镣，关进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狱中，不管敌人怎样严刑逼供、利诱拉拢，他志坚如铁，宁折不屈，没有向敌人透



露半点党的秘密。审判官在使尽各种伎俩都达不到目的后，打出最后的“亲情牌”：“夏先生，凡事都要三思而行。先生年纪轻轻，上有老母，中有爱妻，下有娇儿，就这么随随便便舍母抛妻弃子，未免太可惜了吧？”夏明翰放声大笑，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已不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已定。我爱亲人、妻女，但为了劳苦工农的解放，为了后代能过上美满生活，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用敌人给他写“自白书”的半截铅笔和纸，忍着浑身的剧痛，用颤抖的右手，给母亲、大姐和妻子分别写了最后三封信。夏明翰是在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下走上革命道路，担心自己牺牲后母亲悲痛，他恳请母亲不要哭泣，要看到前途和光明：“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血口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离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夏明翰忘不了大姐夏明玮对自己的诸多照顾、对革命事业无私的支持和付出，在给大姐的信中写道：“大姐为我坐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赤云”是夏明翰给女儿起的名字，他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赤化”下去，就算反动派以“赤化”为由要对共产党人赶尽杀绝，也要让赤旗插遍全世界！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不忘鼓励妻女继续完成自己未竟的革命事业。写完信，年仅28岁的夏明翰眼含热泪，用嘴唇和着鲜血，在给妻子的遗书上留下深深的吻印。这鲜红的吻印寄托了对妻女深深的爱意，体现了他作为革命者的侠骨柔情。反动派对他无计可施，于是电告国民党中央，请示对夏明翰如何处置的问题，得到的批复是：“就地枪决。”

1928年3月20日清晨，武汉上空乌云密布，寒风阵阵。临刑前，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大声说：“有！给我纸和笔。”他用戴着镣铐的手，将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心写进诗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敌人恼羞成怒，命令立即行刑。随着枪响，夏明翰壮烈牺牲于汉口余记里空坪（现汉口铭新街7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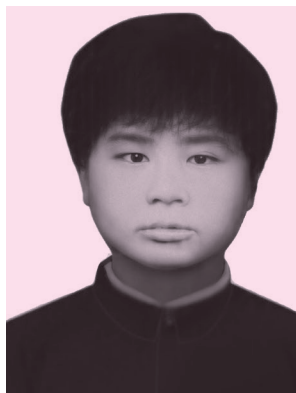
武汉市警予中学所在地），时年 28 岁。



夏明震



夏明霖



夏明衡

夏明翰就义后的第二天，他的五弟夏明震在郴州事变中英勇牺牲，当时才 22 岁。此前一个月，他的七弟夏明霖为组织衡阳暴动，在秘密制造武器时不幸被捕，就义时不到 20 岁。夏明翰的四妹夏明衡组织过湘南妇女运动，在夏明翰牺牲后三个月，她遭到反革命武装的搜捕，献出了年仅 22 岁的生命。两年后，夏明翰的外甥、大姐夏明玮之子邬依庄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19 岁。



邬依庄

如今，汉阳城外，芳草萋萋，以烈士夏明翰命名的夏明翰小学就坐落在这里。无数的“后来人”在这里用朗朗的读书声将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饶 翠）



潇湘女英杰 丹心照楚天

为女界大放光明

热闹繁华的上海码头，笛声长鸣，游轮到港，人归故国，一位身穿蓝布袄裙的女子缓步走来。那女子约摸二十六七岁年纪，清雅秀丽，略显苍白，身材瘦弱，腹部隆起，一双大眼睛明亮沉静，笑容理性温柔。经过两年的赴法勤工俭学之旅，她完成了人生的成长与蜕变，从激扬青春的女学生到身怀六甲的母亲，从践行教育救国的女校长到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这位 1895 年出生于湖南溆浦的传奇女杰便是向警予，她是毛泽东的湘籍契友，蔡和森的红色恋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员，被誉为“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一生致力于“为女界大放光明”。



向警予与蔡和森

这次回国后她于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1925 年 5 月，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并增选为第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直至 1925 年 10 月赴苏联深造，连续四年间她都是我党妇女工作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和指导文件大多数都

是她提议和起草的。李立三同志评价说：

“如果说就从此时起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是合乎事实的。”

向警予同志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妇女界的先进、先知与先觉，首先在于她卓越的见识，指出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她撰写了大量论述妇女解放的文章，精辟地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妇女运动的学说，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妇女地位，分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是中国妇女解放运



向警予

动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她批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倾向的女权运动，企图把妇女运动从革命运动中孤立起来，领导到脱离政治的非政治道路。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的旧中国，“非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把握。”“政治混乱之下的女权运动，犹之起屋沙上，随起随倒。”她鼓励广大妇女参加民族民主革命，才能争取自己的解放。“我们应当注意和参加政治运动。可是现在一般妇女的团体，对于政治问题，好像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毫不关痛痒似的，这样奴隶心理，绝不是觉悟妇女所应有。”

二是中国妇女运动必须唤起最受压迫的千百万劳动妇女参加。她批判当时国内一些妇女运动者企图把妇女解放运动限制为少数知识界妇女的运动，变为贵族式的妇女运动。在军阀官僚专制的官场，女子参政运动完全成了一种时髦、一种摆设。“女子参政运动弄成了女子个人做官、做参议员的运动，如果本着此种意义去做参政运动，其结果不过是无聊的议员队伍里增加了无聊的女议员，可耻的官僚群里添多些可耻的女官僚，可以说毫无意义。”她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高度评价劳动妇女运动。她说：“劳动妇女日受资本家压榨，常有不能生存的危险，而团结奋斗遂成了她们生存的要件。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成万地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地易



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向警予在党内党外的每次会议上，在各种报纸中，以及在同周围同志的接触中，都大力宣传和组织知识妇女“到劳动妇女中去工作和学习”，“我们的工作应当深入到下层贫苦民众中去，唤醒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为她们自己解放利益而奋斗”。

向警予同志这一卓绝的见解，特别是她为着这一见解而始终不移地艰苦奋斗，就不能不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开辟新的纪元，走上光明坦途。

她是最早到劳动妇女中去实际工作的，参加各种妇女群众的会议，领导妇女运动与斗争。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有关男女平权、保护妇女权益的条例。1924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派了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向警予担任青年妇女部助理，具体领导上海妇女运动。中共中央高度赞扬向警予的工作能力，她们三个人（杨之华、张琴秋襄助向警予）竟掌握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的工作。向警予筹建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帮助党培养了许多很好的妇女干部，此后“妇女解放协会”在全国各地得到迅速发展，会员达30万人，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

她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工厂，进行调查研究，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女工开展革命斗争。1924年著名的上海闸北丝厂1.4万名女工罢工和南洋烟厂7000多人罢工等，向警予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在女工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而且她还发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全国学生总会、闸北市民协会等团体声援女工的斗争，女工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向警予主张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应到劳动妇女中去工作去锻炼，她还具体帮助和带领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同志到女工中去。1925年元旦，向警予带领上海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女生团100余人，分成几十个演讲宣传队到西门、南市、闸北、虹口等地演讲，还到人家屋里去宣传。当时上海《民国日报》评价说：“中国知识妇女有组织地向民众宣传，不能不以十四年

元旦为纪元。”五卅惨案发生后，向警予积极组织和领导上海妇女参加斗争，新闻报道说：“斯时大雨如注……女界有向警予等分头演讲，将传单贴诸于玻璃窗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最深刻地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中国妇女运动由单纯争取女权运动，纳入整个革命运动的轨道，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同向警予同志的努力分不开。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他说：“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将少数知识妇女运动发展为汹涌澎湃的以广大女工和农妇为主体的民众运动，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向警予同志在中国妇女界的功绩就在这里。她当时策划全国妇女运动，就是极力用一切方法把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群众推动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革命斗争当中来，把妇女运动与全国总的政治运动、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她鼓动并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女学生到女工农妇中去进行工作，她极力使知识界妇女与劳动妇女团结一致，开启了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式道路。

大江赤潮女主笔

向警予最后在武汉的革命生活，短暂而光辉，崇高而壮美，热烈而伟大。1927年11月，向警予调湖北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担任省委党报《大江报》主笔，她撰写的社论和时评，笔锋犀利，振聋发聩，激励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她编写的《告士兵歌》《鄂省通讯》等宣传品，用通俗的“三字经”“四字经”形式，揭露敌人，教育群众，令人热血沸腾。她的《大江复活与纪念“二七”》一文，向处于血腥镇压下的斗争群众发出了亲切温暖的呼唤：“《大江》愿做你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愿做你的明灯，在黑暗中照着你们走上光明的大路！《大江》愿做你们的后台，替你们细诉冤苦，在湖北的鬼世界里发出工人阶级



《大江》复活与纪念“二七”

警予

朋友！爱《大江》的朋友！我们又达到了目的，从《大江》和你们分离以后，承你们的厚爱，屡屡问及《大江》，屡屡要和《大江》见面。

朋友！亲爱的朋友！《大江》现在来到你们的面前！《大江》向你们极诚恳的表示：

《大江》愿做你们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

《大江》愿做你们的明灯，在黑夜中照着你们走上光明的

大路！

《大江》愿做你们的后盾，替你们细诉冤苦，在湖北的鬼世界发出工农阶级的正义之声！

朋友！我们欣喜重建的今日，正是五年的以前吴佩孚在江岸屠杀铁路工人的“二七”流血日——我们记得今年今日是“二七”纪念的五周年！我们纪念过去五年的“二七”，同时便不能不联想到去年四月以来国民党新军阀所造的无数“二七”！更其不能忘记胡宗铎任应秋陶钧……新近在湖北所下的“二七”，我们的领袖余尚斌（长彬）、潘忠雨、刘冠雄、虞一鸣、黄五、马得胜、段良财、马瑞亭、王小妹、潘良强……那牺牲在这新近的“二七”血泊之中！

朋友！继续不断的“二七”，怎样才能绝迹呢？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与兵士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用群众的力量，实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打倒“二七”屠杀的凶手——中外资本家军阀国民党！杀尽新生的吴佩孚——蒋介石、白崇禧、胡宗铎、陶钧、任应秋……！

朋友！踏着“二七”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努力杀敌！《大江》愿做你们的小助手！

向警予《〈大江〉复活与纪念“二七”》一文，发表在1928年2月7日出版的《大江》复刊第一号上

的正义之声！”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大江报》复刊是及时发出的整队号令，给工人群众送去共产党的声音，点燃新的希望！

由于党的负责人陆续牺牲，武汉党的各级机构尤其是基层组织已很不健全，组织上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几乎中断。为了不让工人群众失望，向警予从不顾及个人安危，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用一切方法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顶住逆流，坚持斗争。她常说，身边没有群众，就算不上真正的共产党员。

工人们很多认识她，见到她来，便暗地里互相鼓励：“总工会还在”“共产党还在领导我们战斗”。她日夜奔忙，常常顾不得乔装就跑出去，废寝忘食，有时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她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第一线，每日清晨和深夜，便在工人区域、学生宿舍中组织各种会议和谈话，讨论怎样保全组织，怎样组织群众反抗等。

向警予和省委其他同志一道，着手恢复、整顿武汉三镇的党组织，过去按照工会系统建立的工人党支部不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改为按照地域的生产机关为单位建立党支部，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做地下工作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异乎常人的勇敢，向警予就是这样坚贞忘我、勇敢机智的一个人，“她每一激奋的时候，便不认识任何险阻与艰难”。她有自北洋军政府时期起长期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经常化装成小学教员、家庭妇女，装扮得十分自然，以至于党内同志都难以辨认。她还教给同志们如何甩掉“尾巴”，如何贴标语、撒传单。她特别强调：“叛徒最可耻，破坏性最大，苏联过去有过，中国现在也有。”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她安

排交通员邓锦珊到木船工会去，找到一条船，党的重要会议如中央特委和湖北省委会议就安排在本船上开，船从武汉关外的沙滩开到阳逻，再从阳逻返回武汉，度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之后，找党也成了极其艰巨的任务。帅孟奇同志回忆她来武汉找党时的情形：“偌大的武汉三镇，人生地不熟，我决定先去找向警予同志。”此时向警予留在武汉，像一缕光，一团火，指引着、温暖着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的很多人。

向警予同志不仅参加了湖北秋收暴动的领导工作，还千方百计支持各地秋收起义。这时，从武汉出发奔赴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因受国民党张发奎部队的拦阻，错过了时间，辗转停扎在江西修水。负责该团工作的共产党员卢德铭、韩浚、辛焕文三人来武汉找到向警予，请示以后工作怎么办。他们曾经得到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同志的建议，放弃部队，只身到福建广东找南昌起义军。向警予认为在革命紧急关头轻易放弃武装力量是错误的，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斗争、搞土地革命的精神，要求他们立即返回部队，以警卫团为基础，把湖南、湖北的农民集中起来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必要时编入部队，与毛泽东同志取得联系，参加秋收起义。她还代表湖北省委拨给警卫团 3000 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选派 6 名共产党员参加该团工作。后来这支部队在湖南浏阳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卢德铭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汉口找到向警予等事，毛泽东握着卢德铭的手说：“我们这支部队，总指挥非君莫属。”在秋收起义最艰难之时，卢德铭坚定支持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意见，星星之火从此燎原。

五一黎明洒热血

1928 年 5 月 1 日，在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同志壮烈牺牲！她把清澈的爱、炽热的血、未竟的恨留给了脚下这片爱得深沉的土地，赤都埋忠骨，丹心照楚天。

七一五“分共”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在军



队中公开“清党”，在政治上严厉“分共”，武汉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

“清党事起，青年适当其冲，而借反共以报私仇之贪污土劣更纷起发动，一时青年人人自危，因诬而被害者极多。”他们不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甚至没有参加过革命的普通老百姓，都不问情由地被捉去砍头、挖眼、剖胸，实在是惨不忍睹。从1927年底开始，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对武汉实行更为血腥残酷的统治。惨烈牺牲带来的巨大愤恨，使湖北省委决定举行年关暴动，以“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

但敌我力量悬殊，年关暴动流产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党的组织从省、市委机关一直到城区各支部基本被破坏。年关前后武汉被屠杀的工运领袖和革命群众约有千人之多。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一批已经暴露身份的著名共产党人陆续被调离武汉，中共中央考虑到向警予的名气很大，留在武汉太危险，三次命令向警予尽快撤离，但是她都拒绝了。向警予是长期公开工作的著名共产党员和妇女运动领袖，国共合作期间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公开活动了四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日子里，要在武汉隐蔽进行秘密工作，何其艰难！而且作为省级领导，她是敌人搜捕的重点目标，敌人收买叛徒、派遣特务四处寻找她、时刻想逮捕她。她为何仍义无反顾地战斗在武汉、牺牲在武汉？因为武汉之于警予，是革命的热土，是宁死不让的战斗堡垒。警予就义之于武汉，俨如长城坍塌、灯塔熄灭，损失不可估计。哲人其逝，梁木折坏，泰山崩倒。

向警予说：“武汉的工作很重要，不能放弃，要有人留下来坚持斗争。”武汉国民政府是中国大革命高潮期间国共合作的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革命政府。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1月，管辖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以及安徽省、河南省一部分，人口亿万、物产丰富、襟江带湖、地势险要，在中共领导下，工农革命群众组织力量十分雄厚。1927年3月从莫斯科回国后，向警予来到大革命中心武汉，她深深感到，这是良好的战斗场所，中国革命的枢纽地带！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激荡全国，地位极其重要，但形势错综复杂，鉴于她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中央派她到武汉市总工会工作。她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日夜穿梭在女工中间，很快得到广大群众

的信任和拥护，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六万女工于赤色工会之中，受到全党一致赞誉。4月底，便代表硚口纱厂工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向警予说：“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一时无支撑，《长江》停刊，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革命形势严峻，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向警予没有因为革命受挫而灰心丧气，反而在严酷的斗争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坚持斗争，是她对亡者的告慰，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投降主义、逃跑主义和散伙主义。“有些人看到反革命气焰嚣张，认为大势已去，他们纷纷投降，求得一官半职，还沾沾自喜。另有些人逃离武汉，出国避难，以求苟安一时。”当此革命成败生死存亡之际，向警予初心不改，倍历艰难险阻，坚守革命工作岗位，显示出坚定理想信念、反对机会主义的赤胆忠心。

向警予说：“斗争越是困难，越是残酷，越是需要我留在这里。我们革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切”。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宋若林的出卖，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被逮捕。对此，她早有思想准备，抱定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在生命最后的日子，有几位留法女同学托李宗仁夫人的关系前往监牢看她，对于这些同情不同路的朋友，她淡然道：“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为革命而死，九死而不悔，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这便是警予最后两年在武汉革命生活之内心写照。

国民党军阀胡宗铎急于要绞杀这位掀起大江革命赤潮的女主笔，多次向法领事要求引渡。在法庭审讯时，向警予用极流利的法语进行抗辩。她慷慨陈词，辩惊四座，驻汉口法国总领事陆公德被其非凡气度所折服，惜其才而拒绝将她引渡，由此引起了法领事与国民党军阀胡宗铎之间的一场冲突，胡宗铎在报上大肆造谣，称法领事收受贿赂，包庇共产党员，甚至威胁要通电全国，收回法租界，最后法国政府撤换了陆公德。胡宗铎与陆公德之间近二十天的舆论战，激起了武汉广大劳工群众对向警予生命的深切关怀。引渡之日，武汉大批劳苦群众来送别他们的巾帼英雄。



武汉龟山向警予烈士墓

向警予被引渡到国民党监狱后，遭受百般凌辱、严刑拷打，她虽几次死去活来，始终一字不供，还领导了狱中的绝食斗争，鼓励狱中同志保持革命气节。敌人眼看无计可施，最后只好把那个断了脊骨的

癞皮狗、叛徒宋若林拖出来。向警予一见到这个无耻叛徒，怒不可遏地指着他的脸就痛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无上光荣。而你这个叛徒，活着是条走狗，死了遗臭万年。无产阶级是不会饶恕你的。”在最后一次审讯中，向警予从容不迫，凛然作答：“要杀就杀！至于我是不是向警予，没有多大关系，横竖你们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

大革命时期，5月是一年中重要纪念日最多的月份（五一、五四、五五等），也是党发动群众、举行集会和组织罢工的红五月，历来为敌我双方所高度重视。向警予在武汉工人群众中威望很高，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杀害向警予，就是为着向工人示威，打压革命斗争的气势。但不义之举终究是胆怯和心虚的，此前党组织和工人同志曾多次设法营救，国民党反动派害怕群众起而劫狱，于是选择在天未明时秘密执行枪决。在去往空坪刑场的路上，反动军警沿途戒备森严，但人群还是越聚越多。向警予坦然赴死，毫无惧色，身如修竹，昂首挺胸，大声演说，高唱《国际歌》。国民党宪兵穷凶极恶地殴打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坚持演讲。刽子手们慌忙用石头塞住她的嘴，用皮带勒紧她的双颊，血沿着她的嘴角滴落，街上许多人见此情景都哭了起来。枪声响了，向警予壮烈牺牲，年仅33岁。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熊俊潇）

白色恐怖下的红色战士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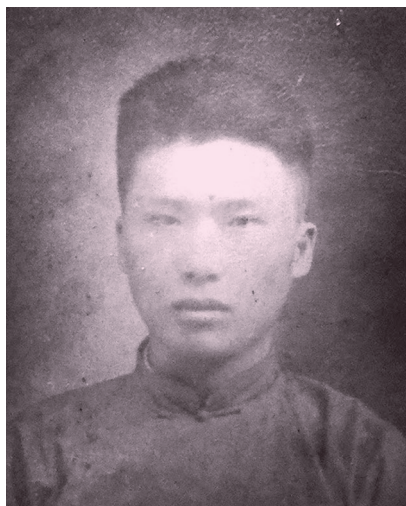
一条深夜收敛的小船

1928年5月1日晨的武汉，白雾茫茫。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汉口余记里刑场。汉阳铁厂老工人、共产党员陈春和得知消息后，强忍着满腔悲愤，不顾生命危险带人赶赴刑场，在周边秘密守护烈士遗体。当天深夜，他们趁军警疏于值守之时，潜入刑场。在惨白的月光下，看着向警予烈士临刑前饱受折磨、遍体鳞伤但仍十分坚毅的遗容，他们悲痛万分，随后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用两丈白布将遗体包裹好，用竹床抬着，穿僻巷、走小路，躲过半夜巡查的警察，到了汉水岸边事先停靠的小船旁，将向警予烈士的遗体抬上小船，渡过汉水，掩埋在汉阳补乾亭附近，使向警予烈士安息在汉阳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在此前后，陈春和还在这里安葬了许多烈士遗骨。

冒死收殓向警予等烈士遗体的陈春和，是一个侠肝义胆的湖北汉子。他于1876年出生在湖北黄陂，幼时家境贫困，随父亲到汉阳城区谋生，居住在高公桥附近。陈春和十几岁就进汉阳铁厂当童工，后成为该厂轮驳水手，长年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干又脏又累的苦力活，拿低廉的工资，只能勉强糊口。艰难困苦的生活磨砺出他坚强、勇敢、能干



民国初期的汉阳铁厂



许白昊

的个性，也使他对旧中国的黑暗以及劳动者所遭受的剥削、欺压有着痛彻心扉的体验，产生了反抗的思想，多次在汉阳铁厂自发组织反抗工头压迫的斗争。

1922年夏，中共党员、湖北工团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许白昊来到汉阳铁厂，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已经46岁的陈春和认同中国共产党保障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政策主张，积极参与活动，在震惊全国的汉阳铁厂罢工斗争中表现突出，经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罢工取得胜利后，陈春和任汉阳铁厂工团组织领导小组组长，是汉阳地区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因脸上长着大胡须而被工友和同志们亲切地称为陈胡子。

二七惨案后，军阀萧耀南欲封锁武汉所有工会，大肆通缉逮捕工会领导人，武汉工人运动陷入低潮。陈春和没有退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不畏艰辛，很快秘密恢复了汉阳铁厂的工会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使汉阳铁厂工会成为当时武汉人数最多、最活跃的秘密工会组织。1924年5月，中共汉口地方委员会在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交的《汉口地方报告》中，报告武汉地区的劳工运动情况，认为“汉阳方面工匠较多，亦因压迫比较和缓，而汉冶萍总工会安源分会，每月拨八十元给汉阳作经常费，人力财力较江岸为好，故能力亦优秀。此方工作以工人同志陈春和尽力极多”。

1926年9月，在北伐军进攻汉阳的战斗中，陈春和率领上千名汉阳码头工人，冒着枪林弹雨，拆毁了北洋军在汉江上架设的浮桥，并隐藏船只，既阻止了汉口的北洋军阀部队向汉阳增援，又使驻守汉阳的败军无路可逃，当时淹死在河中的敌军不计其数。陈春和还布置工人埋伏于汉阳兵工厂外，用扁担等追打逃窜的驻厂军警，配合北伐军敢死队里应外合，顺利夺取了

汉阳兵工厂，使北伐军旗升起在龟山之巅。北伐军占领汉阳之后，他迅速组织工人修复浮桥，集中船只，迎送北伐军进驻汉口。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陈春和当选为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在汉阳各工会中培养、介绍许多工人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后，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动军警在武汉街头巷尾不间断地巡逻，以各种借口挨家挨户查户口，便衣暗探在大街小巷跟踪盘查行人，看到形迹可疑人员即予以拘捕，有时一天拘捕千人以上。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当时已经52岁的陈春和隐居在汉阳龙灯堤一带，由做裁缝的妻弟王斋公掩护，继续坚持党的工作。他担任了中共济难会的工作，为掩护组织和保护同志，利用本地人的身份，租房子，买船票，找铺保，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活动。

在“宁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C.P.”的血腥口号下，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当时汉口铭新街集中了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监狱、刑场等反动派镇压革命的全套暴力机器，很多共产党人和善良百姓被捕后就关押在这里，又从这里被押送到铭新街东端的余记里刑场遭无情杀害。在武昌设立的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公署也捕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汉口的余记里空坪、宏春里后面、旧府街、江汉北路，武昌的阅马场、紫阳桥、大东门外等地均是反动派的杀人场所，有时一批就枪杀20余人，尸体排满刑场，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不计其数。

烈士牺牲后，遗体由家属亲友认领安葬，有的烈士特别是外省籍遇难者的遗体无人认领，被弃置刑场。起初还有善堂施棺收殓掩埋，可国民党反动政权杀人如麻，被残害的革命者成百上千，善堂无



民国初期汉阳龟山西南麓的补乾亭



力资助。目睹烈士们曝尸刑场、无人收殓的惨烈情景，陈春和悲愤交集，他义无反顾，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妻弟王斋公等，在一个个夜黑风高的深夜，划船过江，潜入汉口济生善堂广坪、余记里广坪、武昌文昌门外等地的刑场，收拢被害烈士遗体，抢抬背负，用小船运至汉阳，秘密安葬于龟山西南麓补乾亭右侧山坳内，同时埋大石块以作标记，并登记烈士名录。

深夜划船过江收殓每一位烈士的遗体，都是一段惊险、悲伤、痛彻心扉的经历，陈春和一时间须发全白，憔悴、苍老了许多，但内心却更加坚强。他下定决心，只要活着一天，就不停止党的工作，就不能不管遇难的革命同志。他将安葬烈士的遗体视为自己崇高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他可以忍受一切磨难，牺牲自己的生命。

老工人出任湖北省监委书记

1927年底，武汉白色恐怖严重，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和复杂。12月14日，陈春和冒着冬日的严寒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秘密举行的扩大会议，与林仲丹等人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选举产生以陈春和、陈国梁、关学参为委员的湖北省监察委员会，陈春和当选为书记，成为继向警予之后湖北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在险恶的形势下坚持履行党章赋予的监察委员会职责。

1928年1月，中央监察委员许白昊与中央委员项英、刘少奇联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请求清查湖北一笔巨款的去向。原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迁回上海，许白昊在去上海工作前将保管的一笔款项移交给中共湖北省委，后来听说该款项已尽数用光，并且账目不详。于是，许白昊与曾同为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的项英、刘少奇联名写信，请求中央查清此事，“以免重蹈‘二七’京汉恤款之覆辙，重危本党对工人阶级之信任而维党纪”。中共中央复信指示清查此事。收到中共中央指示的湖北省监察委员会责无旁贷，派出陈春和、关学参等监察委员与中共湖北省委成员余茂怀、陈声煜、万家佛组成五人经济查办委员会，负责审查款项用途。陈春和与其他同志一起认真审查款项账目和购买枪械情况，监督审查党的经费使用，完成了

党组织交办的任务。

以陈春和为首的湖北省监察委员会注重从制度着手，加强党的组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纪律建设。为防止出现贪污、生活腐化等问题，中共湖北省委于1927年12月31日发布第十号通告，严格规定省、市、区、县各级干部生活费标准和待遇。1928年1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明确规定：党员要重新登记，未经过此次登记的不再是党员；各支部、小组一律改组，完全实行选举，由党员推举支部书记、干事；一切指导集中到常委，常委的组织集体化等，强化党的组织纪律。通告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强调对贪污与临阵退缩分子无条件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加以严厉地处罚。1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第十七号通告专门对武装暴动中党员的纪律问题做出严格规定。2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又发布规范全省各级党部经济整顿的办法。这些制度的制定，凝结着以陈春和为首的湖北省监察委员会的心血，在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的特殊环境下极大程度发挥着维护湖北党组织纪律的作用。

由于当时斗争的环境极其艰难，留存下来的档案史料非常少，我们不能更多地知晓陈春和领导湖北省监察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情况。仅就目前已发现的档案史料来看，以陈春和为首的湖北省监察委员会在困境中仍坚持履职尽责，在党组织接连遭受破坏的特殊时期为湖北党组织纪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忠贞不渝的红色战士

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后，武汉地区反共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在腥风血雨的大屠杀面前，一些人退缩了，但陈春和没有，他以义无反顾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依然坚持为党工作。

1928年春，武汉地区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陈春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仍然想方设法恢复党在汉阳城区的地下活动。为了与党取得联系，陈春和秘密下乡串联，与中共汉川、汉阳两县委幸存的几个委员联合组成中共川阳县委，任县委委员，负责恢复党组织在汉阳城区的地下活动。这年秋天，



湖北省委从九江迁回，重建汉阳县委，陈春和任县委委员。11月，中共湖北省委又遭到破坏，汉阳县委再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尽管几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环境极其险恶和复杂，但陈春和等人置生死于度外，继续深入工厂、街巷、码头、农村发动群众，坚持斗争，使汉阳县委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2月，汉阳党组织与重建的省委恢复关系时，汉阳县委下辖13个党支部、106名党员，汉阳人力车夫、汉阳码头、汉阳兵工厂等均成立了党支部，成为重建后的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力量最强的一个基层党组织，陈春和任汉阳县委书记。其间，陈春和还曾领导汉阳人力车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并取得胜利。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难时期，正是有陈春和等人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担当和坚持，汉阳地区的党组织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28年11月27日，周恩来主持的讨论湖北组织问题会议记录：“汉阳：兵工厂、铁厂、码头、车夫、面粉厂都有线索。汉阳县：县委还存在。”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湖北——武汉三镇屡次被破坏，现仅汉阳有百余同志的组织。”12月30日，《中共湖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省委和各县工作情形以及对中央的要求》中，报告在党的工作方面，“汉阳：组织是没塌台”。

1929年2月，中共湖北省委及武汉三镇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因叛徒出卖，陈春和在汉阳龙灯堤家中被捕，被关押至国民党湖北清乡督办署军法处所属监狱。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实施了劝降和严刑逼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坚守共产党员的信仰。经过一年多严酷环境下的革命斗争和冒死收殓烈士遗体的惨痛经历，陈春和在被捕时显得非常苍老，敌人写他“罪状”的文书上记载他是八十几岁。

1929年3月4日，陈春和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夏文法等16人一起，英勇就义于武昌文昌门外。自46岁时加入党组织，到53岁牺牲，陈春和从一名朴实的老工人成长为忠贞不渝的红色战士，他对党的事业忠诚担当，对革命同志侠骨仁心，其忠勇事迹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陈春和的牺牲，以及他的妻弟王斋公被捕入狱牺牲，记录安葬烈士的

名册因此遗失，仅知道他在龟山补乾亭附近安葬了许多烈士遗骨，其中有优秀共产党员向警予等，后人缅怀这些死难烈士，称之为红色战士，安葬烈士的汉阳龟山西南麓补乾亭（又称六角亭）土冢因此以“红色战士公墓”而闻名。

1938年抗战初期八路军办事处开办后，得知向警予的墓就在汉阳六角亭，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到当地凭吊烈士，挖出一个刻有“红色战士公墓”等文字的短碣，就将短碣立了起来，并合影留念。这块短碣可能就是当初陈春和在掩埋烈士遗体时所埋。



1938年，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红色战士公墓凭吊



1986年10月迁建于龟山的红色战士公墓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修红色战士公墓，并在附近辟建因墓而命名的“红色广场”。1955年，因建武汉长江大桥，将红色战士公墓的烈士忠骨移葬于汉阳扁担山南麓。1978年，为纪念向警予烈士英勇就义50周年，在龟山西南麓修建向警予烈士陵园。1986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将红色战士公墓迁建于汉阳龟山西南麓。

如今，红色战士公墓和向警予烈士陵园坐落于长江、汉水汇合处的龟山之上，这里，青松翠柏，碧水蓝天，山花竞放，江水长流。烈士的忠魂安息在英雄的江城，向警予、陈春和等忠贞不渝的红色战士的英名和业绩彪炳史册，千秋万代永远传颂。

（汉阳区史志研究中心 熊 婕）



百折不挠

赤光耀江城

当湖北省委遭遇第一次大破坏，武汉陷入血雨腥风之时，一位中等身材、书生模样的青年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到武汉，他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此次重返武汉，是奉命到湖北巡视工作。面对湖北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干部惨遭屠杀，党的组织工作难以开展的困难局面，罗亦农决定成立湖北省临时委员会，指定黄赤光等5人为委员，在危难之时先行主持全省党的工作。

罗亦农回到上海后，立即向中央报告了湖北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并把对湖北省临时委员会的任命向中央报告。中央对湖北的情况极其重视，经过慎重考虑，重新任命新的湖北省委，但同时强调，在中央任命的中共湖北省委成员到达武汉以前，由罗亦农指定的湖北省临时委员会负责湖北的一切工作。192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正式成立，黄赤光、关学参、祁松亭、霍锟镛、余泽鸿为委员，黄赤光任书记，余泽鸿任秘书长。祁松亭、霍锟镛负责武汉工作，指定吴化之任汉口市委临时书记，蒋文负责武昌市委的工作。

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后，针对湖北各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黄赤光和省临委委员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他们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分头前往鄂东、鄂北、鄂西、鄂中了解情况，在湖北各地和武汉三镇四处寻找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重建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

经过一番努力，省临委与鄂东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得知鄂东党的组织和特委大部分还存在，在黄冈、黄安一带还在坚持斗争，但因动员群众不足，加上子弹缺乏，常常遭到失败。在鄂中天门一带，省临委派人对群众进行紧急宣传，动员了四五千人参战，同样因缺乏子弹，无法坚持，当地党组织不得不埋藏枪械，分散人员，并派人来找省临委请求接济，不料买到子弹后却遭敌人破获，随后又与省临委断了消息。省临委还派委员关学参赴鄂西巡视，了解和处理鄂西党的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了解到鄂西党组织还在，贺龙已回到鄂西，公安、石首一带时常有武装斗争。关学参派黄人觉从鄂西来武汉向省临委汇报工作，可惜他一到武汉即被内奸逮捕，所带来的钱款和报告省临委都没能收到。省临委派人到鄂南和湘鄂赣特委联系，却始终没有得到消息。

根据这种情况，省临委指定了专门人员负责购买子弹和转接信件，并派党员干部开了三个商铺，作为交通联络站。同时他们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地恢复和发展武汉三镇党的基层组织。他们先后在汉口寻找到了人力车工人党员 20 多人，在硚口找到了部分农民党员，在市政、法院等支部联系上了部分党员，在武昌徐家棚找到党员 10 多人，在汉阳也找到 3 名党员。这样使武汉地区的基层党组织逐渐得到了恢复。

对于湖北其他地区，省临委一方面指派得力党员干部去鄂东、鄂中、鄂北等区与当地党组织联络，另一方面又分派人员到黄罗蕲、黄麻、鄂东南、鄂南、鄂西去恢复党的组织。经过一番努力，省临委先后建立起中共鄂东、黄罗蕲、黄麻、鄂东南、鄂南、鄂西、鄂北、鄂中等特委和施鹤临时特委，省临委还给鄂中特委发出了一份训令和对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湖北各地的党组织和各项其他工作“有所建树”“同志亦较热烈，大有蒸蒸日上之貌”。

然而，湖北党的工作刚有起色，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破坏又降临了。4 月，省委转信人张玉珩和内部交通梁赤威、岳林在国民党当局威胁利诱下叛党投敌。张玉珩等叛徒获悉从河南来汉的同志要在一个旅馆中同霍锟镛的妻子养素接头，立即带领特务和军警包围了旅馆，逮捕了接头的交通员和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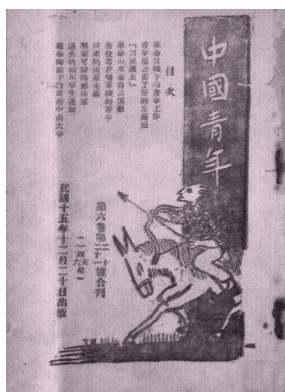
素。接头旅馆被破坏却没有引起省临委警觉，省临委书记黄赤光也不知情，未能及时撤离。次日，张玉珩又带领敌特包围黄赤光在三分里的住处，黄赤光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壮烈牺牲。随即，团省委书记卓凯泽、袁寿田先后被捕。因省临委首脑机关遭致命破坏，关学参去鄂西与组织失去联系，霍锟镛在汉无法立足去了河南，余泽鸿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汉口市委和武昌市委瓦解，省临委实际上不复存在。

危难时临危受命、刑场上视死如归的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书记黄赤光是一位颇为神秘的人物，湖南人，出生年月、入党时间均不为人知，就连黄赤光这个名字也并非本名。据说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为表示自己对革命的向往，更名为“赤光”。在北伐战争中因表现优异，被调至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军事教官，曾任区队长。

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调黄赤光任鄂南特委委员。他率领数百农民武装于1927年9月8日深夜在蒲圻中伙铺车站埋伏截击从武汉开往长沙的军用列车，他亲自登上火车，打响湖北秋收起义第一枪。

10月中旬，省委拟派黄赤光前往黄麻地区指导工作，后又根据需要对派他赶赴鄂中。他在了解鄂中各县的情况后，和特委的同志一道把分散的几支农民武装组织起来，组编成工农革命军。这支工农武装随后发动了一系列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地方当局。

在这次省临委大破坏中英勇牺牲的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卓恺泽则是一位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



卓恺泽与他主编的《中国青年》

他1905年出生于浙江奉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书记、共青团武昌地委书记、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等职，他以笔为枪，以“砍石”和“石”为笔名，

在《中国青年》上发文 28 篇，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

1927 年 5 月，卓恺泽在武汉出席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卓恺泽奉命赴江浙指导工作，奔波于沪、杭、甬等地。1928 年 3 月，卓恺泽调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他明知此去凶险万分，仍然大义凛然地对妻子林文翠说：“武汉局势，确如一幢将倾大厦，但总要有人去支撑。就是必死，我也要去。”4 月 19 日，卓恺泽主持召开团省委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与妻子诀别，“我决心一死，你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下去”，鼓励妻子坚持斗争。他还给父母亲留下《绝笔书》：“人总不免一死，死是最寻常的事；死于枪弹之下，更其比死于床褥之间的痛快而有意义。你们千万不要为我悲哀和可惜。”他希望家人坚信光明的未来一定会到来，一定要顽强地坚持下去。26 日晨，卓恺泽迈步走出监狱，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

异地建省委

1928 年 6 月 29 日，一位在武汉以开商店为掩护的党员干部刘子刚向中共中央写信反映：“省委机关尚未建立，所有负责人都住在九江几个大旅馆里……每日费用很大，以致将兄处所决议之经营商店的费用，几致全数挪用去了。”那么湖北省委为什么不在湖北境内建立省委机关，却要花费重金在江西九江租旅馆住呢？

事实上，这是由于湖北省委在接连遭受两次组织大破坏后，面对武汉异常严重的白色恐怖，新的湖北省委成员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异地重建省委。

1928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少猷、余泽鸿、张永和重组湖北省委，刘少猷任书记，张永和兼组织部长，余泽鸿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新任省委书记刘少猷 1902 年出生于云南彝良县，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信阳铁路工会秘书、中共豫陕区执委会委员、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委、中共沪东区委书记等职，曾在河南、南京、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由于武汉形势异常险恶，从外地派往武汉的干部很难立足，因此湖北省委机关被迫暂时设在江西九江。5月9日，刘少猷、张永和离开上海，刚到达九江就遭遇到江西省委交通主任李世杰叛变，江西省委在九江的机关和九江市委也被破坏，刘少猷险些被捕，不得不逃亡外地，直到5月25日以后才开始在九江着手建立湖北省委。由于这种特殊原因，出现了刘子纲来信中所说的省委在九江住在旅馆中却一时无法开展工作的情况。此后，省委派刘凤灵、刘子刚到武昌和汉口去寻找党员线索，派雁冰恢复京汉区特委与省委的联系，派余泽鸿去武汉与鄂西特委接头，派王文民巡视鄂东，省委还与鄂南特委发生了联系，逐步恢复了全省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为加强湖北省委领导，中共中央从1928年7月起连续多次调整湖北省委成员，湖北省委随即由九江迁到武汉。8月初，省委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选举刘少猷、余泽鸿、郑耀华、曹振常、张绍善、祁松亭、关大顺、周逸群、曹壮父为省委委员，以刘少猷、余泽鸿、郑耀华为省委常委，周逸群、祁松亭为候补常委。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由九人组成新省委，以刘少猷、余泽鸿、郑耀华为常委，因郑耀华未到职，由王奇岳接任省委常委。组织调整完毕后，新省委迅速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开展城市工作和士兵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各种日常斗争，整理并扩大群众组织。省委还派出巡视员巡视各地，加强同各地的联系，并决定重组各地党组织，取消各地特委，将全省划为中南、鄂东北、鄂东、鄂西、鄂北5个区，除中南区外，其他4个区设立办事处。

针对武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刘少猷提出要重新创造大城市的工作基础，团结和领导武汉三镇40万工人，建立坚强的产业支部。省委先后成立武昌市委和汉口市委。到10月，武昌有党员五六十人，成立2个产业支部；汉口市委管辖5个支部；汉阳县委管辖13个支部，有党员106人。全省共有党员6455人。

就在此时，桂系鄂籍军阀胡宗铎、陶钧强化了在武汉的反动统治，加紧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叛徒黄佑南将中共秘密工作的规律、具体措施等写成文章，发表在湖北省“清乡”司令部主办的刊物《清

乡月刊》上，并献出所谓的“以毒攻毒”即大量使用中共叛徒来破坏中共组织的毒计。这个毒计被胡、陶所采纳，武汉卫戍司令部随即成立汉口稽查队密查班，委任黄佑南为上尉密查长，网罗一批中共叛徒为密查员，专门侦缉破坏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11月6日，新任黄广特委书记汪玉棠到汉，在汉口旅馆与省委代理秘书长张秉初接头，因张不认识汪玉棠，故又派认识汪的省军委秘书董恕陪同前往。当时，沙市发生了抢枪杀人案，消息传来，武汉国民党当局加强戒备，缉查甚严，法租界恢复对旅馆的检查。

当晚8时30分许，国民党侦探来到汪玉棠的住处进行搜查，张秉初神色异常，引起敌特注意，在他身上搜出省委交通网和组织法等文件，3人一同被捕。张秉初在严刑拷问下坚不吐实，保护了省委书记、两位常委的安全，旋即牺牲于汉口。汪、董二人则在敌人酷刑审讯下叛变投敌，当晚即带领敌特捕人，省委军委机关全部被破坏，2个特务队长胡萍、高龄被捕牺牲。11月7日，武昌市委和省委外县通信处被破坏，武昌市委书记张作宾、汉阳县委特派员余盛荣和裕华纱厂支部书记范金山等被捕叛变，牵连省委机关和武昌市委、汉阳县委被破坏，一批党员如郭顺卿、张凤英、徐兰英、刘桂远、杨春枝、高昌明等被捕牺牲。

接连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和机关，让反动当局的气焰更加嚣张。一时间，侦探、特务、警察、叛徒密布武汉三镇，各十字街头均有特务暗中监视，电影院、戏院、旅馆、茶馆、酒楼都有敌探守候，轮渡来往须检查一小时，夜间进行不定期检查；特务还化装到各里各户检查居民，稍有怀疑即行逮捕。至11月18日，仅武昌就有50余名党员干部被捕，8人牺牲；汉阳县委与省委失去联系。

在湖北省委遭遇的第三次大破坏中，熊亨瀚这位在汉阳鹦鹉洲开设湘益隆杂货店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的优秀党员不幸被捕。熊亨瀚是湖南益阳人，出生于1894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务委员，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奔走于湘鄂赣三省之间，1928年初转移到武汉。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仍然豪情满怀赋诗曰：



熊亨瀚

含冤终可白，再世当为天下雄！”抒发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展示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27日，熊亨瀚被押解长沙，湖南“清乡”督办署军法处连夜审讯，他凛然回答：“要杀就杀，何必多问。”军法处法官感到证据不足，难以定罪，便报告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何键竟说：“熊亨瀚三个字就是罪证，不必更问，枪决就是。”次日清晨，熊亨瀚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山头。

尽管在这次大破坏中省委主要负责人未遭劫难，但党组织损失严重，省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汉不能立足，被迫撤离武汉。事后，刘少猷、余泽鸿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湖北党组织的破坏情况，本届省委即告结束。1929年秋，刘少猷回到家乡云南，任云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0年5月被捕，7月26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狱中。

“男儿国是家，长剑走天涯。”

1928年11月7日，熊亨瀚被捕，他自知生命即将结束，在狱中作《自挽联》。上联是：“十余载劳苦奔波，秉春秋笔，执教士鞭，仗剑从军，矢志为党；有志未能伸，此生空热心中血！”表达了对党忠贞不渝的真实情感和壮志未酬的无限感慨。下联是：

“一家人悲伤哭泣，求父母恕，劝兄弟忍，温语慰妻，负荷嘱子；



熊亨瀚烈士自挽联

中央新举措

1928年12月14日，一封来自湖北的《雨华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了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雨华是湖北省委常委王奇岳的党内用名，他在三镇党组织遭大破坏，省委书记刘少猷、常委余泽鸿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留守武汉，在报告中向中央详细列出了党组织严重受损、在汉活动困难和党员牺牲情况。

在收到这份报告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已于1928年11月27日在上海与夏文法一起听取了刘少猷、余泽鸿的汇报，会上刘少猷介绍了湖北党的现状，并对湖北今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周恩来在会上对湖北全省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湖北党的城市工作、支部建设与支部生活、整顿地方党部、秘密党的条件与方法、宣传教育、经济、群众组织、党团关系等15个问题进行了具体指导。周恩来强调在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城市，党的工作必须扎扎实实从下层做起；党的干部必须“职业化”和“社会化”，“机关少而职业化”，“会议时间人数少，开会时必须保留一部分在外”，“省委分工，必须每个人能够解决问题”，“各级党部能够解决问题”，等等。

鉴于湖北武汉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中共中央还采取了非常之举，于11月29日发出《关于湖北省委委员、常委、组织分工的指示》，规定湖北省委设立两套班子，以夏文法、曹壮父、王奇岳、叶开寅、法荣廷5人为正式常委，夏文法为书记；吴致民、曹振常、周逸群、廖划平、关大顺、曹大骏6人为候补常委，曹壮父为候补书记。

新任命的湖北省委书记夏文法是湖北黄冈阳逻龙口村（今武汉新洲）人，出生年月不详，父母早亡。10多岁到阳逻当学徒，转而赴汉口汉正街一带从事打包等杂活，几经辗转，成为一名染织工人。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夏文法把染织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武汉最早的染织工会，被选为工会委员长。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2日，武汉八二总同盟罢工爆发，夏文法率领汉口织染工人参加斗争。八二总同盟罢工失败后，湖北省委将



暴露身份的干部转移，夏文法被送往莫斯科学习。其间，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8年七八月间奉命回国，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工委书记，负责工人运动。

1928年11月，夏文法接党中央通知离开河南到上海。在上海，他见到了自莫斯科分手3个多月的良师益友周恩来。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在河南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向他介绍了各地的情况，谈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湖北的形势和情况。关于湖北的形势，周恩来说，湖北省委遭到3次大的破坏，湖北省委及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亟待恢复和整顿，形势相当严峻。这时，夏文法已经明白了党中央要他来上海的意图，于是立即表示：服从组织的调遣和安排，党需要我到哪里、干什么，都坚决服从。

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后，夏文法于12月初从上海乘船前往武汉。因在团风意外遇见同乡的反动分子，为躲避敌人盘查，他机警地从阳逻登岸，连夜赶至武昌。次日与法荣廷碰面后，他了解了省委遭受破坏的具体情况，深感重建组织非常迫切。他首先建立省委机关和隐蔽机关，亲自带头并安排省委干部下去与失散的党员接头，着手恢复三镇党组织。在较短的时间里，



夏文法

武汉三镇党员就陆续发展到150余名。与此同时，还派出多人到湖北各地与各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他还细心地与中央约定：“鄂省委今后代名福兴，前胡秀林作废。”

1929年1月31日至2月1日，夏文法在汉口秘密主持召开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省委常委、鄂南、鄂东北、鄂西、京汉路、大阳和省委军委、共青团代表参会。会议听取了“政治报告、省委工作报告、武汉三镇

工作报告、各出席代表报告”，讨论了政治任务决议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兵士运动、团的工作。在此期间，夏文法对湖北全省国民党军队及其治安概况、湖北省“清乡”督办公署所辖各部主官和驻扎地点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制表上报中共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武汉党组织迭遭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党员被捕后叛变投敌、带领敌特到处指认共产党员，尤其是黄佑南，出卖许多同志，罪恶昭彰，危害极大，必须予以铲除。为此，夏文法领导成立了专门惩治叛徒的特务队，并亲自制定惩治叛徒的行动计划。他特地向中央申请“在沪速代湖北买手枪几支、炸弹及电刀，蒙蔽眼睛药”，并列出了在敌卫戍司令部任职的叛徒丁超、黄佑南、范金山、汪淡元的名单。他还向中央报告敌卫戍司令部署内有我们的组织，“现有个计划正在进行”。遗憾的是这一狙杀叛徒计划因意外情况未能成功。

1929年2月上旬，蒲圻县委书记刘迪生被捕叛变，在武昌指捕了两个到省济难会领款的人，二人随即叛变，省济难会机关遭到破坏，国民党侦缉人员搜查到一些党的文件和信件，从中发现了一些党的机关驻地，逮捕了汉阳县委组织部长姚玉山、省委办事处工作人员傅士倬等人。姚玉山、傅士倬随之变节投敌，供出了省委机密，引导敌特抓捕共产党员，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夏文法和团省委书记王允文在夏文法家中被捕，曹壮父、叶开寅、杨石魂等在楚善里省委办公处被捕，法荣廷在友益街广货店被捕。

这次大破坏，共42人被捕，在汉的省委委员除吴致民幸免于难外，其余省委委员、团省委、济难会“俱一网打尽”，武汉三镇党组织骨干损失殆尽。3月4日，夏文法、法荣廷、曹壮父等16人壮烈牺牲。

与夏文法同时任命而又同时牺牲的候补湖北省委书记曹壮父又名曹仲甫、曹锐。1896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龙山镇曹家垅村（今属湖北大冶）。1913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班，之后结识了恽代英、萧楚女等进步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2年3月，曹壮父考入南京河海工科大学。由于他才智过人，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很快成为南京地区的青年知名社会活动家。1924年7月，



他由南京回到家乡过暑假，组织领导家乡农民革命运动，以禁烟为由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以原“青年读书班”的进步青年为骨干，深入各乡村进行宣传，用通俗的语言写了一首歌，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天上星，
颗颗稀，
莫笑穷人穿破衣。
地主军阀命运短，
农民协会快成立。
要团结，
把心齐，
困龙自有上天机。

1924年，曹壮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南京党小组成员。国共合作时期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6年1月10日，国民党（左派）南京市党部成立，曹壮父当选为市党部常务委员。2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决定创办“国立广州中山大学分设南京附属中学”，为解决学校经费困难，他毅然放弃毕业考试，与宛希俨前往广州争取国民党中央和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最终广东国民政府同意常年供给该校教育经费，并拨款3000元作为临时开办费。3月12日，学校开学，曹壮父任校长。6月，因身份暴露，他被调往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12月，曹壮父调到中共湖北区委工作。1927年1月，曹壮父受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派，以武汉各团体派赴鄂西“发展民众运动代表团”主席和国民党省党部巡视员身份，率代表团赴鄂西指挥工作。

在湖北省委经历三次大破坏后，1928年11月中央再度重建湖北省委，任命曹壮父为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二线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兼组织部长。

1929年1月，曹壮父到武汉就职。新省委在万分艰苦的情况下积极开

展工作，恢复与各县的联系，支持工人罢工、领导失业工人斗争。他还兼任了秘书处、军事等机关的领导工作。省委设立的秘密印刷机关也由曹壮父具体领导。2月上旬农历年关，由于叛徒告密，曹壮父和省委常委叶开寅在汉口楚善里省委办公处被捕。

曹壮父曾化名王子琴，但由于叛徒的指认，他的身份还是暴露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曹壮父坚贞不屈，敌人以“只要承认姓曹，就可保释出狱”的诱饵来引诱，曹壮父轻蔑地答道：“我从来只姓红！”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曹壮父被捕后不久，敌人又逮捕了他当时已有七八个月身孕的妻子，曹壮父知道后便常托人带信给妻子，鼓励她要坚强，要勇敢，并说自己牺牲后，无论妻子生男生女，都取名为“祥继”，“祥”是辈分，而“继”就是继承父辈的革命遗志。

在这次大破坏中被捕牺牲的杨石魂是一位曾在广东叱咤风云的共产党人。他1902年出生于广东普宁，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汕头特支第一任书记，后任汕头地委委员兼工委书记。广州四一五惨案后，他组建惠潮梅工农救党军，任党代表，率军奔赴武汉，后因马日事变爆发，进军受阻。1927年9月下旬，杨石魂参与组建东江工农军，任副总指挥，积极配合南昌起义部队作战。10月初流沙会议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驾驶一条小船，护送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到香港，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将他们安全送到目的地。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南路特委书记、北江特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1928年12月，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参加省委重建工作，1929年3月4日被国民党杀害。

与夏文法、曹壮父一同牺牲的叶开寅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他



杨石魂



1907年出生于湖北应山县（今广水市），曾是一名铁路工人，1927年春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叶开寅历任中共广水铁路支部书记、应山县委委员兼工运部长、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前后回国，向京汉路区党组织传达六大精神。1929年2月7日被捕，3月4日被国民党杀害于武昌通湘门外。

据初步统计，从1927年12月至1929年2月，在武汉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800多人。由于湖北省委连遭四次大破坏，192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暂不恢复湖北省委，在武汉设立特支，其他地区特委则改为中心县委或特支，直属中央领导。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涂天向 刘桂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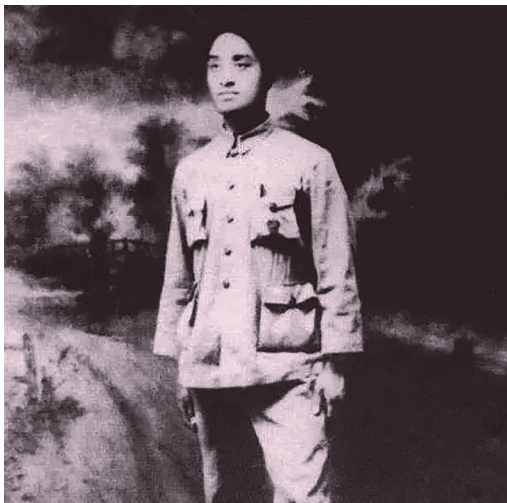
历尽苦难初心不改

中央发出新指示

1929年6月的武汉，天气有些闷热，让人有压抑窒息之感。在一家旅馆中，一位年轻的“商贩”正在埋头奋笔疾书。他写的既不是账本也不是货单，而是一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位“商贩”就是中共中央派往湖北的巡视员杨开明。

杨开明是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堂弟，早年曾受毛泽东、杨开慧影响参加革命，投身工农运动并参加了秋收起义和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洗礼。此次他来湖北巡视，是在湖北和武汉党组织连续遭受四次严重破坏，党在当地的组织体系已不存在，急需重建的情况下，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起联络失散党员、恢复重建组织的重任。

在杨开明来湖北巡视之前，周恩来曾于1929年3月25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的文件，指出：过去在各地党的上级机关破坏后，再派人重建党的上级机关的办法不妥，“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结果不但工作不能推动，新的关系不能发生，甚至旧的基础也日益缩小。工



中央巡视员杨开明



作既没做起，而机关已立，于是这个架空的组织，在社会中便极易为敌人发现，屡遭破坏”。为此，中央明确指示：“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并规定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者遭受破坏后，党的领导同志要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1929年4月24日，党中央又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北问题决议案》，指示湖北党的中心任务是要发动斗争，在斗争中反对改良主义，组织群众。中央还决定暂不恢复省委，加重中心县委的责任和巡视员的指导，健全地方党部，培养地方的干部人才，加紧党员教育工作，建立正确的党与群众的组织关系，注意秘密工作，建立正确的党与团的组织关系。中央还明确要求在湖北要建立中心区域的城市工作；建立支部生活，特别注重产业支部；要深入群众，“有决心做坚苦忍耐的工作”，实现党员职业化；要慎重地找旧的线索，对于靠不住及没有确实考察的分子，宁可不用，不可乱用；要注意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注意质量的发展。此外，中央还对湖北党组织如何发展职工运动，建立中心区域的城市工作，如何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武装斗争，如何开展学生运动和反帝运动，以及如何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都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指示。

杨开明带着中央这些新指示精神来到湖北开展巡视工作，然而，此时他面临的现实却比预计的更严重，形势更恶劣。作为一个外乡人，他不得不化装成小商贩从武汉前往鄂南巡视，而乡下白色恐怖同样严重。铁路车站沿线都有严格盘查，住饭店每夜也有清乡团盘查，若居住时间稍长、无职业与当地社会关系掩护，或者应对盘查稍有不慎，即被抓进团防局。武汉大街小巷，军警密布，暗探特务如麻，在旅馆居住和外出也经常面临搜查、盘问，稍有破绽和嫌疑就遭逮捕。外地男性若无家眷，甚至连租房都难找到房东和铺保。找职业掩护也异常困难，没有武汉的社会关系很难找到职业。而武汉和湖北各地党的组织基本破坏殆尽，党员失去组织关系、上下级失去联络的情况非常普遍。党员和进步群众因畏惧白色恐怖，也不敢开展活动。

尽管环境异常险恶，但杨开明还是在鄂南找到了一批党员干部，并建立了新的中心县委。同时，在武汉他也意外地找到了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其中包括第一女子中学教员余佛舟等7名知识分子党员，还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吴桂城等20余名党员以及第十师的10名党员。还找到了第一纱厂的一名女党员。杨开明分别找其中部分同志，与他们个别谈话，并开了一两次会，向他们传达了党的新路线、方针、策略和工作方法，但他还未来得及进行具体工作指导，就又匆匆忙忙赶往鄂中，巡视当地7个党支部并召开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扩大会议，筹备组建中心县委。然而，就是这一次离开武汉，让他阴错阳差地与中央派往武汉开展恢复党、团组织工作的另一批同志失之交臂。

龙潭虎穴寻党员

当杨开明在武汉三镇和湖北各地四处奔波巡视，寻找失散党员重建党组织之时，由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开展恢复党、团组织工作的刘先觉、张家驹、余本安等也于1929年6月陆续秘密潜入武汉。他们知道中央巡视员杨开明正在湖北和武汉活动，于是刘先觉试图与杨开明取得直接联系，不料杨开明却于7月1日离开武汉前往汉川巡视，他没有收到刘先觉来信，因此既没有来与之会面，也没有任何回复。刘先觉等人只好自己按照中央给出的一些线索，寻找散布在武汉三镇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经过一番努力，刘先觉于7月19日向上海寄出了一封收件人为“云光”的密信，向党中央报告他来武汉后进行的恢复党组织工作，并请示了一些重要问题。

这封密信报告中央：武汉一共成立了4个党小组，大概有20名党员，全都正式开过党小组会议。但党员成分都是下级军官、警察和失业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产业工人。在武汉找职业掩护非常困难。在武昌方面的纱厂里，敌人不但有公开的稽查，还有暗探，如果没有办法送党员进去做工，就没有办法动员组织群众。铁路、运输、兵工厂等单位，情形也与此类似。要渗透打入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组织，也很难，因为敌人不但控制严密，还有叛变的刘楚材、万家佛等人助纣为虐，要先铲除这些败类。



密信还向中央请示八一纪念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和形式去做，对于过去自首又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人该如何办理等问题。为保密起见，密信请求中央将刊物书报和通告文件、普通来信分别寄送武汉不同地点，并请求中央设法拨款救济 40 余名在狱中的被捕同志。同时还请中央转告军委，在国民党军第十师输送营中，还有一些党员存在，可以组织起来。

就在这封密信寄出一周以后，中共武汉特支干事会在武昌秘密成立起来。特支干事会由刘先觉任书记，张家驹任组织干事，女党员李素之任宣传干事。特支干事会直属党中央管辖，下辖 10 多个党小组和 1 个产业工人支部，分布于汉口、武昌地区。另外，在狱中还有 40 多名党、团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党员 50 余人。汉阳城区党组织属咸宁中心县委管辖，因此武汉特支干事会没有在汉阳建立党组织。8 月上旬，由团中央派遣到武汉工作的余本安建立了共青团武汉特支干事会，下辖汉口、武昌支部，拥有共青团员 20 余人，直属团中央管辖。余本安担任团武汉特支书记。这是自 1929 年 2 月湖北省委遭受第四次大破坏后，武汉市区内再次成立新的基层党、团组织。

不知是什么原因，刘先觉发出的密信迟迟没有被中共中央收到，倒是共青团武汉特支干事会报送的关于武汉党、团组织情况和武汉目前工作的信件辗转交到了中共中央。于是，中央根据武汉团组织报告，于 1929 年 8 月 11 日发出了《中共中央给武汉特支的指示信》，指示武汉特支不要依赖旧的组织基础去恢复党组织，而要开展“艰苦的创造的工作”，深入到产业部门，由下而上地去创造党的基础。特支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地打入到粤汉、京汉两铁路和兵工厂、海员、市政工人和纱厂工人中，去接近群众，组织群众，在斗争中发展、创造产业支部，自下而上地从群众中生长党的组织。

凑巧的是，就在刘先觉向中央发出密信的同一天，因白色恐怖被迫转移到武汉从事地下活动的中共湖南省委，在武汉也向中央发出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写道：“省委在武汉在找湖南同志关系中牵带找得不少武汉当地同志的关系，因湖北省委的破获，再加上与武汉负责人以前彼此不相往来，

所以找得武汉当地的组织暂时不得不由湘委负责指导。在武汉最有成绩的要算刘家庙，此处已由省委成立一个支部干事会，组织四五个小组。支部干事会的负责同志以前多是在省农民协会负过责的，对党非常忠实，省委拟将一切党的文件训练他们外，并按期派人参加他们的会议。最近在该处找了新的线索。”

湖南省委在武汉找到这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纯属偶然。那是由于在江西任中共铅山县委书记的黄冈籍党员邓斌因遭遇变故与特委失去联系，回到武汉后偶遇湖南省委常委张同志（时任湖南省委常委中姓张的先有张学琅，后有张浩即林育英，此处不能确定是哪位），他们商议寻找失去组织关系的在汉党员，准备筹建党组织。邓斌先后联系散布在汉口刘家庙和武汉第一纱厂的一些党员，陆续建立了党支部。

湖南省委经过认真考察，向中央报告称“担保所找得的关系，完全是以前最忠实可靠的同志而绝无一点危险性”，请求中央尽快派出得力同志来汉工作，尽快筹建武汉特别市委。同时，湖南省委积极领导这些同志在武汉重新筹建党组织，并恢复工会和青年团的活动。

中共中央接到湖南省委报告后，就想要把分散在武汉的三部分党的力量整合到一起。起初准备将杨开明在武汉找到的党员和湖南省委在汉联络的党员统一划归中共武汉特支领导，并强调“对每一部分的关系，都应经过慎重考察，尤其要有工作的考察”，然而，湖南省委按照中央指示准备将所辖武汉党员的组织关系转交给中共武汉特支时，却因接头失误未能移交成功。

为了加快恢复武汉党组织，加强对分散在武汉和湖北地区党的力量的统一领导，192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湖北省委，由叶守信、何玉琳、欧阳洛担任省委常委，叶守信为省委书记，负责领导武汉市区、近郊，京汉、粤汉铁路与海员，以及直属各县市工作，并指导鄂豫边、鄂西、鄂东三个特委工作。中央规定“湘委在武汉之组织及特支以前发展的组织均须移交省委慎重加以审查编成支部小组”。中央还特别强调：“省委之建立，须绝对保持秘密，同志间都要不使知道武汉有省委组织，此事非常重要。”



不料武汉党组织的整合还没开始，就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1929年10月，一封署名“女友傅淑华”的信从武汉寄给了上海的“钟先生”。这封信并不是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一封紧急报警信。寄信人“女友傅淑华”是中央指定在汉的候补交通员，收信人“钟先生”则是中共中央的代称。傅淑华在信中向中央报告：工人夏正奈因发传单被捕，导致武汉特支书记刘先觉、组织干事张家驹和共青团武汉特支干事会书记余如心（即余本安）被捕。刘先觉、余本安随即叛变投敌被释放，他们将作为敌人眼线来破获党的机关，反动当局还发给他们安家费和旅费，将其派往南京、上海等处。

刘先觉、余本安的叛变，导致武汉特支20余人被捕，中共武汉特支干事会和共青团武汉特支干事会被敌破坏解体。而此时湖南省委又接到了中央指示，准备迁回湖南益阳开展工作，为了不使武汉这批刚刚接上组织关系的党员再度失散，湖南省委决定组建中共武汉特别区委员会，临时担负起组织党员和指导武汉党的工作之责。

9月28日，湖南省委常委张同志召集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中共武汉特别区委员会，由龙睿任书记，邓斌任组织委员，陈明任宣传委员，胡朗明、曾青山为区委委员，王献清、赵宗申为候补区委委员。中共武汉特区委代号伍鸿兴，机关驻武昌。区委负责人邓斌、龙睿、陈明分别使用化名郑琛、洪瑞和秦敏，以便保密。武汉特区委下辖第一纱厂、武昌街道、江岸刘家庙和汉口三眼桥4个党支部，4个独立党小组，还有一些零星党员，共计100余人。

中共武汉特区委成立仅4天，就向中央发出了报告，详细介绍了特区委成立经过、成员简历及工作计划，还向中央报告了中共武汉特支不幸被敌人破获的消息。

10月初，随着新的湖北省委书记叶守信和省委组织部长何玉琳、宣传部长欧阳洛陆续到达武汉，新的湖北省委正式开展工作，由湖南省委领导成立的中共武汉特区委历尽艰辛和周折，终于与新湖北省委取得联系，失散多时的党员们又重新回到组织怀抱。新湖北省委将中共武汉特区委改组为中共武昌区委，由邓斌任书记。党员们又投入了新的斗争。

袜子作坊巧设联络点

1928年夏的一天，位于汉口市汉正街的宝庆路跟往常一样热闹非凡，沿街商贩的叫卖声络绎不绝。在一家杂货店的楼上，几部旧织袜机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一个老奶奶正在将织好的袜子装进筐子里，一位大嫂在袜子厂内来回忙碌着。没过一会儿，她走下楼来，看到一位头戴大草帽的男人正在卖凉面。她端详了一下卖面人，要他随她一起上楼去拿她自己的碗装凉面。两人上楼后走到晒台上，卖面的人还没开口就失声痛哭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1927年底说起。1927年底至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秘密组织武汉年关暴动计划泄露后，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在武汉开始了血腥屠杀。仅仅在年关，被敌人枪杀的革命者就达100多人。1928年2月间，党的多处秘密机关、接头处遭敌破坏，一大批共产党先后被捕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惨遭杀害。3月至4月，由于叛徒出卖，省、市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遭到大破坏，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党团干部在“三百一十人以上”。

危急时刻，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五大代表张金保得到时任全省总工会秘书施季高的及时提醒，得知省总庶务宋若林已经叛变。于是她机智地避开敌人，马上乘船回到家乡芜湖。在家乡的一个多月里，张金保夜不能寐，度日如年，她时刻担心着曾并肩作战的施季高、向警予等革命战友们安全。张金保想着无论如何，党组织肯定需要经费，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娘家在芜湖仅有的几间茅房和一些破旧家具卖了一百多块钱，祭拜了祖父和父亲的坟墓后，马上回到武汉。

此时的武汉，早已物是人非。由于武汉白色恐怖严重，湖北省委遭到破坏，无法在汉立足，新湖北省委机关被迫于5月间暂设江西九江。此时，失去组织关系的张金保要公开找党危险重重，于是她化名张日晖，利用此前在芜湖卖房所得的一百多元，与一个胡姓商人合伙，在汉正街宝庆路上开了一家袜子作坊。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小小的袜子作坊作掩护，张金保开启了找党之路。那位头戴大草帽卖凉面的男人，便是原中共湖北省委内部



张金保

交通员陈汉清，他是张金保联系到的第一个党员。陈汉清告诉她，由于叛徒宋若林的出卖，向警予、施季高同志壮烈牺牲，施季高的妻子韩凤兰也被敌人判了刑。两人越说越伤心，但心中革命的信念却更坚定。陈汉清再三提醒张金保要提高警惕。

为更稳妥地联系、掩护同志，张金保决定结束与胡姓商人的合作，单独开办袜子作坊，作为党员秘密联络点。她联系上原硚口区保卫干事李少清，此时李少清正在国民党部队任营部文书，便利用他的关系将袜子作坊搬到了安徽会馆附近。此后，李少清经常带一些穿国民党军装的朋友到袜子作坊玩，以消除外界的怀疑。就这样，袜子作坊作为党员的秘密联络点，陆陆续续串联了许多同志，如泰安纱厂工会委员钟金枝、罗家墩面粉厂工人江麻子等等。为了解决部分党员失业问题，张金保号召有工作的同志凑些本钱，资助他们摆摊或贩卖小菜，或通过社会关系给他们介绍工作。

在串联失联党员的同时，张金保还组织开展了惩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她指挥罗家墩面粉厂工人江麻子和秘密串联的同志陈永康，利用在江边渡口驾渡船的机会，干掉了一个专门陷害工人的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的特派员。

张金保自己不知道的是，在1928年7月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她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党的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到1929年6月以后，与张金保建立联系的党员越来越多，包括原省总工会工人武装训练班的同学袁育、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刘立青、张济宽等等。为了进一步扩大联络网，张金保安排两条线进行联络：一条线是工人线，由钟金枝及曾经做过店员的谢兴益两位同志摆摊作为接头和联络点，同时对于人数较多的纱厂同志以运菜为名进行联络；另一条线则是军队线，由打入国民党

军队的同志直接到张金保家中接头。每隔三至五天，钟金枝、谢兴益到张金保家中碰头，交换联络同志的情况，研究和解决相关问题。当时虽然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正式建立党的组织，但这些经受过大革命失败生死考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凭着坚定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诚，依然冒着危险坚持开展革命活动。

在联系党员的同时，张金保等人一直在设法寻找党的组织。然而，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找党组织谈何容易，张金保在找党的过程中曾因同志被捕而“断线”；还因接上“反线”，遇到假冒中央来人的叛徒而险遭不测，以至于她不得不远走上海，最终因找不到党组织而再次回到武汉。

返回武汉后，张金保又遭遇叛徒刘金山、贾波臣多次骚扰，都被她机智地一一化解。位于安徽街的袜子作坊已然不安全了，张金保不得不搬家。袁育帮她找了一位姓任的老板做店保，将作坊搬到汉口董家大巷。后因出入人员太多、织袜子噪音大，房东不愿续租，张金保又借用刘立青的名片搬家至大夹街三巷附近。

1930年1月前后的一天，有人告诉张金保，何恐在狱中希望和她见面。何恐曾担任全国学联湖北理事、团武昌地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湖北区委学运委员等职，1929年春在汉口火车站被叛徒指认遭到逮捕，囚于武昌湖北省高等法院看守所。此时和他一同关押的还有曾任中共硚口区委组织部部长的王自强。何恐通过其他关押的革命同志了解到张金保等已经在外面秘密串联了一批同志，正想方设法寻找党的组织，便想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一些有用的信息给张金保。

于是，张金保以探监的名义来到狱中。何恐隔着铁窗问：“你打袜子的生意怎么样？”张金保意识到这是要交换信息，便答道：“生意不太好，袜子没有地方销啊！”何说：“做打袜子的生意没有销路怎么行？应该到乡下去推销。洪湖一带能销袜子，那边生意好做，比去黄陂好得多。”张金保马上明白，何恐这是暗示她应该去洪湖一带找党，但她一时间想不到接头的方法，便说：“没路子，怎么销呢？”何恐心领神会地说：“汉口香肠厂有洪湖一带的熟人，可以托他们给你推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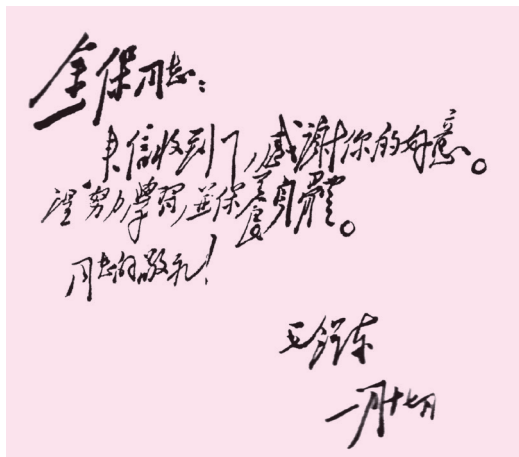
洪湖地区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曾组织群众在这里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6月，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担任重建的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1929年2月，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鄂西，鄂西特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取得反“清剿”的胜利，使被分割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此时的洪湖地区已经建立有党组织且发展良好。

何恐将洪湖有党组织的信息带给张金保，让张金保离党组织更近一步。1930年1月的一天，张金保前往香肠厂，通过老工人钱老七介绍，次日一早带上20打袜子，与吴姓交通员一起，以行商身份为掩护，经多次辗转才到洪湖根据地。一路上，尽管天气恶劣，道路崎岖，但离洪湖根据地越近，张金保心里越感到亲近。到洪湖根据地后，张金保向党组织汇报了近两年工作开展情况。找到党组织后，张金保服从组织决定返回武汉。也是从这天起，张金保化名余冬生，她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在严寒的冬天找到了党，承认了我的党籍，使我又获得了政治生命”。

由于感染风寒，张金保返回武汉不久就患了一场重病，一病就是4个月。据张金保事后回忆，在她患病期间，由金泽霖代表她，将他们秘密串联起来的党员一一介绍给党组织，然后一一进行审查，一批同志先后被承认党籍，

恢复了组织关系。

在张金保患病期间，湖北省总工会的李震瀛和吴芳两位同志于1930年3月到家中看望她。当年5月张金保病愈后，参加了省总工会的工作。张金保在与党组织失联后，通过办袜子作坊联络失联党员，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组织怀抱，为武汉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金保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后，毛泽东于1944年1月17日给她的亲笔信

堡垒营暗藏党支部

在张金保开办的袜子作坊中，有一位国民党军官经常光顾，此人名叫刘立青，是一位在反动派“清党”时没有暴露身份隐蔽下来的共青团员。

刘立青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先在国民革命军任第三军战时宣传员，后因军队扩大，紧急分配至国民党第八军三师九团任三营指导员。刘立青曾是宁乡甲种师范学校的首届学生，学生时期深受革命先驱谢觉哉、何叔衡等影响，当年5月，他在部队驻地岳阳加入共青团组织。由于汪精卫集团“清党”，他迅速离开国民党第八军，准备回到武汉加入由共产党掌握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不巧的是，当刘立青赶回武汉时，警卫团已离开武汉到江西修水同平（江）浏（阳）农军会合，参加秋收起义了。就这样，刘立青如飘荡的浮萍，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为了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及时回到组织的怀抱，刘立青加入国民党第三军警卫团担任三营指导员，随部队从武汉赶到南昌。但他赶到时，南昌起义的部队早已撤离。这年秋冬，刘立青在宁乡甲种师范学校的同学曾克艰和喻中阳同样与组织失去联系，先后避难到南昌。他们两人是共产党员，刘立青是共青团员，三人自然组织起来，设法找党，暂时在国民党的部队中隐蔽起来。

1928年夏，机会终于来了。由于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并未暴露，刘立青参加了黄埔同学会，被分配到南京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一团机枪连，担任中尉排长。该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校友，他自觉资格老，一般不爱过问连里的事，这就给了刘立青掌握部队的机会。刘立青先后把喻中阳、汤弼中安排到连里任文书。他们经常以吃湖南腊肉为名，到革命同志开的腊肉店商量如何掌握机枪连并率部兵暴。但由于无法联系上级党组织请示相关问题，他们不得不蛰伏下来，等待有利时机。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和桂系各自盘马弯弓，准备鏖兵武汉。刘立青所在的补充团被调去攻打武汉，刘立青他们计划在打武汉时搞兵暴，到大别山中去寻找红军。但因桂系内部分化，刘立青所在的补充团一枪未发



就进了武汉，他们兵暴的计划未能实现。

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军阀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其势力由东南伸展到了华中。为防止冯玉祥部南下，蒋介石接受德国顾问团的建议，建立武汉北区要塞司令部，在汉口北面构筑要塞工事。刘立青所在的机枪连和部分炮兵、工兵部队合编为炮兵补充团，刘立青任机枪连长。为方便掌握部队，刘立青趁机安排在汉口遇到的黄埔军校同学、曾任汉口工人纠察队长的共产党员张济宽为连司务长。这时张济宽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正在找党。

通过张济宽，刘立青了解到张金保开办袜子作坊串联党员的情况。按照张金保的安排，刘立青一方面与张济宽一起将他们两人的妹妹接到汉口，安排到袜子作坊工作，为今后相互联系作掩护；另一方面，帮助张金保搬迁袜子作坊，并在门前张贴军人家属工作处的纸条，进一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冬，喻中阳、张济宽和刘立青的二叔——共产党员刘力民都在汉口同地下党接上了组织关系。1930年初的一天，张济宽邀约刘立青到大智门法租界亚洲旅社面见中央军委从上海派来的曾希圣、蔡申熙两位同志。蔡申熙说：“这几年来，你打入国民党部队工作，时时不忘搞兵暴，组织上是了解的。你在地方入团，经过几年考验，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今天组织上正式宣布吸收你入党，我和曾希圣同志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至此，刘立青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照组织安排，刘立青在国民党军队中正式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张济宽任支部书记。为了安全性，刘立青按要求与张济宽单线联系，每周到党的秘密联络点汉口法租界刘力民住处交换情报。大家共同商定了接头暗号：凉台竹竿上晒了衣服，表示安全；如果竹竿上没有衣服且往外伸得很长，表示不安全，要立即离开。刘立青起初表示对做地下工作不是很在行，想找合适时间转移部队。蔡申熙提出需要刘立青做好部队工作，争取要塞司令部的信任，待到将来红军进攻武汉时，可以作为主要力量里应外合。

1930年6月，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

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并于7月1日再次提出建立长江局的问题。遵照党中央安排，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伯承和刘云6月奉调回国，7月按照党中央指示，前往武汉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

刘伯承和刘云到汉后就与刘立青取得联系。在汉口德租界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刘伯承接见了刘立青。刘伯承详细询问武汉军事形势、武汉警备部队情况、要塞的地理位置、装备及司令部指挥人员的情况等，并要求刘立青随时了解敌人动态，严密掌握部队，做好与红军里应外合进攻武汉的准备。

根据党的指示，刘立青加紧整顿机枪连，要求在连里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伙食、不准违反军纪，以争取人心，并借机安插喻中阳等党员到重要岗位，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同时，刘立青修改了要塞战壕工程中德国顾问关于战壕高度的设计，使其更适应中国士兵实际身高，提高了战壕的适用性，得到要塞司令部参谋长嘉奖。为此，刘立青被提升为武汉北区要塞幸福堡垒营长，驻地黄陂横店，手中直接掌握的兵力增加了。

在此期间，刘云和刘立青接触较多，每个礼拜见一两次面。刘云曾亲自到堡垒营现场勘察地形，与刘立青一起研究如何配合红军进攻武汉。为便利红军进攻，刘云提出以方便农民出入种田为名，增加、扩大要塞铁丝网出口，并准备白军军衣，以便红军冒充白军，智取要塞司令部。后该计划因武汉暴动的停止而被搁置。

刘云在武汉工作约两个月后，1930年9月2日因叛徒汪坚告密而被捕。刘云面对敌人劝降，毫不动摇。9月6日，蒋介石下达11号密令，刘云被押到刑场，壮烈牺牲。刘立青的二叔刘力民得到刘云被捕的消息，当即通知大家迅速作好应变准备，截断同亚洲旅社联系，并立即调查告密人。

为了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刘立青根据组织安排，与喻中阳的妹妹喻素珍结婚，并在法租界建立新联络据点。为做好保密工作，每当有党员到家里联系时，刘立青都要喻素珍和妻弟喻重九在门外掩护，并且把党的文件夹在喻重九的练习册中，要他锁在学校课桌里。尽管如此机密，仅过了约



十天，1930年10月初，刘立青还是被捕了。

那天下午，要塞司令部参谋处长派人将刘立青关入禁闭室“问话”。起初，刘立青的妻子喻素珍和妻弟喻重九还可以前去探望。喻中阳通过喻重九带话给刘立青，告发者为叛徒汪坚，而且要准备好和他对质。这样，刘立青心中便有了对策。

一开始，要塞司令部派人与刘立青谈话，来者现身说法，说他当过共产党，现在不干了，并称赞刘立青有前途，最后诱导性地表示如果真是共产党，自首就没有事。刘立青明白这是在套他的话，拒不承认，那人只得悻悻而归。

见刘立青不上当，他们又组织了行营、警备司令部、要塞司令部三堂会审。第一次会审时，法官黄本基说：“刘立青，你年轻有为，误入迷途，可以回头，上级会成全你，顽固没有好处。”刘立青拒不承认，义正辞严



1950年，刘立青（前排左）与昔日同监狱难友张执一（前排右）、张文藻（后者）合影

地请法庭马上派人去调查。法官见问不出什么，便作罢。第二次会审时，他们把叛徒汪坚叫来对质。刘立青心中早知汪坚的底细，十分镇定地问汪坚：

“你认不认识我？”汪坚说：“不认识。”刘立青又问：“你为什么要诬害好人？”汪坚说：

“你到过亚洲旅社吗？”刘立青说：“亚洲旅社住了很多黄埔同学，我为什么不能去？”

要塞司令部法官见汪坚落了下风，马上插话：“你这个人，既不认识他，为什么来对质！

下去！”法官黄本基接着说：“刘立青，你要好好交代，问

题还没有结束！”第二审就此退堂了。第三次会审时，由于敌人抓不到刘立青的证据，只得将刘立青判处无期徒刑，于1931年初将他关进汉口军人监狱。

此后，刘立青被党营救出狱，到延安学习和工作，重新回到党的怀抱。1943年12月中旬，张金保和爱人金泽霖历经曲折后也来到延安。解放后，刘立青和张金保还成了儿女亲家。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宋 健
硚口区史志研究中心 戴定凯 詹 慧）



前仆后继

身居陋屋胸怀全局

1929年9月下旬，一位来自上海的眉清目秀的青年，住进了武汉工人区中一所破旧不堪的低矮房屋。这位自称“老刘”的外来户，很快就融入了工人群众之中，成为了武汉工人运动复兴的总指挥，他就是中央新调到湖北担任省委委员的欧阳洛。

自从1929年春湖北省委遭受严重破坏后，中共中央一度决定暂不恢复省委，直到半年后，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中共中央才于9月24日决定恢复湖北省委，指定叶守信、何玉琳（陈华）、欧阳洛、刘先觉（中央尚不知道刘已被捕叛变）、周逸群、吴致民、曹大骏为委员，以叶守信、何玉琳、欧阳洛、刘先觉为常委，叶守信任书记。省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武



欧阳洛

汉市区和近郊，京汉、粤汉铁路工人与海员、直属各县市工作，指导鄂豫边、鄂西、鄂东3个特委的工作。欧阳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身负重任来到武汉。

欧阳洛虽然外表文弱，却是一位性格刚强、意志坚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1900年生于江西永新，字仲廉，号梦朵，化名毛春芳、孟之富、老刘、苏得三等。1922年8月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与方志敏等发起成立“列宁主义研究会”。

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5年至1927年间，他在江西吉安永新从事革命活动，是永新党组织主要创始人，曾任中共永新临时县委书记。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后奉命前往上海。他乔装改扮，昼伏夜出，历尽艰辛，四处乞讨，才辗转来到上海。为寻找党组织，他甚至饿晕在黄浦江边，幸好被同志发现才从死亡线上救回，随后出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9年6月沪西区委书记张浩被捕后，欧阳洛调任沪西区委书记。

1929年9月，中央作出重组湖北省委的决议，欧阳洛接到通知感到有些突然，但他义无反顾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立即做动身准备。此时妻子沈凤音正在怀孕，他安慰了妻子，并嘱咐生下孩子取名“欧阳中华”。之后，他便匆匆离开家门。

9月下旬，欧阳洛乘船到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由于叶守信、何玉琳经常到外县巡视，实际仅他一人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

1929年10月，武汉福源纱厂工人反对该厂工会整理委员会无理征收登记费遭到军警镇压后，宣布罢工。新一届省委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从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入手，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指导工人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以此为起点至1930年3月，武汉市出现大规模的工运高潮，武汉革命走向复兴。在斗争实践中，省委吸取教训，开始转变过去盲目蛮干的做法，注意运用适合地理民情的斗争方式，对宣传人员进行科学分工：望风者随时注意敌情变化，散发者用快捷有效的方式迅速发放宣传品，掩护者保证宣传人员的安全。

对于党在白区的工作，新的湖北省委从实际出发，吸取过去党组织屡遭破坏的教训，强化秘密工作纪律。规定一般采用单线联系、分散居住、分散活动的做法，不允许互相打听，不发生横向联系，尽量避免一人出问题牵连一大片的现象重演。

1929年11月，欧阳洛以湖北省委负责人身份，会同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干部，详细研究了隐蔽在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旅的共产党员程子华等人提出的起义计划，决定举行士兵暴动。除中央军委派来的干部外，省委也派出干部前往主持和联络，并向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和阳新县委发出配



合士兵暴动的9条书面指示。12月中下旬，该旅5个连的士兵在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即著名的大冶兵暴。

12月上旬，叶守信调离武汉，省委改称省临时委员会，由欧阳洛、何玉琳、邓斌3人负责，欧阳洛任书记。1930年2月3日，中央决定恢复湖北省委，由12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4人，分别是欧阳洛、冯任、何玉琳、郭金鳌（未到任）。欧阳洛任书记兼妇委书记，冯任为宣传部长兼农委书记。省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工委、农委、军委、妇委等工作机构，机关驻武昌。

1930年春，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触即发，驻扎在湖北及其周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大多调往内战前线。欧阳洛和省委决定，趁此机会采取跳跃式向外扩张的策略，迅速将过去“梅花”状分布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为此，省委作出一系列战略性布局 and 安排，推动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统一。

省委积极恢复整顿各地党组织，到1930年4月，省委除下辖武汉2个区委外，还下辖鄂西、鄂北、鄂豫边特委和大冶、黄梅、荆门、汉川、孝感、鹤峰等中心县委，全省党员2万余人。

此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一些领导人对革命力量的发展产生了骄傲和冒险情绪，决定采取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路线，加紧组织武汉暴动，要求湖北省委努力在武汉组织政治罢工和政治示威。由于通过飞行集会这种公开形式宣传组织群众，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很容易暴露，党组织失去隐蔽，导致严重后果。

3月23日下午，武昌区委在洪山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因会前党内有人叛变，供出开会地点和时间，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会场，与会者几乎全部被捕，其中包括省委书记欧阳洛、武昌区委书记邓斌、武汉三镇纺织总工会委员长史汉斌、湖北省总工会工纠部长何长清。

阴险狡猾的敌人想诱捕更多共产党人，便让欧阳洛戴上手铐，外面盖着衣物，在马路上行走，便衣暗探尾随其后，如有相识同志向他打招呼，就进行抓捕。欧阳洛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为避免牵连同志，他故意高举双臂，

露出手铐。特务强行按着他的双手，他就大声地争辩，喝斥敌人，以此提醒同志们注意。

在狱中，欧阳洛虽受尽酷刑，却并未供出一字，后来被两个叛徒当堂指证，他才说自己是江西来的交通员，名字叫苏得三。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利用他的一个同乡来劝降。欧阳洛厉声说：“大丈夫死在战场，决不投降。”最后同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死后，请告诉我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难过，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1930年4月8日，欧阳洛与武昌区委书记邓斌、武汉三镇纺织总工会委员长史汉斌、湖北省总工会工纠部部长何长清被杀害于武昌通湘门外。临刑前，欧阳洛走在前头，高呼革命口号，后随三人唱国际歌和之，悲壮激烈，视死如归。

受命危难不辱使命

省委书记欧阳洛等被捕后，湖北党的力量受到严重摧残。1930年3月25日，在省委临时会议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冯任被中央代表指定代理省委书记，在危难之中肩负起领导湖北全省党的工作的重任。为充实湖北省委领导力量，中共中央于3月27日决定，调郭士杰、吴芳到省委工作，分别任临时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待省党代会召开后再行选举。

接替欧阳洛的代理省委书记冯任又名红刃、鸿任、冯仁、冯凌、王警吾、洪任、王亦吾等，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土塘镇，1924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冯任前期主要在江西省从事革命活动，是江西省早期党团组织重要领导人，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

1930年2月，冯任到达全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城市武汉，就任省委宣传部长兼农委书记。冯任到达武汉后，化名王亦吾，



冯任



党内使用名字方明，以太平洋震旦通讯社记者身份作掩护，开展秘密活动。

他在湖北省委就职后，立即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协助书记欧阳洛工作。由于前一届临时省委人少事多，正值工运高潮时期，欧阳洛忙于深入实际领导斗争，省委机关日常工作乏人主持，一度有些混乱。冯任的到来，解决了欧阳洛的困难。冯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明确内部分工，以避免工作人员忙闲不均，使之各得其所。由冯任起草，省委接连发了两个通告，而之前省委已有几个月未向全省发通告。2月24日，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军阀战争中湖北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主要任务》。由冯任主持的省委宣传部，实际只有他一人，工作异常繁忙。他还抽空给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写通讯，反映湖北工人运动、军阀战争、社会动态等情况。

短时间内，冯任以其卓越干练的才能将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受到同志们的一致好评。有一位同志在给党中央写报告时，特地对冯任的工作才能予以称赞：

“方同志去了以后的省委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第一，开始注意到工作的分配；第二，接连着发下两个通告（注意：成立六七个月的省委，始终没有一个通告发下）；第三，对省委的错误观念，纠正过来不少，如省委派人到鄂西属下拉人，方同志极力纠正这种观念的错误，××同志也相当的接受了。”

3月23日，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在武昌出席武昌区委活动分子会议时被捕。3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临时会议，会上，“中央代表——胡子同志指定冯任暂代书记”。3月27日，中央来信对冯任暂代湖北省委书记做了追认。

4月上旬，冯任和大多数省委委员赴上海，省委常委、秘书长何玉琳代理省委书记。4月15日至月底，中共湖北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央指定的准备担任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主持。在大会开幕式上，冯任代表上届省委作了关于湖北形势及省委工作的报告。会后，新省委接着召开会议进行分工，任弼时任书记，郭士杰任组织部长，华少锋（华岗）任宣传部长，

冯任担任秘书长。

5月7日，冯任返抵武汉，开始担任新省委秘书长工作。诸如安排省委常委会会议，文件起草、印刷、发放，交通，接头，机关保卫，经费分配等等，虽然十分繁重，他均熟练地安排得有条不紊。由于干部缺乏，他常不顾危险亲自担负一些具体工作。

5月22日和6月9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布两个新的通告，传达全省代表大会精神，阐释目前形势和党的工作路线。通告再次重申“湖北是全国统治力量最薄弱，同时又是工、农、兵革命斗争最普遍深入的地方，党的领导力量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革命高潮是有首先由湖北涌现出来的可能”，强调“湖北党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加紧准备武装暴动”。为此，省委制定了赤色五月总示威和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运动周等计划大纲。根据这些大纲，武汉党组织大搞马路演说、飞行集会，虽然在三镇突击发展了50余名新党员，散发了数千份传单、宣言，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有不少党员骨干在行动中暴露了身份，遭到了逮捕，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力量呈现出边发展边损耗的状况。

6月16日，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部部长黄昌恒（外号麻子）在和记蛋厂附近召集飞行集会时被捕，随后叛变，带领特务破获省总工会机关。

6月17日，冯任到汉口碧云里12号湖北省总工会常委接头处去接头，不知道这个秘密机关已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破获，当场被叛徒黄昌恒指认。黄昌恒只知道他叫王亦吾，不知其真实姓名，更不知其在党内的真实职务，但



汉口英商和记蛋厂



指出“是个重要分子”。敌人当场从冯任身上搜出两份文件，一为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派工农革命分子和党员打入反革命军队做士兵运动的计划，一为省委关于拥护红军鼓动工潮的通告，另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中央介绍来做工运的张喜春同志的旅馆地址，还有 300 元钱。

冯任被捕后，关押在位于汉口义成里的稽查处，敌人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刑讯。因证据确凿，冯任只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做交通工作，其余坚不吐实。

为了营救冯任，6 月 18 日，中共湖北省委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疾呼：“省委秘书长冯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7 月 1 日省委又向中央报告，“冯任在狱中，要求千元做保”，请求中央设法营救。武昌横街头的黄鹄书店，是省委秘密接头的一个地点，也派人出面保释冯任，但没有成功。

从冯任身上搜出省委文件和暴动计划，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反动当局宣布武汉部分戒严。7 月 7 日，湖北省委发出第十二号通告，决定组织七一六反军阀战争、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运动。消息传出，武汉三镇骚动。蒋介石下令在武汉实行全面戒严，规定凡是共党案犯，不经法院审理，直接交武汉警备司令部就地枪决。

7 月 10 日，冯任在武汉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判决书上，写着这样几句话：“迭经审讯，据王亦吾供称担任交通工作，传达重要文件，实行拥护红军，煽惑国军组织兵士总合暴动。”这说明敌人始终停留在开始搜出的文件和他应对敌人的说辞上，其他情况一无所获。敌人连他的真实姓名、年龄、籍贯都没搞清楚，判决书上写：王亦吾，27 岁，江西南昌人，实际应为：冯任，25 岁，江西都昌人。冯任以鲜血捍卫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

冯任被捕后，黄昌恒又带领特务、密探四处捕人，连续逮捕了硚口、水厂、纱厂、打包厂 8 名工人，破获了省委总机关，至 7 月 1 日，敌特共逮捕党、团员 23 人。7 月 17 日，武昌区委书记陈康、宣传部长王文定、组织部长兼工会特派员李柏林等 13 人被捕，武昌区委瓦解。此时，武汉只剩下阳夏区委，共有党员 100 余人、团员 80 余人。不久，阳夏区委下辖的六七个党支部也遭到破坏。

中央指示撤离武汉

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第二次成立长江局。8月7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党团组织从上到下进行合并，成立长江总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武汉暴动计划，由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华少峰、秦了君、李震瀛等7人组成，以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主席团，项英为书记。到8月下旬，为配合红军进攻武汉，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区纷纷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分别由秦了君、吴芳和廖去恶担任书记。此外，兵工厂产业、纺织产业和码头产业行动委员会也相继成立。

此时，武汉已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状态中。荷枪实弹的军警和铁甲车每日巡逻，特务密探遍布三镇大街小巷，举行不定时间、不定地点、不定次数的检查；各水陆交通要隘均设立瞭望哨、盘查哨，严密监视和检查；晚上9时隔绝市内交通，24时后断绝长江交通，中外船只一律不许航行，即使是运兵船亦不许通行；严查旅馆客栈，所有住客必须取保；颁布戒严令16条，触犯任何一条即处死刑。1930年8月，武汉国民党当局执行蒋介石第11号密令，凡属共产党案件，不再经法院审判，径由武汉警备司令部办理。

8月上旬，国民党武汉当局将关押在监狱的87名党团员分作两批，用大砍刀砍杀于武昌汉阳门、阅马场，汉口六渡桥、江汉关、和记蛋厂等处。在刑场上，武汉早期共产党员、著名青年运动领袖何恐泰然自若，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最后的胜利属于红军”等口号，从容就义，留下《魔窟》等著名诗篇。

8月8日，党组织设在武昌横街头的秘密机关黄鹄书店因连夜赶制传单等宣传品被敌察觉，书店负责人黄嘉今等3人被捕遇难。两天后，武汉城区的示威斗争也因准备不充分和敌人残酷镇压而流产。

由于武汉斗争形势急剧恶化，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湖北省委，成立武汉市委，直属长江局领导。9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关



于武汉工作问题给长江局的信》，强调制定工作计划要切合实际地估量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提出适应具体环境灵活运用的斗争策略。根据敌我力量对比、革命形势发展以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至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再也没有在武汉市恢复重建湖北省委。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刘桂芳）

地火奔腾

工人运动风潮再起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白区工人运动呈现屡起屡仆的消沉局面。与此同时，列强侵略国土沦丧，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资本剥削民生凋敝，至暗时刻来临，但总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而是喷涌而出的地火，“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1929年，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派系斗争不断，全国各地以反蒋为中心的战争连绵起伏，先后爆发了两次蒋桂战争、两次蒋冯战争、蒋唐战争等。为了支撑战力，驻汉蒋军便派工会整理委员会到各工厂筹措军费。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执行的是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和扶助农工政策，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劳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各地工人运动进行武力镇压同时，制定欺骗和控制工人阶级的大政方针，“使一切工会，皆为国民党化的工会”，在各地成立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对原有工会组织进行改组和整理，以钳制工人的行动。“工整会”的头目大都是国民党党棍、工贼和流氓头，被工人们称为“流氓工会”或“黄色工会”。

1929年不仅是战乱之年，“民国十八年年馑”（1929年）也是被载入史册的百年一遇特大自然灾害年份，当时报纸记载：“武汉在这种环境之下，更是恐慌异常，形成了断炊的趋势……吃饭是成着了很大的问题。”天灾、饥荒与战争，加之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拉夫派饷，武汉人民痛苦不堪。

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联合，向工人阶级进攻，血



腥屠杀工人中的革命分子，中外资本家也趁机反攻倒算，推翻大革命时订立的一切劳资协议，将工人阶级推入更加痛苦的深渊。他们不但要忍受恶劣的车间环境，接受严苛管理制度的“规训”，而且通常每天要连续工作 12 小时，收入却极为有限。大革命时期基本实现了 8 小时工作制，这时则普遍增加到 12 小时以上，其中纺织工人的劳动时间长达 16 小时，有工人夜间困倦极了，落在机器上，被戳伤致死。厂主店东还以各种借口减少工人的工资，据当时报纸刊载，汉口市各业工人平均每月工资最高 18 元（纱厂），最低 1 元（印刷业童工）。按照当时粮价和房租统计，每月工资 18 元勉强能让家人糊口，但毫无积蓄。资本家还通过拖欠克扣工资和以贬值纸币发放工资的办法进一步剥削工人，武汉市面纸币狂跌，物价飞涨。

大革命失败后，作为工人运动主心骨的武汉党组织遭到多次破坏，1929 年春夏之际，中央派刘先觉到武汉寻找党员，只找到 20 名零散党员，几被屠戮殆尽。这 20 人多是失业知识分子和下级军官、警察，没有一个产业工人。1929 年 9 月，党中央为了恢复湖北地区的工作，决定派叶守信、何玉琳、欧阳洛（毛春芳）等赴武汉，重建湖北省委。他们在工人中艰难开展思想和组织工作，改变了前一段时间武汉工人中没有党组织的状况。此后，武汉工人运动又一度活跃起来。1929 年至 1930 年期间，相继爆发了福源纱厂、震寰纱厂、第一纱厂、泰安纱厂以及煤业、水业、码头、人力车、店员等几十次罢工。这次武汉工人运动的复兴，是以纱厂工人斗争为中心，以武昌福源纱厂工人斗争为起点。

福源纱厂三“打”工整会

1929 年 10 月 1 日，武昌福源纱厂工整会要向工人每天征收 5 分钱的登记费，按当时日用必需品价格，5 分钱可以买一块肥皂或者一条鱼。此举遭到工人强烈反对，1000 多名工人冲击并包围了工整会办公室，要求厂方免收登记费。为了缓和工人的激愤情绪，工整会被迫口头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当时武昌震寰、裕华纱厂工人的登记费已扣，一纱也准备执行，若福

源纱厂这次反抗成功，那么工整会扣登记费的事就可能在武汉纺织行业中，甚至在整个武汉产业工人中彻底落空。根据这种情势，中共湖北省委立即指示武昌区委要正确认识这一斗争的重要性，要求武昌区委“应有计划的去发动这一斗争”，指出“这一斗争是武汉工人斗争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按照湖北省委指示精神，武昌区委立即派出党员干部深入到福源纱厂，了解情况，同厂党组织一起研究斗争策略。

10月4日，当工人们领取当月工资时，发现工整会与厂方勾结暗扣登记费，仍被扣大洋5角，相当于少了一天的工资。愤怒的工人群众立即聚集起来。当时正值白班和夜班工人交接班时间，工人愈聚愈多，大约有5000人包围了写字间和工整会办公室。愤怒如地火燎原，激烈冲突一触即发。只听人群中一声喊：“打！”一瞬间，经理被打，写字间、工整会办公室被捣毁，办公桌椅、板凳，以至墙上的挂钟均被砸得粉碎。恼怒的工整会委员调来200多名军警，荷枪实弹，强行驱散工人，而且借口维持工厂秩序，阻止工人上夜班。不上班是要扣工资的，于是工人们团团围住警察进行交涉。拉扯间，一警察突然鸣枪，并叫嚷：“都是共产党，开枪！”工人们也毫不畏惧，纷纷抓起铁棍、煤块，与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24名工人当场被捕。

事件发生后，武昌区委因势利导，组织领导工人罢工，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并集合200多人前往警察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并且不准开除。国民党武汉当局因前方军事吃紧，唯恐后院起火，毕竟当年北伐军攻打武汉时，是工人群众里应外合大力支援，才加速了战争的胜利，工人力量不容小觑。于是国民党武汉当局对福源纱厂的工人斗争采取缓和政策，不但释放了被捕的24名工人，答应不开除他们、停收登记费等条件，而且允诺工人每人每日增加工资5分钱，撤换该厂的工整委员。第二天工人们复工，高兴地说：“我们‘打’得了胜利！”

就在工人们复工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河南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又展开了激战，筹集军费仍是工整会当前的首要任务。明征暗扣不成，新换来的工整委员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欺骗工人。他们一方面拉拢工人领袖，委以干事、组长等头衔，公开辱骂前任工整委员，“以前的工整委员不好，



我们是为工人谋利益。我们只要两百钱，将来还要替你们加工资”；另一方面恐吓工人：“不要闹，要闹就是共产党，要枪毙。”并将军队和警察派进工厂，防范工人再闹事。同时，由于收不到工人的登记费，他们就直接向厂方提取经费。厂方出尔反尔，把工整会提取的费用又要转嫁到工人头上，并拒不执行当局向工人允诺的每人每日增加5分钱工资的条件。

当得知登记费可能又要收，5分钱也加不到时，工人们又激愤起来，连那些已被拉拢去做干事、组长的工人也反对工整会，表示“他们也是一样的要钱”。这时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利用纪念广州起义，宣传反军阀战争，“用广州起义的事实，鼓动群众的斗志”，在巩固前两次战果的同时将斗争引向深入，于是提出新的斗争口号，要求立即执行增加5分钱，提出反对工整会、反对登记费、车间要吃茶、厕所要改良、反对稽查进车间、工人出入自由。

工人们向厂方宣布，若12月4日发工资时不加这5分钱，他们将再打工整会，再罢工。武昌区委组织工人群众到处张贴有关广州起义的传单和标语，甚至送到军警手中，张贴到军营里。这次罢工斗争的影响较大，国民党的报纸刚开始还企图掩盖，称这次罢工的起因不是扣登记费，而是工厂的职员算错了账，但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散发传单传递消息。此时蒋冯战争硝烟暂熄，而蒋桂战争烽火又再起。面对如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厂方和工整会惊慌失措，一时草木皆兵，于是打出白旗，出示布告，正式答应工人们所提条件。12月4日，工人们终于领到了每日增加5分钱的工资。

临近年关，福源纱厂工人要求工整会“年关发双薪一月”，“若不发双薪，又要打，又要罢工”，工整会立即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资本家也被迫答应。历时近百天，前后历经3次较量的反“工整会”的斗争，不仅在反收登记费上取得了完全胜利，而且扩大了战果，增加了工资。

武昌福源纱厂工人反对“工整会”斗争的胜利，打破了武汉八二总同盟罢工以来武汉工人运动沉寂的局面，给武汉工人运动的复兴起了示范作用。

一纱和泰安纱厂齐罢工

武昌第一纱厂是武汉首家由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纺织工厂，1919年正式投产时，其规模不仅在武汉最大，在华中地区也首屈一指，其创始人李紫云有“纺织大王”的称号。但随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大肆扩张，不但倾销棉纱，而且广设纱厂，武汉的棉纺市场几乎被日商垄断。一纱的经营情况急转直下，亏损巨大，1927年第二次关厂停工时，造成9000多人失业。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地方党组织虽屡遭严重破坏，但第一纱厂此时重建了一个党支部，包括6名共产党员。第一纱厂要扣工人登记费本已是厂方决定的事，当福源纱厂工人斗争兴起时，一纱党支部对如何领导该厂工人进行斗争进行了充分酝酿。由于第一纱厂关厂停产了一段时间，“工人们一提起罢工就心有余悸，害怕关厂、失业，尤其是女工更是如此。”因此一纱党支部当时提出的斗争策略是“厂内斗争与打走狗”结合起来，提出切合实际的斗争口号：反对登记费；恢复8人缺额补失业工人；总理诞辰要工钱；每人每月工资增加5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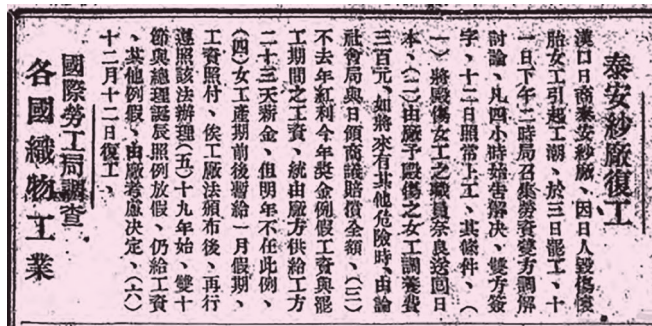
一纱党支部同时还秘密组织了由100多名工人组成的“弟兄团”。“弟兄团”成立后，整治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工头，大大增加了工人斗争的勇气。福源纱厂工人斗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一纱工人更是信心倍增，工人们说：“福源打到了一角钱，我们也要打一次。”工人们自发提出了“恢复到民国十六年的条件”（即1927年大革命时期劳资协议中的条件）的口号。厂方威胁工人说：“这是共产党的条件，你们提出来要枪毙。”工人们说：“我们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条件，只知道现在的米比十六年的贵了几倍。”经过不懈斗争，一纱工人取得了停收登记费的胜利。临近年关，一纱效仿福源纱厂开展了要求年关发双薪的斗争。各车间工人推荐80余人组成代表团向厂方交涉，起初资本家置之不理，工人随即宣布罢工，最后资本家妥协，一纱取得了年关7天发双薪的胜利。

在这次斗争中，一纱发展中共党员11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基



层党组织一方面要保障革命的力量，同时又要积极地领导当前的斗争，就必须建立适用于地下工作环境更加严密的组织体系，既不至于脱离群众，又可以防范敌人的进攻。一纱党支部的党员数量并不多，但质量非常优良，工厂支部仅6名同志，完全能够领导全厂6000多名工人群众，就是很好的例证。

不同于一纱罢工是党直接领导的工人斗争，泰安纱厂的斗争是在福源纱厂、一纱斗争的影响下，在纪念广州起义活动的宣传鼓舞下，自发组织的。汉口泰安纱厂是中日合办的工厂，属日本江州财团，1924年投产后称霸武汉纱布市场，日本领班经常无故殴打工人，侮辱女工，劳资纠纷时有发生。1929年10月，工人曾向厂方要求参照武汉各纱厂的惯例，发放1928年红利以及当年奖金和例假工资，多次交涉，均被厂方拒绝。12月2日，日本职员奈良无故殴打怀孕女工陈友芝，致其流产，终激起工人群众的愤怒。次日，泰安纱厂全厂18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日本人的暴行，向厂方提出“惩凶恤伤”，发给“盈余、奖金、例假工资”等条件。厂方不但不答复工人的合理要求，反诬陷工人“对日人之自由横加干涉”。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不敢触犯日方，害怕事态扩大，当即出面“调解”，“分别向劳资双方切实劝导，务期劳方不得有越轨行为，而资方改善工人待遇”，并组织当地各民众团体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护该厂日人安全”。这再次暴露了国民党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打手、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本质和丑恶面貌。



《纺织时报》报道泰安纱厂复工及劳资双方达成的六项协议

面对外强中干的反动当局，泰安纱厂工人群众始终没有动摇反抗斗争的决心，坚持连续罢工9天，终于迫使日方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双方达

成6项协议，泰安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血与火的淬炼

1929年至1930年，武汉工人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下进行不屈斗争，接受血与火的淬炼，取得了不小的胜利。据1933年《申报年鉴》记载，在1928年11月至1930年6月间，汉口市发生劳资冲突有132次。其中纠纷案件116次，劳方完全胜利的占49.1%，部分胜利的占19.8%；罢工停业16次，劳方完全胜利的占60%，部分胜利的占20%。

武汉纺织业发展迅速，纱厂工人集聚程度高，革命潜力巨大。到1924年，武汉纱厂工人达14900人，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位；从区域社会结构来看，纱厂工人俨然占据武汉产业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据1934年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比例高达74.8%。武汉党组织早期较少着力于数量上占优势的纱厂工人，而更集中于铁路、钢铁厂和机器厂工人。到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才特别强调“对数量最多的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因为女工也有“很激烈很一致的行动”。1926年武汉六大纱厂工会先后成立。

数以万计的武汉纱厂工人，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诉求，共同与工厂“规训”相抗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地团结了起来。在武汉党组织成立之前，工人罢工是靠行会和各种秘密社团，工人参加这些社团，主要是为了寻求一种保护和帮助，但同时这些帮会也会对工人实行封建性压迫甚至倒戈背叛，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容易失败。而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不代表任何特殊集团的利益，始终与工农群众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而且从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上，改变了他们一盘散沙的局面，跨越了地域、工种、性别等隔阂，把工人阶级团结成具有统一意志、诉求、行动的战斗队伍。

党的领导是武汉工人运动之魂。1929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叶守信、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欧阳洛（毛春芳）先后到武汉，新的湖北省委正式开始工作。省委将武汉特区委改组为武昌区委，邓斌任书记。党组织指导福源纱厂工人斗争取得胜利后，又领导第一纱厂和裕华、震寰、泰安等纱厂工人开展斗争，沉寂两年的武汉工人运动走向复兴。12月，中共中央



改组湖北省委为临时委员会，欧阳洛任书记。此时，武汉党组织迅速恢复，湖北省委在武汉下辖的武昌、阳夏两个区委共有党员 105 人，党员成分大多数为工人，改变了 1929 年春党组织在武汉产业工人中曾一度空白的状态。

此时，工农运动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劳资纠纷中，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引起的纠纷所占的比例日渐减少，而抵制苛捐杂税和由于资方歇业停业引起的解雇纠纷所占的比例日渐增多，生存是武汉纱厂工人的首要诉求。国民党反动派所担心的“农民、工人反转来压迫地主和厂主”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相反，由于抗租、罢工、减工等农工可以用来抗争的手段，已被国民党政府视为“亡国举动”而被严加禁止，在侵害面前，工农陷入求告无门、求告无效的窘境。

党及时总结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对革命形势和任务进行分析研判，制定指导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克服右倾错误的同时，滋长了“左”的情绪，“左”倾错误使得中国革命特别是白区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1928 年 6 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当前形势进行清醒分析，批判了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强调：“在各个罢工中，须估计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以及自己战斗力的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到的要求。”“一切的罢工者需要有非常谨慎的预备。”

湖北省委积极贯彻执行中共六大决议，明确了工运的任务不是马上组织暴动，而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以取得胜利为目的。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在斗争策略方面，从工人斗争的实际出发，重视日常的经济斗争，恰当地提出口号；改变了以往只要工人做伟大的政治斗争，而不要工人做细微的经济斗争，提出超过实际可能过多、过高的要求，扬弃了“只问政治，不要面包”的激进方针。指导福源纱厂反“工整会”斗争，便是从厂内反对“工整会”收登记费等经济斗争着手，提出改善工人目前生活的口号，不断引向深入，发展为反对军阀的斗争。

在组织形式上，运用细微审定的罢工战术，正视了黄色工会大量存在，赤色工会不能公开存在、难以发展的现实，提出要加入黄色工会，以革命

分子取代黄色领袖，用各种名义领导工人斗争。“只要工人愿意要的，任何名义都可以的，甚至拜弟兄等方法都可以采用。”第一纱厂工人斗争就是在厂内组织了一个 100 多人的“弟兄团”。在白色恐怖严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通过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去开展斗争、争取群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罢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武汉纱厂时开时停，工人薪资时续时断，求生存无疑是工人最基本、最迫切的需要。工人群众不到逼不得已，必不愿意罢工。工人罢工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而是暴力的运动，得有组织有纪律，有武力对抗的勇气，有流血牺牲的觉悟。领导此次工潮的欧阳洛、邓斌等湖北省委负责人皆壮烈牺牲。理想的明灯指引着奔腾的地火，先烈之血浇灌成革命之花。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熊俊潇）



木兰烽火

住进道观的七十二个兵

荆楚名岳木兰山位于黄陂北部，是巾帼英雄花木兰将军的故里。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提及：“湖北黄陂县有座木兰山。”1927年12月，黄麻起义失败后，副总指挥吴光浩率72名突围的鄂东军战士转战木兰山，创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后编入红四方面军），开展游击活动，在豫鄂边区插上第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木兰山被视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根，组建的红七军是红四方面军的基干力量之一。为纪念木兰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李先念题词：“巍巍木兰山，革命浩气存”，徐向前题词：“木兰山的革命烽火燃遍了大别山”，陈再道题词：“木兰精神，万古长存”。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也笼罩着黄陂。国民党反动派



木兰山玉皇阁

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陂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妇女组织均被迫解体或解散。共产党员吴光荣、陈诚意、夏朝诗、易兆兰等人被杀害。吴光海、

熊汉奎等人转移到黄陂蔡店、梅店、塔耳岗、三合店、双泉寺、黄门冲、木兰山一带秘密活动。

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艰难时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等决议案，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在湘鄂赣粤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农民发动起来，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的要求，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分为武汉、鄂东、鄂南、鄂北、鄂中、鄂西、京汉路区等7个工作区域。第一步，建立各区起义指挥机关，组织农民武装，恢复农民的组织和鼓舞士气；第二步，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夺取敌人的武器，建立革命政权和工农革命军。

1927年11月3日，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成立，黄陂籍人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13日，黄安农民自卫军与声势浩大的黄安七里、紫云区群众在麻城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克黄安县城，摧毁了反动政权，并生擒县知事贺守忠。14日，宣布成立黄安农民政府，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一、二路军。农民政府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打倒蒋介石，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纲领。但是，当时由于党还不够成熟，经验不足，对反革命缺乏警惕，占领县城以后，就在城里住下来，没有明确以乡村为根据地的思想，没有大力地普遍地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在21天以后就被反革命的十二军攻下县城。起义军总指挥潘忠汝及无数优秀的革命战士英勇牺牲，副总指挥吴光浩带领少数同志突出重围。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伺机而起，1927年12月下旬，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简称黄麻特委）和从黄安城激战中突围出来的鄂东军部分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等在黄安县北乡的木城寨举行会议，分析和讨论当前黄麻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我军的任务，一致认为“鄂东军不能老停留在中心区（即黄安七里、紫云、乘马、顺河），要打出这个圈圈，



木兰山红军洞原称风洞，吴光浩同志曾率黄麻起义突围的72名战士转移到洞中隐蔽

把敌人牵着走，以减少中心区的损失”，中心区留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人转移到木兰山，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次会议保存了革命力量，是鄂豫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一次关键性会议。会后，吴光浩、戴克敏等鄂东军领导人在黄安北部的闵家祠堂集合了72人，携带长枪42支、短枪11支，

向木兰山进军。经中共黄陂区委党史办公室调查，这72人是：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丁茂福、王健、王免勤、王宗彦、王豌豆、方思法、方思德、刘天华、刘本华、刘道成、刘宝珠、刘宝坤、叶耐青、石健民、石生勇、江竹青、许道龄、来显焱、李继光、李思禄、李绍起、余思明、肖永正、吴永达、吴信行、吴世安、吴行忠、邱江浦、陈再道、陈福润、郑福东、郑维德、郑植黄、郑遵敏、郑老四、郑芽绿、段孟玉、胡德亏、张心灼、张忠国、张忠顺、袁芳菊、徐书宏、徐其虚、徐其芳、晏仲乎、凌柱中、黄家寿、曹学道、阎常如、程绍山、董天祥、董孝玉、董纯齐、詹道福、詹道湖、詹道国、詹道学、詹才芳、廖荣坤、潘遐龄、戴学诗、戴本魁、戴道普、韩四光、×保纯、×保福。

木城寨会议之所以确定将革命军主力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是因为这里有着极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

木兰山方圆60多平方公里，山势巍峨，群峰攒簇，林木繁茂，主峰海拔580多米，仅有一条曲径通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势，易守难攻，便于革命军隐蔽其间。这里是鄂东道教、佛教中心，山上有30多座庙宇佛殿，终日香火鼎盛，梵音四起，远近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革命军混杂其间，不易被敌人发现。木兰山地区有大革命时期的良好基础，1927年9、10月间，中共黄陂县委为领导全县秋收暴动，相继成立了宣传队、暴动队、暗杀队、逮捕队、侦察队和毁路队等组织，在木兰山周围的王家河、研子岗一带开展打奸商、惩土豪等活动，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同时，木兰山是吴光浩的家乡，他在这里土生土长，了解当地情况，熟悉周围地形，很容易与中共黄陂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再则，当时驻木兰山地区的敌三十军已经撤走，地方反动势力相对薄弱，而木兰山地处南北交界之地域，与革命基础较好的黄安县高桥等地区相毗邻，革命军可进可退，游刃有余，是理想的游击区域。

鄂东军沿途突破敌人层层封锁，战胜饥饿严寒，于12月29日胜利到达了黄陂木兰山，向道长万昭虚（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道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晓以大义，在征得同意后，驻扎于观音沟仁忠寺。战士们缺衣少粮，生活十分艰苦，仍然遵守纪律，不进大殿，不干扰道教活动，主动帮道人扫地、浇菜、担水、劈柴、修路，向他们讲述打土豪、惩恶霸的故事，很快获得他们的好感，主动给部队送粮食、蔬菜等物资，部队与僧道关系逐渐融洽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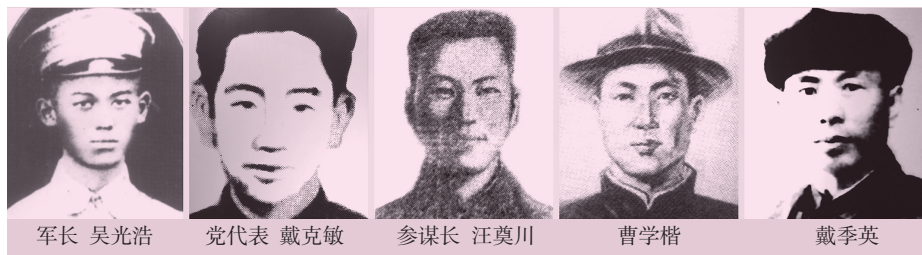
1928年1月1日，曹学楷、戴季英带着湖北省委的指示回到木兰山。当晚，在道长万昭虚的帮助与掩护下，黄麻特委和鄂东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



木兰山雷祖殿会议旧址



曹学楷等在木兰山雷祖殿举行会议，学习讨论省委的指示。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决定由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汪奠川等五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委。为缩小目标，便于游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分编为三个队，每队 20 余人。第一队，队长戴学诗（后汪奠川），党代表吴先筹；第二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王树声；第三队，队长汪奠川，党代表江竹青。会议还总结了黄麻起义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工农革命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强调重大问题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坚决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党委号召全军进一步团结起来，依靠广大群众以木兰山区为中心进行游击战争。这次会议为第七军乃至以后的红四方面军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初步奠定了基础。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领导人

红色武装震黄陂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军党委的领导下，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做好驻地的僧道群众工作，积极游击活动于木兰山周围，帮助当地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及农民协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带领工农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寻机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反动武装……经过近一个月的游击战争，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一度被迫外出隐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数十人纷纷返回到木兰山来。这一时期革命军的斗争实践活动，可以说是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

开始。

罗家岗位于木兰山东南，封建地主罗胜元、罗安元两兄弟在此开设当铺、油坊，商号罗隆昌，他们与国民党军队相勾结，成为独霸一方横行乡里的地头蛇，当地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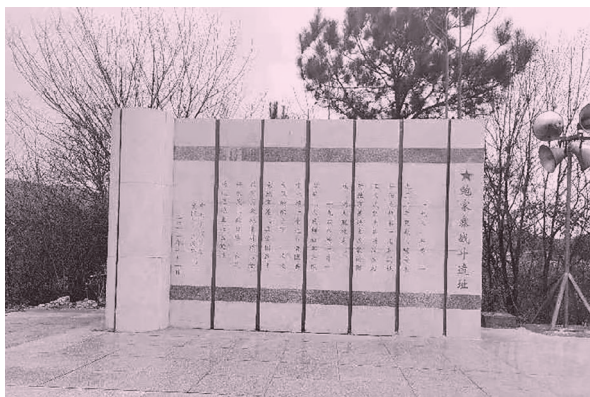


火攻罗家岗发生地（今王家河街罗岗村）

恨之入骨。1928年1月23日拂晓，军长吴光浩乘罗家过春节疏于戒备之际，率25名战士奔袭罗家岗。因院墙坚固，炮楼又居高临下，相互策应，当晚未能攻入。次日晚，再次发起进攻，战士在火力掩护下，搭人梯翻过院墙，奔至油坊屋檐下，凿开铁门，投入火把，油坊内40多担香油起火，罗家兄弟仓皇逃走。第七军进入寨子，缴获长枪19支及其弹药。随之开仓济贫，把当铺抵押品全部发还、分配给原来的当主和穷人。过了四五天，罗保元从县城搬来魏益三部攻打第七军，被第七军击败，并烧毁了当铺。这次战斗，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无一伤亡，战果累累，大振军威。火烧罗家岗战斗的胜利，打响了黄麻暴动后鄂东地区的沉寂局面，打响了黄陂土地革命的第一枪，为土地革命的开展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木兰山附近桥头李湾大恶霸地主李波臣和儿子李本福，残酷剥削穷苦农民，并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奸淫民女，无恶不作。中共黄陂第一任县委书记吴光荣就是被李波臣告密而惨遭杀害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决心镇压李波臣，为民除害。1928年初，军长吴光浩率一个精干的小分队趁夜色直奔桥头李湾，潜行入村，翻墙入院，将正在熟睡的李波臣父子击毙。消息传开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时间，“打土豪劣绅”“惩恶霸地主”的怒潮席卷木兰山地区。

木兰山北面的鲍家寨，是当时黄陂县最大的封建堡垒，寨内聚居着一个血缘延续五代的反动封建大家族。族人在国民党军队担任师长、团长、营长及在国民党政府做官的达10余人。他们上结官府，下欺百姓，顽固反共，



鲍家寨战斗遗址（今长轩岭街户冲村鲍家寨）

称霸一方。这个封建家族在鲍家寨周围修筑有炮楼六座，豢养着近百人的民团。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进驻木兰山后，在鲍家寨附近的孝子店、梧桐寺、城皇塔等地建立据点，发动农民群众实行“五抗”（即抗租、

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并且组织围攻，大灭官僚地主的威风。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还经常分成若干小支，时聚时散，昼伏夜行，神出鬼没地在塔耳岗、长轩岭、柿子树店以及邻近乡村活动。向土豪下款，开仓分粮，救济贫民；向穷人说明党是穷人的，是为穷人的解放才革命的，提出“五抗”口号，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同时，联络当地的以及黄麻暴动区突围出来的党员和革命群众，依靠他们的支持和配合，组织公开和秘密的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第七军重返木兰山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木兰山地区连战连捷，使国民党反动派深感不安，立即派重兵“围剿”，妄想剿灭这支部队。省委对此密切关注，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注意保存力量，情况紧急时，能回黄麻地区即返回，否则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行动方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委会开会讨论了省委的指示，认为当前革命虽然处于低潮，敌强我弱，但是只要坚持斗争下去，革命队伍就会壮大起来。鉴于黄麻地区仍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点控制之下，而这时党在黄冈县领导了武装起义，并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因此会议决定，鄂东军暂不返回黄麻，而是东进黄冈，与黄冈的第六军配合行动。

1928年1月26日，国民党第十二军一个团向木兰山地区进攻。工农

革命军第七军实施转移计划，将全军分成若干小组，利用有利地形，边打边撤，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朝黄冈方向行进。同时，留下曹学楷、徐朋人在木兰山周围坚持斗争，并负责收留黄安、麻城等地“跑反”的群众，聚集革命力量。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经过一昼夜百余里的急行军，到达黄冈北部，随即在大崎山金鸡坳与中共黄冈县委和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共40余人）会合。不久，又遭到麻城反动民团郑其玉部的进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遂与第六军分开，东进三里畈。刚刚到达，敌军便跟踪而至，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又向西南黄冈附近回龙山行动。由于这些地区革命组织均遭破坏，敌情严重，地形不熟，活动困难，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经三店街，渡紫潭河，绕太平桥，穿过黄安南境，于3月初重返木兰山。

一个多月来，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敌人的控制区内辗转游击，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有时仅以南瓜或野菜充饥。但是，部队士气旺盛，每到一地就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寻机歼敌。在战斗中，部队的素质得到了提高，摸索到一些在敌我力量悬殊下进行游击战的经验，即“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创造并掌握了“八会”战术，即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散开）、会集（集合）、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敌）、会疑（疑惑敌人）。在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东进黄冈、罗田期间，曹学楷、徐朋人等人根据第七军党委的指示和戴季英带回的省委指令，在木兰山收容了从黄麻暴动区跑来寻找革命军的63名战士，编成几个小分队，开展游击活动。号称工农革命军第八军，由徐朋人任军长。全军仅有一支手枪、一支长枪，长枪枪托还断了半截，故有“一条半枪打游击”的说法。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回到木兰山后，在塔耳岗以西之陈家祠堂与第八军会合，第八军60余名战士全部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共有130余人，80余支长短枪。

1928年3月中旬，木兰山地区敌情日益严重，退回黄麻地区的国民党军又调集兵力围了过来。面对新的情况，第七军党委成员吴光浩、戴克敏、



1928年3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重返木兰山途中，连续遭到敌人的进攻。面对新的情况，第七军党委在蔡家榨红岗山举行会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会后，全军编成4个短枪队，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图为蔡家榨红岗山会议旧址

一支短枪队北返黄安；廖荣坤、王树声带领一支短枪队东进麻城；吴光浩、汪奠川率一支短枪队在黄陂、孝感边缘活动；曹学楷、戴季英指导地方工作，继续联络从黄麻地区出来的干部和群众，汇聚革命力量。三个月以来，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军党委领导下，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勇气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以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活动，足迹遍及黄陂、孝感、黄冈、罗田、黄安、麻城六县，扩大了革命影响，使广大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28年4月初，蒋桂战争爆发，盘踞黄麻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二军教导师与桂系第十八军发生冲突，撤回河南，黄麻地区的敌情出现了新的变化。此时，木兰山区正在遭受桂系十八军的“进剿”，在黄安活动的戴克敏分队，取得了歼灭柴山区戴家“清乡团”战役的一系列胜利。针对南紧北缓的局势，第七军党委4月中旬在木兰山下的陈秀冲召开会议，作出“返回黄麻，再组暴动”的决定，并根据省委指示和前段工作斗争的经验，确定了北返后的斗争策略和任务。会后，第七军各支队伍返回黄麻地区，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吴焕先等人汇合，实现了分散以后的首次会师。第七军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沿用和发展在木兰山创造的斗争经验，紧密依靠群众，开始走

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等在蔡榨红岗山上举行会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多数同志暂时离开部队，利用不同身份做掩护，到地方从事隐蔽斗争。全军100多人编成4个短枪队，以木兰山为中心分别在黄陂、孝感、黄安三县边缘地区扩大游击，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打回黄麻起义老区。遵照军党委的决定，戴克敏、徐其虚带领

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征程。



1928年4月中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委在木兰山东麓陈秀冲举行会议，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作出“返回黄麻，再组暴动”的决定，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等。图为陈秀冲会议旧址

（黄陂区史志研究中心 谭继明）



水乡英烈昭千秋

七萧大湾暴动

1927年10月的一天深夜，蔡甸工会院内（原中共蔡甸区委机关内），几个人影静悄悄地聚拢在一起，紧张地忙碌着什么。突然一声轻响，好像是铁锹挖到什么的声音，一人兴奋地小声说道：“挖到了。”几人连忙小心扒拉起来，不一会儿，竟然从地下挖出15支驳壳枪。几人小心翼翼地收好枪，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这几个神秘人物就是汉阳县委领导下的中共蔡甸区特别委员会成员，这天正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为发动汉阳秋收暴动筹集武器！

两个月前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和《湘鄂赣粤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精神，便于领导武装暴动，决定将全省划为7个暴动区，汉口、武昌市委和汉阳县委直属省委领导。省委对汉阳的工作非常重视，立即恢复了中共汉阳县委，祖山竹任书记，并派邓曜为汉阳县委农委书记。县委下辖县城区委、龟山前后区委、蔡甸区委、鹦鹉洲区委、黄陵矶区委和汉阳兵工厂特别支部。9月中旬，湖北秋收暴动期间，城区车夫支部、一码头（大码头）支部、鹦鹉洲支部、汉阳电话支部、汉阳邮务支部、汉阳兵工厂特别支部也均由县委直接领导。为适应农村斗争需要，全县划为4个区域，成立特别委员会：第一区为蔡甸，邓曜为特别委员会书记，第二区为鹦鹉洲，第三区为黄陵矶，第四区为荻障口。

邓曜到蔡甸后，与原中共蔡甸区委书记黄蕴珊取得联系，并与萧利三、萧毓福、萧永思、陈直、郑子泉等党团员一起，清理失散的农村党组织，

先后恢复建立了大集场、长新集、新集场、合贤集、永安堡 5 个党支部和蔡甸两个党小组，党员 50 余人。10 月初的这天，特委从蔡甸工会院内挖出农民自卫军埋藏的 15 支驳壳枪，连同邓曜带来的 3 支驳壳枪、子弹 200 发，成为发动暴动的全部武器装备。11 月，中共蔡甸区特别委员会根据县委的指示，决定在七萧大湾举行武装暴动。

七萧大湾地处汉阳西端，与汉川榔头一水之隔。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封建势力甚嚣尘上，七萧大湾以萧洪林为首的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倚仗新军阀势力，从武汉购回枪支弹药，豢养一批打手、恶棍，私设团练，横行乡里，鱼肉人民，贫苦农民恨之入骨。萧洪林还占有大量土地和湖泊，千方百计地剥削人民，这里的劳苦大众深受其害，有强烈的惩治要求。为使暴动首战告捷，县委研究决定，汉阳的秋收暴动首要打击对象就是七萧大湾头号劣绅萧洪林。

七萧大湾族大人众，是共产党员萧利三、萧毓福、萧永思的家乡。萧利三，原名谟，派名秀节，汉阳县柏林乡华英村七萧大湾人。生于小康之家，清末考入武昌法官养成所，习典狱。他在武汉结识董必武，1911 年 12 月由董必武介绍加入同盟会湖北支部。国共合作开始后，他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到武汉会晤董必武，了解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后回县发动农民运动。1926 年 6 月，他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他同由国民党省党部派回汉阳工作的萧秀耀（又名萧抱真）、龚培元一同组建国民党汉阳县临时党部，任农民部部长。随即发动汉阳县农民支援北伐军进攻汉阳和汉口。同年冬，他由董必武和中共汉阳县委书记魏亮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汉阳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经费一时短缺，他立即变卖祖遗田产十多亩，所得现款全部充作农运经费。他还鼓励儿子萧永思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国民党第五区党部常委。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汉阳县保安团查封他家住宅，他全家老少被迫逃往他乡，历尽艰辛。特委书记邓曜到蔡甸后，联系上了萧利三。

1927 年 11 月的一天晚上，邓曜与萧利三、萧毓福、萧永思等组织并



领导了七萧大湾的暴动。暴动前，特委决定由萧利三与侏儒山徐质夫、合贤集吴干臣联系，鉴于这两个地区的暴动队只有几支枪，其余均为大刀、长矛、梭镖之类的武器，派萧毓福与汉川榔头区委联系，决定联合在七萧大湾举行暴动。暴动时他们向群众进行了广泛动员，并宣布了萧洪林的种种罪行，使暴动队员和人民群众怒火满腔，义愤填膺。为了保证暴动顺利进行，邓曜带领蔡甸地区的暴动队在柏林太山寺加强警戒，监视、阻击蔡甸方向的敌人；萧毓福带领暴动队进击七萧大湾，包围了萧洪林住宅。萧洪林见势不对，准备紧闭大门，凭借高墙深院负隅顽抗。暴动队员怒不可遏，撞破大门冲进住宅。萧洪林见暴动队来势凶猛，吓得胆战心惊，急忙爬上楼层间，钻进柴草堆里。暴动队将萧洪林拖出来，就地处决。

七萧大湾暴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武汉近郊打响了农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斗志。暴动队乘胜前进，处决了国民党汉阳县政府派来监督堤工的警卫队长，还接连打击了几家土豪劣绅，并在汉川榔头处决了大恶霸张明斋。

在七萧大湾暴动影响下，合贤集吴干臣首先响应，在李家集组织群众处决了依仗权势、勾结军阀、横行乡里、残害百姓的土豪李俊夫，没收了其财产。接着配合徐质夫、蒋天树等领导的暴动队进击张家大嘴，全歼该地反动团防，缴获枪支 30 余支，壮大了农民武装力量。汉阳暴动队员还配合汉川黄一光领导的暴动队，参加了攻占汉川系马口的战斗。

在进攻汉川系马口的第二天，国民党新军阀鲁涤平部的特务队乘机进驻蔡甸镇。他们为了扑灭汉阳农村暴动的烈火，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暴动骨干，袭击农民暴动队。共产党员舒法震等 5 人被逮捕，敌人将其杀害于蔡甸镇汉江轮船码头，并悬首示众，汉阳武装暴动被迫停止。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汉阳人民在党领导下前赴后继，继续斗争。

英风浩气千秋在

在侏儒山街马赛村通往镇上的主干道旁，有一片开阔的田野，远处青山隐隐，绿水幽幽，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一栋白色徽派建筑物静谧守候

在这片绿色沃野之中，这里就是侏儒山马赛村革命烈士纪念馆。此地长眠着九位烈士，其中就有侏儒山早期党组织和工农武装的创立者徐质夫。再往前走的百赛村村委会院内西侧是革命烈士蒋天树墓。同样在侏儒山街离此不远的中刘村四组中刘湾桃凹山，山顶埋葬着革命烈士刘可人。英雄的侏儒山，烈士浩气依然在，青山处处理忠骨。

徐质夫，又名知悟，字家文，汉阳县侏儒山街马赛村人。当地人讲究穷文富武，认为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条件学武，

徐质夫家境优渥，其父是当地有名的拳师，他从小习武，幼年从村塾师攻读四书五经，后又在武汉求学。他十分排斥封建文化，喜欢深入民众，对农民的苦难遭遇怀有强烈的同情心。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徐质夫于1926年经尹成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党组织派遣参加了国民党，任侏儒区党部常委。在此期间，他吸收蒋天树、刘可人及许多优秀革命分子入党，建立起侏儒区中共特别支部，他本人担任党支部书记。

1927年初，徐质夫经党组织介绍，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干部训练所”学习。学习期满后，他受命以国民党汉阳县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回到侏儒山指导党务和领导区、乡农民协会工作，与蒋天树、刘可人、李发成、朱长江等一起编练农民自卫军，这为在（汉）川（汉）阳边区开展秋收暴动打下了基础。同年7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背叛革命。徐质夫没有被血腥的反动逆流所吓倒，坚定地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关于开展秋收暴动的号召，同川阳边区同志密切配合，在侏儒山、马泗寨农民自卫军基础上，组成川阳边区赤卫大队，在百丈塞燕子山六海古堡举行树旗仪式，蒋天树任大队长，徐质夫任指导员。此后，在川阳边区的武装斗争中，曾多次配合汉川县黄



徐质夫



一光所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袭马口和汉阳县侏儒山等地，开拓了以汉川南河渡为中心的纵横百余里的红色区域，建立了区、乡红色政权。

1928年初，桂系军阀第十八军陶钧部吴良琛团进驻马口，以优势兵力向川阳边区进袭，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受到摧毁。同年3月，吴良琛在川阳边区包括汉川之南河渡、丁集、七吴家和汉阳之彭新集、马泗寨、侏儒山等地采取“扇形梳篦式清剿”，历时二月之久，自认为对红色武装已斩尽杀绝，方收兵归去。殊不知徐质夫深得边区群众爱戴，受到掩护，免遭敌手。他随即与汉阳县柏林乡的共产党人萧利三、萧毓福、黄楚侠、萧文安，以及汉川县的程棣华等取得联系，组成中共川阳临时县委。由程棣华任书记，徐质夫任县委委员兼侏儒山支部书记。徐质夫根据中共六大确定的“在极为严峻的白色恐怖下，着重在恢复组织，保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启发其父徐茂银、胞弟徐家柱参加革命活动，传递信息，保护同志，积极开展斗争，积蓄革命力量。

1929年7月，中央特派员杨开明巡视鄂中地区，同时，湖北省委派程棣华任鄂中南巡视员，在汉阳县桐山头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成立川阳中心县委，徐质夫当选为执行委员，积极开展活动，重新发动川阳边区武装斗争。同年，贺龙率部分工农红军由湘西东下，以洪湖为根据地，建立了湘鄂西红色政权。徐质夫受到极大鼓舞，斗志昂扬地率领游击大队先后进袭马口、榔头、永安堡、侏儒山等集镇，武器不断增多，队伍相应扩大。

1930年，徐质夫根据湘鄂西边区工农红军领导的指示，又同黄一光、蒋天树、刘可人将汉阳游击队与汉川游击队合并组成川阳边区游击大队，在百丈塞燕子山六海古堡隆重举行树旗仪式，大队长黄一光，政治委员徐质夫，蒋天树为副政委兼财经委员。

川阳边区游击大队驰骋于汉川之丁集、马口、南河渡和汉阳之侏儒山、马泗寨、彭新集、索河一带，纵横百余里地区，仍以南河渡为中心，建立川阳边区红色政权。后由于黄一光牺牲，蒋天树为大队长，徐质夫则继任川阳边区县委军事部长。

同年，由于湘鄂西工农红军发展的需要，徐质夫遵照上级指示，在燕

子山六海堡将川阳边区游击大队改编为湘鄂西川阳独立团。徐质夫任团政治部主任。

川阳独立团组编后，遵照贺龙指示北渡汉水，攻打京山、应城、天门、岳口等地，屡立战功。后回师川阳根据地，又多次袭击马口、脉旺、仙桃、蔡甸、黄陵矶等地之敌，直接威慑武汉。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惶恐不安，只得将黄陵矶守军由一个团增到一个旅，加强防范戒备。

由于川阳独立团 1930 年 6 月编入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蒋天树、刘可人即随贺龙赴洪湖。上级党委仍确定徐质夫和少数骨干留在地方坚持战斗。

待大部队走后，敌县长兼保安大队长黄宝实、副大队长蒋子刚乘机率 3 个保安中队袭击侏儒镇。徐质夫在一次指挥游击队转移时不幸落马，肝部受了重伤，住在汉川彭方梓亲戚家中养伤。

红军战士徐家望前往徐质夫住处汇报敌情时，被石山的地痞流氓袁黑皮发现告密，徐质夫和徐家望落入敌手，被敌押至侏儒镇。敌县长黄宝实先对徐质夫以“同学之谊”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徐质夫说“你我同学不同志”，并把黄宝实大骂了一顿。黄恼羞成怒，施用灌盐水、红烙铁烫等酷刑，打得徐质夫皮开肉绽。

1930 年 8 月的一个早晨，徐质夫英勇就义，年仅 27 岁。惨无人道的黄宝实将徐质夫悬头示众，挖心剖腹，陈尸三日。群众把徐质夫的遗体埋葬在侏儒皂角山麓。



侏儒山街马寨村革命烈士纪念馆



徐质夫遇难后，其父与其胞弟继承遗志，先后投奔洪湖苏区，参加贺龙部队继续革命，后来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984年，汉阳县人民政府拨款修建烈士墓，树碑以昭英烈。该墓于1986年被汉阳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在武汉市、蔡甸区两级党史部门和侏儒山街党工委的支持指导下，马赛村党支部以徐质夫等9名革命烈士光荣事迹为依托，全力建设了马赛村革命烈士纪念馆。每年清明节期间，马赛村都会组织党员及志愿者前去烈士纪念馆清扫烈士墓地，有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到此举行纪念烈士先辈的活动，深切缅怀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烈士。自纪念馆陈列展基本完成以来，市内、区内机关团体上百批次自发前来参观学习和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由村支部书记和其他两委干部担任讲解员，向参观者讲述那段峥嵘岁月，讲述党政军民生死与共、水乳交融共同铸就的革命精神，讲述红色侏儒山最美的精神底色。

人生何处不青山

1930年6月，川阳独立团编入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后，蒋天树率领所属部队驰骋江汉平原，转战武汉外围，屡建战功。蒋天树又名天煦、天曙，汉阳县侏儒山百丈寨人。自幼天资聪颖，记忆过人，有神童之称，曾在当地名师李雪丞门下就读，深得先生钟爱。先生曾出示一时论题曰：“民国



蒋天树烈士纪念碑

以来，军阀割据，南北纷争，有增无已，青年学子应如何负起救国之责，试论以对。”蒋天树奋笔直书，列举救国十条道，全文二千余言，洋洋洒洒，波澜壮阔，一时传为佳话，开头语曰：“呜呼！昊天不吊，

华夏板荡，茫茫禹甸，见被发于伊川，莽莽神州，遭鬼谋于曹社。国事蜩螗，时局杌隉，至今日已极矣。”寥寥数语，亦可见其文学素养与政治洞见之不凡。当时侏儒山地区早期革命活动家尹成章即在附近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团结进步青年，尹成章亦是李雪丞的早年门生，常来经馆看望先生，蒋天树深受其影响。

1926年，中共汉阳县委派肖斌文、徐质夫二人来侏儒山筹组汉阳县第二区党部及农协会，发动当地知识分子参加，并在合丰堡成立了汉阳县第十区党部第五分部，安排蒋天树、刘可人分别负责党部与农会的工作。1927年春，蒋天树经徐质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侏儒特别支部主要成员，在侏儒山地区积极开展农民协会工作，负责训练农民自卫军，为川阳边区开展秋收暴动奠定了基础。9月，川阳边区开展秋收暴动，他先在汉川县南河渡傅岩领导下从事武装斗争，后随斗争胜利进展，回到汉阳原籍，与刘可人一起协助徐质夫以侏儒马泗寨、汉川张家大嘴为据点组织赤卫大队，他任大队长，率队进攻汉川县马口镇后，又多次向川汉边区内盘踞小集镇的反动团防武装主动出击，对于建立并保卫以南河渡为中心的川阳县边区红色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8年初，川阳边区革命武装遭到桂系军阀陶钧部吴良琛团疯狂镇压，暴动失败，蒋天树与徐质夫等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在白色恐怖中，蒋天树不畏艰险，千方百计寻找幸存同志，终于恢复党组织，重建侏儒支部。1929年，中共边区县委决定乘蒋桂军阀战争爆发之机，收缴桂系军阀溃败后散兵游勇所抛弃的枪支弹药，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川阳边区独立大队。不久，大队拥有人枪三百余，蒋天树任大队长，随即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他英勇善战，在攻打汉川系马口、汉阳侏儒东子山、黄陵矶的历次战斗中，均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不断缴获敌人武器，壮大革命武装。

1930年初春，川阳边区县委鉴于兴建侏儒南屏垸水闸关系到边区数万亩农田受益，并能保障数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故决定在春汛前抢修竣工。时国民党汉阳县政府派兵盘踞侏儒镇，恣意袭击阻挠。中共川阳县委特派萧利三负责建闸工程。蒋天树率领川阳独立大队日夜警卫守护，



数次击败来犯之敌，终于使水闸抢在汛前竣工。同年3月，川阳独立大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阳独立团，蒋天树任副团长。随后他所在部队编入贺龙所率领的红二军团，蒋天树任四师十二团团长。该团配合红二军团，先后在武汉外围地区攻打京山、应城、天门等县和岳口、皂市等重镇，牵制和袭击汉川县系马口、脉旺嘴，沔阳县仙桃，汉阳县蔡甸、黄陵矶等地之敌。

1931年，蒋天树在天门皂市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遗体后来葬于侏儒山百赛村村委会院内西侧，立有纪念碑。碑底部有石刻的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签署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查蒋天树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与徐质夫、蒋天树并肩战斗的刘可人是一位优秀党员，也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红军指挥员。刘可人名衡山，字定铭，号勋庵，汉阳县侏儒山中刘村人。自幼聪颖过人，胆大无畏。1925年春，刘可人考入河南建国军樊钟秀部举办的建国军军官学校学习一年，其间与中共先进分子建立了联系，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7月由河南返家，专心研读马列著作。

1927年春，刘可人参加徐质夫领导的侏儒地区党部与农民协会，被推选为合丰乡农会主席，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他协助徐质夫、蒋天树发动群众，编练农民自卫军，组织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将其粮食、浮财分给贫苦农民。后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汉川南河、丁集农民赤卫队与侏儒山、马泗寨赤卫队合并为川阳边区赤卫大队，刘可人任副大队长。



刘可人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处境艰难，不能在家容身，刘可人赴武汉考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随营学校学习。后来，他发现该校是为军阀割据扩充实力而开办时，即毅然离校回乡，设馆授徒，暗

中宣传革命，还亲书对联一副贴于门上：民国十八九，革命尚未成功，中华四百兆，同志仍须努力。

1929年春，黄一光、徐质夫二人由洪湖秘密返回川阳边境，后组织群众，成立川阳独立大队，刘可人任第三中队队长，在川、汉、沔三县边境地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同时他还组织农民疏浚河道，培修堤防，减轻当地渍涝灾害。是年夏、秋之际，他率部进袭汉川的城隍港、系马口、丁家集，汉阳的侏儒、永安、黄陵矶，沔阳的周邦、长埡口、西流河等地。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在袭击周邦时，突与惯匪周天贵部遭遇。仙桃敌军赶来一个营增援，三中队四面被敌包围。他在屋顶瞭望，把红旗集中插在屋顶，用以诱敌，而率部突围进入芦苇密林深处，从而避免了重大伤亡。他在此次战斗中受伤，弹穿腹背，经秘密医治数月始愈。

1930年，刘可人任川阳独立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此后，他率部转战沔阳、新滩、汉川襄南一带，屡建奇功。后来，他奉命调往湘鄂西苏区，在洪湖编入红二军团，任第三军第九师二十六团团长。在贺龙领导下，他坚持在监利、洪湖和川汉沔一带与敌人周旋，并孤军深入汉水北岸开辟根据地。1931年11月，他率部一举拿下应城城关，继而攻克应城重镇长江埠，以一个团的兵力歼敌34师一个旅，俘敌旅长张联华及以下官兵两千余人，缴获长枪两千余支及大量军用品，仅以一个团的兵力创造了红军又一个以少胜多的非凡战例。同年底，他率部配合红七师攻打武汉外围重镇黄陵矶，歼敌千余人。至此，红军直逼汉阳，使湘鄂西苏区版图扩大到武汉西郊。

1933年，红三军北渡汉水，攻打天门渔新河时，刘可人不幸中弹负伤，因医治无效，在岳口镇附近逝世，年仅29岁，遗体葬于岳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阳县人民政府明令追认刘可人为革命烈士，其遗骸于1984年始查明运回，葬于中刘小山上，墓前立有“革命先烈刘可人纪念碑”，以资纪念。

在侏儒山，这样的革命烈士还有很多，有地下党员朱长江，他被敌人施以酷刑，用绳子拴在马鞍上拖行1公里，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仍不交代



新四军游击队行踪，最后血染横山，壮烈牺牲。有满门英烈的李发成，他母亲被敌人用尽酷刑，最后将自己的舌头咬掉吐向敌人，也不肯交出儿子，最后父母双亲惨遭杀害。有就义时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的刘慈夫等等。他们胸怀革命真理，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与敌人作殊死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永远值得后人追思缅怀。

（蔡甸区史志研究中心 许雁晴）

不灭的火种

魏梦龄与冈西暴动

1928年初，黄冈西乡（今武汉市新洲区）爆发了一场声震鄂东的农民武装暴动，史称冈西暴动。此次暴动是共产党人魏梦龄为发动冈西沿江一带农民、响应省委年关暴动计划、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举行的，打响了新洲农民武装暴动第一枪。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立即制定了全省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为7个暴动区，并从武汉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赴全省各地农村，在重建党组织的同时，组织和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10月中旬，正在汉口秘密组织人力车夫罢工斗争的魏梦龄，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与罗四维、陈卫东一起回到黄冈，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暴动。10月下旬，罗四维在峰火山翊明庵召开党员扩大会议，正式恢复建立中共黄冈县委，罗四维任书记，陈卫东、胡亮寅、魏梦龄等7人为委员。罗四维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研究了如何反击土豪劣绅的反扑、组织暴动队伍及暴动行动计划等问题，提出了暴动口号。

魏梦龄，黄冈西乡魏家淌人，大革命时期与叶万鹤一起组建了西乡第一个党支部，即中共阳逻支部。先后任中共阳逻支部书记、冈西特别支部委员、中共黄冈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黄冈县委委员、黄冈县民运部部长、县农协执行委员、县农民自卫军常委、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长、县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等职，是一位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共产党员。此次奉湖北省委的指示回黄冈，正值白色恐怖严重时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与其他县委成员一起，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恢复建立了一批党的基层组



魏梦龄

织，并成功发动了冈东回龙山暴动和杨鹰岭暴动，建立了黄冈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和工农革命军第六军。

1928年1月，按照黄冈县委的指示，魏梦龄与叶万鹤等一起回到冈西，恢复建立中共阳逻区委，决定发动冈西沿江一带农民武装暴动，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

大革命失败后的冈西，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党团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原来隐蔽下来的一批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或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或逃往外地。面对险恶环境，魏梦龄怒火中烧，不顾个人安危，四处活动，

走村串户，秘密发动。他以原刘家集党支部书记叶斗垣、原顾家大湾支部书记顾润谦等为骨干，动员母亲和妻子陈惠莲为交通员，召开秘密会议，研究暴动计划。通过秘密串联发动，分散隐蔽在周边地区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听说魏梦龄回来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陆续返回，很快集合了百余名党、团员和农会骨干分子。

1928年2月2日，魏梦龄、顾润谦到黄冈县委开了两天会议，汇报了暴动的准备情况，4日返回魏家淌，一起来的还有省委派来协助暴动的4名武装干部。当晚，魏梦龄在家中召开暴动前党团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年关暴动的指示精神，介绍了邻县及黄冈东乡暴动情况，与会人员群情振奋，备受鼓舞。通过讨论，会议决定以国民党“清乡”委员、恶霸地主叶协臣作为暴动主要打击对象。魏梦龄指出：“只要坚持斗争，最后革命一定会胜利。”

叶协臣是刘家集（今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臭名昭著的土豪劣绅，极端仇视革命和共产党。自当上国民党阳逻“清乡”委员后，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和土豪劣绅，肆无忌惮地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砍头、剖腹、挖心、“点天灯”，惨无人道，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对农民则进

行反攻倒算，敲诈勒索。他私设公堂，豢养打手，看谁不顺眼就扣上一个“共党”的罪名，轻则罚款、罚跪、罚酒席、拆房子、披麻戴孝，重则捆绑吊打，送官府关押、判刑，许多人妻离子散，逃亡他乡。人民群众愤恨至极，敢怒不敢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决叶协臣必定大快人心。

2月5日（农历正月十四）晚，暴动队伍按照指令在魏家淌西堤外的江边集中，暴动总指挥魏梦龄作了简短的动员布置后，省委派来的武装干部宣布了暴动纪律：保守秘密、不许放火、不拿东西。规定不走大路，行走时不准点灯火、不准有响声、保持安静等。

此时已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百余名暴动队员手持大刀、长矛、冲担等武器，在魏梦龄的带领下沿江东下，直奔周施湾，包围了叶协臣家。暴动队员砸开大门，冲进屋内，将叶协臣的老婆——一个反动透顶、助纣为虐的地主婆砍死，还处决了几个“清乡”队员。但狡猾的叶协臣听到大门被砸开后，迅速爬到阁楼，藏在一个装满棉花的竹篓子里。由于暴动队员缺乏经验，虽然反复搜查，终未发现，在抄没家财后撤出。在返回途中，处死了顾家大湾民愤极大的大地主顾法子（混名）。

叶协臣逃脱后，到国民党黄冈县政府搬来保安团，进行疯狂报复，多次血洗魏家淌，纵火烧房，70里刘家集烟火弥漫，一片腥风血雨，魏家淌被烧房屋六七十栋，财物洗劫一空。国民党当局将刘家集划为“匪区”，将魏家淌划为“匪村”，凡是参加暴动的人员捉住就杀。共产党员林楚清、叶文安等，魏梦龄的母亲、魏文伯的三伯父，均惨遭杀害。叶协臣还将魏梦龄的母亲暴尸三日，不让亲属收尸。同时四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匪首”魏梦龄，缉拿魏梦龄之妻陈惠莲。在农民群众的保护下，陈惠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躲藏在湖泊中一个放灵柩的茅草屋中，由于找不到食物，加之天寒地冻，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活活冻饿而死。

冈西暴动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参加暴动的大部分党员和骨干分子遭到通缉追捕，无处藏身，满怀悲愤再次远走他乡，魏梦龄在农民群众的掩护下逃到武汉。后来，魏梦龄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上级派了两个同志携带手枪到刘家集，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寻机铲除叶协臣，



但一直未能如愿。1928 年秋，党组织获悉叶协臣为处理一起户族土地纠纷要到汪林的总官庙喝酒调解，认为这是除掉叶协臣的一个好机会，便立即告知上级派来的两位同志。第二天上午，那两位武装同志化装成农民，身穿短衫，头戴草帽，来到总官庙。他们从侧门发现叶协臣坐在首席，正高谈阔论，洋洋得意，毫不防备。两位武装人员立即冲进去，前面的同志抬手一枪，打在叶协臣的屁股上；后面的同志赶上去，往胸口补了一枪，恶贯满盈的叶协臣终得应有下场。

叶协臣被处决后，当地党组织以季如非的名义张贴布告，历数其罪恶，沉重打击了本地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为此，本地一老秀才创作了一首民谣：“世界草木中，血染遍地红。……杀暴安良善，总存因果中，官清民自德，庙显神灵通。”

程鹏万与李紫苏区的创建

李紫区（新洲李集与红安紫潭河的合称）位于黄冈、黄安（今红安）、麻城三县交界之地，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这里多为山地，林木茂密，河港纵横，地形复杂，土地贫瘠，是国民党军阀统治的薄弱地区。1931 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建立起一块方圆 200 余平方公里的李紫革命根据地。苏区内建起比较完整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虽然苏区存在不到两年时间，但在新洲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历史不会忘记点燃李紫地区革命烽火的第一人——中共早期党员程鹏万。

程鹏万，湖北麻城料棚人，1922 年进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较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3 年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立下誓言：“不可昏庸同草木，誓将热血洒山河。”1926 年，程鹏万按照董必武的指示，以黄安特别支部成员的身份，到李紫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他以教书作掩护，穿长衫戴礼帽，住在董兴谱等可靠群众家里，白天除了教书不出门，以免暴露；夜晚出来活动，活动范围在七方田周边 20 余公里的村湾。他用农民语言向贫苦农民讲述：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是因

为田地都掌握在地主的手里，穷人没有自己的田地，只得租种地主的田地，受地主老财的压榨，而官府只保护富人的利益，不保护穷人的利益，是压迫贫苦百姓的官府。共产党是要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闹翻身，打倒地主老财、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和官府，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要做到这些，首先穷人就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走。一把筷子折不断，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道理通俗易懂，很容易为贫苦农民所接受。在这个过程中，程鹏万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1927年春，他创建了李紫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七方田支部，同时成立农民协会。从此，革命烈火在这里点燃。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遵照黄麻特委的指示，程鹏万率领李紫地区党员和农会骨干20余人，携长枪5支及火铳、刀矛，在肖家田（今凤凰程田村）一棵百年古枫香树下集合，奔赴黄安，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战斗中3名队员牺牲。后来，群众把这棵树称为“红军树”。

受黄麻起义的影响，1928年，程鹏万开始着手建立革命武装。由于这一带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七方田党支部仍得到发展，到1928年已有党员50多人，这为建立农民武装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程鹏万首先秘密联络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农民自卫军队员，以共产党员和这些自卫军队员为骨干，以农会积极分子为基础，组建了李紫地区第一支武装——特务队，有20余人，程鹏万任队长，主要活动于七方田、蔡家田、毛家冲、罗家大塘、骆家田一带。1929年冬，在程鹏万的帮助下，共产党员李炳坤建立起李家港湾特务队，20余人枪。此时，红一军三十一师经常到这一带活动，推动农民武装的快速发展壮大。到1930年秋，七方田特务队发展到100余人枪，李家港湾特务队发展到80余人枪。与此同时，程鹏万还积极组建赤卫队等武装，后来又成立袭击队。这些武装组织的建立为李紫苏区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务队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是打土豪、筹粮款。1930年初的一个晚上，特务队在三圣湾、刘兴湾、刘溪畈一带抓了18个土豪，缴获银圆数万块，其中刘溪畈的孔姓土豪交了2万光洋。对少数抗拒不交的死



硬分子，则予以严惩。二是镇压反革命及反动大刀会等枪会的叛乱，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1930年春，特务队与赤卫队相配合，歼灭了郭家湾的反动民团，缴枪40余支。三是为红军收集传递情报、救护伤员、配合红军主力作战。1930年春，红军进攻李集，程鹏万立即派人化装成小贩进城侦察敌情，然后向红军指挥员作了汇报。战斗开始后，他又带领特务队参加战斗。此战歼灭军阀徐源泉1个营，红军第一次占领李集城。1930年11月底徐向前率红一军成功夜袭新洲城，与李紫苏区提供的重要情报密切相关。这些重大活动，程鹏万都是积极参加者。

1930年初，中共鄂豫皖特委在黄安召集黄陂、黄安、麻城、黄冈等县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建立和扩大李紫苏区的问题。会议认为，李紫地区革命形势发展较快，应进行统一领导，以便进一步扩大武装割据局面。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黄冈县工委，由特委委员雷绍全任书记，统一领导三县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

黄冈县工委成立后，对李紫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统一调整，组建中共李紫区委，程鹏万任书记。按照县工委的有关精神，程鹏万一手抓农民武装建设，一手抓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先后建立十几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00余人。随着李紫地区各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李紫苏区初步形成，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李紫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与仇视，急欲除之而后快。当时，李紫地区周边反动势力比较强大，既有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也有地方民团等地主武装，他们一向与人民为敌，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刘溪畈反动民团团团长刘仁夫曾狂妄叫嚣：“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他们划定公路以北为“匪”区，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犯下累累罪行，不断制造白色恐怖。

1930年2月14日，七方田支部在党员程厚兴家中开会，被国民党李集保安团获悉，当晚，民团头目成朗轩带领保安团100余人，将七方田团团包围，程福坤等7名与会人员全部被捕，2名党员和8名革命群众被杀害。临走前，成朗轩还将这7户人家的房屋全部烧毁。

1931年2月8日，程鹏万在李紫区七家凹（今属凤凰）召开党员干部会，由于叛徒告密，会场被反动大刀会包围，程鹏万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而被捕，被押至三店保安团。国民党先是以高官厚禄诱惑，遭到程鹏万的严厉拒绝后，将他绑在一棵大树上严刑拷打，程鹏万忍着剧烈疼痛，一声不吭。恼羞成怒的敌人在树下架起木柴，将其活活烧死。

程鹏万牺牲后，李紫区党组织虽然遭受严重损失，但斗争从未停止。李紫苏区人民继承程鹏万的革命遗志，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建设李紫革命根据地。

1931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雷绍全在李紫区正式组建中共黄冈县委，下辖黄冈李紫区、红安平区、麻城歧区，李紫区成为黄冈县的革命中心，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黄安、麻城和陂安南苏区连成一片，从而加速了境内红色政权的建立。

5月14日，李紫区苏维埃筹委会在西赵湾后山上召开万人大会，正式成立李紫区苏维埃政府。至此，李紫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7月，黄冈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各区、乡农会组织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抬匾送额前往祝贺。人们高兴地唱道：“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光辉灿烂闪现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亲爱的农友们，唱一支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县、区苏维埃建立后，在境内开展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夙愿。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他们感谢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把苏维埃政府当成自己的政府，把红军当成是自己的队伍，把参加红军、支援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光荣任务，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踊跃参军参战，李紫区先后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苏区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为保卫苏区、建设苏区进行英勇的斗争。

（新洲区史志研究中心退休干部 邱继初）



将星初升

“小李木匠”闹革命

“啪啪啪”，黄陂叶家田村的袁木匠家传来了一阵焦急的敲门声。袁木匠打开门，发现来人是一位陌生的年轻妇女，诧异地问道：“你找谁？”年轻妇女脸有愠色，“全伢子在这里么？他好几天没回家了。”袁木匠这才明白，她是来“告状”的。这位年轻妇女叫姚泽辉，她找的就是新婚不久的丈夫——李先念。

1909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六），李先念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九龙冲李家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名全伢。旧中国的农村，手艺人要比种田佬的社会地位略高些，生活状况也略好些。与学堂和仕途无缘的穷孩子，能拜师学艺，掌握一门技术，就谢天谢地，不愁将来没有出路，没有饭吃。李先念要自谋生路，和父母亲反复商量，



李先念

辗转来到叶家田村的表亲袁学福那里学木匠。在这里，少年李先念逐渐接触进步思想，参加革命工作。

黄麻起义夺取县城后，高桥区委的领导人和李先念等迅速率领队伍返回本区，发动群众，开展庆祝和示威活动，给当地的反动势力以强有力的震慑。为了巩固群众基础，支援木兰山的游击武装，经区委同意，派李先念回叶家田村袁学福家，以木匠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并继续

与九龙冲的韩爽先、李泽信保持联系。袁学福见了徒弟，格外高兴，问长问短。李先念不便暴露身份，谎称原来搞农运，现在洗手不干了，怕有人报复，母亲叫他来这里躲风，挣碗饭吃。袁家子弟和村里的一些小青年都是李先念的好朋友，李先念白天跟师傅做活，晚上常和青少年们聚会，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

在李先念的教育和影响下，1928年初，叶家田村第一批青年加入共青团，组成黄陂县的团支部，李先念任支部书记。此后，青年团的发展工作又扩大到附近的塔耳、蔡店、研子、静山庙等地，形成了一支配合党组织战斗的生力军。

袁学福师傅见李先念晚上经常外出，深更半夜才回来，不知他在外面搞什么事，心想全伢这孩子年岁已大，该成个家啦。于是去同李先念的的母亲商量后，给他包办婚姻，娶静山庙的一个名叫姚泽辉的贫苦女子为妻。李先念满心不愿意，但苦于师傅和父母亲的压力，没有办法推托，遂草草成了婚。三天后，他就离家回师傅处，只是晚上外出搞革命活动时，多了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回家去住。这边的师傅以为他天天回家，那边的母亲却长久不见人影。她埋怨孩子不懂事，新婚就不着家，心里焦急、憋气，又不便对新媳妇明言。有天就去叶家田村问袁学福：“全伢子为什么这段时间没回家？”袁大吃一惊，说：“不对呀，他每天下工后都说回家去住，怎么会没回家呢？”过后师傅盘问李先念，他却沉默不语。不久，姚氏又来“告状”，说不知什么原因，丈夫总不回家。气得袁学福狠狠训斥李先念一顿，还打了他一巴掌。

有天，李先念实在疲惫过度，干活时不知不觉进入梦乡，腰间的手枪忽然掉到了地上。袁学福看到这个铁家伙，知道非同小可，赶快唤醒了，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在干什么？不要瞒着我们，让我和你娘提心吊胆！”

李先念见再也无法隐瞒，就如实说道：“师傅，你是个老实人，我怕你担惊受怕，没敢对你说。为了打倒地主老财，让穷人翻身，我已参加了革命。这些时间没回家，是开会搞活动去了。”袁学福平时不爱言语，只埋头做活，



极少管闲事,但他也是穷苦人,内心里同情革命,希望翻身。听了李先念的话,不仅没有责备他,还答应为他保密,嘱咐他千万要小心谨慎。过后,又在房里做了夹墙,挖了地洞,里面放上干粮,以备敌人搜捕时,应急藏身之用。从此,他在白天尽量带上李先念外出做活,行踪不定;夜晚特别留神,听到犬吠人嚷就叫李先念藏进夹墙里。李先念也经常向他讲一些革命的形势和道理,师徒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有天,袁学福问道:“全伢子,你说的革命能成功吗?”李先念充满信心地答道:“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只要我们穷苦人跟着共产党走,团结奋斗,不怕流血牺牲,革命一定成功!”袁学福受徒弟的影响,不久加入了共青团,全家支持革命,他的一些子侄也先后加入共青团或参加了红军。

1928年早春二月,乍暖还寒。高桥区九龙冲乡游击队成立和木兰山革命武装打回家乡的消息,像春风送暖般地吹进千家万户,温暖着白色恐怖下广大群众的心田。此时,担任乡游击队长的李先念,为了打击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壮大游击队的声势,决定首先拿陡山彭家村的联庄会首陈芝斌开刀。

在一个朔风劲吹的雪夜,李先念和詹献庭率领五名游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陈芝斌的深宅大院。未发一枪一弹,便将睡梦中的陈芝斌活捉,历数罪状,就地正法,并由李先念、詹献庭联名,在村里张贴布告,以儆效尤。陈是当地的一霸,常给国民党军通风报信,反攻倒算,鱼肉乡民,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游击队的这一义举,迅速传遍高桥、塔耳区的各个角落,使群众深受鼓舞。李先念、詹献庭名声大振,成为敌人在这一带搜捕的主要目标。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李先念率游击队以红马寨为活动中心,采取白天隐蔽,夜间出击,敌来我藏,敌退我出的办法,依靠群众,与敌周旋,不断捕杀极端反动分子,为群众除害。有时,他们还深入到二程区桐柏集一带活动。3月,九龙冲乡党支部重建,李先念兼任支部书记。

为加强对革命游击武装的打击,控制黄麻起义区的局面,国民党军加派一个团分驻两县。4月间,黄安驻军会同“清乡团”、“自卫团”等,进

占七里坪、檀树岗、箭厂河、六里湾、高桥河诸镇，分兵反复“搜剿”革命武装。李先念和游击队处境艰难，不时遇险。有一天，他率队员转移途中，突然与敌遭遇。他掩护李泽信等队员脱险后，只身逃进孟尝山南王家村，敌紧追而来，该村农会会员将他藏在房里夹墙内，才幸免于难。李先念的家里是敌人搜索的重点，为了不牵连家人，游击队的江竹青和他商量出一个“绑架”的办法，掩人耳目。有天，李先念回家去住，夜半江竹青率几名游击队员进了他家，强行将他绑走，声言家人必须交出五百块银圆才能赎回。这事轰动了全村，说全伢子是被逼干游击队的，家里没有钱，所以没法赎他回来。有全村的人作证，敌人信以为真，此后才极少找李家的麻烦。7月间，李先念率游击队配合詹才芳、江竹青率领的队伍，奔袭下乡“清剿”的敌军。因反动分子告密，遭敌包围。李先念等沉着应战，组织队伍奋勇突围。脱离敌人包围圈后，利用暗夜分散隐蔽，躲避敌人的搜捕。

林木茂密的红马寨山冈，是李先念儿时常去放牛的地方。那里有个岩洞，洞口被野藤、树丛遮着，十分隐蔽。洞里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仅能容纳两三个人。他钻进洞里住了几天，由二嫂和三姐李德琴或韩爽先的妹妹装作上山拾柴，给他送饭，传送消息，使敌人在李家大屋的轮番搜捕落空。国民党军出几百大洋悬赏李先念的头颅，他听说后，拍拍脑壳笑道：“想不到这东西还这么值钱！”

在此期间，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已转移到光山县南部，开辟柴山保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那里是豫、鄂两省的交界处，易于同“进剿”的敌人周旋。第七军利用敌军以省为界的“进剿”，当河南敌人来攻，就翻山进入湖北；当湖北敌人来攻，又翻山进入河南，所以便于保存和发展自己。在柴山保，部队再次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党代表是戴克敏，辖四个大队，每个大队约六七十人，兵力较从前的七十二人扩展了几倍。1929年春，李先念率九龙冲乡游击队编入新扩建的红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班长郑仲。郑仲牺牲后，他代理班长。红三十一师连续粉碎了“罗（霖）李（克邦）”、“鄂豫”、“徐（源泉）夏（斗寅）”三次“会剿”。部队打了走，走了打，吃不上饭，喝不



上水，连续作战，十分艰苦。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我们反了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我现在不能吃南瓜，就是因为那时吃不上饭，整天啃生南瓜当饭吃。”通过参加一系列战斗，李先念进一步得到锻炼，增长了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克敌制胜的本领。这些战术，李先念、戴克敏在战后总结为七条原则：一是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是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是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是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是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是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原则是进与退、走与打、虚与实的辩证统一，是李先念在军事斗争实践中学到的第一堂重要军事理论课。反三次“会剿”前后，商城起义的队伍组成红三十二师，六（安）霍（山）起义的队伍组成红三十三师，与红三十一师并肩战斗，形成豫鄂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区的工农武装割据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粉碎国民党第三次“会剿”后，豫鄂边根据地亟待巩固，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繁重。192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豫鄂边特区，改组鄂东北特委为豫鄂边特委。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日后发展的稳定基础，特委决定派出工作委员会分赴各区开展工作。派往高桥区的工委会主任甘济时需要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得力助手，经人推荐，选中了李先念。这样，李先念便从军队去地方工作。

金风萧萧，枫叶乍红，大别山区正是稻谷登场的秋忙季节。但是，敌人的反复“清剿”，赤白的严重对立，群众的不断跑反，使大片土地荒芜，野草蔓长，田野里、村庄里人影稀疏，看不到喜气洋洋的秋收繁忙景象。李先念跟随甘济时从柴山保一带南下，愈走愈看，心里愈是沉甸甸的，深感此去任务的艰巨。

他们两人在群众基础较强的庙咀乡落脚后，当即召集詹献庭、敏汉华、区委书记高崇德、赤卫队长田开寿、游击队长肖敬明等一批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领导骨干开会，传达特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和确定了工作部署。一是

健全各乡、村党组织的领导，扯出红旗子，公开活动，利用红军胜利的有利形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二是成立庙咀、程河两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布告四方，号令行事，若有违抗和破坏政府法令者，严惩不贷。三是由各乡派人去深山密林，向群众宣传胜利形势和土地革命，动员他们回来“打土豪，分田地”，重建家园。四是以赤卫队、游击队为骨干，武装群众，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收拾各种枪会。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各种枪会纷纷解体，大部分跑反群众陆续归来，一些群众组织也相继恢复和建立，全区初步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局面。

193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大别山区周围的十七八个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区，成立鄂豫皖特委。鄂豫皖根据地至此正式形成，面积达一万五千余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分别在豫鄂边、豫东南、皖西转战的红军第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亦统一改编为红一军。

黄安南乡一带，本来就不很巩固，特委推行“左”的政策，加上地主豪绅的造谣和挑拨，致使部分农民“反水”。红枪会、黄枪会、绿枪会等地主武装东山再起，联合起来进攻八里、西斋、二程、桃花、高桥等区，肆意烧杀抢掠，向分得土地的农民反攻倒算，造成数万群众跑反，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也大部坍台。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先念和区委决定一面派赤卫队、游击队掩护群众跑反；一面派人筹集和运送粮食，解决跑反群众的吃饭问题。一批区、乡领导干部均随群众撤到山林间，稳定群众情绪，尽力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因老弱妇孺居多，哭的、叫的、吵的、闹的，不绝于耳，犹如散沙一盘，乱麻一团。稍有风吹草动，便惊惊乍乍，四处乱钻，拢都拢不住。所谓“宁带一军，不带一村”，李先念有了实际体会。当然，最困难的还是缺粮问题。他便组织武装小分队，利用暗夜深入白区，找土豪地主集粮，交出粮食就能保命，否则杀头。这种办法很灵，豪绅地主为了保命，会乖乖地把储粮和银圆献出来。不久，应特委请求，西出平汉路的红军回师，武装镇压反动枪会和地主豪绅。正规红军一到，大批乌合之众迅即作鸟兽散，整个局面才被扭转。在恢复各乡、村苏维埃政权，做好“反水”农民的争取教育



工作，组织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基础上，高桥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9月间在詹家湾召开，李先念当选为区苏维埃主席。

1931年陂安南县设立，李先念又当选为县苏维埃主席。陂安南县辖区位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带，屡遭敌人“清剿”和抢掠，缺粮现象尤为突出，财政收入更是少得可怜。李先念就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急谋解决这方面的困难。要求全县政府工作人员和党团员积极响应中央分局“粮食运动周”的号召，每天吃两餐稀饭，带头种瓜种菜种粮，严禁浪费粮食；大力减免农业税，采取变工、换工、换耕和代耕等多种形式，加强互助合作，解决群众劳力不足、耕牛和农具缺乏等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各级政府机关面向基层，深入村头田间，指导生产，就地解决群众之间的某些纠纷和问题；组织全县的武装力量，坚决保卫麦收、秋收，防止白区的敌军和枪会前来抢粮。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办法是：实行农业累进税（贫雇农免收）和商业累进税；组织和发展经济公社、消费合作社和木工、铁工合作社；保护小商业，扩展集市贸易，活跃经济，增加财税收入；利用靠近白区通往汉口的便利条件，大搞农副土特产品的输出和急需商品的购进，凡粮、棉、布、盐、药材、军需用品等紧缺物资的输入，一律免税，大宗物资的输出和输入派地方武装护送；组织武装小分队，去白区向土豪劣绅“筹款”；等等。上述各项措施的实施，使全县的财政困难局面逐渐好转，秋季又获得农业丰收，群众生活明显改善，使陂安南县这块前沿阵地愈加巩固。

李先念身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管辖二十多万人口，却仍像过去在基层工作时一样，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他经常身着农民衣服，脚穿草鞋，走村串户，和农民群众交朋友，话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因而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发生诸如邻里吵架、土地纷争、婆媳不和、夫妻离异等矛盾，人们就会说：“咱们去找李先念评一评！”在他的办公地点，男女老少经常进进出出，找他解决问题。“农民把我们当成神，大小事都找我们决断。离婚说找神，就是找李先念，天不下雨也说找李先念。”

李先念后来回忆起他在区里、县里这段工作经历时说：“我的基本经

验是两条，一是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二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把党的决议、指示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也才能真正学会领导群众斗争的本领。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窑工扛枪逞英豪

木兰山，这个和巾帼英雄花木兰同名的山，以它茂密的丛林，掩护着劳苦大众的英雄好汉。它是大别山区平民百姓的骄傲，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的摇篮，也是徐海东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所学校。

徐海东 1900 年生于湖北黄陂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徐海东只在私塾读了三年半书，十二岁那年，因为打了一个欺负他的地主儿子，辍学后不得不当起了窑工，成为徐家第七代“泥巴人”。徐海东的同窗吝积堂毕业后一直在外深造，后来到武昌教书。

1925 年，武汉一些知识青年和学生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下，在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这年寒假，共产党员吝积堂受党的派遣，回大悟做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工作。

一天，徐海东挑着担子埋头走路，听见有人和他打招呼，抬头一看，竟是几年没见的吝积堂。两人聊起近况，徐海东说，自己成天不是在窑里受烟熏火燎，就是挑着担子走路，可还是改变不了受穷的命，“你是教书人，说说看，我们这些‘泥巴人’的命怎么才能好起来？”

吝积堂向徐海东说起自己在武汉的见闻，告诉他穷人为



徐海东



啥受苦，中国有了共产党，要领导穷苦人闹革命等等。

经过吝积堂的引导和启发，徐海东下定决心离开家乡，投身革命。1925年3月，徐海东把自己喂的一只羊卖了做路费，和吝积堂来到武昌。徐海东到武昌后，租住在中华路的一家小客栈，吝积堂为他介绍了另一位共产党员李树珍。

小客栈的老板娘见徐海东一时找不到事做，想拉洋车又没有本钱，便介绍了一份挑水工。挑水工是一个又苦又累，收入微薄的活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上一百斤重的水桶，在六七十级的码头台阶上爬上爬下，一直干到天黑。肩膀压得又红又肿，晚上躺到床上腰酸腿疼，不到半个月，他就病倒了。徐海东生病期间，吝积堂和李树珍经常去探望，还跟他谈革命的前程，没多少文化的徐海东渐渐明白了许多道理。

1925年4月8日深夜，徐海东在武昌都府堤20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吝积堂和李树珍。徐海东的第一笔党费，就是自己挑水挣的钱。

为了学习军事技术，1925年5月，徐海东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在同乡同学、共青团员田道生一个亲戚的帮助下，顶替一名叫“柳金彪”的人，进入北洋军阀湖北二师刘佐龙的部队。

武汉的夏天非常热，徐海东在军阀部队每天顶着大太阳出操，还要受老兵的欺压。他的班长叫陈德金，是个老兵痞，为人刻薄，徐海东刚进部队带的一点苦力钱和每个月的津贴都被陈德金搜刮去吃喝嫖赌。为了学到军事技术，徐海东一忍再忍，陈德金拿了他的钱理亏，也肯教他点东西。不到半年时间，徐海东就把学到的军事技术常识记了密密麻麻的一本，半年后被提升为下士班长，又过了两个月，升任中士班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党组织通知徐海东离开部队，与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南下。4月，三个年轻人离开武昌城，前往广东。徐海东一行跋山涉水向南步行了一个多月，在广东韶关遇到从广州打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徐海东加入了北伐军，吝积堂、李树珍继续南下。临别前，吝、李向第三十四团党代表介绍了徐海东的情况，

并留下他的党员组织关系。党代表也是共产党员，很器重徐海东，当即派他到三营九连当代理排长。

徐海东作战非常勇敢，6月北伐军攻打湖北门户汀泗桥时，徐海东带领全排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大炮，受到师长张发奎嘉奖，晋升为少尉排长。

1926年9月1日，北伐军打到了武昌城下，几天后攻克汉阳、汉口，吴佩孚逃往郑州。10月10日，北伐军发起总攻，一举攻克武昌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徐海东跟随北伐军转战江西南昌、河南洛阳，于1927年6月初返回武汉。这时，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迅速分散，自行隐藏。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徐海东离开武昌，返回黄陂老家，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

当时，黄陂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洪流推动下迅猛开展。徐家桥附近的村庄多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响遍四方。徐海东由武汉回来之前，已经有一批共产党员如田道生等，分别由各地返回家乡，担任了党和农会的负责人。徐海东回来后，首先去找田道生。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田道生介绍了全县农民运动情况，徐海东倾谈了武汉方面的见闻，二人推心置腹，谈得十分投机。经田道生建议，第二天，徐海东去中共黄陂县委请示工作。县委书记陈金台热情地欢迎他说：“现在我们组织农民自卫军，缺少军事指挥人才，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当即派他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

此时，河口区农民自卫军力量非常薄弱，徐海东分析了河口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形势，认为必须组织力量打一两次小胜仗，缴获几支钢枪，才能吸引群众，打开局面。在县委领导下，他率领农民自卫军偷袭了夏店雨坛盐卡民团一个班，缴获了七支长枪。这个胜利对自卫军队员和附近农民的鼓舞很大。此后一个月，自卫军人数就扩大到三百多人，但由于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这支农民武装力量在思想和组织上都很不巩固。不久，国民党地方武装向自卫军发起进攻，徐海东正指挥部队进行迎击，阵势还没有摆开，敌人一阵排子枪打来，就把自卫军大半队员吓得跑散了，留在



徐海东身边的只有少数党员和他的亲属。徐海东非常气恼，但他并未灰心，不断召集队员，准备继续斗争。

11月13日，黄安和麻城工农民众三万余人包围黄安县城，举行了武装暴动。黄陂县委紧急命令河口区农民自卫军赶赴黄安参加暴动。徐海东动员了几名当过兵的窑工，连同原来的自卫队员一起，组成了一支二十七人的农民武装，向黄安奔去。当他们赶到黄安时，县城已打下两天了。徐海东应邀参加了11月18日举行的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受到鄂东革命军副总指挥吴光浩的接见。徐海东深为黄麻民众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认为黄陂也应像黄安那个样子才算是革命。他根据吴光浩的要求，只身返回黄陂河口区，召集失散的自卫队员。不久，黄麻起义遭到反动派镇压而失败，随后反动军队向黄陂“追剿”过来，县委通知农民自卫军暂时解散。这时，反动军队在民团和豪绅地主操纵的红枪会配合下，四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并且指名要抓徐海东。徐海东先回徐家桥躲避，敌人在徐家桥严密搜查，他待不下去，就又跑到河口。

最后，在徐家叔伯的齐心保护下，徐海东又回到徐家桥当上了窑工。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徐海东仍然想着革命。他凭着懂得些军事，胆子又大，白天在窑厂干活，晚上出去秘密组织农民武装。在“进剿”的敌人撤走后，黄陂县重新建立党的工委，组织黄陂县游击大队，徐海东被任命为游击大队的分队长，又公开干起农民武装斗争。

1928年秋，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委员、军事部长，他领导的游击队已扩大到六十余人。县委决定恢复党的工作，指派他担任夏区区委书记。他到夏区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组织了秘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把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1929年初，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发动年关暴动，委任徐海东为年关暴动委员会总指挥。腊月三十晚上，暴动开始了！他指挥暴动队冲进地主豪绅庄园，点起火把，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四乡正愁过年没米的农民，捉捕恶霸地主分子游街。豪绅地主垂头丧气，穷苦农民扬眉吐气，几个村庄顿时被搞得天翻地覆。但没过几天，敌军驱散了暴动队，屠杀了很多革命群众，年关暴动失败了。徐海东是夏区区委书记，又是这

次暴动的总指挥，名声很大，敌人到处搜捕没有抓到他，就抄了他的家，烧了他做工的窑厂。他的母亲、妻子和兄嫂都被迫逃亡他乡。

年关暴动失败后，徐海东带领几名暴动队员离开徐家桥，经过许多曲折，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底，鄂豫边区特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徐海东被任命为第五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1930年4、5月，他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根据边区特委的指示，他利用蒋桂阎冯军阀混战的大好时机，配合各路红军游击队，转战在大别山区，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赤卫队。10月，黄陂县赤卫队升编为补充六师，徐海东任师长，不久，复任第五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1931年初，又调任鄂东警卫二团团长。这时，徐海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和发动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1931年3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二团整编为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八团。他继续担任团长，成了红军中一名中级指挥员。

穷苦农民求翻身

1930年6月11日午夜，平汉铁路（今北京至汉口）南段的杨家寨车站突然火光冲天，爆炸声响成一片，一位年轻的红军班长带领战士冲进车站小院。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国民党士兵，正忙乱着取枪准备抵抗，被红军战士们几声断喝，吓得高举双手当了俘虏。这位年轻的红军班长就是杜义德。

1912年5月16日，杜义德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程家咀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了8个月私塾。8岁起给地主放牛。10岁便随哥哥出外挑担磨肩，起早贪黑地奔走于河口、夏店等集镇，每天要往返百十里的山路。15岁时，他经人介绍，到武汉帮人拉



杜义德



大锯。老板为了多挣钱，一天到晚逼迫工人们多干活。杜义德是新学徒，除了拉大锯外，还要煮饭、洗碗、烧菜、担水，常常累得汗流浹背，腰酸背痛。一次，他因为劳累过度，头昏目眩，拉锯偏了线，遭老板毒打。他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丢了学徒生计，家庭生活越来越苦，杜义德陷入苦闷之中。

1927年11月，传来了黄麻起义的消息。不久，杜义德家乡木兰山的塔耳岗出现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就是黄麻起义的部队，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吴光浩派来的，负责人是詹才芳。这支队伍赶走了土豪劣绅，给农民分了田地，到处张贴“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宣传工农革命军为穷苦农民求翻身，组织农民协会，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号召穷苦农民进行五抗（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债）。这些使杜义德看到希望，毅然参加了农民协会。在与地主豪绅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农会的会员们拿起土枪、大刀和梭镖，各村组织了农民赤卫军。1928年，16岁的杜义德成了赤卫军的一员，常常跟着队伍到赤白交界处与地主反动武装“扇子会”、“大刀会”作战，并在战斗中经受了锻炼。同年，杜义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2月，杜义德参加红军，编在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四大队。同年6月，担任第四大队宣传队队长。一天夜里，杜义德带领全体队员，在木兰山脚的乡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天快亮时，他们在徐家湾村突然遇到了国民党军，杜义德立即命令大家占领有利地形。待国民党军靠近不到30米时，他带领大家向对方甩出十几枚手榴弹，趁着硝烟，冲上去展开肉搏战，打退了国民党军。

1930年初，杜义德的父亲被地主反动武装杀害，他听到消息后，悲痛中更添仇恨，作战更加勇敢。杜义德离开宣传队后，调到鄂豫皖边区红一军第一师三大队当班长。

6月11日午夜，第一师袭击平汉铁路南段的杨家寨车站。一列火车过后，副军长徐向前指挥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国民党军发起冲击。顿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杨家寨战斗不到半小时，胜利结束。此后，杜义

德相继参加了杨平口战斗和花园战斗。因为作战勇敢，几个月之后就由班长提升为排长。杜义德担任排长不久，就奉命带领全排参加攻打新集的战斗。新集守军有坚固的工事，防守很严。杜义德带领全排挖地道至新集城下，埋设了一口装满炸药的棺材，一下子把城墙炸开3米多宽的口子。激战中，他的臂部负伤，但仍然坚持战斗，直到取得胜利。这年，他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杜义德升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机枪连连长。红四军在南下作战中，势如破竹，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城，有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并缴获和筹集银圆7万元，黄金20余斤，白银1600余斤。在这次战斗中，杜义德率机枪连多次完成了突击任务。同年底，杜义德升任第三十团三营政治教导员。

燎原的星火

在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蔡吴湾村口的小山坡上，有一座吴光浩烈士陵园。陵园庄严肃穆，青松翠柏掩映下，烈士墓静静伫立，上半部分的花岗岩上镶有烈士的半身浮雕像，依稀可见烈士当年的英姿；下半部分的石碑上镌刻着烈士生平。看到“牺牲时年仅23岁”的碑文，在场者无不为之惋惜。

吴光浩，原名光皓，曾化名陈新，1906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三合店蔡吴家湾。他年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由于家道清贫，他六七岁就不得不随兄长干些简单农活，直到1914年才进入本湾附近的灵驾庵读私塾和初小，1921年考入三合店大余家湾自进小学读高小。少年时代的吴光浩正直、勇敢、聪明、活泼，除完成各门功课的学习外，还特别喜欢武术。1925年五卅运动的反帝斗争高潮影响到



吴光浩



黄陂，吴光浩和进步同学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进行了街头宣传和张贴标语等革命活动。

五卅运动后，吴光浩考入黄埔军校，经过一段入伍训练后，正式编为第三期学员。在这所充满革命气氛的熔炉里，吴光浩努力学习革命理论、阅读进步书刊，刻苦钻研古今兵法，积极参加军事操练，眼界为之一新。他和进步同学交往甚密，并积极参加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各种活动，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192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吴光浩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同年5月，广东国民政府派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吴光浩随叶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并任连长。国民革命军在攻克武昌后进行扩编，吴光浩因屡建战功，被提升为营长。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鄂南的咸宁和鄂东的黄安、麻城等县举行秋收暴动。吴光浩被省委派往鄂南，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9月10日深夜，吴光浩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汀泗桥，截断了武汉至长沙的铁路交通，给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地方当局紧急调兵于12日赶到鄂南，与当地反动武装合流，共同镇压起义军。在这危急形势下，吴光浩率领起义军沉着应战，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9月下旬起义失败。

中共湖北省委认真总结了鄂南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中共掌握了一定武装力量而且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黄安、麻城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0月初，省委派吴光浩、王志仁、刘镇一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黄麻地区，与当地党的领导同志汇合，改组中共黄安县委，组织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黄安、麻城两县的武装起义。吴光浩被推为特委委员兼麻城县自卫军大队长。

11月初，吴光浩参与领导了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的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确定以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为骨干，武装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会议还制定了暴动计划，部署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决定巩固

和发展工农运动，加紧对有组织的农民进行军事训练，产生了由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吴焕先等组成的起义总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并负责组织和领导攻城突击队的工作。

11月13日凌晨，起义拉开序幕，吴光浩率领突击队攻城，攻占敌军城防驻地火王庙、县衙等要地，抓获知事贺守忠和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多人。农民自卫军进城以后，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1月18日，在中共鄂东特委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同时，鄂东特委还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将起义的农民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黄麻起义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鄂豫边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国民党新军阀也恐慌万分。为了扼杀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于摇篮之中，国民党反动派立即调动十二军教导师，于12月5日夜，向黄安县城发动突然袭击。起义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因寡不敌众，解放了21天的黄安城终于被敌攻陷，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和许多革命志士壮烈牺牲，吴光浩带着少数同志突出了重围。

国民党军占领黄安县城后，又乘势占领了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大肆烧杀抢掠。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吴焕先等于12月下旬在黄安北乡的木城寨举行会议，总结黄安失利的经验教训，认真探讨坚持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从挫折中开始懂得了依靠农村进行游击战争的必要性。为了避敌锋芒、保存和积蓄力量，会议决定留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大部分武装由吴光浩率领转移到黄陂北部的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他的坚持和率领下，这支革命队伍继续高举革命的红旗，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战胜重重困难，于12月29日胜利到达木兰山，开始了以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活动。

吴光浩到木兰山不久，同村的乡亲就给他送来了一封家信，说他母亲病危，要他马上回家探望。吴光浩回到家里，方知是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全，骗他回家成亲。吴光浩一心想在木兰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便以外出理发为名，当天就返回部队。他坚定



的革命意志，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1928年元旦，吴光浩与戴克敏、汪奠川等在山上的玉皇阁举行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军中建立了党委会，吴光浩任军长兼党委委员，戴克敏为党代表，汪奠川为参谋长。这次改编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对于创立一支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具有重要意义。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经过一段休整后，在木兰山周围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发动群众，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地主豪绅及其反动武装。

4月初，国民党军第十八军与第十二军发生冲突，十二军从黄麻地区撤回河南。吴光浩乘敌军撤走之机，立即率部返回黄麻老区，消灭了长冲、二道桥、长塘边、谭畈河、料棚等地地主豪绅的反动民团。接着，他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同敌人进行公开的、秘密的斗争，不断给敌人以新的打击。群众兴奋地称这次胜利为二月暴动。

工农革命军取得的胜利，使敌人惶恐不安。敌十八军一部旋即进入黄麻地区，到处设立据点，实行严密的控制和“清剿”。工农革命军在吴光浩等的领导下，与强敌进行艰苦的战斗，常常是一日数迁，处境十分困难。他们根据几个月来的游击战争经验，深深感到仅凭流动式的单纯游击活动，难以维持长期武装斗争，迫切需要一个比较稳固的休整部队和坚持对敌斗争的根据地。与黄安、麻城毗连的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今属河南新县），地处鄂豫两省三县的交界处，是河南、湖北军阀割据的空隙地带，地形险要，而且当地群众深受农民运动的影响，积极要求革命，有许多便于活动的条件。吴光浩和中共鄂东特委的领导同志于5月间在黄安紫云区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开辟柴山保根据地。会后，吴光浩率领第七军于6月间进驻柴山保地区。从此，鄂豫边的党和红军开始走上了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进入柴山保以后，河南的敌军奔袭而来。部队在吴光浩的领导下，利用有利的地形，发动和依靠群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站稳了脚跟。此后，第七军采取时聚时散、南北配合，既开辟新区又支持老区人民斗争的正确策略，使这块新生的红色根据地得

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巩固。

7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根据上级指示，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10月，重组中共鄂东特委，吴光浩被选为特委常委，负责军事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否决了把特委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机关放在白区的意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这期间，吴光浩领导部队先后在天台山韩家老屋等地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支持和掩护了鄂豫边区地方工作的开展。1929年2月，国民党第十八军两个团向柴山保地区进犯，鄂东南的国民党军在北面堵截。吴光浩带领部队分三路突出包围，向南面敌人的侧后方进击，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攻。接着，他又亲自率师部特务队深入到黄安县城以南，一举歼灭了高桥河的“清乡团”，缴枪24支。3、4月间，蒋介石和桂系军阀进行了争权夺利的战争，桂系的第十八军从柴山保根据地周围调走。吴光浩指挥刚改编的红十一军三十师和地方赤卫队，乘机向反动地方武装进攻，消灭了黄安、麻城等地的多股反动民团。一次，他亲自率领一个小队，化装进入麻城南部之歧亭，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活捉了四个土豪劣绅，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有一次，他于深夜率部来到麻城一民团驻地，先布置少数人在周围鸣枪，虚张声势，他自己则带着部分战士拖着四个秤锤在街上来回跑，并大声叫喊：“穷苦人不要怕，我们共产党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秤锤在街上的石板上撞击发出像马蹄似的“哒、哒、哒”的声音，民团团丁被吓得仓皇逃跑，吴光浩等顺利地收缴了20余支枪，安然返回驻地。

吴光浩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也十分关注，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柴山保为立足点，指挥部队铲除了周围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帮助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中，他非常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带领战士写标语、贴传单，帮助群众犁田、车水、打柴，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保卫革命根据地的热情，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29年4月，中共鄂东特委为制定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召开了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三十一师党委联席会议，确定改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吴光浩仍担任特委军事委员；会议还决定把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河南省的商（城）南，并立即组织商南的武装起义。会后，中共鄂东北特委派吴光浩去商南与红三十二师一起组织起义。5月初，吴光浩带十余人化装前往商南，途经湖北罗田县滕家堡时，突然遭到反动民团的包围袭击。吴光浩坚定沉着地指挥大家投入战斗，不幸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时年23岁。

（武汉长江新区发展改革局 芮 鹏）

红色堡垒

保福祠支部的斗争

保福祠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南部，原为早年的一座公祠。由于远离城镇，加之湖匪猖獗，此地历朝民不聊生。1916年时，经开明绅士张念之倡导，化凌去乱，将原本杂陈的几家鱼行、肉肆、油坊、布店、杂货铺……排居列户，遵序成街。20世纪初叶的保福祠不再专指那座古祠，而是以保福祠为圆点、约20千米为半径，面积大致为1200平方千米的一片“红区”，俗称保福祠地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武汉，血雨腥风遍及山乡。这天，一位30多岁的游子，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保福祠。只见他一身长衫，目光坚毅，神情机警，看穿着打扮似乎是位教书先生。他其实就是中共保福祠地区农村党组织的创建者——葛达。

葛达原名开达，号履五，化名臧新群，1892年出生于江夏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保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幼读私塾，后当塾师。1923年，葛达在武昌担任承法吏时，常与共产党员钱介磐往来于勾庭中学，参加董必武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葛达在大屋葛村组建了中共保福祠支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在1927年8月——1931年4月期间，保福祠



葛达



支部名称几经变革，先后有中共保福祠支部、中共保福祠特别支部、中共保福祠行动委员会、中共保福祠分区委员会等）。1927年1月，葛达奉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兼任国民党武昌县党部执行委员、山坡区党部常务委员。他利用合法身份组织农民协会创办信用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清算或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解决贫苦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后，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人民为敌。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人民武装，收缴枪支弹药，捣毁农民协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协会会员。此时，葛达根据党组织指示回乡转入地下斗争。回乡后，他召开党员秘密会议，会上推选出葛达、陈英、左豪等人组成党支部委员会。为了适应隐蔽斗争，将党支部改为代号谐音“鲍福之”，并将原农民协会消费合作社改为利民商店，作为支部、农会、自卫军秘密开会和联络的地点，开展秘密活动。

此时的保福祠，环境极端险恶，葛达从事地下斗争，出生入死，经常被敌人监视跟踪，有时亲戚朋友对他不理解，劝他不要干革命了，去教书过个清闲日子，但他不为所动，信仰坚定，革命斗志丝毫不减，并写下了一首七律，以表明矢志革命的心迹，诗云：

罪孽难招自首因，不甘枉尺直由寻。
况当万里难投止，何忍千家野哭频？
耳际风狂益惨厉，心头热血更翻腾。
雪封世界任它白，我信人间总有春。

党的八七会议作出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重大决策，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1927年冬末和次年春，上级党组织先后几次派人来保福祠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从此，保福祠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人民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组建农民武装——进击大队，开展扩红，抢枪筹款，袭击联防团，惩办土豪劣绅，破坏铁路交通等，积极支援苏区，配合了红军作战。其中，支援鄂南秋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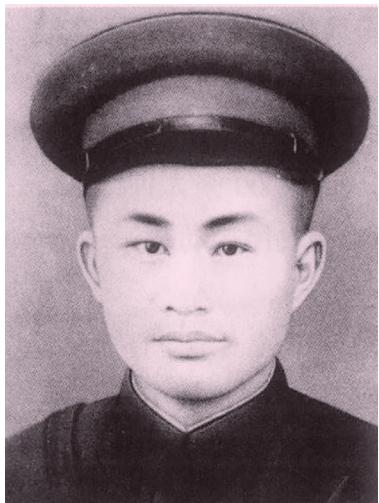
暴动是保福祠党组织在这一时期的一次重要活动。

1927年9月8日，省委农民部负责人黄大全、邓雅声带数名徐家棚铁路工人到山坡、保福祠地区，成立指挥暴动的中共山坡特别委员会，吴秉钧任书记。并以保福祠特别支部27名党员为骨干，以大革命时期保存下来的18支长枪、3支短枪为基础，组建了一支数百人的农军，作为暴动的基本力量。

9月9日，鄂南暴动开始，保福祠特别支部积极配合。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葛达等人带领党员和农民群众，穿过湖汊，越过小山，到了粤汉铁路山坡至贺胜桥段。这里是国民党从长沙往武汉运军需物资的重要干线，他们摸黑破坏了1.5公里长的铁路，即切断电线，砍断电杆，断绝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通信联络与交通运输，迫使粤汉铁路瘫痪一星期之久，给鄂南暴动以有力支持。

鄂南暴动失败后，武昌国民党当局和地主阶级进行疯狂反扑。1927年9月的一天，党、农会、自卫军等主要领导人葛达、葛震寰、左豪等人正在利民商店商讨防止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和白匪军偷袭时，突然原团防局团总韩相卿引来国民党十三军一部包围保福祠利民商店。敌我双方交火一阵后，因敌众我寡，不宜久战，与会人员当即决定由葛震寰正面牵制敌人，掩护大家安全撤退。葛震寰完成掩护任务后，携带文件、枪支越墙突围，不幸跌成重伤，忍痛爬至山林中埋好文件、枪支，因伤势过重，于1928年2月牺牲。

葛震寰，原名宏时，又名敬授，1892年出生于武汉市江夏区保福乡。1924年到武汉勺庭中学读书，直接受到董必武等的思想影响，1925年秋，葛震寰由葛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葛震寰由党组织介绍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次年春因病返鄂，经组织安排任湖北省临时农民



葛震寰



协会常务委员。不久，葛震寰回乡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主张，介绍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情况，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先后发展陈英、左豪等入党。同年8月15日，葛震寰在保福祠召开千人大会，成立保福乡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斗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破除封建迷信，并率先动员其父兄将私产（葛永兴杂货铺）交给农会，办供销合作社。当时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信革命真，就看葛永兴，加入农协会，去当自卫军。”北伐军攻打贺胜桥，党组织派葛震寰率保福祠农民自卫军数十人，抬土炮，拿鸟枪、大刀等配合作战，袭扰敌后方，后又随北伐军攻打武昌城。1927年初，他参加了国民党的全县党代表大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在山坡区农协组织了2000余人进行讨蒋游行示威。4月底，湖北省农协会任他为农民运动特派员，赴应山县农运讲习所任中队长。大革命失败后，葛震寰返回保福祠，组织党员转入地下斗争。

利民商店遭到偷袭的次日，韩相卿纠合原团防局头目卢吉成等组成“清乡团”，自任“团总”，扬言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他们掠走保福祠经济、消费合作社全部资财，洗劫周边百余个村庄。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清晨，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韩相卿带领抓捕左豪未遂，当即将其弟左玉成扣押作为人质，另一路由卢吉成带领到下门陈搜捕陈英。陈英在党员和群众巧妙周旋下脱险逃走，星夜赴汉，找到在武汉的涂康民，令其速返保福祠通知13名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转移隐蔽。其间，农会主席涂玉亭，自卫军队长涂元德（一说陈元德）先后被捕遭到枪杀，同时遇害群众十余人。武昌城镇和农村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驻扎在保福祠的十三军匪徒撤走后，9月18日凌晨，保福祠特别支部带领小股地下武装，分头将地头蛇“清乡团”全部捕获，当即处决了团总韩相卿。团丁舒天元等交枪发誓不再与人民为敌。另一团总卢吉成被捉后向被害烈士披麻戴孝，准备次日处决，因看守不严，卢吉成逃至丛林中，惊恐而死。

白色恐怖下保福祠第一回合斗争结束。尽管革命者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是镇压了地头蛇，瓦解了“清乡团”和土豪劣绅，提高了党领导地下斗争的水平，为以后的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

在坚持斗争的过程中，保福祠地区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组建地下武装，以增强党的力量。1928年春，由葛达主持在梁湖葛雄村召开了党员大会。大会决定：一是发展党组织。吸收葛震寰烈士的长子葛运福和积极参加地下斗争的汪家淦入党，使保福祠地区党员发展到42人，除在对敌斗争中光荣牺牲5人外，还有37名同志继续坚持斗争。二是组建地下武装。葛达、陈英、左豪等在保福祠和涂家垸两地发展武装80余人，组成进击大队，由陈英和左豪领导，其任务是袭击联防团，收缴枪支，打击土豪劣绅，筹集资金支援红军。5月，支部与中共鄂东特别委员会取得联系，虽未与之建立隶属关系，但工作上接受其指导。

此后，保福祠支部数次历险，其中一次是1929年李济遥叛党事件。李济遥原为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当局县教育局长。他在武昌被敌警备司令部逮捕，很快叛敌投降，带领武汉警备司令部武装匪徒一百余人窜到保福祠搜捕共产党员，声称缴枪械方可保命。保福祠地下党组织得到信息，提前隐蔽，进击大队化整为零，四处鸣枪，吓得武装匪徒惊慌而逃。

还有一次就是1931年的“林林春”药铺遭破坏事件。此事件后，自1931年4月至1935年冬，保福祠地区地下党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土地革命时期，保福祠共产党组织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领导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活动范围涉及江夏南部各乡，大大鼓舞了广大劳苦群众对敌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支援了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战争，为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条件，也扩大了党在当地乃至鄂南的影响。这个地处偏远的农村党支部，领导保福祠地区英雄儿女，在革命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一部壮丽的史诗。

“林林春”药铺的秘密

1930年春寒料峭，保福祠有一家小小的“林林春”药铺开张了。路人纷纷驻足观望，很快就有人认出了站在门口拱手迎客的是当地知名人士张



念之先生，而柜台里站着一个手脚轻快的年轻小伙。先说说这二位经营者的身份。张念之先生作为读书人，却“兼职”当了药铺的老板，一面教书一面经营药铺，实际上是为党的地下工作做掩护。年轻小伙名叫涂康民，是保福乡大屋涂村人，曾经在杂货铺帮工当学徒，后来学医，1926年就参加了保福祠农民协会领导下的童子军，是保福祠童子军的负责人之一，也是一名共青团员，受组织派遣经营这家药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板张念之先生，虽不是共产党员，却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张念之名光祖，1882年出生于江夏县保福乡，是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直致力于造福乡梓，为家乡办了不少好事，如创建保福街，捐平民教育基金，募捐重修和尚桥，创办了山坡完全小学、勤思中学，在保福街周围植树造林，创办本乡合作社，等等。他以教育为生，在当时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私塾教学中，能增加时事教育，将新知识融于课程讲义中，使学生接受新思想，关心国事，力求上进。该塾馆学生曾一次考入湖北法政学堂达十余人。张念之先生思想开明，1927年初他参加了当时还未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日益反动，汪、蒋同流合污，在1928年国民党举行总登记时，他没有去登记而脱离了国民党，以后思想逐渐倾向共产党。他的很多亲人（包括女儿）、挚友和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他还积极保护了他的学生——共产党人陈英、左豪。

中共保福祠特别支部的陈英、左豪带领农民军处死了地主武装“清乡团”团总韩相卿后，韩相卿的儿子韩学庠于1927年10月勾结国民党十三军一个连到保福祠“为父报仇”，扬言要抓共产党杀头示众。韩学庠一行人召集土豪乡绅，追查“凶手”，到会者都闪烁其词，不吐实情。但韩学庠追查很紧，大家又怕遭杀身之祸，一时形势十分危急。

张念之挺身而出，出面周旋，先是安排酒肉筵席应酬官兵。他对国民党军周连长说：“韩相卿之死，是‘宗族仇杀’，不是国共两党的干戈，此事不必劳驾国军。”同时规劝也是他学生的韩学庠，晓以大义：“宗族矛盾，宜解不宜结，你杀来，他杀去，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你还要

看远些。”张念之夫人卢氏拿出了多年积存的全部金首饰，连头上所戴的发钗耳环都卸下，共值四百块银圆，统统交给张念之，塞给了国民党军连长。周连长得了如此“重金”，又有了向上级交差的理由，便借口有紧急任务收兵回营了。韩学庠被迫放弃恶念，饭后匪军就撤离了保福祠。陈英、左豪二人这才得以脱险。

在“林林春”药铺成立一年里，经常会有些神秘人物进进出出，有的借抓药之机传递情报，有的抓药时会进入后堂商量党的秘密工作。表面看“林林春”药真价廉医道好，为求医购药的人解除了痛苦，特别是无钱治病买药的贫苦人都到这里来，既治好了病还听到了好多令穷苦人高兴的消息。其实“林林春”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以行医卖药掩护革命活动。“林林春”药铺背后的神秘人物就是当时保福地区党组织负责人陈英、左豪等人。他们经常出入药铺，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其中左豪担任“林林春”药铺地下联络员。

陈英又名陈国华，1902年出生于江夏县保福乡。左豪又名素文、裕荣、甘棠，1903年出生于江夏县保福乡，与陈英是私塾同学，后在保福祠教私塾。1925年春，左豪考入河南建国军官学校学习，同年秋弃学回保福祠。

1926年春，经葛达等人介绍，陈英、左豪二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二人昔日的同学、如今的战友同生共死干革命的红色征程！在保福祠党史册上，这两位英雄的名字总是联袂出现，可谓是“保福双雄”。

中共保福党支部成立后，又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保福祠支部，左豪任书记，



陈英画像



左豪画像



发展团员 30 余人，其中有涂康民等人，从事农运斗争。1926 年，在北伐军攻打贺胜桥时，陈英、左豪一起破坏铁路、割电话线，冲锋在前。在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战斗中，他们一起组织农民给北伐军端茶送水、救护伤员，以至直接参加战斗。10 月，保福祠成立农民协会，陈英、左豪均当选为农协会常务委员。

1927 年初，陈英任国民党山坡区党部宣传部长，左豪任青年部长。不久，二人当选为国民党武昌县党部执行委员，负责农运中处理雇工、牧童、逆产等工作，并督查禁烟、禁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英、左豪不仅没有畏缩，反而越战越勇。1929 年春至 1931 年 4 月，陈英历任保福祠支部书记、保福祠分区委员会书记，左豪、徐春荣等人为委员。“林林春”药铺正是在此期间建立起来。在此期间，他们接待了红军联络员高盛德，秘密组织多次革命行动。如捉拿地主蒋义太、韩金茂，迫使他们缴枪交款等。

1929 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师活动于大冶县金牛镇一带。大冶中心县委派交通员高盛德、夏龙飞、丁贵芬到保福祠向地下党传达搞枪筹款支援红军的指示。陈英、左豪等同志带领进击大队，昼伏夜出，捉拿了地主兼资本家蒋义太、韩金茂，迫使其交出步枪 8 支、银圆数千元，由高盛德、夏龙飞、丁贵芬用船运送交红三师。同时输送青年葛鹏程、陈焕章、葛庆甫等 11 人参加红军，有力地支援了湘鄂赣红军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7 月，为配合红军进攻长沙，陈英、左豪等人和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地下武装人员炸毁粤汉铁路桥梁 1 座，在小板桥一带挖铁路、剪电线、砍电杆，切断敌人对长沙的通信和运输线。

“林林春”药铺营业一年后，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1 年 3 月 21 日，“林林春”药铺外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地主吴传学带领下，荷枪实弹的敌宪兵队冲进了药铺，正在药铺中商议地下工作的中共保福祠分区委员会书记陈英、区委委员左豪和徐杰不幸被捕（即分区三名委员全部被捕）。

“林林春”药铺的暴露，起因是分区委员会书记陈英带领地下武装到

湖泗张桥捉拿了地主吴传学。由于看守不慎，吴传学越墙逃跑到武汉，并引来国民党宪兵包围“林林春”药铺抓人。陈英、左豪二人先遭省保安队逮捕，后转送武汉警备司令部。在狱中，他们遭受严刑拷打，伤痕累累，但拒不透露党的秘密。他们一面坚持向难友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与敌人开展斗争；一面做好牺牲准备，向党组织表示：“大丈夫视死如归，决不会给党丢脸。”陈英在监狱的墙上刻下了大义凛然的誓言：“剖心挖眼或砍头，十字架前用火烧。中外古今不屈者，正义参天史册标。大好头颅你来砍，我誓死亦为共产。”左豪对探监的老母说：“儿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只是不能亲自参加完成革命大事。儿死后，要把儿埋葬在保福祠后山上，看到全人类的解放、革命的胜利……”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涂文卿和张念之先生设法营救未果。

1931年4月的一天，武昌汉阳门刑场，天灰蒙蒙的，两位因酷刑本已伤痕累累的共产党员陈英、左豪，被敌人残忍地用铁丝穿透肩胛锁骨，押下囚车。鲜血随着两人每一步艰难的走动滴落在地上，见者痛心落泪。但见这二人毫无惧色，一路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昂首阔步走上刑场，慷慨就义。

陈英、左豪牺牲后，遗体葬在保福祠后山上。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有着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又因共同的信仰而成为战友，最后一同牺牲，同时用生命实现了各自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林林春”事件后，当地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敌人在武昌南乡建立了反共联防网，成立了保福祠联保处，加强了保甲统治。党的负责人葛达在敌人搜捕下离开保福祠。其余党员也隐蔽下来。

1931年冬葛达返回家乡，与其他同志秘密商量后，决定在革命处于低潮、反动势力猖獗的形势下，要利用各种合法渠道，展开隐蔽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重建联络站，开展地下秘密活动。1932年夏，葛达、韩佐卿等商定并征得张念之先生同意，重建联络站，将“林林春”药铺改名为“涂普康”药铺，由涂康民（其爱人柳树梅当时也是地下党员）主持营业，迁往山坡继续掩护革命活动。



星火燎原燃梅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南等地暴动的星星之火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在鄂南播下的火种汇聚成炬，形成了燎原之势。以湖北大冶县、阳新县、通山县为中心的鄂东南苏区逐渐连成一片。紧靠大冶的武昌县梅林、王班苏区，在共产党员吴多寿、祝隆美等人的奔走活动下建立发展起来，成为湘鄂赣苏区组成部分。

吴多寿生于1908年，江夏县舒安街燎原村吴月常湾人。1927年秋，吴多寿在湖北阳新县龙港的鄂城子谭庙等地活动。同年冬，共产党员徐宏晨任武鄂地区地方工作大队队长，以教书为掩护，在武鄂边界的梅林、涂镇等地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7月初，湖北省委特派员吴致民委派吴多寿回家乡梅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进而筹建苏维埃政府。同期，大冶中心县委指示徐宏晨与吴多寿联系并协助其开展工作。吴、徐二人串联当地共产党员刘光福、易国卿、李卿安、颜永祥、陈立善、陈宜耀、易余庆、王开厚8人，又同洪湖游击队派回梅林的余祥林、易已亥、吴清耀、易学惠、陈孔云等人接上关系，并经过慎重考察吸收易锦超等13人入党，还指派易锦超等人经常去分水、瓦窑、熊祠、何堰等地以贴标语等形式宣传革命。



吴多寿画像

1928年8月上旬，吴多寿等党员骨干在梅林庙附近的吴月常村吴学书家成立了武昌县梅林区苏维埃，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昌县南乡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吴多寿任区委书记，颜永祥兼任组织委员，王开厚任宣传委员。徐宏晨、颜永祥分别任区苏维埃正、副主席，刘光福任秘书。

9月上旬，梅林区苏维埃政府在玉皇阁庙召开民众大会，到会民众1200余人。吴多寿、徐宏晨在会上作热情洋溢的讲演，号召农民起来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积

极参加赤卫队，保卫苏维埃政权。省农会派来的女代表张素兰宣讲共产党和红军的路线、方针、政策。到会民众受到了极大鼓舞，纷纷表示拥护苏维埃，拥护共产党，并踊跃报名参加农会、妇女协会等革命团体。

在发动并组织民众的同时，梅林区苏维埃组建人民武装赤卫队。历经月余，区苏维埃发展赤卫队员百余人。赤卫队分编为3个分队，吴多寿兼赤卫队长，区委委员易余庆，陈宜和、颜茂友分别任第一、二、三分队长，并从梅林地区各村湾收集鸟枪72支用于装备赤卫队。

有了农民自己的武装，区苏维埃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沉重打击了当地封建势力。

吴多寿率赤卫队到楼下陈湾、五墩涂湾抓获五墩团防局长涂朝阳及大土豪陈二拐（陈宜满），勒令其低头认罪，涂、陈二霸服罪，上交苏维埃政府300块银圆罚款。不久，赤卫队员在武鄂边界的上金梅湾捕获武昌三二团防局（祝祠联保）和鄂城团防局化装成乞丐的2个侦探，经吴多寿等苏维埃委员审讯属实后，就地镇压。

随后苏维埃梅林区委会决定，攻打本地区势力最强，作恶最多的反动武装组织三二团防局。吴多寿与徐宏晨商议后，派区委通讯员王开厚化装成乞丐，与原来打进三二团防局内部当局丁的张万兴、吴禄雪取得联系，掌握三二团防局布防情况。吴多寿随即制定行动方案，召开战前动员会。第二天晚上，正是轮到吴禄雪当班巡逻守夜，吴多寿挑选十名赤卫队员，悄悄摸到团防局周边隐藏，在与张万兴、吴禄雪取得联络后，大家里应外合潜进团防局武装人员睡房，趁21名兵丁酣然入梦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将摆放在靠墙枪架上的8支步枪全部取走。为了支援地方正规部队，吴多寿与全体委员商议后，随即将获取的步枪全部转交给驻谭庙湾的大冶县委手枪队。武鄂地方宣传员王成长到梅林苏区宣传苏区革命政策，吴多寿积极配合王成长的工作，与王一起动员鼓励赤卫队队员朱绍康、刘顺成等青年去大冶县花犹树湾参加军事培训班。

这年冬天，吴多寿率赤卫队先后查封、没收了徐、陈、易三姓祠堂的封建财产，没收徐让湾的徐祖启、易福湾的易进书、丁家塆湾的徐治安、



徐河湾的陈益堂等豪绅的财物，这些财物一部分充实苏维埃的财政库存，一部分分给劳苦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被梅林区苏维埃政权镇压的一些土豪劣绅潜逃至武汉市区，勾连胡宗铎、陶钧在武汉成立的湖北省“清乡”督办公署，企图还乡剿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9年底，被梅林区苏维埃政权摧毁的地方团防局死灰复燃，土豪劣绅陈益堂等回乡恢复团防局，通过“清乡”捕杀共产党人。区苏维埃党员骨干多人被捕杀，少数人在群众掩护下逃离出来。

1930年6月，武鄂地方团防势力勾结国民党武昌县保安队“围剿”梅林苏区。三二团防局的王映清率部在吴多寿的村庄吴月常湾扬言，不交出吴多寿，就把吴月常、戈林吴、江家窑、蔡家咀、新林铺五个湾村炸平，把这些湾村的五六百群众全部斩尽杀绝，并限时三天。到了第三天，敌人仍不见吴多寿的影子。于是在这五个湾村埋上炸药，将男女老少赶到湾村中央，用机枪对着，只等午时三刻下手。吴多寿听到抓不到他就会殃及众多乡亲的消息，毅然告别战友们，急匆匆踏上回家路。回到吴月常湾，吴多寿昂首挺胸走到敌人中间，大声道：“好汉做事好汉当，共产党员不怕死，把五个湾子的群众放了。”团防局把群众放了，把吴多寿绑在玉皇阁的柱子上，吴多寿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杀得了我人，灭不了我志！”随即，吴多寿被团防局王映清部所杀，群众无不落泪。

在梅林等团防局实施大屠杀时，徐宏晨、王开厚在群众掩护下逃离出来，转入地下活动。

此后，徐宏晨为恢复梅林区苏维埃积极活动。同时，红五军第五纵队派涂镇地区地下工作人员徐胄丁串联舒贞祥（舒家塆人）在梅林地区发展革命力量，并协同徐宏晨恢复梅林区苏维埃。徐宏晨任区委书记，徐胄丁任区苏维埃主席，舒贞祥任秘书。

梅林区苏维埃初步恢复后，继续发动并领导党员和农民开展打土豪、反“清乡”斗争。

梅林区苏维埃恢复不久，形势又趋恶化，武昌县、鄂城县各团防局联防捕杀共产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1930年秋，徐宏晨被国民党地方爪牙抓

到鄂城斗山杀害，区委宣传委员王开厚被梅林团防局捕获。次日刑前，母亲送来一碗鸡汤、一瓶酒。他吃鸡喝酒完毕，向豪绅和行刑的团防局长说：“杀！过20年我又是英雄好汉，要来杀你们！”王开厚被害于王家塆。至此，梅林区苏维埃不复存在。

薪火再传起王班

1930年5月至10月，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共产党员祝隆美（化名吴家升，又名周得胜）继梅林区苏维埃之后，在武（昌）、鄂（城）、大（冶）边界的王班香火堂创建武昌县南乡王班区苏维埃政府，再次点燃农民革命热情，推动王班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祝隆美1902年出生于江夏区，幼年家贫，天资聪颖，青少年时期，曾跟邻村一老道士学习道法用以谋生。在接触革命真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脱掉道袍，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上来。

1930年2月，隐蔽在王班地区的祝隆美与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后，在当地积极开展联络老党员和发展新党员工作。

5月1日，祝隆美得知红五军五纵队在阳新、大冶、鄂城等地扩编，遂与刘云卿化装成卖货农民进山，在红军驻地鄂城县马七乡刘岗村刘春甫家，向红军领导人李灿汇报王班地区地下党活动情况，根据李灿指示，吸收刘云卿入党。此

后，因红军与国民党金牛区长胡世永的地方武装交战，李灿委任祝隆美为红八军湖泗地区纵队副队长，嘱其同刘云卿回到武昌县南乡王班、梅林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组



红三军团留下的标语口号



祝隆美画像

织，建立苏维埃政权。临行时送给祝隆美一把盒子枪、几本马列著作和一些党内文件。

回到南乡王班地区后，祝隆美以道士身份作掩护开展组织宣传活动。经过秘密串联和宣传发动，党组织得到了较大发展。譬如，在王班、王班塘、王间丁等湾村先后恢复和发展了 20 余名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先后被红八军委任为地方工作队员、通讯员、联络员等。地下党力量得到充实和壮大，农民的革命信心和斗志有了一定提高。

5 月中旬，祝隆美、刘云卿在武昌、鄂城交界的王班香火堂建立王班区苏维埃政府。这是继梅林区苏维埃后创建的南乡第二个红色政权。祝隆美任区委书记，刘云卿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易国初任区委宣传委员，唐润芝任组织委员，王孔门任秘书。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组建农民赤卫队，有赤卫队员 50 余人，祝隆美任队长，龚福山任副队长，王兴田、张传连分别任第一、二分队队长。区苏维埃政府规定，每个赤卫队员开会或游行时必备一件武器，或长矛，或大刀，或鸟枪等。为了筹款买枪弹，区苏维埃组织党员和民众开展打土豪和反“清乡”斗争。

5 月下旬的一天，祝隆美带领赤卫队和积极分子 200 多人到段庄抓捕土豪柯一臣。赤卫队员打着红旗，押着柯一臣从段庄游到王班香火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3 天后，柯上交一百多担粮食抵罚款。不久，赤卫队到距区政府 10 余里的孟王湾抓捕土豪王大殿、王二殿兄弟，二王低头认罚银圆 60 块。赤卫队员不仅打击土豪劣绅，而且维护本地治安，严禁贩卖鸦片烟。区苏维埃通过斗争得来的财物分别埋藏在王班后背塆段庄曹景富家和萧胡湾对面武鄂交界的老鼠尾庄屋后。时机成熟，祝隆美时常带领赤卫队到 20 多里外的金牛镇协助鄂城，大冶等地红军打土豪，分田地。

7 月中旬一个夜晚，祝隆美带领赤卫队去团防局夺枪，摸到三二团防

局附近，一名队员被路边障碍物绊倒发出声响，哨丁熊维树鸣枪报警，引起 20 多个局丁警觉，夺枪未成。

王班区苏维埃的革命行动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三二局团总祝棠卿和土豪劣绅纷纷逃窜，鼓舞了劳苦大众的革命意志，激发了农民拥军参军的热情，壮大了王班区苏维埃政权的声威。

8 月至 9 月间，国民党军夏斗寅部在武汉重兵布防，团防局及土豪劣绅也卷土重来进行“清乡”，王班苏维埃组织遭严重摧残，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祝隆美转移至武昌城内秘密活动。

10 月 5 日，祝隆美携款找武汉地下党组织联系购枪事宜时，在汉阳门趸船被王班地区大地主胡德茂的走狗胡丹林碰见。胡告密后，祝隆美被捕获押送到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几天后，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勾结红军李灿、烧杀金牛镇并“组织共党机关”、“杀人放火”、“杀人劫物”、“劫掠团防局枪支”等罪名枪杀祝隆美于阅马场。当年《武汉警备专刊》录有“讯得该犯（吴家升）勾结红军李赞（李灿）烧杀金牛镇，并在祝家湾组织共产机关等情……复据武昌县三十六区保卫团团总祝棠卿电呈该犯劫掠保卫团枪支，请于正法等情，亟应依法处以死刑，用昭炯戒”。其间，区委成员王孔门被杀于瓦窑湾，唐润芝被杀于熊家码头，刘云卿借同村人刘子春出门办事作掩护，装病抬出哨卡，到沙市寻找党组织。

1931 年初，三二团防局反动武装拥入王班香火堂并放火焚烧香火堂。至此，王班苏区赤卫队队员大部分牺牲，王班苏区丧失，区委解体，部分人员突围前往鄂南革命根据地。

（江夏区史志研究中心 李 滢 吴国志）



浴血斗争

神秘的画师

1930年盛夏的一个上午，汉口一座公园的树荫下，一个青年画师正在为一个雇主画像，画师似乎是个爱聊天的人，逗着雇主说话，有时两人还一起哈哈大笑起来，轻松活泼的气氛中，一幅画完成，雇主拿着画像满意而去。

其实画像只是表象，画师和雇主都是伪装的，这是两个共产党人正在



在白色恐怖下化装掩护工作的任弼时

秘密接头。这位画师还经常登门入户为人画像，实际是地下党开会或密谈工作。画师时年26岁，面容却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些，相当老成持重。他来历不凡，1920年16岁就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8岁在苏联留学时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国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当选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后，他历任党内要职，经常出席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参与讨论。

1930年4月他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8月就任中共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常委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扮作画师就发生在8月以后。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五位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任弼时！

任弼时于1930年5月上旬携妻子陈琮英从上海乘客轮抵达武汉，就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后，选择在汉口里弄安家。他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配长袍，俨然是个家境小康的中国传统商人。他的住处不设党的机关，只夫妻2人住家。做生意嘛，家中有人来往正常，党内干部上门同他谈工作方便，经常需要外出做生意也正常，实际是出外开展党的工作。他到汉不久，便有湖南老家真正的亲戚数人闻讯赶来探望，热闹了几天。这样真真假假，在外人眼里就一户平常人家而已，并未引起敌人怀疑。

任弼时到汉就任省委书记后，深感党在武汉的城市工作不容乐观，党的力量距配合红军攻城、发动城市武装暴动的要求相去甚远。他带领省委领导班子作出详尽规划，深入基层特别是深入工人群众发动斗争，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努力增强党的力量。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实行空前严酷统治，白色恐怖无处不在的环境下，党的工作举步维艰。之前党的武昌区委曾连遭两次大破坏，他就任后亲自指定了新的区委书记，重建了武昌区委。然而仅仅两个月，7月份新建的武昌区委又被敌人破坏殆尽。6月中旬党的阳夏区委所辖工厂支部多被破坏，被捕20余人，多为工人干部。他还遭遇了手下两任省委秘书长先后被捕，因秘书长了解党的机密甚多，他不得不按党的规程耗费精力、财力采取措施，布置省委各机关的特别警戒。两任秘书长胡英生、冯任均严守党的机密，先后英勇牺牲，保护了省委机关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安全。

8月初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开始工作，湖北省委与长江局合并，8月内正式撤销。任弼时就任中共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常委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下，任弼时搬家了，他的家不再是家境小康的商人家，而是汉口不起眼的市井小巷中一户无人问津的城市平民之家。夫



妻两个湖南外乡人来到武汉大城市谋生，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丈夫背着画囊走街串巷为人画像，有时也顺带做行商搞点小生意。任弼时入住后，党内无任何人上门，甚至长江局几个主要负责人之间，工作上频繁接触，但彼此不知对方住在何处。妻子陈琮英是他的交通员，每日清晨以买菜为名外出与一男交通员接头，交换信息。带给任弼时的信息她从来不看，她已习惯于遵守党的纪律，在武汉这个时期，任弼时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她不都知道，也从不打听。

长江局常委4人，任弼时任常委兼管宣传，并主管接头工作。宣传工作在原湖北省委的技术机关基础上扩大，决定出三种刊物——党报《长江红旗》、工刊《省总三日刊》、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机关报，“并在各区各工厂出壁报和工厂小报”。8月下旬《长江红旗》（5日刊）第1期开始付印发行，其他刊物尚在筹备中。接头工作特别繁重而危险，代表长江总行委出面接头的只诗圃1人（诗圃为任弼时的化名），因此长江局曾要求中央再派1个负责干部来加强长江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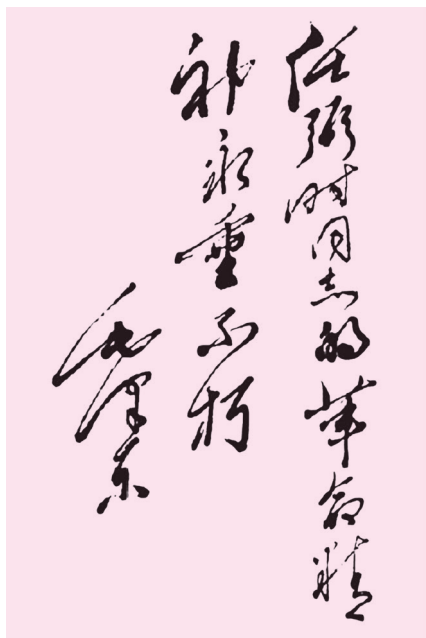
9月初任弼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主持武汉市委工作上，长江局方面只能出席会议了。新建的武汉市委工作特别繁重，而重要的接头仍需他亲自出面。据当年的汉阳区行委书记廖去恶回忆，他同任弼时有两次接头，一次是任弼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他担任阳夏区行委书记时接过头；一次是任弼时任武汉市委书记，他调任汉阳区委书记时接过头。他之前见过任弼时，一见面就知道是任，不过没有挑明。平时市委与区行委之间的指示、汇报都是书面的，通过交通员传递。

9月初长江局常委关向应被中央调往中央苏区中央局负责（时驻湘赣红军战区），长江局书记项英也于9月中旬因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赴上海（后从上海调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未回汉），在武汉的长江局常委只有任弼时、顾作霖2人，因此任弼时主持长江局工作从9月中旬直到11月7日关向应返汉。

任弼时、顾作霖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长江局管辖范围已有所变化，不再管湘、鄂、赣三省苏区工作，只管湘、鄂、赣、豫、川的白区以及这

5省未联成一片的小苏区的工作，铁路、海员工作仍“直属长江局指导”。按照9月4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武汉工作问题给长江局的信》精神，他们开始转变过去那种公开斗争方式，不再号召群众举行飞行集会、政治示威；纠正过去认为群众只要“大干”而不切实际的布置工作，开始注意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抓住被服厂、车夫、码头工人的经济诉求发动群众，取得较好效果。特别是国民党军政部设在武汉的被服厂工人为反对减少工资和发清欠薪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5个厂的同盟怠工，最后取得胜利，在斗争中该厂的党员、赤色工会会员、纠察队员都得到发展。与此同时，蒋冯阎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以蒋方获胜行将结束，蒋介石政权腾出手来实行对武汉城市的绝对严苛控制。9月下旬，党的武昌兵士委员会、汉口区行委、中央军委长江交通站（以开办华中大药房为掩护）接连遭敌破获。当任弼时得到汉口区行委书记秦了君报告，知道该区主席团成员宋惠和及交通员黄毛丫头（黄毛丫头系秦之妻）失踪时，他指示秦了君停止活动，不许回家，并安排党的情报机关打探消息。当汉口区行委整个被破坏，他于10月主持重建了党的汉口区委（党的三中全会后，取消了行动委员会）。当中央军委长江交通站被敌破获，联络站负责人贺诚逃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其妻周越华（联络站工作人员）、岳母、幼女均入狱，任弼时安排有关部门营救出狱，并向中央报告肇事者张金仞伤情，请示对其去向如何处理。

10月，由于叛徒宋惠和仍不断带敌游走大街小巷、码头车站指捕同志，长江局文书科长沈绍藩被路遇指捕。文书科是保管长江局机密文件和长江局几位负责人看文件的地方，机密性极强，任弼时常打扮成生意人模样上门找行商沈绍藩谈生意，实际上是到文书科看文件。沈绍藩是能接触长江局多数领导人的少数干部，还是任弼时主管接头工作的助手，同任接触密切。他一失踪，任弼时便高度重视，除安排警戒外，立刻向中央报告，直到10月30日沈绍藩英勇牺牲，长江局领导人和各机关安然无恙。任弼时于11月7日向中央写了沈绍藩牺牲经过的专题报告，多年后谈起沈绍藩烈士，他仍热泪盈眶，伤心不已。被宋惠和路遇指捕的还有党员干部孙良惠、吴芳等，孙良惠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负责京汉、粤汉两



毛泽东为任弼时的题词

铁路党的工作；吴芳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被捕前负责苏维埃政权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孙、吴的被捕牺牲，任弼时也向中央作了报告。

12月初，武汉市委常委陈德辉、代理书记陈洪周两天内先后失踪。因陈洪周在武汉难以立足，中央欲将其调往湖南工作，他正在办理移交。任弼时与新任市委书记尤无魂与陈洪周约好5日下午5时在某处接头，“至晚八时未到”。至7日晚两失踪者仍无消息，8日任弼时执笔写了《中共长江局关于陈德辉、洪周失踪经过及戒备措施给中央的报告》，文中还谈到7

日晚听尤无魂说汉口区印刷机关亦遭破坏。11日任弼时执笔又写了《中共长江局向中央的报告——洪周、陈德辉被捕及党、团汉口区破坏之分析》，报告陈洪周、陈德辉业已被捕牺牲，叹息“牺牲了我们极好的干部”。

武汉白色恐怖形势越来越险恶，12月中旬，长江局机关连遭破坏，甚至有一次长江局领导人开会结束刚离开5分钟，这个机关便被敌破获，任弼时等险陷罗网。

12月初，中央拟调任弼时回中央帮助总书记向忠发工作，长江局书记关向应于10日向中央写信说，弼时离开后，如把市委、海委、铁办以及各地来之人谈话交给长江局留在武汉的同志，“如何应付得了”，并鉴于当前长江局作用已不大，他建议中央暂取消长江局。

12月17日，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回，在武汉只留外交科、军委办事处与交通站。长江局管辖的各地工作由军委办事处负责，中共武汉市委独立工作。中央并通知关向应、任弼时“须尽可能于二十四日前到沪”。临行前任弼时紧急会见他原直接领导的留下坚持武汉工作的负责人，

做好善后工作，结束了他 1930 年的武汉之行。

华中大药房遇险

1930 年初，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地下党员贺诚与妻子周越华离开上海，来到武汉，在汉口法租界建立华中大药房，作为中央军委长江流域五省总交通站。

贺诚与周越华是一对革命夫妻。贺诚，四川省射洪县人，早在 1925 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改为北京医科大学）读书时，贺诚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贺诚经花县、海陆丰、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在周恩来、陈赓领导下的党中央保卫部门工作。妻子周越华是湖北广济人，早年入汉口一所女子学校读书，后投考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与一百多名姐妹编为女生连，并在军校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过广州起义和红四师在海陆丰的斗争，并辗转香港等地，后来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上海时为了便于工作，党组织批准贺诚同周越华结婚。

华中大药房是中央军委同长江流域五省红军之间的重要联络点，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秘书长曾希圣与大药房进行直接联系。从五省红军来的同志通过这里与中央军委接通关系，许多党内重要文件通过这里传递给五省红军根据地，红军需要的药品器械和其他物资由大药房采买并千方百计送到各革命区。党的指示通过曾希圣同志口头传达或用药房的业务函件秘密传递。因工作任务重，党组织以雇员身份给贺诚派了一个助手小江。小江的父母亲都是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被敌人杀害，他是由党组织抚养长大的。

华中大药房建立不久，周越华生了女儿贺晓华，贺诚特意从老家将岳母接来，帮忙操持家务。岳父也时常过来探望，送些土特产，一家人其乐融融。助手小江非常勤快，将药房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意也不错。由于药房本身往来的人员各色各样，这个地下联络点隐蔽性非常强。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国民党军警宪特密布大街小巷，交通站开展工作十分危险，周越华同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越华对党的



事业忠心耿耿，在工作中胆大心细，从容不迫，既有在上海达生医院的工作经验，又对武汉三镇情况比较熟悉，工作十分出色。她多次甩掉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准确及时地将党的文件、指示送到指定地点。

任弼时到达武汉后，立即同贺诚取得联系，并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到大药房布置工作。他作风踏实，办事谨慎，如到什么地方采办药品器械，如何送出，可能发生的问题等等，都一一交代清楚。办了几次事后，他发现贺诚很有办法，连连称赞。

1930年8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央规定，鄂、湘、赣、川、豫省委和长江局建立直接关系，鄂、湘、赣、川的红军和士兵运动由长江局军委指挥，辖区内红军各前委、军委、师委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交通站归属长江局军委领导。关向应、刘伯承先后任长江局军委书记，刘云是长江局军委参谋长，是总交通站的直接领导，也常到大药房听取工作汇报，指示工作。但关向应不久调离武汉，刘云9月2日被捕，刘伯承于9月2日来汉，且驻汉川军中熟人很多，因此，来大药房部署工作最多的还是任弼时。

由于贺诚做事谨慎，总交通站的工作一直顺利进行。但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导致华中大药房被破坏。

1930年9月26日下午5时许，贺诚正在柜台清理账目，突然，长江局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兵士运动委员会书记张金仞（即张慕陶）带着一个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和两个便衣特务来到大药房，神色十分紧张，对贺诚说这是他的朋友，有重要事情商量，需要帮忙。贺诚知道这几个国民党特务是打算抓捕张金仞的，便问需要多少钱解决，



贺诚与周越华

一个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和两个便衣特务来到大药房，神色十分紧张，对贺诚说这是他的朋友，有重要事情商量，需要帮忙。贺诚知道这几个国民党特务是打算抓捕张金仞的，便问需要多少钱解决，

并约军官到另外一室相商。得知需要 10 万元，而且是张金仞同意了，贺诚暗暗吃惊，依旧镇定地说：我这个小小的铺面，哪有那么多的钱，就是榨骨熬油也拿不出来的。他从柜子里拿出仅有的 1800 元塞到那个军官手中，说“望诸位多多关照”。但国民党军官仍然坚持要将张金仞带走，诡称他们一共有 6 个人，其他 3 人肯定不会相信只有 1800 元钱，必须要张金仞去一下作个证明。

国民党军官说完，就把自己的名片递给贺诚，作为收条，然后专心点钞票，还准备再讨价还价。正在此时，张金仞乘机逃跑，先是由后堂下楼被阻，然后由二楼阳台跳下去，经街面逃走了。国民党军官立即追去，开枪射击。贺诚见情况突变，立即从后门逃出。

华中大药房后面有家商行，此时正在举行开业典礼，鞭炮声声，宾客如流。枪声传来，人群立时骚动，贺诚则乘机混入人群之中，进入店内。他待了一会儿再出来，发现街上还在搜捕。这时有个富户家中一位佣人模样的老太太出来泼水，贺诚向她点头示意。老太太把他引进家里，递水递烟，让他暂且休息一会儿。等到大街上平静下来，国民党军警离去后，贺诚才匆匆赶往江边码头，准备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贺诚走得仓促，身无分文，又不能回家取钱，搜寻一阵，发现有一张上海某大商行经理的名片，他灵机一动，想到了办法。他大摇大摆地登上去往上海的客船，将那张精美的名片在茶房眼前晃了一晃，傲气十足地说有急事要去上海，行李待会儿有人送来。茶房见贺诚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气度不凡，俨然是一位上海大亨，立即点头哈腰，满面笑容，把他安排到头等舱里去了。等到开船，他又佯装生气，大骂道：“该死！一群饭桶，船都开了，行李还没送来。”茶坊反而劝道：“先生，莫生气，这些下人有几个会做事的！”就这样，贺诚一文未花，不仅受到热情款待，还安全地抵达了上海。临下船时，他又掏出那张名片，要茶房到他府上去结账。茶房连连称是，竟恭恭敬敬地把他送上码头。

到上海后，贺诚住在朋友家，就张金仞违反秘密工作纪律被追捕，致使华中大药房被破坏的经过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中央决定给张金仞以严



重警告处分。

贺诚逃脱后，周越华、周母、小江三人连同婴儿贺晓华一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同时法国领事馆以武汉警备司令部军人在租界内开枪，侵害了租界治外法权为由，向武汉警备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张金仞已经逃走，武汉警备司令部因交不出人证，加上军官私下受贿，留下了名片作证据，生怕事情败露被追查，只好声称是误会，向法国领事馆道歉。

华中大药房枪响之时，刘伯承正在附近党的秘密机关做事，他判断华中大药房已经出事了，迅速进行了善后处置，事态没有再扩大。他通过党的地下关系，由党组织出钱，指派有公开身份的同志作保，积极营救周越华等人。由于周越华同志被捕前迅速处理了党的秘密文件，法国巡捕房没有拿到实质证据。加上周越华坚称自己就是个药房主妇，身份上无懈可击，巡捕房只好将她及家人无罪释放。

空军英烈墙第一人

坐落于北京北郊的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有一面空军英烈墙，那上面有1776个鲜红的名字深深镌刻在花岗岩墙体上。那一行行英雄的名字，标定了空军精神的制高点。排在名单首位的烈士就是刘云，他是党从事飞行事业的标志性人物，既是党内牺牲的第一位飞行员，也是党培养的第一名飞行员，还是党内最早驾机作战的军人。

刘云是湖南省宜章县人，原名刘可炳，由于决心立志献身于航空事业，改名刘云。1919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入法尔曼飞机工厂。1921年考入该厂附设的飞行学校。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不久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刘云是这个组织较早的成员之一。1923年回国后入广州西江陆军讲武堂，同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6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大元帅府航空局军事飞机学校的教务主任兼党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飞行员。9月，受广州国民政府委派，刘云与唐铎等5人一道赴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1926年冬，转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

院（陆军大学）中国班学习，并担任中国班班长。1928年6月，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了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30年6月，即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之际，接到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派他立即回国的命令，他毅然中断学业，告别新婚的苏联妻子，与刘伯承、左权等人一起取道海参崴，经哈尔滨到达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



刘云

不久，刘云受中央军委派遣，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参谋长。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他先后化名刘志明、李志浩、宋推，以商人、教员等身份作掩护，出入武汉三镇，积极进行革命工作。

8月，他接到中共中央要他迅速将鄂东南武装部队组成红二十五军，准备进攻武汉的命令，随即冒着风险，勘察地形，绘制路线，制定暴动计划，以便接应红军。他秘密到黄陂横店去见国民党武汉要塞堡垒营营长刘立青，部署工作。刘立青于1930年5月入党，是地下党员。

据刘立青回忆说：“我那时同刘云接触较多，每个礼拜见一两次面。刘云在武汉工作可能两个月就牺牲了。刘云还到我的要塞去看过，观察地形，研究打起来时我们如何与红军联络等。还研究红军来时如何通过要塞的铁丝网，我们决定在铁丝网多开口子，开大口子。后来

陸軍軍官學校詳細調查表									
姓名	年 歲	籍貫及住址	通 信 處	家 族	家庭主要職業	家庭生活狀況	專門技能或特長	有無烟酒嗜好	有無宗教信仰
劉 雲	二十四歲	湖南宜章縣包龍堡車田村	湖南衡石均和安亭	父母兄弟一人姊妹二人 子妻姓名周	農商	中 田屋二十餘畝	航空術	會	會

刘云入黄埔军校时填写的调查表



我借口四周有田地，为便于老百姓种田通行方便，而开了几个大口子，平时关起来，准备红军来时再打开。我曾对刘云说过，我们里应的力量太小（整个武汉能掌握的就我的部队，我的营里，能真正完全掌握的还只有机关枪连），无法对付城内敌人。刘云说，你在国民党军队中，官做得越大越好，有了权，就可以便利我们。”

刘云刚到武汉时住在德租界长江局军委机关，后因长期住军委机关不合适，应另寻个人住处，便暂时移住亚洲旅社。长江局军委秘书长曾希圣帮刘云找好新的住处，约好9月2日下午3时到亚洲旅社见刘云送住处保单，结果未遇，当晚9时曾希圣又到亚洲旅社接头仍未遇。次日派人到亚洲旅社打听，都说在该旅社并未捕人。后来得知，刘云9月2日外出时，在亚洲旅社门口遇到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而遭到逮捕，被关押在武汉警备司令部监狱。

刘云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审讯，与敌人巧妙周旋，没有吐露一句实话，敌人从他身上也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以下是敌人档案中记录的刘云的一段供词。

问：军委会负责的有几个人？机关设在什么地方？

答：军委会有三个负责的委员，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叫张俊，一个叫王源，但是我们的姓名都是时常改变的，并且绝对没有用真姓真名的，他们向我说的既是假的，我也只有照他所说的告诉你。至于我们的机关，实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汉口租房子要老婆，所以我去了三四次都没能租到房子。假使我租了房子，这次捕我就没有这样容易，至于五省军事计划方案，因我到汉不久，各处情况尚未调查清楚，所以也未起草。

问：据你们同党说长江军委会成立了好久，岂有没有机关的道理？

答：本来军委会开办有两个多月，但是以前负责的是红军第七军的军长蔡申熙，他的态度很灰色，并未积极组织，所以我未接他的下手。我来此只两个星期，房子既不能租，所以无法建立机关。

问：你的二十五军的基本部队在哪里？

答：我受组织的使命不到三四天就被捕了，并未着手计划。不过我们所指的基本队伍就是鄂南各县的农民。

问：你来武汉这样久有何工作？对于此间共党活动的情形及长江区各种的组织当已详悉？

答：我是专负军事责任，与各省党的方面绝无关系，所以他的分子及其活动状况全不知道。至长江区的组织计分两种，一是政治委员会内分指导、宣传、裁判三部；二是军事委员会内分参谋、工农武装、谍报三部，均由委员分兼。我到汉以来并没有什么工作，因为尚未调查完毕不明情况，不过在军事方面我实地到过蛇山并在警钟楼内歇了两夜，龟山我也去了的，这两个地方的地形我是知道的。

实际上，供词中的张俊、王源纯属于虚乌有，而他去的地方更不是龟山、蛇山，他是到黄陂横店敌军的堡垒营与该营营长、秘密党员刘立青会面，勘察地形。

敌人见威逼利诱无效，按照 11 号密令，将刘云处以极刑。9 月 6 日刘云被押到刑场，牺牲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刘云英勇就义，时年 26 岁。刘云的牺牲在当时的黄埔军校师生中引起一片震动，人们为刘云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军事航空人才被蒋介石杀害而感到无比痛心。

任弼时曾回忆说：许多牺牲了的同志，都留下了不少光辉的业绩，他们的高尚品德、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却更为可贵，刘云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先烈。

半个世纪的母女情缘

1940 年的春天，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一位失去双亲的烈士遗孤，在革命圣地延安重逢，开启了她们长达半个世纪的母女情缘。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帅孟奇，这位遗孤就是烈士沈绍藩的女儿沈宗沪（后改名舒炜）。早在 1930 年，她们在武汉就因特殊的原因生活在一起。



沈绍藩,号述仲,化名述之,1902年农历十月十九日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17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长沙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沈绍藩毅然申请,并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他当选为中国赤色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秘书长。

1930年7月,沈绍藩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书科科长。此时,正值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武汉的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到处乱捕乱杀。武汉离长沙又近,危险性很大,但他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沈绍藩在汉口民生路张美之巷6号租了几间楼房,将母亲刘静、妻子舒亚先和不满一岁的女儿沈宗沪接来,与秘书处秘书帅孟奇住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对外说帅孟奇是寡居的大嫂。在这个“家庭”的掩护下,沈绍藩和帅孟奇每天都要到夜深人静才开始紧张的工作。帅孟奇的工作是抄写秘密文件,把中央来的指示抄给苏区,把苏区来的报告抄给中央。开始,她对工作并不熟悉,加之时间紧迫,有时非常焦急。沈绍藩总是耐心教她书写方法,文件多的时候,还亲自帮着抄写。帅孟奇每抄好一份文件,他都要认真地校对,然后才送出去。

帅孟奇回忆说:“我们住在汉口的一个弄堂里,这里实际上是长江局的重要机密机关,保存机要文件和长江局领导同志来看文件的地方。沈绍藩扮作行商,经常要出外谈生意,领导同志就扮作上门找他谈生意的人。领导同志基本上是个别来。我扮作这家长媳,是死了丈夫的寡妇,平时见人总是低眉顺眼,寡言少语,足不出户,很少与外人接触,每日几乎都会在凉台上出现一次,洗这洗那,似乎总在忙于家务。实际上我是这个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沈绍藩是我的领导。他的母亲、妻子都不是正式工作人员,但她们起掩护作用,而且配合得不错,有领导同志来时,我负责招呼看文件,沈绍藩负责警戒。形势特别紧张时,沈曾叫他的妻子抱着女婴坐在楼下大门口喂奶,如有异常,早用暗号通知。”

10月19日晚7时,沈绍藩从家中外出联系工作,说9时可回,但是他整夜都没有回来。帅孟奇猜测沈绍藩可能出事了,立刻在凉台上标明暗号,

警示长江局领导人千万不要进门来，这里可能不安全了。

整整两天，沈绍藩杳无踪影，帅孟奇非常焦急。她在武汉与党组织的唯一联系人就是沈绍藩，他失踪了，帅孟奇在武汉与党的联系就断了，而他们所驻的机关机密性很高，出了问题非同小可。万般无奈，帅孟奇当机立断，安排沈绍藩家属回长沙，然后自己扮作穷妇，携带党的文件乘轮船返回上海寻找党组织。

原来 19 日那天晚上，沈绍藩外出后，在张美之巷路遇了叛徒宋惠和，被宋惠和硬指为共产党，即便身上毫无证据依然被逮捕。沈绍藩被捕后，关押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在狱中，他表现得非常英勇，宁死不屈，严守了党的秘密，保护了同志和机关的安全。30 日，沈绍藩英勇牺牲，年仅 28 岁。

沈绍藩家属返回长沙老家后，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威逼，妻子舒亚先被迫自杀身亡。父母双双为革命牺牲后，女婴沈宗沪成了孤儿，跟随祖母辗转漂泊。直到 1939 年，沈宗沪 10 岁时，帅孟奇在长沙找到了她们，看到她们生活艰难，遂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经长沙地下党组织批准，1940 年 2 月由任作民（任弼时的堂兄）将沈宗沪带到了延安。沈宗沪到达延安后，帅孟奇作为湖南省选派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来到延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知道帅孟奇从事地下工作时曾在武汉与沈绍藩及家人组建过“临时家庭”，便将沈宗沪交给帅孟奇带养，由此续写了一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母女情缘。

革命何须怕断头

1930 年 5 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其他国民党地方军阀同蒋介石的中原大战正式爆发，一时红色区域周围的反动武装势力减弱。与此同时，中共的革命根据地已遍布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河南、安徽、江苏等 10 个省 300 余县，红军发展到 10 万人。7 月底，红军一度攻占长沙，威震武汉，武汉人民群众闻之欢欣鼓舞，革命空气一时空前高涨。然而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依然存在，自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除调遣军队加强武汉防务外，更加紧对武汉人民的残酷镇压，专事对付共产党的军警机关就有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宪兵团、教导团、游击大队和武昌、



汉口公安局。军队、铁甲车每日巡逻，密探遍布三镇，举行不定时、不定地点、不定次数的检查。从8月起，反动派执行第11号密令，凡属共产党案件，不经审理即行斩杀。

为进行恐怖威慑，反动派竟然从监狱中提出已判决服刑的共产党人，采用最原始的砍头方式，分批集体屠杀于三镇闹市。长江局书记项英1930年8月1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都是已经在狱判决监禁的，敌人重新提出杀头，向群众示威（七日到十日四天内杀了四十一人，而且在汉口六码头和记蛋厂口、后城码头民生路即张美之巷、武昌汉阳门砍头示众）”。

第一批被斩杀的为何恐、王自强、石德俭、喻义、付子容、张国彪、童濯之、于心宇、万怀行、邹骨剝、李庆发、李庆义、雷永林、高木香、张金龙、李时敏共16人。

何恐，原名步孔，字楚珍，号毅生，是湖北青运领导者、武汉共青团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派往日本东京的共产党领导人。他1900年出生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一个绅士家庭。1918年考入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被选为学生代表团成员，向武汉当局提出正义要求，反对二十一条。1920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冬，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恐

是武汉早期共产党人之一。曾多次在《星期评论》《江申日报》《正义报》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在何恐的带领下，他的两个弟弟何馥荪、何立人先后参加革命，人称“何氏三杰”。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同年3月，何恐代表武汉学生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回汉后带领学生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二七惨案发生后，参与起草武汉学联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告全国同胞书》。7月，出席全国学

联会议，为湖北理事。10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6月4日，带领武汉各校学生高举“愿流血以灌溉正义人道之苗，愿流血以倾倒帝国主义之根”的大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年底，由共产党组织派赴日本留学。曾以《中国青年们努力奋斗，不做东亚病夫，来救中国之危亡》为题发表演讲，受旅日爱国华侨赞扬。1926年10月10日，由日本回国，任国民党青年部秘书，主管青运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何恐于9月底不幸被捕，关押在武昌北首巷警察看守所。在狱中，他联合同监难友与反动当局进行说理斗争，同时与狱中共产党员张金保等人积极行动，利用国民党湘桂军阀内讧、武汉三镇一片混乱之机，领导200多名被捕同志于11月下旬越狱脱险。

何恐越狱后，只身赴沪寻找党中央。此时上海党组织已经知道何恐在特务搜捕名单之内，要他迅速离沪。何恐返回武汉后找不到党组织，却意外地遇见了在外专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一块赴日留学、同属中共东京支部成员的卢玉成和云梦县赴省寻找党组织的秦孝芬。何、秦应卢玉成之邀请，商定同去应山开辟工作。他们三人趁乱弄到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结伴走小路，避开敌军盘查，步行300余里，顺利到达应山东乡方家店，以卢玉成家为秘密活动据点，建立了京汉特委路东联络站。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地下农会，宣传土地革命，与黄陂、黄安互通信息，接待过往革命同志。当时，邓雅声任京汉特委书记，常到铁路以东活动，何恐等协助邓雅声编辑刻印特委刊物《川报》，供革命同志传阅。同时还协助卢玉成夫妇秘密建立路东应山、孝感边界乡村共产党支部，发展了卢泰、刘正启、高孝坤、郑华丰等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

1928年4月1日，面对当地反动团队开始的“清乡”活动，京汉特委、应山县委部分成员秘密转移至路东方家店卢玉成家，将党内文件、名册、关防印信进行销毁或深埋。次日晚，何恐、秦孝芬化装成商贩，由卢玉成派村支部文书卢泰护送到孝感王店搭火车赴汉口。



何恐自应山来到武汉，得知武汉形势更加恶化，无法留在武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乃决定再次返回家乡。1928年12月16日晚，何恐又一次回到家乡竹溪县。

为了把革命斗争引入家乡，早在1926年11月，何恐即派共产党员何立人（何恐五弟）和进步青年陆树声、杨明智回到竹溪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又动员在汉的竹溪籍学生王慎五、尹积庵等人回到竹溪，开展革命活动。何恐回到竹溪后，立即与他们会合，多次在甘家岭子开会，分析竹溪革命斗争形势，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农民武装。

何恐回到竹溪不久，国民党竹溪县政府即接省里电示：注意何恐行动，伺机逮捕。何恐在竹溪城乡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反动政府的察觉，他们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拟定了逮捕计划。1929年1月的一天下午，何恐同五弟何立人、四弟何美生（团员）等在家里商量事情，被县保安队探知。队长邹次澎带领队员数名，冲进何家，妄图将他们一并抓获。在危急的情形下，何立人、何美生为救何恐，躲避不及被逮捕，何恐乘机溜进后院，借助花台跃上房顶躲了起来。次日清晨，邹次澎再次率领队员将何家团团围住，他带着队员以找枪支弹药为名进宅搜查。邹乘人不备，将自带的子弹偷放在何家瓷瓶里，被何恐六弟何楚铭发现制止。邹见栽赃不成，恼羞成怒，以异党分子为名，将何楚铭捆了起来，责令其交代何恐去向。之后，隔三岔五不断搜查。为了安全起见，何恐与父亲何常甫一起在堂屋楼上后门的右侧做了一条隧道，上面堆上谷子。何恐白天进隧道隐蔽，晚上出来进行革命活动，以此相持20余天。这期间，竹溪县的反动势力日趋嚣张，搜捕何恐的行动有增无减，并不断扬言要搜捕何恐余党，逮尽所谓异党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何恐在农会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化装出城，于1929年2月7日晚离开竹溪。

何恐离开竹溪后，辗转安康、西安来到武汉。何恐在武汉刚一露面，便被叛徒万家佛发现，遭到逮捕。万家佛以叙旧情为由，诱逼何恐叛党，供出党组织情况，遭何恐严厉斥责。因万家佛只了解何恐在大革命失败前的经历，说不出他从事地下党活动的情况，所以何恐只被判了两年半徒刑。何恐最初

被关押在武昌湖北清乡督办公署军法处，4月转押至湖北高等法院看守所。

何恐在狱中受尽折磨，仍坚贞不屈，写有《魔窟》等诗文。他向狱友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揭露反动派残酷迫害革命者的罪行。面对敌人的判决书，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何恐拒不签字，并一次又一次地向法院提出控告。他在法庭上豪迈地说：“我为马列主义，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乃我所持理，有何之恐！”

每次回到看守所，何恐都要向难友们讲述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争的情形，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他经常利用放风的机会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何恐的教育鼓舞下，许多党团员在敌人的刀枪面前保持了革命气节，众多难友的觉悟也随之提高，看守所的难友们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何恐等经常在狱中举行政治示威，集体喊政治口号，高唱国际歌，1930年7月31日还通过地下党员从监外购进20多双木屐，准备8月1日做狱中暴动的武器。但终因时机不成熟，加之敌人防范严密，导致暴动失败，促成反动派提前进行血腥屠杀。

8月7日凌晨，国民党武汉保安队第二大队三区队将何恐、王自强等16位同志带出军法处，强行扒下他们的外衣，五花大绑，用纱布、棉花塞口，走过僻静街巷，来到平湖门码头，上了专门用来押解犯人的建汉轮，此轮前后左右都是铁栅子围着，仅留两旁进出口活动的铁栅门。专轮顺流而下，一直开到汉口德国二码头趸船，趸船上早有人等着。何恐等人刚上趸船，就被插上斩标，他们口中的纱布棉花刚被取出，何恐即带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其他15位同志应声相和：“打倒蒋介石！”“最后胜利属于红军！”上岸后敌人警戒森严，16位共产党员不惧死亡，不断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行进。到了汉口六合路英商和记蛋厂前马路的丁字路口，只见几个刽子手已提着屠刀等在那里，16位勇士见之浑然不惧，昂首挺胸，面不改色，高呼革命口号，血溅江城。何恐是最后一个殉难的，他眼见15位战友依次被大刀砍杀，仍目光炯炯，蔑视敌人，高喊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30岁。

文化艺术界泰斗夏衍称何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党校原校



长杨献珍为他题词“千古流芳，青史永垂”，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与何恐同时被杀的王自强，又名元甲，化名玉旷，孝感县张家山人，1904年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8岁在本村私塾读书，15岁考入武汉晴川中学。他在武汉读书期间，勤奋学习，关心国事，爱看进步杂志和马列主义书籍，思想觉悟日益提高，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党组织派他赴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某团做政治工作。同年9月，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当时，各地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党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抽调大批干部赴各地担任领导工作。1927年春，王自强调任汉川县委书记，兼任汉川农民自卫军负责人。9月，省委派赵璞、王自强到天门卢市组建了鄂中区（天、汉、京、沔）游击大队，隶属鄂中特委领导，下辖天门和汉川两县游击队。

1929年，王自强潜入应城长江埠盐务署税警大队任大队长，意图掌握这支武装为我所用，不料被黄埔同学认出指捕，押往武汉判刑，监禁于湖北省高等法院看守所。

1930年5月，蒋、冯、阎爆发军阀混战，鄂豫边与湘鄂西的红军主力不断获得重大胜利。敌人为了巩固后方，防止城市暴动，实施更严酷的白色恐怖，关在监狱中的共产党人随时都有遭到屠杀的危险。经请示上级组织，狱中的同志决定组织越狱暴动。暴动日期定在农历六月十五，起事前已和外面的同志约定：暴动开始后，在巷子内悬挂红灯，以便外面的同志接应。不料当晚风雨交加，巷内点不着灯。监内起事者打死狱卒一名，开了第一道牢门。这时暴动被敌人发觉，监狱被敌人包围，狱内的同志们虽多次与敌展开生死搏斗，但越狱未能成功。

狱中暴动使国民党湖北省反动当局极为恐慌，他们派重兵严密包围监狱，并紧急颁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为进行血腥大屠杀作准备。

8月7日，敌人开始对何恐、王自强等同志下毒手。在何恐、王自强的带领下，16名战友昂头，挺胸，高呼口号。在汉口和记蛋厂前面的丁字形道上，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砍下了何恐、王自强等16位同志的头颅。王自强就义时，

年仅 26 岁。

绝杀计划功败垂成

1930 年秋，武汉的白色恐怖日益严峻。9 月 1 日，国民党派两湖调查员蔡孟坚到汉，联合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警备司令夏斗寅对革命行动进行血腥镇压，对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实施大搜捕。

9 月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联合军大败，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同时，张学良率大军自东北入关，进占平津，宣布拥护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得以稳固。

11 月下旬，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宣誓就职两周后，离开南京“西巡”，在庐山召开第一次“剿匪”军事会议，预定会后巡视武汉。国民党湖北和武汉当局准备在汉口总商会举行欢迎大会。

武汉党组织获悉情报后，计划利用这次机会，派人打入大会筹备组，准备炸弹和炸药，乘机将蒋介石炸死，打乱国民党最高当局“围剿”革命根据地的部署。经过连日周密安排，党组织趁欢迎会需雇佣临时办事人员的契机向其中渗透，党员刘光、罗德保混入其中充当记录员，何玉琳（又名陈华）负责盗取欢迎徽章，分发给其他党员。为确保万无一失，刺杀人员分成二十四个组，每组五人，一律携带手榴弹参加，准备待蒋介石走上主席台时同时向台上投掷手榴弹，将其炸死。

正在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时，12 月 2 日，汉口区委书记何玉琳（又名陈华）在汉口丹凤街路遇叛徒宋惠和被捕，随即叛变。何玉琳叛变后向蔡孟坚供出刺蒋计划和参与者姓名、地址，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即按图索骥疯狂捕人，刺蒋计划流产，刘光、罗德保等人壮烈牺牲。

蔡孟坚一边开展搜捕行动，一边向陈立夫电告此事。陈立夫回电让其立刻从汉口赴九江，待两人会合后一起上庐山面见即将赴汉口的蒋介石，当面汇报此事。蒋介石闻听此讯，十分震惊，对蔡孟坚的行动给予嘉奖，奖金一万元，封少将参议，让其随侍左右行动。蔡孟坚提出自己先行回汉口，布置迎蒋事宜。



蔡孟坚回到汉口后，将反动军警重新部署、加强戒备，安排蒋介石改在汉口七码头登岸。数日后，蒋介石同邵力子、周佛海及刚脱离阎、冯势力投向蒋介石的北平市长何其巩乘军舰抵达汉口，欢迎会的安排取消。

蒋介石到汉后，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密谋，在行营下设立侦缉处，杨庆山为处长，蔡孟坚为副处长，专门破坏湘、鄂、赣三省的城市党组织。侦缉处组建后，杨庆山、蔡孟坚纠集一批青洪帮分子和叛徒成立若干个地下行动小组，实施破坏行动。由此，武汉的白色恐怖更严重了。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刘桂芳 李婉霞）

惩奸除恶

里应外合志未酬

1928年12月的一天，湖北省委秘密机关内，省委书记夏文法主持召开会议。会议的一项议题是：成立特务队，惩办叛徒。会上，大家群情激奋，一致同意夏文法的意见：利用内线里应外合，择机处决穷凶极恶的大叛徒黄佑南！

黄佑南，原名世钧，又名岳南、又难、黄坚、黄毅，湖南湘阴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曾任北洋军阀吴佩孚部连长。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后，经郭亮（时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介绍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1927年任湖南兴化锡矿山工会秘书长兼工人纠察队队长，因当时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突出，同年2月经郭亮、肖铁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日事变中，黄佑南带领工人纠察队突围但未成功，他只身逃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因其有军事工作经历，湖北省委将他派至共青团湖北省委任军事委员，主要担负对青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教练使用枪支、手榴弹等，为武装暴动作准备。当时组织训练时并不区分党、团员，也并不仅限于青年，因此黄认识和接触的武汉三镇党、团员及革命群众很多，知晓共青团组织机关、接头处等大量秘密。

1928年3月初，一名叛徒在武昌指认出了黄佑南，黄随即被捕（亦有当年亲历者回忆称黄于1927年12月底或1928年1月被捕）。敌人对其威逼利诱，黄佑南畏惧酷刑，同时贪恋反动派抛出的高官厚禄“橄榄枝”，很快就叛变投敌，供出团省委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姓名、住址，以及机关地址、通信联络方法等，在反动法庭上指证团湖北省委书记唐鉴等人，还到车站、



轮渡、茶馆等处守候指捕共产党员。他还参与逮捕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大江报》主笔向警予等人。由于黄佑南叛变，在汉中共湖北省委以下党、团、工会组织遭空前大破坏，被敌人逮捕并杀害的党、团骨干有 300 余人，省委被迫在江西九江重建。1928 年 4 月，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刘伯庄向中央写信，报告省委机关被破坏原因及七名告密者名单，其中就明确指出“黄文难（C.Y. 军事委员）（注：“文难”应为“又难”的误写）每天在街上捉拿，月薪五十元”。

此外，为了向敌人邀功讨赏，黄佑南竟将党的地下组织秘密活动规律写成文章，发表于湖北省“清乡”司令部主办的《清乡月刊》上，并提出“以毒攻毒”，即利用共产党叛徒来指认抓捕共产党员、破坏党组织的策略。这一策略被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副司令陶钧采纳，遂成立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稽查队密查班，黄佑南也被委任为上尉密查长。在反动派那里得到封赏后，黄佑南的气焰更为嚣张，他网罗了一批曾经入党或为党工作，后又叛变的叛徒任密查员，专司侦破共产党组织。1928 年 11 月，黄佑南等叛徒将刚从九江迁回武汉不久的中共湖北省委完全破坏，逮捕 40 余人，杀害 22 人。对抓获的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黄佑南手段狠毒，收买威胁不成就以酷刑拷打，甚至用铁丝勒进受刑者的腿部，割开皮肉，直至露出白骨，残忍至极。1928 年 11 月，刘少猷（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余泽鸿（时任湖北省委常委）向中央报告湖北省委遭到第三次破坏的情况，明确指出：“华界破机关多在晚间二、三时，破获后武装看守三天。最努力的是黄以[佑]南（铲共科长）……等约十人，……目前，敌人专用同志来捕同志，除此他们很少办法。”

1928 年 12 月，夏文法由上海赴汉重建中共湖北省委。在对敌斗争方面，新组建的省委痛下决心，成立特务队，处决那些专门以昔日同志鲜血换取自己升官发财的叛徒，而罪大恶极的黄佑南就是首要目标！

此时黄佑南已成为特务头目，行踪不定，且往往有其他叛徒特务作为随从伴其出行。想对其成功发动袭击，没有内线接应是很困难的。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耐心谨慎的工作，省委找到了稽查队稽查员沈尚平。

沈尚平原为中共汉口市委员会负责人，1928年8月被敌抓捕。为了打入敌人内部获得消息，他忍辱负重假意自首，并在敌稽查队充任稽查员。沈尚平十分仇恨黄佑南为虎作伥四处抓捕革命同志的恶行，一直想置其于死地，只是一个人势单力薄，无法成事。不过，为了能摸清黄佑南的行动规律和弱点，沈尚平平日里也违心地奉承黄佑南，与其混在一起搞好关系。当省委派人与沈尚平接上头，并指示他参与刺杀黄佑南的计划后，他欣然接受任务。省委还向沈尚平提供了一笔经费，供其活动使用。与此同时，省委还向中央报告，请“中央在沪速代湖北买手枪几支、炸弹及电刀，蒙蔽眼睛药”，做好武器准备。

一日，沈尚平请黄佑南与其合影留念，黄佑南认为这是对方的一种讨好和巴结，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他哪里知道，这是省委布置给沈尚平的任务，要求沈尚平取得黄佑南的相片，以供特务队制裁叛徒时辨认身份。这张照片差点成为黄佑南的催命符。

12月底的一天，汉口铁路外五福里省委秘密印刷所来了几个农民模样的人，为首的是中共（汉）川云（梦）应（城）县临时委员会书记程棣华。印刷所助手、共青团员郑恒武接待了他们，并为其找住所。当天晚上，程棣华告诉郑恒武，省委通过内线消息得知黄佑南将带领稽查队赴襄樊老河口一带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并获悉其出发的准确时间。那名内线还提供了一张黄佑南的照片，供省委特务队辨认。省委作出部署，准备在孝感花园车站黄佑南换乘汽车时发动伏击。而今天来的这些人，就是参加锄奸行动的特务队员。如果能将黄佑南处



民国时期，在华流行的美国人在孝感花园车站外拍摄的照片，照片中建筑墙面上有“花园”二字和对应威妥玛式拼音



决，就解除了党在湖北地区工作的最大威胁。在谈话中，为了保密，程棣华并没有告诉郑恒武那名内线是沈尚平，而照片正是沈尚平与黄佑南的合影。

到了黄佑南出发的那天，省委特务队员在孝感花园车站周围埋伏就绪，就等着他进入陷阱。谁知等了一天，都没看到黄的人影，行动失败了。后来从沈尚平处传回消息，黄佑南在出发前突发疾病，临时取消了赴老河口的行程，导致特务队扑空。湖北省委同志都深以为憾。

祸不单行，1929年2月，在黄佑南等叛徒特务卖力地搜捕下，蒲圻县委书记刘迪生被敌人抓获并叛变，由此导致省委机关遭到第四次大破坏。省委机关遭破坏时，沈尚平之前提供的照片也被敌人搜出，沈尚平因此暴露并遇难。

省委秘密印刷所没能逃过这次劫难。到2月下旬，郑恒武也被武昌清乡督办公署稽查队逮捕。解放后，郑恒武回忆，敌人将他押到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囚禁。过了几天，看守所长引来一名三十多岁，穿着佩上尉衔制服的瘦子，并对郑恒武说：“这是黄密查长，对你训教。”这个瘦子正是黄佑南，是来劝郑恒武叛变的。

黄佑南看了一眼郑恒武，然后开口：“我是黄佑南，你是晓得的。你这小子是想死想活？你还不供出程棣华的地点投诚吗？你想死真划不来，我听说你还只有17岁呀。”

郑恒武回答：“我实在不知道程棣华的地点，过去只是他来联系我。”

黄佑南见郑恒武并不愿意主动“投诚”，也不恼怒，反而得意洋洋地说：“在孝感花园想打死我的人都捉到了，程棣华总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哼，总算你们有本领，把我的相片也偷窃去了，但是结果如何呢？夏文法现在枪决了，整个夏文法的省委被我们一网打尽了，你这个小鬼头好好想想，作出贡献求活路吧。”最后，黄佑南还恬不知耻地向郑恒武炫耀：“这次协同破坏夏文法省委有功，将升少校阶级。”

蒋桂战争爆发后，胡宗铎、陶钧在蒋系军队的威逼下于1929年4月退出武汉。因之前的靠山倒台，黄佑南一度退出武汉敌特机关，跑到宜昌公

安局任卫生科长。到当年底，新上任的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又把黄佑南这个“铲共能手”给招了回来，委任他为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校督察，直接指挥由中共叛徒组成的密查队。1930年，黄佑南带领密查队连续在武汉三镇多次破坏中共党、团、工会组织及驻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所设机关，逮捕数百人，杀300余人。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黄佑南的官帽，也让湖北、武汉的革命者对其恨之入骨。

经过多年宦海沉浮，到解放战争时期，黄佑南已身居国民党上海防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的高位。但他深知，以他过去背满血债的叛徒经历，一旦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绝无可能放过他。他于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希望以此可以“避难”。新中国成立后，黄佑南一直故意隐瞒其早年叛党投敌罪行，民建中央和上海市政法系统并不知晓他的严重历史问题，他得以相继任民建组织委员会委员、淞沪防空司令部顾问、上海文史馆秘书，似乎是“平稳着陆”了。

然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黄佑南出卖和破坏的湖北省、武汉市党、团、工会等组织的幸存者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其问题，强烈要求惩治这个双手沾满同志鲜血且不知悔改的大叛徒。天网恢恢，上海市公安局于1957年11月逮捕黄佑南。1963年10月，上海市检察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对黄佑南提出公诉。1973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黄佑南无期徒刑。

午夜惊心云绣里

除了黄佑南，当时在武汉还有一名被捕后出卖众多同志和党组织秘密并竭力充当敌人鹰犬，为本地革命者切齿痛恨，欲除之而后快的大叛徒——宋惠和。

宋惠和，又名宋梁、宋飞鹤，湖南湘潭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武汉，先后任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兼阳夏区委书记、汉口区行动委员会（党、团合组）主席团成员。

1930年9月中旬，敌中央宪兵第三团在汉口华清街抓捕了正在与他人



接头的宋惠和。宋惧怕拷打，随即叛变，供出中共党、团组织及联络处成员 28 人，导致汉口区行动委员会及铁路、烟厂、印刷厂、刘家庙、兵工厂、轮渡等行动支部被破坏，20 余人被捕，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委书记秦了君、区行委委员邬聘三、彭信儒等人被害。不久，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书科长沈绍藩、全国铁路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孙良惠、中共武汉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等多人遭宋惠和指捕而相继遇难。11 月底，宋惠和被中央宪兵第三团交给黄佑南的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密查队，遂蜕变为专门破获共产党案件的得力鹰犬。他还无耻地向敌人出主意瓦解党组织和党员意志，如“注意技术，要优待被捕人员，起头不要乱打，使大家都‘转变’，瓦解整个组织才是上策”云云。

1930 年 12 月，宋惠和在汉口义成里丹凤街口（今江汉一路）路遇汉口区委书记陈华（又名何玉琳），宋立即指认陈并抓捕。在宋惠和的“攻心”下，陈华不仅向敌人交代了武汉党组织准备在汉口总商会举行“欢迎蒋总司令讨逆胜利大会”时刺杀蒋介石的计划，导致刺蒋行动失败，还充当敌人眼线，导致中共汉口区委被完全破坏，区委常委李运达、区委秘书兼交通王鹤鸣被捕牺牲；汉口区委印刷机关被完全破坏，工作人员刘光、罗德保、刘戴氏牺牲；武汉市委开会机关、秘书机关被完全破坏，市委常委陈洪周、陈德辉被捕牺牲。至年底，由宋惠和直接危害或间接牵连被捕的党、团骨干及革命群众达百余人，其中被杀者数十人，武汉市委机关和下辖各级组织几乎损失殆尽。

陈华这个“大案”办完后，稽查队为了鼓励宋惠和卖命反共，任命其为“准尉稽查员”。然而宋惠和自居有大“功”，飘飘然了起来，认为自己应该当“上尉督察”，对敌人给的这个衔级和密查班头目黄佑南心怀不满。恰逢陈立夫派蔡孟坚到武汉任“中央党部两湖调查员”，实为在汉建立 CC 系特务机关，于是宋惠和通过黄佑南结识蔡孟坚，并转投由蔡控制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侦缉处”，每月领取 50 大洋的津贴。但宋惠和却不知道，一个针对他的复仇计划也在悄然布局。

陈华向敌人自首后，很快就后悔自己的变节行为，于 1931 年初和自己

的爱人陈兰（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党员，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商量，打算一起逃到上海去找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军委武汉办事处决定制裁宋惠和，派出王崇仁与陈兰接上了头。在王崇仁介绍下，陈华和同在稽查队的陈万（曾任军委武汉兵士委员会书记）、唐仲书（曾任军委武汉兵士委员会副书记）、龙从启（曾任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等人与军委的几名干部秘密接洽，陈华、唐仲书、陈万、龙从启等都同意刺杀宋惠和，并亲自动手，以此请求党对自己之前变节行为的谅解。为顺利实施刺杀计划，他们表面上依然与宋惠和虚与委蛇、称兄道弟以麻痹对方，宋惠和对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毫无察觉。

1931年2月22日下午，陈华对宋惠和说，想把陈兰的妹妹陈蕙（某些材料称陈慧）介绍给他订婚，请宋惠和晚上来自己在汉口云绣里的住宅聚会。当天晚上，宋惠和如约而至，陈华和陈兰、陈蕙及陈克勤（陈兰的堂妹）对其殷勤招待。过了一会儿，唐仲书、陈万、龙从启也来到陈华家，众人一起打麻将取乐，直到深夜。晚11点时，宋惠和已经是呵欠连连，眼皮打架。正在迷糊犯困时，他忽见之前站在自己边上观看牌局的龙从启手中亮出一把匕首，猛地刺了过来——众人就是在等宋惠和精神涣散丧失警惕的时机！只见宋惠和猝不及防，被龙从启刺倒在地，他刚想大叫呼救，就被龙从启扼住脖颈，发不出声音；陈华也拿出菜刀，向宋惠和猛砍，唐仲书和陈万则使劲搅和桌面上的麻将牌，发出“哗哗”的响声，以掩护刺杀行动。很快，宋惠和血流满地，像死猪般不声不响趴在地上不动了。陈华等怕其不死，又一起动手补了数



云绣里在吉庆街北，民国时期的里弄住房已被拆除，原址上现为新建商业建筑



刀。此时众人都认为宋已毙命，于是将其“尸体”塞到床铺下，然后匆匆离开现场，奔赴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大贞”号轮船，以避免敌人的搜捕。

似乎是老天不开眼，被猛刺猛砍，耳朵都被割坏一只的宋惠和，竟然没有死。陈华等人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动手时又紧张，虽然前后刺砍宋惠和二十多刀，但一刀都没杀中要害。宋惠和被刺伤后很快晕厥过去，气息奄奄，于是陈华等以为得手便匆忙离开。然而他们走后没多久，宋惠和就醒了，从床底爬出来大喊救命。邻居听到声音后叫来警察，宋惠和立即让警察给特务机关打电话，要求封锁车站码头，截停事发后从武汉出发的所有交通工具，搜捕陈华等人。23日凌晨2点半，特务们截停了“大贞”号，并在客舱中捕获陈华、唐仲书、陈万、陈兰、陈蕙、陈克勤。只有龙从启在发现特务上船搜捕时，急中生智，躲进船员休息舱，躺进一张空铺并盖上被子，冒充正在休息的船员，而敌人未找到他，以为他跳江游泳逃走，并未搜查船员休息舱，这才逃过一劫。

近半个世纪后，当年宋惠和的“顶头上司”蔡孟坚在回忆文章《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为这场刺杀提供了一个在细节上有些许不同的版本：由于宋惠和不断为蔡孟坚出谋划策，蔡对宋极为信任，宋等同于其贴身秘书，这导致宋惠和“几为所有自首分子的眼中钉”。破获汉口刺杀蒋介石未遂案后，蔡孟坚将一部分奖金发给了陈华等自首分子，陈华等则向蔡孟坚报告说，要在汉口创办《醒报》以呼吁革命者“转变”。蔡孟坚同意，于是陈华等邀请蔡出席办报筹备会议，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陈华等打算在会议上同时刺杀蔡孟坚和宋惠和两人。事发当晚，蔡孟坚在别人家打麻将，在陈华的要求下，宋惠和三番五次去请蔡孟坚参会，蔡孟坚输了钱想赢回来，就没有离席，让宋惠和回去告诉陈华等先开会。陈华等人见蔡孟坚久不到，而驶沪轮船出发点将至，只好刺杀宋惠和一人，然后赴码头登船逃离。不过，敌档《武汉警备专刊》第二集中刊出《审理共党陈华等判决书》，判决书内对刺杀宋惠和案件的案情叙述，并没有蔡孟坚所说的办报和计划将他也一起刺杀之事。宋惠和在解放后的自供中也未提及办报和当晚他去请蔡孟坚到陈华住宅之事。所以蔡孟坚的叙述应该是

有意为自己贴金，故作“惊心动魄”，只是其一家之言。

3月上旬，陈华等6人均被敌人法庭判处死刑而殉难。在医院里养伤的宋惠和很狡诈，得知陈华等人被处决后，生怕党组织还会继续派锄奸队员来对其复仇和制裁，就让蔡孟坚在报纸上刊登“宋惠和重伤而死”的假消息以蒙蔽视听，他自己痊愈后则化名周大烈，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侦缉处少校特务长，主持由中共叛徒组成的特务队，继续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勾当。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宋惠和参与劝降，促成顾叛变。1932年，他率特务队在武汉、九江、江陵、汉川、沙市等地四处活动，破坏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多起。

此后，宋惠和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内混了多年，但并不如意，他在多个部门里来回辗转，始终得不到敌人真正的信任和“重用”，无论在哪里都只能当一个小头目。1948年3月，心灰意冷的宋惠和找他的叔父漆玉麟（本名宋玉成，在宋惠和介绍下成为军统特务，是后来杀害江竹筠等著名革命烈士的主凶之一）要了一笔钱，跑到四川新都宝光寺受戒为僧，法名果印。1950年3月，在人民政府对前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的强大追捕压力和政策宣传攻势下，宋惠和向四川省峨眉县公安局自首。1954年9月，由于宋惠和主动自首并交代罪行，西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依法从宽判处宋惠和无期徒刑。

善恶到头终有报

万家佛，又名万正道。在党史原始材料中，因口音或化名关系，也曾以万嘉福、万家福、王嘉福、王家福等姓名出现。万家佛是湖北孝感人，知识分子出身，1926年11月至1927年5月任共青团通山县特支书记，后调任汉口农委书记，负责农运工作。万家佛在汉口开展工作并不顺利，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万家佛在这个岗位上只干了一个多月，用掉400余元经费，但基本上都被已脱离革命的前农协特派员骗走，没有发挥作用。汉口各区委也不愿与万家佛发生联系，拒绝其参加区委会议，也不告诉他接头地点。在此情况下，万家佛竟弃职而去，



并找别人代理他的工作。

1927年11月，万家佛任共青团武昌市委书记，主导了对武昌县监狱劫狱的行动和武昌青年学生支援震寰纱厂被开除剪发女工的斗争，由此获得出席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的资格，以“王嘉福”的名字在会上发言，声称“过去省委在通山的工作完全脱离了党”“党没有注意怎样在农村中组织群众及发动群众之工作”“对于暴动政策，C.Y. 始终主张，不过没有坚决主张，C.Y. 是应负责任的，但党要多负一些”云云。对此，陈乔年、任旭、黄五一在对湖北问题的总答辩中，很强硬地回击和讽刺了一番，说：“最不负责和工作最糟的同志批评亦最不切实际。万嘉福同志（现为 C.Y. 省委委员之一）过去曾担任汉口农运负责，工作虽不见得怎样糟，但有始无终，并不报告 C.P. 省委就跑了，最不负责。他是不负责任惯了的，所以他的批评，尤其是对于通山的暴动的意见，完全是不负责的造谣。”

1928年年关暴动时，共青团湖北省委派万家佛去鄂南布置暴动任务。1928年4月间，万家佛又被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为经济查办委员会委员，参与对省委各项账目的审查工作。此后，万家佛在党内的工作和活动轨迹没有留下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1928年12月前叛变，并先后任敌稽查处密查员、公安局督察处办事员，干起了出卖同志的罪恶勾当。当年12月，湖北省委委员、候补常委兼省委农委书记曹振常被省委临时派往鄂东找省委委员、候补常委曹大骏，在由汉口出发坐轮渡去往武昌时，被万家佛指捕。当年年底，曹振常被敌人杀害于汉口济生三马路广场。1929年2月，著名青年运动领袖、共产党员何恐从家乡辗转来到武汉，刚一露面就被万家佛发现，随即遭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逮捕。万家佛无耻地以“叙旧情”（其与何恐都曾在共青团组织内工作）为借口，想引诱何恐“转变”，供出党组织秘密，结果遭何恐严厉叱责，自讨无趣。何恐于1930年9月被敌人杀害于汉口和记蛋厂门前。

万家佛叛党后甘做走狗密探，四处抓捕革命者的行径，让反动派对其赞赏有加，敌档《武汉警备司令部会报录》（第十八次）中记载称，万家佛叛变后，“遂一变而为反共最力之人，所有湖南清乡计划多出其手，而

以肃清安源一役功绩尤著”。党内同志则视万家佛为凶恶的敌人，并将制裁他提上了议事日程。1929年4月，湖北省委派人与团鄂西特委书记包泽英谈话了解其工作情况和个人意见，包泽英就要求制裁叛徒：“单纯的处罚，甚至于枪杀反动的同志，虽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可是那自首的、反动的同志，如中学省委书记万家福等坐在武汉，实于我们工作有很大的危害，应秘密地把他们解决。”

一段时间后，万家佛似乎是嗅到了某种危险的味道，他突然在明面上脱离敌特机关，转到湖北省立第四民众教育馆当讲演员，并使用“万正道”的姓名，可能是希望以此避人耳目，躲开党组织对他的制裁。但是，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党组织已经精心布置了针对万家佛的锄奸行动。这次行动具体的命令者、谋划者、参与者和谋划过程，现在已无史料可供准确考证，但实施过程却在敌档中留下了记载。据刊载于《武汉警备专刊》第一集的《训令所属各机关部队准湖北省政府函为省立第四民众教育馆讲员万正道被共匪击毙一案令彻严密侦缉逸匪文》中记载，1930年8月7日下午三点，省立第四民众教育馆正常开放，突然来了一群人快速闯入馆内，直扑万家佛。万家佛没来得及反应，这群人就对万家佛发起突袭，将其当场击毙。顿时馆内秩序大乱，其他职员惊恐万分，全部逃走。教育馆馆长也慌忙逃出，跑到附近警察岗亭报告。但等军警赶到案发现场警备并搜捕时，袭击者们早已不见踪影，“已远去矣”。



湖北省立第四民众教育馆位于武昌兰陵街，即今解放路大成路路口至张之洞路路口，图为解放路大成路路口



万家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死，令反动统治者大为光火。《武汉警备司令部会报录》（第十八次）中记载，“在严重警备之下竟有民众教育馆讲员万正道猝遭暗杀之事，而凶犯严缉未获”。之所以说是“严重警备”，是因为该馆当时坐落于武昌兰陵街（今解放路大成路路口至张之洞路路口段）上，一侧是警察局，另一侧是宪兵营，可以说教育馆就在敌人枪口下。另外，这次会报录日期为8月12日，说明敌人“严缉”了五天，却一无所获。敌特机关稽查处的代表则在此次会议上报告针对万家佛的暗杀“据说是由上海中共中央派来的暗杀队共计16人实施，请各机关部队切实协拿”云云，然而这也只是他们的道听途说，在会上拿出来充数而已。1930年10月，中央机关给武汉地区党组织去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上次对万某事件，是否值得，并在政治上影响如何，你们还须详细报告来”，说明针对万家佛的刺杀，是由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实施的。总之，针对万家佛的锄奸行动非常成功，敌人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而出卖革命者的可耻叛徒也落得了其应得的下场，这足以告慰曹振常、何恐等烈士的英魂。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孙 勤 李婉霞）

铁骨傲霜信仰坚

英雄夫妻以身殉党

1930年9月的夜晚，武汉的天气依然有些燥热，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青年男子正伏案疾书。他就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武汉市委委员、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秦了君，他正在写的是给武汉市委的紧急报告。他的妻子是秘密交通员，外出与汉口区行委主席团成员兼负青年秘书处工作的干部宋惠和接头后，两人同时失踪，秦了君感觉出了问题，遂立即向党组织报告。

9月20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常委兼武汉市委书记任弼时接到秦了君急报：区行委主席团成员兼负青年秘书处工作的宋惠和及外号黄毛丫头的女交通员两人失踪，分析可能是两人在茶馆接头时被捕。任弼时立即“决定防止扩大的办法”，并紧急指示秦了君“停止活动，绝对不能在家过夜”，这是因为黄毛丫头是秦了君之妻，为防不测，所以命令秦了君不许回家。

尽管采取了紧急措施，但9月22日，汉口区行委主席团书记秦了君、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长邬聘三、主席团成员兼宣传彭信儒3人同日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被捕，主席团5人中仅主席团成员兼组织陈华幸免。不久，秦了君、邬聘三、彭信儒英勇牺牲。

敌人为何如此精准掌握党组织负责人的行踪和隐蔽地点？原来是宋惠和9月16日在汉口华清街与人接头时被敌宪兵第3团逮捕，宋当即叛变，首先供出汉口区行委主要负责人，并供出他所知道的汉口区行委下属组织人员及他之前担任阳夏区行委常委时所知道的汉阳、硚口下属组织人员。他开了40人名单给敌人，导致铁路、烟厂、印刷厂、刘家庙、兵工厂、轮



渡等行动支部遭到大破坏，28 人被捕。之后，宋惠和仍不断带敌游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指捕革命者，致使党的重要干部多人遭其毒手。11 月底，宪兵团将宋惠和移交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密查队效力，正式成为敌特建制内的得力鹰犬。

宋惠和首先出卖的就是秦了君。因为他同秦了君于 1930 年春便同在共青团湖北省委共事，秦是书记，他是常委，同年 8 月又一起组建汉口区行委领导班子，两人熟识。他除向敌人描述秦了君的体貌特征外，还献一毒计说先抓住秦之妻黄毛丫头即可捕秦，他还告诉敌人他同黄毛丫头接头的地点是汉口统一街阅报处，并说 18 日上午 8 时即为接头日。果然，18 日那天他带敌人于汉口统一街阅报处诱捕秦妻黄毛丫头得手。

年仅 18 岁，被同志们昵称为黄毛丫头的女共产党员被捕后装憨卖傻，报假名李兰英，一口浓重的四川重庆一带口音，却硬说自己是湖北宜昌人。对自己丈夫的姓名每次庭讯都有不同的说法，一连说了 5 个不同的名字，其他更是一概不知所云，让敌人一头雾水。敌人决定判她死刑，无奈没有真凭实据，只得完全靠分析推断，写出判死刑的理由是：“姓名籍贯皆不吐实”，“据宋惠和供伊在四川一带负有重要工作，已经证明李兰英为共党重要职员”，而宋惠和“指证共党有二十八名之多俱已证实无一诬攀”“李兰英为共党职员已无疑义”。因她怀孕在身，在狱 3 个月分娩之后，她强忍抛舍刚产下的亲骨肉之大痛，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义无反顾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秦了君则是 9 月 22 日外出路遇宋惠和被指捕的。敌人感到捕获了一条“大鱼”，如获至宝。因为秦了君虽只有 22 岁，却在湖北武汉党、团组织中身居要职。1930 年初春他调来武汉时就已担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4 月 13 日参加党、团合并组织的省行动委员会任常委，在外县工作上分工管鄂中，是武汉三镇党发动的飞行集会、政治示威等群众性斗争的秘密指挥之一。1930 年 4 月中共湖北省委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缺席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因他留守湖北工作未与会）。8 月他被任命为长江总行动委员会（由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华岗、秦了君、

李震瀛 7 人组成）成员兼汉口区行委书记，9 月兼中共武汉市委委员。

肩负重任的秦了君常常化装深入工厂、学校、农村，寻找因党组织破坏而失散的同志。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找到多名工人党员：打包厂 7 人、蛋厂 3 人、烟厂 3 人、印刷厂 2 人、码头 8 人……秦了君和他们逐一接上党员关系，恢复印刷支部党组织。就这样，打散的党员逐渐集中，破坏的组织重显生机。至 9 月中旬，汉口区行委党员人数增加到 61 人，管辖 6 个行动支部和 3 个分行委。全武汉三镇的党员 150 余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共 73 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秦了君不能召开工厂支部会议，只能轮番接头谈话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他整天奔走武汉三镇各处，发动武汉产业工人和革命群众，集聚武汉革命力量，复苏武汉革命群众运动。

由于秦了君在党、团内均担任极重要领导职务，与原团省委领导层有密切接触、与下级团的干部也有接头；与原中共湖北省委若干负责人曾一起开会和有过接触，8 月后这些人分布在武汉三镇新的岗位上，他认识的重要干部和掌握的机密确实很多。然而，在审讯过程中，敌人感到大失所望！秦了君被捕后以钢铁般的意志，经受住敌人酷刑的考验，忍受着非人折磨，甚至敌人以夫妻之情和骨肉亲人生死离别相威胁，他依然没有动摇，守住了他所知道的长江局秘密（宋惠和不知道成立了长江局），特别是保护了与他接触较多的长江局常委兼武汉市委书记任弼时的安全，保护了原党、团省委各领导人的安全。直到秦了君牺牲，敌人只掌握了由宋惠和供出的他曾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和现任汉口区行委书记两个职务。1930 年 11 月 23 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布《追悼武汉最近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士》通知，列出担任重要职务的 12 名烈士的英名，秦了君就在此光荣榜上。

秦了君 1930 年在武汉时期使用过的名字还有陈了君、刘履祥、刘元、萧厚之等，其籍贯和调来武汉之前的经历不详。传说他当年曾一度活动于武昌的大学校园，扮作青年学生作为社会职业掩护，在校行事低调，不显山露水，却因性格活泼好动，被同学赠外号“小猴子”，萧厚之的化名可能由此而来。其妻黄毛丫头的真实姓名、籍贯、调来武汉前的经历至今亦不为人所知。他们牺牲后遗留下的孤儿也不知下落。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没能找寻到这对英雄夫妻更多的信息，但敌人的档案中却记录了这对英雄夫妻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记载：秦了君“所有被告人等供词俱属狡辩。”“李兰英，高等教育，狡不吐实。”“姓名籍贯皆不吐实”“李兰英准予分娩后一百天执行（死刑）”。

这对英雄夫妻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舍弃亲情爱情和家庭幸福，视死如归面对敌人屠刀，以忠诚践行誓言，以热血捍卫信仰，谱写下感动地的英雄壮歌。

白衣天使 红色战士

1930年9月22日晚，位于汉口球场街西马路46号的邬聘三医生家里，突然闯进几个身穿便衣、形色诡异的不速之客，声称国民党某要员“请邬大夫看病”，说罢便不由分说强行将邬聘三带走。邬聘三看见便衣人中有宋惠和，心里顿时明白了一切。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由大叛徒宋惠和引敌指捕的奔袭行动。邬聘三的公开身份是汉口市立医院医生，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区行委秘书长。而宋惠和带来的便衣人，根本不是什么“病人”的亲属和部下，而是国民党宪兵三团特务，邬聘三明白自己被叛徒出卖了！

可是宋惠和与邬聘三并不熟悉，在工作上也没有什么交集，宋惠和是如何知道邬聘三家庭住址的？原来1930年上半年，邬聘三和宋惠和同在中共阳夏区行动委员会担任常委，邬分管宣传，宋负责青年秘书处，两人工作虽然并无交集，却因阳夏区行委书记廖去恶曾在邬聘三家里召开过两次区行委会议，宋惠和都参加了，宋由此知道了邬聘三的家庭地址，遂带敌上门指捕。

邬聘三是武汉本地人，1900年出生在黄陂县李集邬家林子，儿时便随父母定居汉口，父亲开一间杂货铺，勉强供他上学。1921年他考入湖北医学专科学校（后改为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在校与进步同学一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投入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正值邬聘三从医科大学毕业，他奉中共党组织派遣开展统战工作，参与组建国民党武昌第一区党部，曾代表区党部出席国民党湖北中小学校教师党义研究所分部成立大会并讲话。1927 年春调中山大学工作，从事青年学生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教育，秘密吸收先进分子加入中共党、团，积极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此期间，他注意到自己的老师陈雨苍思想进步，就经常去陈雨苍诊所，送给他马克思列宁著作和进步书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1927 年春，经邬聘三、马春泉介绍，陈雨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做出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前夕，邬聘三被派往苏联学习，1928 年下半年奉命回国，化名胡素民，在汉口市立医院以医生职业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邬聘三在汉口还开办一家私人诊所，他的妻子儿女与父母住在球场街西马路 46 号。

在武汉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屡遭破坏，从省委机关到武汉三镇基层党组织损失殆尽，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乃常事。邬聘三回国不久，便两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 年上半年武汉中共党组织呈空白状态有半年之久。正当邬聘三内心十分焦急之际，老朋友龙睿找上门来，告诉他可以恢复党的关系了。原来中共铅山县委书记邓斌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关系，潜回武汉遇到暂驻武汉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张同志，商谈在武汉筹组党组织。湖南省委因机缘巧合在武汉发现一批失掉关系的党员，决定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中共武汉特别区委开展革命活动。特区委之下设若干组，邬聘三担



邬聘三出生地



任汉口一个党小组长，其小组共有党员3人，其中1名就是他亲自吸收的党员陈雨苍，此时陈雨苍正在汉口担任自办医院的院长。

9月下旬湖南省委迁回湖南，将武汉特别区委移交给刚成立的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委改组武汉特别区委为武昌区委，并将原特区所辖汉口、汉阳的党员划出来另行管理。10月，新的湖北省委对原中共武汉特别区委的党员进行了考察，于1929年冬淘汰一批动摇、不作为分子，邬聘三在斗争中经受了严格考验，于1930年春被提拔到新成立的中共阳夏区行委担任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区行委书记廖去恶同邬聘三在一起共事后，认为邬忠实可靠，曾数次在邬的家里召开区行委会议，并决定将邬在汉口市立医院的诊室作为党的重要接头处，十分重要的人和事才让他接头。

1930年5月上旬，湖北省委书记任弼时携妻子陈琮英乘客轮来到武汉，曾到邬聘三处谈工作听汇报。长江局成立后，邬聘三于1930年8月调任中共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长。他在汉口利济路开办的私人诊所也成为党的秘密机关。身为区行委秘书长，邬聘三有许多党内技术性工作要处理，好在诊所里求诊者人来人往，即便夜晚有人上门也理所当然，不会有人怀疑，党组织还特地调来一名女同志以护士身份帮助他工作，这对党的工作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邬聘三行医收入颇丰，却都被他用作党的经费，钱的去向使其父生疑。被父埋怨时，他打躬作揖，表示这些钱没有拿去干坏事，请二老尽可放心。

此时，红军攻占长沙，威震武汉。党组织在武汉布置总同盟罢工，进行公开政治示威斗争，各种飞行集会很多，发传单、贴标语。但是所有公开活动都没让邬聘三参加，也不让很多人去同他接头，使邬聘三处于隐蔽状态。

正当邬聘三的工作顺利进行时，宋惠和的叛变却使他暴露身份，身陷囹圄，汉口区行委及所属的党支部也惨遭破坏。邬聘三被捕后，在酷刑下始终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叛徒宋惠和解放后在狱中供词：“陈（秦了君又名陈了君）、邬二人被捕后始终忠实革命，虽经我这个叛徒两次庭讯对质，又经叶（即敌中央宪兵第三团观察员叶枝）等数次用刑逼供，一直坚不承认。”

邬聘三经过敌人各种酷刑摧残，遍体鳞伤，已经无法站立。他大哥给他送饭，十分担忧他的前景，邬聘三反而安慰大哥说：人固有一死，为劳苦大众去死，是我所愿，遗憾的是没有为父母尽孝。他嘱咐妻子要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革命遗志。同乡好友邬祥乐4次去狱中看望，邬聘三向邬祥乐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希望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受邬聘三的影响，邬祥乐后来积极支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武汉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软硬兼施，始终不能使邬聘三屈服，于是痛下毒手，残酷杀害了邬聘三。邬聘三用自己的生命，忠诚保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武汉市委书记任弼时和汉口市立医院院长、武汉市医师公会会长、地下党员陈雨苍等许多同志的安全。中共阳夏区行委书记廖去恶在解放后回忆邬聘三时，仍然赞不绝口：“有个汉口市立医院的医生，湖北人，知识分子嘛，斯斯文文的，工作积极、踏实、可靠。”

中共武汉市委得知邬聘三等牺牲的噩耗，于1930年11月23日发布中共武汉市委通知（第五号）《追悼武汉最近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士》，列出包括邬聘三在内担任重要职务的12位烈士的英名，沉痛追悼这位白衣天使红色战士，表示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暗夜的星光

宋惠和叛变引起的连锁大破坏，给武汉各级党组织带来了一场浩劫。叛徒日夜带领敌探，在武汉大街小巷搜寻，遇到共产党人立即指认逮捕，先后被捕牺牲的重要领导干部有全国铁路总工会武汉办事处负责人、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孙良惠，武汉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及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郭士杰、陈洪周等。

孙良惠又名张良慧，1898年出生在南京。自幼随家人来上海谋生，进入日商同兴纱厂做工，参加上海“工人半日学校”，成为最早的一批学员。1923年11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沪西地区最早



孙良惠

的工人党员。曾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担任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和浦东地区工人武装总指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良惠被判刑 10 年，获释出狱后被派往武汉，担任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

1930 年 9 月，孙良惠奔赴武汉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在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从发动铁路工人准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总暴动，到执行党中央指示纠正“左”倾冒险停止武装总暴动，转向适应具体环境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孙良惠始终奔波奋战在工人运动第一线。10 月，孙良惠因叛徒指认而被捕。在监狱里，他化名张忍斋，自称湖北咸宁人，来武汉经商。由于他刚从外地来，并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敌人只得用叛徒宋惠和出庭指证，孙良惠大义凛然，痛斥叛徒无耻，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敌人认定孙良惠是“省总主席委员”后，更是以各种酷刑日夜审讯，但孙良惠始终意志坚强，宁死不屈。在敌人的牢房里，孙良惠不断地进行革命宣传，给难友们很大鼓舞。敌人无计可施，最后判决孙良惠死刑。10 月 28 日，敌人把孙良惠押上刑场，孙良惠神态安详，从容不迫。临刑前，他连声高呼口号，其势雄雄，悲壮感人。

被宋惠和出卖的还有武汉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吴芳 1899 年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在长沙船山学校求学时参加湖南五四反帝爱国斗争，加入毛泽东、何叔衡发起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1921 年吴芳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被党派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年转为党员。经过 4 年苏俄学习工作，1925 年春回国工作。1927 年 4 月，吴芳代表山东省党组织来武汉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不久被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1930 年春吴芳再次来到武汉，担任湖北省临时工委书记、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和省审查委员会委员。长江局成立后，吴芳参加长江局和长江总行

动委员会的工会工作，担任省行动委员会委员。由于武汉党的下层组织十分薄弱，工作人员大半由外地派来，而“左”倾冒险主义的集会示威往往使党组织难以得到掩护。吴芳为了动员群众培养革命力量，找到武汉济生三马路工人领袖张金保家，向病中的张金保传达党中央重建湖北省委的指示。

吴芳是外地派遣到武汉的干部，宋惠和对他并不熟悉。在吴芳被捕后，敌人档案中完全没有留下他的真实姓名、职务、活动痕迹，说明宋惠和并不知道吴芳的姓名和底细，可是宋惠和为什么能准确地指捕吴芳呢？这一切源于1930年春吴芳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工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总工会党团书记后，经常到区委集会现场指挥，而宋惠和此时正担任共青团阳夏区委书记，免不了带团员青年到集会现场。他是在1930年4月党在汉口一三里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见过吴芳，当时看到交通员多次同吴芳接触私语，他就猜测吴芳是会场秘密总指挥。因此后来宋惠和叛变后，路遇吴芳就指认逮捕。

中共中央长江局向党中央的报告也证实了孙良惠、吴芳牺牲是因叛徒宋惠和出卖，报告指出：“孙良惠、吴芳及最近牺牲之同志之牺牲，系直接由叛徒宋惠和在街上捉人，而且很聪明地在晚间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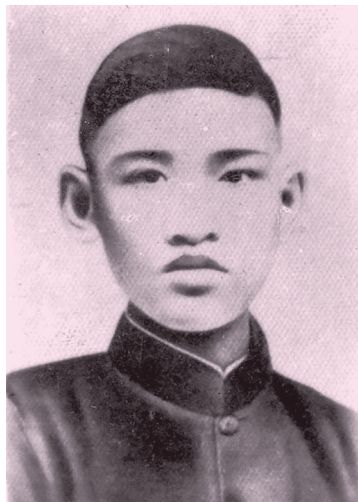
1930年10月中旬吴芳被捕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派人劝降，吴芳凛然回答：“我为革命永不变节，死了也要做‘鬼雄’！”随后慷慨就义，时年30岁。他的爱人也被捕，并在分娩后惨遭杀害，婴儿亦夭折。慷慨悲歌英雄气，又一对革命伉俪用生命捍卫信仰，在武汉走完短暂而壮丽的一生！

针对宋惠和被捕叛变引起湖北和武汉党组织大破坏一事，中共中央于1930年10月2日发出了《关于武汉破坏后的恢复问题致长江局的信》，提出长江局更应引起对秘密工作的注意。中央还决定调任弼时专做长江局工作，武汉市委书记一职由上海调王弼接任，因王弼未到职，由郭士杰代理。

郭士杰1906年出生在四川隆昌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下半年，郭士杰在安庆被捕，后保释出狱。党组织考虑郭士杰身份在安庆



已经暴露，将他派往湖北。1930年4月，郭士杰当选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负责武昌和鄂东南党的工作。武昌区党组织几经破坏，从区委到支部几乎空白。5月，郭士杰四处寻找党员线索，恢复基层组织，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定时参加区委会议研究情况。经过艰辛努力，郭士杰在知识分子和学校中找到失散的党员，恢复了多个学生党支部，又发展了数名工人党员，建立工人党支部。他抓住被服厂、车夫、码头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来发动群众，推动其他重要产业如兵工厂、铁路、海员工人开展斗争。武昌的一



郭士杰

纱、福源、裕华、震寰4大纱厂共有工人2万人以上，郭士杰针对各个纱厂的不同情况布置不同的罢工斗争策略，充实省总工会下层组织，组织罢工委员会、赤色工会分会，训练工人纠察组织，取得较好的效果。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军打下长沙，长江局负责人关向应派郭士杰到湖南与湖南省委和彭德怀联系。因敌军严密封锁交通，郭士杰无法到达长沙，只得返回武汉。9月，中共武汉市委成立，任弼时任书记，郭士杰为市委常委。

一个月后，因武汉市委书记任弼时被中央调动专做长江局工作，由郭士杰代理武汉市委书记。10月中旬，郭士杰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化名黄奕卿，敌人虽不明确他真实的身份，但知道他是共产党在武汉的重要人物，对他软硬兼施，使尽各种手段，想从他口中得到党在湖北武汉的组织情况。但郭士杰坚不吐实，被敌人杀害在蛇山下，时年24岁。临刑前，郭士杰挥笔作诗：

神州大地起风暴，
席卷华夏灭群妖，
我自举杯仰天笑，

宁甘斧钺不降曹。

郭士杰以壮丽诗篇谱写出了生命绝唱，抒发了自己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表达了革命者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英雄气概。碧血铸忠魂，丹心照汗青！

尽管党组织采取了不少紧急措施，但宋惠和被捕叛变导致的连锁破坏却依然在延续。1930年12月2日，中共汉口区委书记陈华（又名何玉琳）在汉口丹凤街路口路遇叛徒宋惠和被指捕。宋认识陈华，是在1929年冬陈华以中共湖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到鄂西，宋惠和时任共青团鄂西特委书记，陈与宋有过谈话接触。

陈华被捕后旋即叛变，不但将汉口区委整个破坏，而且祸及中共武汉市委两位主要负责人陈洪周和陈德辉被捕牺牲。

12月4日下午2时，武汉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常委陈德辉“4时半未到会”，开始市委疑其上午参加武昌区委会议时被捕，结果武昌区委却给市委来信“责备为何无人出席”，说明武昌区委并未发生问题。陈德辉失踪了！

12月5日，武汉市委代理书记陈洪周上午应出席硚口区委会议，“下午五时应在某处与诗圃（任弼时的化名）、无魂接头，至晚八时未到”“硚口区也来信责备为何无人出席”，陈洪周也同样离奇失踪！

武汉市委两名重要负责人接连失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陈德辉4日上午出门不久，即发现有人盯梢，便不敢按约赴武昌区委和市委的会议，而是引诱敌人大街小巷乱窜，摆脱敌人后隐蔽了两天，7日出门发现仍被跟踪，旋即被捕。

陈洪周也是5日上午出门不久即发现有人盯梢，他也不敢参加硚口区委会议，更不敢与长江局常委任弼时、新就任的武汉市委书记尤无魂两人接头，而是想法摆脱敌人隐蔽起来。7日出门发现仍被跟踪，他在法租界、日租界大街小巷兜圈子，走了许多路，仍在汉口一元路被捕。

7日这天，汉口区委机关、汉口区委印刷机关同时被敌破获，说明敌



人根据陈华口供早已暗中布下严密罗网，先是盯梢陈德辉、陈洪周，企图“放长线钓大鱼”，因诡计被识破，乃于7日收网实施逮捕，并由陈华出庭指证。

12月10日，市委的陈洪周、陈德辉、区委的李运达、刘光、罗德保、刘戴氏、王鹤鸣、王富山被敌杀害。

陈洪周又名洪舟、陈清、文淑、陈正佳，湖北阳新人（一说大冶人），1904年生。早年在武昌上学期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返乡从事农民运动，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大冶农民秋收斗争，之后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白区地下工作。

1930年5月上旬，陈洪周经中央调赴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秘书。他抵汉后，因武昌党组织这年春季连续两次遭大破坏，每次破坏从区委到支部都解体，因此省委决定派他担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他履任后，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很快恢复了中华大学、博文中学、女一中3个学校支部，有党员15人；恢复1个街道支部，有党员5人；同黄鹄书店两个店员党员取得了联系；在福源纱厂找到两个工人党员，成立了支部；在徐家棚发展了两个铁路工人入党，拟成立支部；恢复人力车工人支部，有党员3人；恢复第一纱厂党员关系，拟成立支部；还派人打入裕华、震寰两纱厂开展工作。区委能正常开会、接头，但区委组织仍不健全，区委机关也未能建立起来。6月他的工作又有了变动，因中央通知湖北省委派人出席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省委派他赴会，另调人担任武昌区委书记。

7月，陈洪周赴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9月初旬，他调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29日中央又决定调他担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实际直到12月陈洪周都未能离开武汉市委的工作到省总就职。因为长江局常委兼武汉市委书记任弼时于10月专做长江局工作，由郭士杰代理市委书记，此时7名市委委员中，秦了君已被捕牺牲，廖去恶因不能在汉立足离汉，市委组织很不健全，长江局10月21日向中央报告说：必须等新的市委书记到任后，陈洪周“才能到省总去”，市委委员、省总党团书记李震瀛才能离开岗位赴上海工作。

不料 11 月下旬代理市委书记郭士杰又被捕牺牲，陈洪周继任代理市委书记。他召集武汉市委委员会议，沉痛发布中共武汉市委第五号通告，追悼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并对武汉党组织最近屡次被破坏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既有客观上的白色恐怖，也有主观上不注意秘密工作方法的因素，提出武汉市各级组织对牺牲的战士进行追悼，要使每一个同志了解和学习战士们的斗争精神，加倍努力，以争取阶级决战之最后胜利，每一个后死者需记取战士们这样激昂慷慨的精神，尽我们一个布尔什维克对党最后的责任。

12 月初旬，从上海来的新任武汉市委书记尤无魂就职，陈洪周与其办理移交工作后，将按中央指示撤离武汉就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陈洪周曾带尤无魂去处理有安全隐患的市委接头机关，6 日深夜他在短暂摆脱盯梢后曾面见尤无魂，安排了尤的住处，尤让他立刻离汉赴湖南，但他说还有省总工会的工作要交代（李震瀛离汉时将省总交他兼管），不料次日即被捕。他被捕后，化名陈正佳，坚不吐实，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武汉市委负责人及机关的安全，特别是保护了同他接触多的长江局负责人任弼时的安全，还保护了湖北省总工会同志的安全。

陈德辉，原名郑汉先，1905 年生于福建。五卅运动前后正在日本留学，结识何恐、夏衍、冯乃超、杨杏屯等进步学生，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担任过中共法南、闸北区委书记。1927 年秋在上海介绍夏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10 月中旬奉命调武汉，先在中共汉口区委担任负责人，旋调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还兼任长江局机关刊物《红旗》编辑。他被捕后坚不吐实，保护了武汉市委负责人及机关的安全，以及他常接头谈话、与会的武昌、硚口、汉阳各区委机关的安全，最后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撰写的《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一文中感慨道：“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终于像旭日东升一样，重新站起来了。”“可是，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喜讯告诉已经牺牲了的同志呢？”夏衍缅怀了一批烈士，第一名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郑汉先（陈德辉）。



陈洪周和陈德辉牺牲后，任弼时满怀悲愤地代表长江局向中央报告说：“市委损失太大了，并且牺牲了我们极好的干部。”

群星陨落，瑰宝折损，苍弘化碧，杜鹃啼血。一个同志被捕牺牲，另一个又挺身而出；一批同志刚刚倒下，另一批人又继续奋斗。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义无反顾地投入斗争中。

在武汉艰苦卓绝的白区斗争中，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他们中有工人、学生、农民，有医生、护士，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代表人物有郭士杰、吴芳、秦了君、孙良惠、邬聘三、刘云、黄树杨、张特夫、张培信、何端芳、魏达连、陈庚峰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他们像沉沉暗夜中闪光的星辰，用年轻的生命照亮前进道路，迎接民族解放的光明未来。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何利平）

惊天之变与艰难苦斗

“黎明”走进黑暗

1931年4月3日，一艘从上海溯江而上的英国轮船停泊汉口。下船的乘客中有一支轻装简从的“魔术表演队”，为首的一位“魔术师”，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他带着一名徒弟和一名助手，分别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张增谦和董健吾。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奉周恩来之命，安排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经汉口进入鄂豫皖苏区。4日，张国焘、陈昌浩乘货轮抵汉口，顾顺章派人将他们接到日租界一个秘密交通据点住下，随后由鄂豫皖苏区来的交通员带离武汉去苏区。

完成护送任务后，顾顺章却没有按秘密工作要求马上离汉返沪，而是借口搞交通线滞留汉口。于是，董健吾与顾顺章商定，在没有可靠的社会关系时，董健吾暂住在他的同学刘少岩家里，顾顺章则下榻在汉口怡园附近的新世界饭店，两人还约定了在滨江一角碰头的时间。

几天后，当董健吾告诉顾顺章已为他找到社会关系可靠的人家居住时，顾顺章却找借口拒绝从饭店搬走。汉口这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已让他有些流连忘返。

4月19日（星期日），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魔术馆贴出了一则招聘演员广告。顾顺章原来在汉口已是颇有名气的大魔术师（艺名为“化广奇”），曾在



董健吾



汉口游艺场多次登台表演，轰动一时，有些富人拜他做老师，汉口三教九流中都有人与他来往，但均不识其庐山真面目。精通魔术而又缺钱花销的顾顺章此时不由得技痒难忍。

顾顺章要董健吾和他一起登台表演魔术。董健吾虽然平日也喜欢玩魔术，但他意识到在武汉公开露面极易暴露自己，严重违反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没有同意，还提醒顾顺章这次护送任务已胜利完成，应尽早返沪。为此，两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鉴于顾顺章一意孤行不听劝阻，董健吾便决定回沪向周恩来汇报情况。他谎称收到祖母病危急电，要求回沪。顾顺章不便挽留，就托人为董买了一张次日早上开往上海的“建国”号船票。

董健吾拿到船票后回到刘少岩家。刘少岩关切地告诉董：“建国”号轮船设施简陋，密封不佳，速度很慢，建议董健吾改乘日商株式会社的“洛阳”号轮船。出于对顾顺章不守纪律、肆意妄为的担忧和警觉，董健吾接受了刘少岩的建议。

第二天早上，董健吾身着牧师服，戴上墨镜，佯装成牧师上了“建国”号轮船。上船后他却“金蝉脱壳”，在轮船起航前混入送客人群中下了船，随即转赴日商码头改乘“洛阳”号轮船。两轮启程的时间相隔两个小时。

就在4月24日董健吾启程返回上海的当天下午，顾顺章与中共中央军委武汉交通大站（此交通大站专门负责与各苏区的交通联络）主任张崧生在电影院接头，在回旅馆途中路遇一个熟人，由此而被捕。

顾顺章这个熟人是他在上海认识的，名叫游中兴，化名尤无魂、游殍，被捕后改名尤崇新，绰号尤麻子。此人是上海洋务打字员出身，1925年入党，历任中共沪中区委、沪东区委、沪西区委、南京市委书记。1930年11月奉调汉口，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1月在汉口被捕叛变，出卖了聂复民（聂系中共中央军委武汉办事处秘书处工作人员，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等同志。游中兴叛变后，被敌人留作眼线使用。

游中兴在解放后化名郁伍文，曾混入北京新华社工作，在镇反运动中被捕判死刑。1952年他在狱中的供词交了指认顾顺章的详细经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的一个下午，又押出去逛马路……傍晚，在三教街西段三码头冷落的街道上没精打采地走着，正到三岔路口向北转角处，忽然迎面走来顾顺章、张崧生，顾在前，张在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相视一下，张见我左右人物不妙，面部发白，加快步伐急于越过去似的。我和周××并肩行走，我身旁一个缉务员（侦缉队特务）守着，周××身旁也有一个缉务员守着，后面跟着四人，这时脚步不约而同地停下。在我身旁的缉务员问我认识不认识，我答认识，后面四人已转头去拦住顾、张。见四人带顾、张一起走，在我身旁的缉务员说声‘我们走吧’，他们两人把我和周两人径自带回侦缉处。顾、张后来不知押到何处去了。”

游中兴回到侦缉处后，立即向敌人供出顾顺章真实身份。顾顺章被捕后，态度镇静，当即要求带他到所住的饭店收拾行李。顾在饭店见到助手张增谦（系中共特科“红队”队员，也是顾顺章玩魔术的徒弟）后说：“收拾行李跟他们走吧。”于是，张增谦亦被捕自首。

顾顺章被押到侦缉处后，神情异常傲慢地说：“我要见蔡孟坚。”蔡孟坚是国民党CC系特工头目，1930年夏经陈立夫派遣从南京到武汉任两湖调查员，其任务是专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蔡孟坚在湖北省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的支持下，与武汉洪帮头子杨庆山勾结，由杨庆山派出20余名洪帮分子随蔡进驻行营，有权对共产党直接采取行动。

从1930年秋起，蔡孟坚在武汉大肆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逮捕、残害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此，蔡孟坚深得蒋介石赏识，多次被蒋召见，并奖以少将参议职位和巨额奖金。蒋介石决定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侦缉处，令蔡孟坚主持，专事对付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侦缉处于1931年2月成立，杨庆山任处长，蔡孟坚任副处长，实际由蔡主持工作。

蔡孟坚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令侦缉处特务押着一些自首分子和叛徒，每日在大街小巷行走观望，到车站、码头、酒楼饭馆暗查，夜晚到旅舍、栈房突击检查，若遇到认识的地下党人员即指认逮捕。



自首分子若多日无收获，便算未完成“自首条件”，给予处决。顾顺章被捕，即为蔡孟坚使用这种手段所致。顾顺章作为中共情报和保卫机构负责人，当然了解蔡孟坚其人，因此要求见他。

顾顺章见到蔡孟坚开口便说：“我有对付共产党大计划，请你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要当面谈情。”说完便“不愿再言其他”。蔡孟坚说：“我将引你见行营何主任。”顾答：“见了他也不过说同样的话。”

蔡孟坚当即向何成濬报告。何成濬决定不见顾顺章，由他与蔡孟坚分别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报告顾顺章被捕自首、要求面见蒋介石等情况，并令蔡派数名特务及一排宪兵，于当晚派专轮武装押送顾顺章启程。蔡于次日早晨乘飞机先飞南京，“会同中央主管单位，直接处理此一巨案”。

与此同时，董健吾乘坐的“洛阳”号轮船于24日晚11时许靠近九江码头，突然发现“建国”号轮船停泊的码头警笛长鸣，人声鼎沸，军警戒严，如临大敌。“洛阳”号轮船的乘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船长见九江码头已戒严，为免惹是非，便下令船不靠岸，直驶上海。顾顺章出卖了董健吾的行程，

导致“建国”号轮船遭受大搜捕，而董健吾因改乘“洛阳”号轮船侥幸脱险。

就在董健吾离开武汉的当天晚上，位于南京中山路的正元实业社接连收到武汉发来的几封紧急密电。其实，这个正元实业社并不是什么商社，而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简称中统）这一特务机构的办公机关。由于收到电文时间已是夜晚，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早已外出度周末寻欢作乐去了，留守机关的是他的机



钱壮飞

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接连收到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侦缉处发来的标记为“徐恩曾亲译”的紧急密电，感到一定有非同寻常之事发生，于是他决定不等徐恩曾回来，便用密码本译出电文。当他译出“黎明被捕，并已自首”的字样后，不禁全身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钱壮飞这位中统特务头子身边的亲信红人，是一位早在1928年就潜伏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他知道“黎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化名，顾顺章被捕叛变，阴谋危害党中央，而此时中共中央并不知情，毫无防备，这怎能不让他焦急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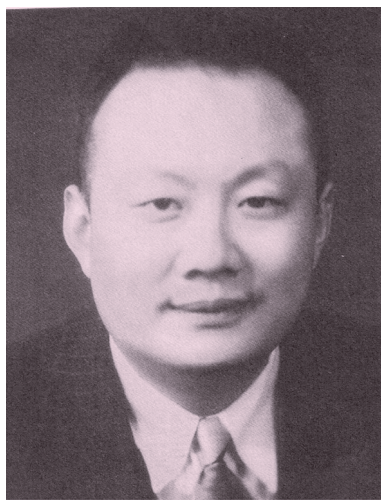
钱壮飞当即派女婿刘杞夫赶上当晚最后一班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连夜赶往上海，向中共特科负责与钱壮飞联系的李克农汇报，李克农又马上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同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的一切关系，废止顾顺章所使用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天，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各级机关全部搬了家。在紧张的两三天时间里，周恩来等人一刻也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把一切安排妥当。钱壮飞在刘杞夫赴沪后，才向徐恩曾呈交密电，然后从容离去，迅赴上海潜伏，不久撤往中央苏区。

董健吾到达上海后，也立即通过交通员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向周恩来报告了顾顺章滞留武汉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等情况。正是这些赤胆忠心、大智大勇的共产党人出色履行使命，让中共中央机关等党组织转危为安。

书生面对刀枪

1932年3月的武汉，虽然已是春和景明的时节，但全城上下却充满着阴冷肃杀的气息。一年前顾顺章的叛变，导致湖北和武汉党组织以及苏区在汉地下工作机关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就在这黑云压城令人窒息之时，有



张执一

一个从湖北襄阳归来的游子，来到汉口汉正街蔡家上巷14号，敲开了自己家的门，他就是曾任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长和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张执一（原名张忍）。

张执一此次回家并不是为了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而是来寻找党的组织。一年前，他被党组织派到襄阳开展秘密工作。不料他刚到襄阳，就遭遇襄阳特委（鄂北特委）书记傅良居被捕叛变，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此时武汉党组织由于顾顺章叛变也遭到大破坏，连他曾经工作的武昌区委都被破坏殆尽，区委书记“小张”已叛变投敌。因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络，只好在襄阳以教书为掩护等待时机。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日渐高涨，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张执一决心冒险回到武汉自己家中，伺机寻找党组织。

张执一回到武汉后，才知道此时武汉党组织已遭全部破坏，一些党的主要负责人也已撤离。于是，他开始自发地联系一些进步师生，陆续组织了30余人，成立了一个名为“武汉左翼青年联盟”的文化团体，开展进步文化活动。

1932年4月的一天，张执一在武汉乘坐轮渡时，偶遇1930年与他共同做过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吴兴。他得知吴兴在1931年也失掉了组织关系，便与吴经常联系。通过吴兴，他结识了在中华大学和武汉大学担任教师的党员陈心泉（陈新乾），也知道陈心泉等人成立了一个叫“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团体，有师生30人左右，他们组织读书会，联系青年进行政治理论及经济学理论学习，还办了一个进步刊物《雪里鸿》。于是，张执一、吴兴和陈心泉等约定工作上互相配合，共同设法寻找党组织。

随着张执一、吴兴和陈心泉等人找到的失散党员和新联系的进步人士人数不断增加，他们的活动也更加活跃。他们将武汉左翼青年联盟与社会科学研究会合并起来，还起草了《武汉左翼青年联盟成立宣言》，到处散发、

邮寄，甚至寄了一份给上海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新闻》，被该刊物摘要登载发表。

武汉左翼青年联盟的活动，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注意，遂要求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联盟——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负责人冯雪峰、姚蓬子等人通过刊物的关系，设法联系这支在武汉异军突起的进步文化团体。于是，“文总”在1932年六七月间派出了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学生党员谢群，以大学生暑假返乡名义来汉口寻找联系武汉左翼青年联盟。谢群来到武汉联系到陈心泉，商定由武汉左翼青年联盟派出代表去上海找党，接上组织关系。为避免发生意外，谢群留下地址后就返回了上海。

武汉左翼青年联盟内部经过商议，最终决定派遣张执一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去接党的关系。张执一于1932年7月底到达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同学秦以谷，准备按照谢群留下两个地址去联系党组织，结果秦以谷告知他这两个地方情况复杂，都不安全。正在进退维谷之时，张执一又在街头巧遇他在武汉的熟人李守宪。李守宪此时正在上海沪中区委工作，他很热心地表示愿意把张执一写的信通过中共江苏省委转给党中央。随后，江苏省委同意先恢复张执一的组织关系，让他参加沪中区委工作。

张执一刚刚安顿下来，就有三个神秘来客到访，他们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负责人冯雪峰、姚蓬子和化名老吴的胡师圣。他们告诉张执一中央已经收到了他的信，要他以后不再参加沪中区委工作，而是直接受“文总”领导。他们要求武汉再多派三四个人来，参加短期训练班培训后，回到武汉建立党组织。

张执一立即用航空信函通知了在武汉的陈心泉，陈心泉随即选派陈俊杰、张翮、魏克纯等人赶到上海，与张执一会合，以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的名义，参加了一个为期四周的短期培训班。此后，党组织又安排张执一到秘密联络点，与化名黄国平的王觉夫见面，向他宣布中央下达的新任务——派遣他们返回武汉建立一个“特委”，即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由王觉夫任书记，张执一和陈心泉为委员，并与他们约定了今后的联系方式和往来的交通人员。当天深夜，王觉夫、张执一就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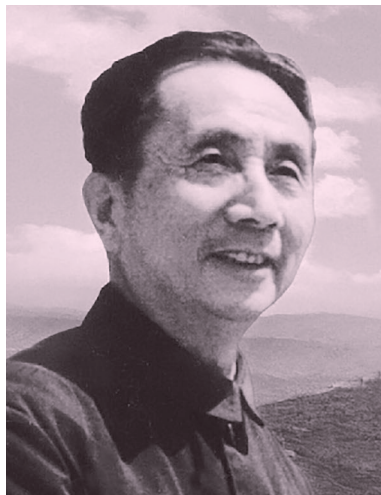
王觉夫,张执一回到武汉后,就在陈心泉家中开了一个简短的秘密会议,正式宣布陈心泉恢复组织关系,并成立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将武汉左翼青年联盟改组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武汉分盟,由陈心泉任党团书记,同时负责武汉工委的宣传工作。他们还决定把陈家作为接头地点,并商定了接头暗号。

随着党组织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武汉分盟的建立,武汉的进步文化工作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陈心泉等此前曾与上海来到武汉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成员盛家伦和吕骥取得了联系。盛家伦和吕骥都与武汉有深厚渊源,他们来汉后以教员等职业为掩护,与文化工作者陈荒煤、张庚、董启翔、郭安仁(丽尼)等联络,筹建成立了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由吕骥担任组织部长,张庚担任宣传部长,盛家伦也是组织者和负责人。他们支持刘露、曼西和许亚多等创办“鸽的”剧社,公开演出田汉编写的《卡门》等进步戏剧,并把郭安仁办的《时代日报》副刊《煤坑》变成了武汉左翼剧联的机关刊物,刊登进步文学作品。此外,还开办了一个时代书报流通社,为进步青年秘密提供革命书刊。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武汉分盟下辖的进步团体除了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外,还有武汉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有陈荒煤、张庚、吕骥、王任叔和搞世界

语的俞昌时、方善竞等,另外还成立了武汉社会科学联盟,成员有李伯刚、陈心泉等。

武汉工委还大力恢复发展武汉党的组织,指导学生运动,相继建立了省一中支部、女高中支部、女师支部、男师支部、高中教员支部、艺专支部等7个党支部,在学校发展了近50名党员。武汉工委甚至制订了《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纪念十月革命节工作大纲》,准备在十月革命节到来之时发起拥护苏联、拥护红军的活动和开展组织、宣传、募捐、工运、兵运等工作。



吕骥

正当武汉党组织逐步恢复和文化工作迅猛发展之时，武汉工委收到了一封上海寄来的密信，信中写道：“子宾叔，家中被抢劫一空，嘱子侄们速为料理善后。”武汉工委书记王觉夫看后，认为是党中央的士兵运动委员会遭到破坏，只是叮嘱大家注意，并没有采取得力“善后”措施。张执一也只是通知两个通讯联络处的受信人提高警惕。他们都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降临。

1932年10月底的一个深夜，张执一家中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声称要找王觉夫和毛剑侠。张执一感到反常，便假装说不认识这两个人。来人又提供了接头信物与暗号，毫无破绽，张执一便说“他们两人都不在，你们可以留下地址，我转告他们，让他们约好时间等你们。”这两人却坚持要马上联系他们。从两人的神情语气中，张执一感到来者不善，心生警觉，便推托说与王觉夫只是泛泛之交，不知道他的住地。两人继续纠缠一阵后，终于凶相毕露，掏出手枪说：“别装糊涂了，我们是宪兵三营的，跟我们走一趟吧。”张执一乘他们搜查之际故意大声喊叫，向住在斜对面的同事刘天墀发出了警讯，随后就被捕了。

张执一被捕后，一直苦苦思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自己身份是怎么暴露的？他思前想后，觉得敌人能知道他的住处和联络暗号，一定是出了叛徒。而知道这些信息的只有王觉夫和毛剑侠两人。在国民党军第88师从事兵运工作的毛剑侠是南京宪兵学校出身，但他已经上船向上海转移了，难道他在船上被捕叛变？王觉夫最近没有联系，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张执一很快就从看守他的一个姓吴的宪兵班长口中得到了答案。宪兵班长曾是位中学生，被骗入宪兵学校后当了兵，他对张执一这位年轻的教师比较同情，便悄悄告诉他：“我们捉到了一个姓黄的共产党，他早就把你供出来了，还供出了好些人，你得赶快想办法，不然很危险的。”张执一听后大吃一惊，因为武汉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觉夫的化名就叫黄国平，他的叛变将给整个武汉工作委员会乃至上海临时中央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和损失。必须尽快把这一消息报告给党组织！

张执一急中生智，便向姓吴的宪兵班长借来纸笔，声称要给在上海担



张执一（坐者）在狱中病监与病友合影

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的姑父写信求救。他在信中写道：“我因受友人黄君牵连，致被误捕，现拘在宪兵三团三营。黄君信口雌黄，诬我是共产党。望速飞函上海姑父，设法营救”。

这封经得起敌人检查的信件由宪兵班长帮忙发出，邮寄给了湖北师范学校。而收信人则是一个事先约好的化名，实际上是地下党员陈俊杰。陈俊杰立刻将这一信息转告了有关同志，并通知了上海党组织。由于告警及时，

湖北省立女高中、湖北女子师范、省一中、中华大学和武汉“文总”等处的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迅速转移，没有遭受损失。上海临时中央也收到了消息，及时采取措施，同时还通过秘密党员潘康时开展营救工作。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张执一始终严守机密，只承认参加了一些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由于党组织和亲属设法营救，本来面临死刑危险的张执一和陈心泉都以“共产党嫌疑”和“从事文字图书宣传，企图危害民国”的罪名，被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判处了七年徒刑。张执一于1935年8月被营救出狱后，他不顾身体未愈，第二次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再次投入党的怀抱。

由于武汉工委被敌破坏，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武汉分盟失去领导，其下辖的武汉左翼作家联盟和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陈荒煤、张庚、吕骥等虽然没有被捕，面对刀枪相向的敌人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不仅无法有效开展活动，连在汉立足也比较困难，只好分头行动，重新寻找党组织，加入新的革命队伍。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宋 健）

战斗在敌人心脏

巧借魔窟察敌情

1932年春，国民党当局决定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由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副总司令。6月23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正式设立于汉口。28日，蒋介石亲自坐镇汉口，调动3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围剿”。由于“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湘鄂西和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败，损失十分惨重，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

为了更好地掌握敌军动向，粉碎敌人“围剿”，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精干力量潜入武汉，打入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获取国民党政治军事战略情报。这个十分重要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谢甫生。

谢甫生是湖北省大悟县人。20世纪20年代初在陈潭秋、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读书，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1924年到北京上大学，1925年五卅运动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后进入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受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影响而倾向革命。他在这里认识、结交了许多朋友，为后来开展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谢甫生经刘子华、朱大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后，他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谢甫生（右）和刘璇



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参加过皖北暴动。1931年受党的委派前往陕西建立党组织，从事西北地区政治军事情报工作，归聂荣臻直接领导，一直到1932年底。

为确保潜伏安全，中央有关部门给谢甫生作了严格的规定：第一，不派交通接关系，重要情报由谢甫生亲自送到上海，一般情报可以密写寄到上海；第二，不跟任何人、任何党派及熟人来往，以免暴露身份；第三，要找个可靠的地方住下；第四，不许上街贴标语、喊口号，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1933年初，谢甫生奉命来到武汉。此时，白色恐怖笼罩江城，大街小巷军警林立，车站码头暗探密布。在国民党军、警、宪、特破坏下，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迭遭大破坏，损失殆尽，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武汉国民党当局实行“五家联保”的反动政策，一人被查出有共产党嫌疑，五家同受株连。因此，别说是打入戒备森严、特务如麻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这座魔窟，就是在武汉找个地方立足也是困难重重。

然而事有凑巧。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和他的机要秘书、司令部上校参谋是江西同乡，两人专管针对苏区的军事作战计划，许多军事计划就是这位机要秘书草拟的。这位机要秘书居然是谢甫生在西北军干部学校的同学，而且是莫逆之交。

一天，谢甫生在汉口街头遇上了这位同学，两人都感到十分吃惊。也许出于职业敏感，这位机要秘书一见面就开门见山，问谢甫生：“你是不是还在干共产党？”

谢甫生倒也很干脆，对老同学毫不隐瞒地说：“我这辈子与共产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干共产党是干定了的。”这样讲虽然冒险，但他对自己同学还是很了解。此人比较正直，当年也受过邓小平、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思想倾向进步，同情共产党，且为人重感情，讲义气。因此，开诚相见，实话实说，反而有利于争取他为党的情报工作服务。

这位机要秘书又问道，“你到武汉来找我干什么！”

“老兄，我这次从外地专程来找你，想请你帮助在总司令部谋个差事

干干。”

一个共产党员要到国民党军总司令部谋职，谢甫生来汉目的显而易见。他这位同学一听顿时变了脸色，结结巴巴地说：“老兄，你知道我有老婆，还有6个儿子，你不怕杀头我怕杀头，我帮不了你的忙，你走吧。”

谢甫生一想，不能操之过急，工作还得慢慢做，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住的问题，便“诉苦”说他还没有吃饭，也很累，需要休息。他的老同学没办法，只好带谢甫生一起回家，并把他安顿在家里住了下来。“五家联保”这一关就算闯过来了。

在同学家里，谢甫生慢慢地做工作，讲国际国内形势，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救国救民的志向，讲国民党的腐败、残暴及其灭亡的必然性。他真诚地希望他的同学能投身于这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中。他的同学本来就很钦佩共产党人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也是耳闻目睹，也想帮助老友，但他也有许多顾虑，主要是担心一旦事发身家性命受牵连。

谢甫生洞察出他的顾虑，遂拍胸作出保证：“老兄，请你放一万个心，就是蒋介石捉住了我，剥了我的皮，我决不会出卖老朋友！”同学深知谢甫生为人光明磊落，说到做到，因而很受感动，终于答应帮其搞情报。

就这样，谢甫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里几乎所有的密件、全部“剿匪”计划和有关苏区情报，每日由同学带回家中，谢甫生连夜拣最重要的摘抄，如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的“围剿”计划、军事作战部署、火力配备等，都源源不断地落入谢甫生手中。

按照中央规定，重要军事情报谢甫生都是亲自送到上海。从1933年初到1935年初，谢甫生往返上海送情报40多次，内容多是国民党军队从何处向苏区进攻、兵力番号、军事部署、作战方向、武器装备、粮饷供应等，不少信息都标注在1：50万的作战地图上，至于用密信寄出的情报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情报都由中央在上海的电台发往苏区。

1934年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军长以上将领有十几人到会。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围剿”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这份绝密作战计划由一个参谋专门监印几份后就烧掉了。谢甫生通过他的



同学得到了一份。

谢甫生连夜抄下全部计划，并标在军事地图上，翌日立即乘船赶往上海交给了党组织。上海党组织迅速电告中央苏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指示红二十五军撤离，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北上长征。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花山寨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由于已知敌人的作战计划，红二十五军从敌人重兵合围的空隙中突围北上，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保安县，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和干部，为迎接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奠定了良好基础。

谢甫生胆大心细，机敏干练，在情报工作中曾多次化险为夷。当时从武汉到上海有中国招商局、日本日清公司和英国的太古与怡和公司的客轮。谢甫生去上海多是乘坐英国与日本船只，因为国民党特务怕洋人，不敢在外国船上随意搜捕或抓人，当然也有例外。

有一次，谢甫生送情报去上海，在汉口江汉关上船，过九江时，被国民党特务盯上。这次乘坐的是英国船，特务只是怀疑，没敢抓人，到南京就上岸了，实际上是进行阴谋策划。谢甫生不敢放松警惕，马上思考对策。因为船在镇江还要停，但镇江没有码头，船无法靠岸，只能停在江心，乘客可坐划子上岸。果然，船到镇江时，岸上有一帮特务和警察守候。刚好三个公司的轮船都停在江心，谢甫生急中生智，从英国船上悄悄下来，从船背后坐小划子上了日本船。岸上的特务看不到这情景，以为谢甫生未下船，就到英国船上搜寻，没有发现目标，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谢甫生却乘日本轮船安全离开了镇江。

1935年，谢甫生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后来在天津、华北等地区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虎穴取密洒碧血

就在谢甫生潜伏汉口大量收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情报之时，

另有一位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也直接潜入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他就是时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的中校机要秘书潘文郁。

潘文郁出生于1906年，湖北襄阳人。早年曾在襄阳二师和武汉共进中学学习，受到萧楚女、董必武等教诲和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成为湖北省学联代表，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建立襄阳地区共产党组织。此后，他被党组织选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共六大上担任俄文翻译，会后留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28年底，潘文郁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离开莫斯科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和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副主编，负责日常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潘文郁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打击，被调出中央到河北省宣传部工作。6月26日，由于叛徒出卖，河北省机关遭到破坏，大部分领导人被捕，潘文郁被迫由天津转北平。7月21日，他在北平西交民巷附近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秘密接头时被捕，关押在北平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由于参与审讯潘文郁的叛徒廖化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潘文郁的共产党员身份、党内任职等无法隐瞒，潘被迫承认自己身份。党内因此对潘文郁以“自首”论处。

在被关押期间，东北军军法处长黎天才对潘文郁的才华十分欣赏，于是答应潘文郁“不带宪兵特务抓人”“不当堂对质”等条件，让潘文郁出狱成为他的私人文书，帮他撰写稿件和书籍。潘文郁乘机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共北京特科了解到潘文郁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救国理论，翻译出版《资本论》等一系列行动，对其被捕前后历史进行分析、并开展了调查研究。北京特科创建人之一吴成方认为潘文郁仍然有革命意志，可以利用特殊身份为党工作，遂派人与潘联系，吸收潘文郁为北京特科成员。

从此，潘文郁根据北京特科指示，在东北军中掌握上层特务机关的部署和动向。同时他还通过他的同窗挚友、在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处当书记官



的谭巽平帮助搜集情报。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张学良责成黎天才组织人力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便把潘文郁推荐给张学良，参与研究工作。潘文郁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的好感，他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是折服。潘文郁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于是，潘仿照《辞源》的体例，按笔画顺序，分部分类地按要求编写一本《匪情辞通》。张学良阅后，非常满意，盛赞潘文郁知识渊博，并亲自为该书写序言，还委任潘文郁为机要组中校秘书。这个岗位更便于潘文郁掌握鄂豫皖三省“剿总”的机密情报。

出任张学良的中校机要秘书以后，潘文郁利用张学良的信任和工作之便，及时完成了北京特科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为党和红军提供了很多国民党军“围剿”苏区的核心机密。

1934年10月，北京特科派杨青林到武昌找潘文郁要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情报。潘文郁把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谋处印制的所属部队团以上军官姓名、兵力、驻地表抄写一本，交给杨青林带回。这是军事机密文件，照例只发给团长以上的带兵军官和“剿总”直属各厅处组。机要组按规定领到一本，由潘文郁保管。不料1934年底，北平宪兵三团破坏了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搜查到一本“鄂豫皖剿匪兵力配置图”，经叛徒供认，指证是潘文郁交来准备转给中央军委的。宪兵三团团长江孝先如获至宝，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一件严重“泄露军情通共案”极为震怒，逼迫张学良交出潘文郁，并“着即押解来京法办”。

张学良一方面非常赏识潘文郁的知识与才华，另一方面也不愿让人抓住他亲近的人“通敌”把柄，于是电复蒋介石请求宽恕，减轻对潘文郁的处罚。同时为掩人耳目，还当即派人从机要组办公室带走了正在上班的潘文郁，收押在自己的官邸，声称“我从不出卖部下”。

大约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又发来手谕急电，限令立即处潘死刑，并指定由蒋介石亲信、时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谋长钱大钧监刑。

至此，张学良无法再保全潘文郁，只好面告他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潘很从容地说：我把我妻子的住处写下，希望能通知她。此外，他没有提出其他要求。



1988 年国家民政部为潘文郁颁发的烈士证书

1935年3月3日，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临刑前，他面不改色，视死如归，将29岁的青春永远留在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

神秘要案惊沪汉

就在潘文郁牺牲两个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内又惊爆了一桩重大情报泄密案件，在武汉、上海两地轰动一时。

武汉行营是国民党政府在武汉的军政首脑机关，也是国民党当局“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司令部和大本营。共产党情报人员是怎样潜入这个反共巢穴，又是如何获取情报并传递出去的呢？这一切要从一个名叫刘思慕（原名刘燧元）的文化人说起。

刘思慕是广东新会人，毕业于广东岭南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成为国民党左派，曾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秘书，1926年11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回国，脱离国民党，先后在北平北新书局、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任编辑。1932年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办的法兰克福社会科学院学习，在柏林参加中国留学生进步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后入维也纳大学经济系学习。1933年秋回国后，经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介绍，加入苏联红军情报部上海站（一说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上海站），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根据组织要求，刘思慕主要搜集国民党“剿共”方面的情报尤其是军



刘思慕（刘燧元）

事情报、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对日政策、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及重要人事变动，以及财政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所有情报由指定的联系人带回上海总部。为便利工作的开展，他决定打入国民党政府机关，经岭南大学同学、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汤澄波推荐，进入国民政府实业部；不久，他又找到他的同学、内政部次长甘乃光，转入内政部任秘书。他利用工作之便，把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军事计划、军用地图等重要情报抄下来，或者用照相机拍照，

然后通过上海情报站送到中共中央或各革命根据地。

1934年12月，甘乃光调到武汉行营担任主管民政与法规的第五处处长，刘思慕又通过甘乃光的关系，打入武汉行营，任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由于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知道一些蒋经国的情况，蒋介石特地在武汉行营召见他，向他打听问询。

刘思慕因受到蒋介石召见，加上甘乃光的关系，他在武汉行营地位得到提高，也没有人怀疑。于是他把很多情报秘密带回家，用照相机拍下来，按照约定的方式，把底片交给情报站的情报员，然后由有关方面发电报传递给中革军委，为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制定军事计划作出了贡献。

1935年3月3日，蒋介石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甘乃光参加了会议，并对刘思慕说：“这几天可能有重大军事行动，你要好好保管一切文件。”下午，甘乃光交给他一份文件，说道：“思慕，这是最新的剿共计划，千万保存好，马上放到保险柜里。”甘乃光走后，刘思慕立即打开保险柜，拿出文件，上面赫然写着“调周浑元部速驻扎遵义以南，同时令各路进剿部队全力阻止共匪蹿过长江……”。刘思慕快速抄完这份重要文件，于下午5时许到电报局给上海情报站工作人员黄维祐发出“货已到手，速派人领取”的电报。不久，上海站派黄维祐的丈夫王墨磐到汉口太平洋饭店取

走了情报。

4月，上海情报站派来的新联络员关兆南在秘密联络站被国民党复兴社湖北站特务抓捕，南京方面派出特务周养浩到达武汉，专门审讯关兆南。在敌人威胁利诱下，关兆南叛变，并按照特务要求给上海情报站写信，要求派一名新联络员到武汉。上海站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用德文给刘思慕写了一封信，让工作人员陆海防派人送到武汉，陆海防就派自己的弟弟陆独步做联络员送信。

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工作经验的陆独步下船后即遭特务盘问，他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引起特务的注意，一搜身就搜出华尔顿的信件，他随即叛变投敌。但他作为一名新手所知情报有限，只供出接头地点是在汉口太平洋饭店，是和一位在武汉行营工作的王先生接头，其他一概不知。

4月下旬，刘思慕与妻子曾菀一同来到太平洋饭店，恰好陆独步不在房间，茶房让他们去房里等待，刘思慕十分警觉，立即离开饭店，第二天若无其事地去上班。不久，黄维祐给曾菀打电话，要她去见面，曾菀告知陆独步出事了。闻知此事后，华尔顿立即派人乘飞机赶到武汉，命令刘思慕夫妇赶快离开武汉，并给他们350元的路费。

为掩人耳目，刘思慕特地向甘乃光请假，说是回老家探望母亲，当晚就走。曾菀也谎称老父病危，携带3个孩子搭船去上海。甘乃光便派广东老乡区伯雄送她上船，为避免行李检查，她向军警亮出武汉行营官衔名片。

当时，周养浩正指挥特务在各个码头检查，听特务们说刚才有个武汉行营的官太太要乘船去上海，顿时心生怀疑。由于华尔顿的信是用德文写的，而刘思慕曾在德国留学，又是武汉行营的上校军官，现在他们夫妇二人都要离开武汉，情况明显异常。周养浩认为刘思慕很有可能就是陆独步的接头人。碍于甘乃光的面子，他一时没有抓捕，而是派人上船跟踪曾菀，并电复兴社特务处，通缉刘思慕。

曾菀到达上海后，在南京路东亚饭店等待丈夫，黄维祐去接人，但晚了一步。因为陆海防急于得到弟弟陆独步的消息，竟然违背秘密工作原则，擅自去东亚饭店与曾菀见面。此时，沈醉带领特务正在饭店四周布控，当



陆海防赶到饭店时，便把他当成了刘思慕，立马抓人。陆海防被捕后随即叛变，立即带着特务抓捕了上海站负责人华尔顿。

黄维祐得到消息后，立即把曾菀母子安排到法租界的沧州饭店，几天后，刘思慕从天津来到上海，一家人在黄维祐的安排下，离开上海，辗转太原、济南等地，上了泰山，得到冯玉祥将军的保护，并由冯玉祥派人护送下山，经烟台到广东，乘船流亡日本。

苏联红军情报部上海站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原名雅可夫·儒德涅克，出生于立陶宛，早年投身于革命，加入布尔什维克，曾任苏联红军上校，能讲俄、德、英、法四国语言，颇有绅士风度。1933年，他接替著名的红军情报人员佐尔格，担任苏联红军情报部上海站负责人。为掩护情报工作的开展，他对情报站工作人员说是第三国际情报站（即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情报站）。华尔顿被捕后，先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押送到国民党湖北省高等法院审判。

华尔顿斗争经验丰富，革命意志坚定，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法庭上，面对国民党特务严刑逼供，始终一言不发，国民党军警虽绞尽脑汁，却一无所得，不仅不知道他的住址、姓名、年龄，甚至连他的国籍也不知道。因此，他们无可奈何地把这个案件说成“怪西人案”。

1935年8月，《申报》对“怪西人案”审判情况进行报道：上海怪西人，又称神秘西人之约瑟夫·华尔顿，前因勾结刘燧元、萧柄实、陆海防等组织机关，刺探中国关于政治上及军事上之秘密，报告第三国际，经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将陆海防捕获，继由陆自首指供，先后捕获该西人等，分别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开庭审判。其后，湖北高等法院将华尔顿等人判刑。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有求于苏联，便将华尔顿释放。不久，华尔顿经新疆返回苏联。

刘思慕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先后到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雅加达《天声日报》、昆明美国新闻处任职，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涂天向 宋 健）

红军威震新洲

吴光浩游击大崎山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后，建立了革命政权，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2月底，鄂东军突围到黄陂木兰山。此时，中共黄冈县委举行回龙山暴动，接着又发动扬鹰岭暴动。1928年1月，根据湖北省委指示，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参加回龙山、扬鹰岭暴动的队伍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六军，王定周任军长，罗四维任党代表。

第六军成立后，以烽火山为根据地，在黄冈、蕲水、罗田一带惩治土豪劣绅，发动农民抗租抗粮，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1928年1月，第六军在300多群众的支持下，袭击了国民党蕲水保安团，产生很大震动。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第六军先后处决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170余人。1月下旬，第六军一部到达大崎山、将军山一带，开展游击战。

也就是在1月下旬，国民党调集1个团进攻第七军。为保存革命力量，吴光浩根据黄麻特委的指示，于2月初率领第七军一部70余人向东转移，经将军山到达於阳岗，2月3日（正月十二）到达金鸡坳，随即在地方党组织的引导下，第七军与第六军在金鸡坳会合。两军会合后，在大崎山、将军山一带开展游击战，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夺取枪支以武装自己，试图在鄂东建立工农割据政权。

2月上旬的一天，第六军史耀华、何政等打听到徐古一个姓鲁的国民党军官携带枪支回家过年，于当晚迅速集合起十多人，突然冲进鲁家，缴获短枪1支、长枪2支、子弹200发。2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在吴光浩和



罗四维的领导下，第六军、第七军悄悄从金鸡坳出发，蹚过冰冷的河流，突然袭击驻徐古孙家河的小股国民党保安团，缴获了9支枪和2箱子子弹。几天后，他们又袭击了罗田三里畈的国民党保安团一部，又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国民党黄冈、麻城和蕲水当局立即调兵对工农革命武装发起进攻，夏斗寅部与麻城民团头目郑其玉互相勾结，向大崎山推进。一天夜晚，国民党军2个连突然包围金鸡坳。金鸡坳在大崎山之南10余里，四面都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根据《中共黄蕲罗特委书记罗四维 黄冈县委书记陈卫东给省委的报告》可知，两军是刚刚组建，缺乏战斗经验，侦察工作没做好，一些险要隐蔽处未设岗哨，也没有做好相互配合和协调工作。由于准备不足，当敌军突袭时，只能仓促应战，十分被动。好在敌军一连长受到过革命的影响，同情工农革命军，进攻时朝天开枪，还将被捕的施正甫释放，基本上是让出一条道。所以第六军、第七军在吴光浩、罗四维等的带领下，乘机猛冲猛打，迅速突围，然后转移到大崎山上，抓住树枝和藤萝下山。战斗中，两军击毙敌军1个排长和1名士兵，而自己没有人员伤亡。但黄冈县保安团营长陈正黄一路尾追而来，企图一举消灭这两支年轻的人民武装，形势非常严峻。吴光浩、罗四维带领队伍撤到山上，隐蔽在深山密林中。

金鸡坳突围有惊无险，也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但两军领导认为，部队如果继续在这一带活动，必然遭到敌军更大规模的围攻，敌强我弱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扭转，必须保存革命火种。吴光浩、罗四维等研究决定，两军分开行动，按照黄蕲罗特委指示，继续扩大游击战，“到相当时候，再行占领大崎山，以此为鄂东割据的根据地。”随即，吴光浩率第七军折向罗田，因敌紧追不放，乃转向西南回龙山，后经冈西旧街、三店，夜渡紫潭河，穿过黄安县境南部，于3月上旬重返木兰山。

第六军继续在大崎山、将军山、扬鹰岭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副军长许士林带领40多人在蕲水十三庙一带处决了几名恶霸地主。在此期间，第六军多次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发生激战，歼敌百余人，但自己也遭到惨重损失。

国民党蕲黄罗三县“剿匪”司令兼蕲水县县长皮宗仁调集 800 多兵力，对第六军发起猛烈进攻，黄冈各地地主武装蜂拥而来。第六军在优势敌军围追堵截下，虽然英勇奋战，终于寡不敌众，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第六军解体。

徐向前夜袭新洲城

1930 年 10 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 8 个师又 3 个旅共 10 万兵力，准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此时，红军尚未查明国民党的“围剿”企图，红一军军部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于 11 月上旬率领第一、二师由罗山南下，向长江沿岸进发。11 月 11 日，红一军向黄陂姚家集守敌发起进攻，激战终日；13 日，转攻黄安县城，迫使驻守上述两地的国民党川军郭汝栋第二十六师第二混成旅仓皇撤退。红一军在转战黄陂、黄安、麻城一带时，接到李紫苏区党组织送来的一个重要情报：新洲城空虚，只有地方民团防守。

新洲城又名邾城，是鄂东重镇，也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城内商贾云集，商铺林立，囤积着大量的布匹、棉衣和粮食。时值初冬，天气转冷，而部队冬装尚无着落。攻占新洲城，不仅能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而且能获得大批皮棉、布匹、粮食和药品等物资，解决部队的过冬和粮草供应等问题。有鉴于此，军部决定，长途奔袭新洲城。

11 月 30 日晚，北风怒吼，大雪纷纷，红一军第一师在副军长徐向前的指挥下，从谢店出发，向新洲城疾进。红军指战员身穿单衣，脚穿草鞋，顶风冒雪，穿过宋埠与中官驿之间的公路封锁线，越过冰凉刺骨的沙河，行走在冰天雪地里。许多战士双脚冻裂，鲜血渗了出来，雪地里留下一个个殷红的血印。21 时许，部队到达新洲城东部的潘家塘。经侦察才知道情况有变。郭汝栋第二混成旅 3 个团和特务营也于 30 日晚进驻新洲城及周边地区，旅部和第四团驻扎在城南，第六团驻城北，第五团驻离新洲城几公里的三店，但敌军尚未发觉红军的行动。面对敌情的突然变化，徐向前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趁敌立足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攻城计



徐向前

划不变，即红一师一团进攻西门，红三团攻北门，红二团阻击援敌。

许世友率红一团一营先于主力出发，担负前卫任务，于24时许悄无声息地抵达新洲城外。按照原定作战计划，许世友带领一营俘虏了敌军哨兵扫清了障碍，秘密从西门直插十字街。此时，红三团连长王建安、排长吴世安也带领突击队从北门进入城内，这几支突击队在十字街口会合。随即，许世友指挥全营迅速展开，分三路向敌军进攻。他带一个连攻进城南黄氏宗祠的敌军团部，击毙敌

团长，俘获一个排。由于敌军团部被打掉，敌军军心涣散，失去抵抗能力。进入城内的红一团、红三团乘机发起猛攻，有的跟随许世友一营向城南攻击前进，有的冲向城东，枪声响彻郟城。许多敌军从睡梦中惊醒，顿时乱作一团，纷纷逃窜，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师歼灭郭汝栋第二混成旅2个团和地方民团共数千人，俘虏1000余人，残敌和驻三店的敌五团逃向长江边的团风镇。

此役打乱了国民党原定的“围剿”计划，实际上揭开了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序幕，并给敌军以极大震动。同时，占领新洲城后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布匹、药品和金银首饰。红军战士大多是贫苦农民出身，对金银首饰、珠宝等奢侈品所见不多，不识货，有的战士把一些金镯子当作铜器玩耍，导致受损，甚至还有乱丢乱弃现象。红三团战士王新亭，孝感人，入伍前曾在当铺当了多年学徒，对古玩、书画和金银首饰有较强的鉴别能力，知道这些金银器皿的价值。为避免损失，他把金银首饰、珠宝收集起来，保管好，交给上级。王新亭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鉴定师”。

占领新洲城后，红军打开粮仓，把粮食、布匹分给贫苦百姓，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红一军官兵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自己动手缝制冬装。几天后，

全体指战员都穿上了棉衣，一个个喜笑颜开。

红一军夜袭新洲城，对武汉国民党当局产生巨大震动。国民党军事战报报道：“时至半夜，红军突来，人枪四千余，向新洲猛攻。同时城厢内外各处亦发现便衣手枪队，四处冲击。是夜适降大雪，官兵不知匪从何处，彻夜混战，延至天明，因众寡悬殊，我军伤亡甚大，子弹亦消耗殆尽，乃退守团风。”

曾中生攻占仓埠

仓埠是黄冈西面重镇，原名骑龙镇，明初在此修建储粮所，乃更名为仓埠。城西南之武湖直通长江，水陆交通便利，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联合一批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建立仓汉轮船局，开设工厂企业，因此，仓埠镇经济较为发达，商贸比较繁华，时有商家300多户。仓埠与黄陂相邻，距汉口五六十里地，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重要江防要塞，具有较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平时在这里驻扎着一个正规团的兵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夺取仓埠镇，能够获得大批军用物资、粮食、布匹和金银、纸币，解决红军的枪支弹药和物资供应等问题。

1931年7月29日，红四军政委曾中生根据李紫苏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得知仓埠守敌调去“围剿”李紫苏区，城内空虚，经与军长徐向前研究后，决定率领四军一部和黄安独立师袭击仓埠镇。部队从黄安出发，于傍晚抵达仓埠附近，驻扎在陶山铺、潘家湾、柳西湾十几个村子里。随同的还有地方党组织派来的“箩筐队”数百人，主要任务是抢救伤员、运输战利品，并协助攻城。

在地下党和仓埠群众的帮助下，军部和师部侦察兵对仓埠周边敌军动态进行了侦察，守敌并没有发现红军到来，有的猜



曾中生



拳喝酒，有的抹牌赌博，有的还在睡梦中。机不可失，曾中生立即下达攻城命令。随着信号弹升起，霎时枪声大作，红军向守敌发起猛烈进攻。“箩筐队”队员在铁桶里点燃鞭炮，就像机关枪射击，为攻城部队助威。

由于毫无防备，在红军战士猛烈攻势下，守敌心无斗志，城门很快就被攻破。敌军军官惊慌失措，如同惊弓之鸟到处乱窜，纷纷逃命去了。守卫拱辰门（北门）的敌军排长吓得胆战心惊，丢下部下溜之大吉；一个周姓连长抛掷手枪，脱下军服，换上百姓服装，扮成一个小商人，逃之夭夭；敌民团团长曾子恭手上沾满了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鲜血，血债累累，担心被俘后会被枪毙，换了衣服向武溪门（南门）逃跑。城内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官员惊恐万状，有的钻进夹墙里，有的躲在阁楼上、草堆里，有的甚至藏身于牛栏、猪圈、鸡窝里，一个个狼狈不堪、丑态百出，而更多的是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企图混进人群里逃到城外。

占领仓埠城后，红军战士在地下党员和群众的引导下，开展打土豪活动。一些大地主、大官僚和买办资本家家里，用围囤子装银圆，用柜子装纸币，整个席子铺上堆满了铜钱，还有许多黄金、珠宝、首饰、药品、布匹等。红军战士和“箩筐队”队员兴高采烈，把这些黄金、银圆、纸币、珠宝等都装到箩筐里，把粮食装到车上，全部运到苏区去了。

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见老巢被占，立即调兵向仓埠进攻。由于红军主力即将向英山、蕲水、蕲春、黄梅一带进军，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曾中生于7月30日率部撤离仓埠，并将被俘的几十个土豪劣绅带回根据地，逐一审问审查，后将其中几个罪大恶极的予以处决。

陈赓再克仓埠镇

1932年5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决定；6月12日，国民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总体部署。7月初，为部署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夏店召开会议，作出大军南下、围攻麻城的决定。

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按照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命令，向麻城开进。7日

至8日，占领麻城外围据点，歼敌2000余人，并切断麻城守敌与外部的联系，准备打击汉口、黄陂方向的国民党援军。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急调驻黄陂的第三十师增援。由于麻城地势平坦，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加上敌军火力比较猛烈，援军逼近，红四方面军决定留下少数部队监视守敌，以主力部队红四军第十、十二、七十三师向西南出击，进逼黄陂和武汉，在运动中歼敌。

7月18日凌晨三四时许，夜空月色如银，田野蛙声一片，红四军指战员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灰色军帽，身背大刀，手握长枪，个个精神抖擞，健步如飞，向黄陂方向疾进。行军途中，红四军军部得到重要情报：仓埠镇城防空虚。军长徐向前决定由陈赓率领红十二师再攻仓埠镇。

红十二师经甘棠铺、靠山店，于上午9时许直抵仓埠城下。师长陈赓作了攻城部署，红三十四团进攻北门，红三十六团进攻西门。随即，全师指战员迅速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四起，城内城外火光一片。

1931年7月曾中生攻占仓埠镇后，国民党当局对城墙进行了加固加高。守敌凭借高大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陈赓决定组建突击队，师部警卫连副连长张仁初主动请缨，并立下军令状：“如攻不进仓埠，我提头来见。”各团都成立突击队，作为攻城先锋。张仁初率领突击队率先攻入城内，却不幸被炸弹炸伤，肠子流出来，顿时昏倒在地。三十六团连指导员陈海松破门后，直接冲到正街。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和三十六团随即跟进。三十四团团团长许世友有“大刀团长”之称，在攻入城内后，他手举大刀，大声喊杀，全团官兵奋勇争先。仓埠城内，枪弹声、喊杀声响成一片，



陈赓



红军官兵在正街、东乡街、扒头街、黄陂街、骑龙镇街、横街、鸡窝街等处，与敌军展开惨烈的肉搏战。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十二师于正午 12 时许完全占领仓埠镇，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一个特务营和地方民团，缴获武器弹药等军需品无数，还有粮食上千担、食盐万余斤、银圆数万枚。红军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每个红军战士也发了一块银圆。李紫苏区党组织动员群众数百人组成运输队，为部队搬运战利品。红十二师还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员。

红军占领仓埠直接威胁武汉。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由水路直趋仓埠，第三十师彭振山部由宋埠、岐亭向南进逼，第八十九师汤恩伯部集中于黄陂祁家湾车站一带，阻止红军主力西进，企图合围红军。为了打乱国民党军的部署，红四军决定回师反击。7 月 26 日，红军独立第一师配合红七十三师，在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线，与张印相部之三十师、三十一师展开激战，重创张印相部之三十师九十旅，全歼特务旅一个团，第二旅缴械投降。

据统计，这几次战役共缴获长枪 5000 多支、机关枪 20 余挺，其他军用物资无数。

鄂豫皖中央分局战报对仓埠、李集、靠山店战役进行详细报道：“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又将驻黄冈仓子埠匪军完全击溃，于昨日上午十二时，占领黄冈仓埠，缴获无数……”“红军独立一师配合七十三师激战，将匪军全部击溃，匪军二旅被我军缴械……”

林维先转战冈西

1935 年 2 月初，高敬亭率红八十二师二一八团与方永乐领导的鄂东北独立团在安徽太湖县凉亭坳合并成立红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高敬亭任军政委，罗成云、方永乐分任八十二师师长、政委。随即，高敬亭决定红二十八军到黄冈大崎山一带开展游击战，建立游击根据地。

1936 年 2 月，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一营营长林维先率领 1 个连出击鄂

东地区，在马鞍山遭遇国民党湖北保安八团一个连，意想不到的的是敌连长没有看出这是一支红军，命令号兵吹号联络。刚好林维先缴获了敌军号谱，便命令司号员应联，麻痹敌军，随即命令部队从左翼迂回抢占制高点，将敌军包围，共俘虏 60 余人。接着，林维先率部进入冈西柳林街，歼灭了部分国民党民团武装，与活动在旧街一带的共产党员王福堂接上了关系。

7 月初，林维先率一营到平汉路西活动，途经仓埠，为发动群众，决定消灭驻守仓埠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当晚，一营对仓埠发动突然袭击，反动民团被打得措手不及，狼狈逃窜。

与麻城、新洲接壤的接天山主峰高 870 余米，东边与大崎山相连，西面是将军山。接天山主峰西南面为刀削斧砍般的垂直石壁，高 180 米；西北面也很陡峭，地势险峻。历史上曾有民谣曰：“鄂郡有座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脱帽，马过要下鞍。”1937 年 3 月 30 日，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主力运动到接天山和将军山一带，军部驻胡家山，林维先也率部随军政委出征。因消息泄漏，次日早上，国民党军分两路从西北方向扑来，一路由徐古柳树河沿千里岗向将军山进攻，一路由邓家山向胡家山运动，情势十分危险。高敬亭当机立断，命令排哨阻击敌军，掩护主力分散转移。战斗开始后，排哨在黄冈便衣队的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且战且退，与数十倍之敌激战长达 4 小时之久，牵制了敌军一个团。高敬亭则率主力沿台阶拾级而上，穿过被当地群众称之为“鹞子翻身”的险境，到达山顶七姓庙，然后向麻城夏家山转移，终于脱离险境。

6 月 5 日，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副团长林维先率特务营和手枪团一部到贾庙、道观河一带游击，驻扎在望军寨。这个寨子呈西北至东南走向，长 700 米，宽 30 至 40 米，建于清朝，全部用石块砌成，高 3 至 4 米。林维先警惕性很高，先在寨子西南面放了排哨。恰在此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一九三团前卫营从道观河方向冲过来，目的就是拦截红二十八军，刚好在望军寨遭遇了。林维先指挥排哨抢先占领制高点，向望军寨北端和迂回之敌猛烈开火，很快将敌人火力压下去了。特务营主力则从侧后包抄，左右夹击敌人。经过 2 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前卫营被歼灭，敌营长被击毙。



战斗结束后，特务营迅速撤出战场，向猫儿山转移。

6月中旬，林维先率手枪团一部到李集、仓埠一带游击，发现李集、余家岗地方民团百余人在此地集结。林维先灵机一动，将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别动队，大摇大摆地向民团走去。这些民团头目见对方是“国军正规部队”，毫不防备，被手枪团全部缴械。

1937年7月上旬，为寻找与军部失去联系的团特务营，林维先率手枪团第一分队进入黄冈，由徐古柳树河向金鸡坳进发，途中发现山岗上有一座很大的碉堡挡住去路。林维先便化装成国民党军三十二师某部长官，假称是“追击”共军，国民党军排长也就相信了，打开寨门。红军乘虚而入，将一排敌军全部俘虏，撤离时将碉堡炸毁。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宛平城，全民族抗战爆发。7月20日，高敬亭派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与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刘刚夫在岳西县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此后，红二十八军在冈西地区的游击战基本结束。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涂天向）

将军山上红旗飘

重建将军山游击根据地

将军山海拔 675 米，“一山挑三县”（三县指黄冈、麻城、罗田，当时新洲属于黄冈县，习惯称之为“黄冈西乡”，简称“冈西”），是武汉连接鄂东、皖西、豫南的咽喉，历史记载曰：“据翼轸之分野，当楚蔡之通衢”，具有比较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山洞、峡谷颇多，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同时，这里是三县边界，是个“三不管”的地方，为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从 1928 年 9 月开始，共产党员刘天元、周德顺、陶子玉等在中共鄂豫皖特委和贾铁区委的领导下，发展党组织，建立秘密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组建农民武装，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抗租抗息斗争，打击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到 1930 年夏，以将军山为中心的新洲东部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地域范围在柳树河、道观河、杨家山、新集及周边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旧街街、徐古街一带。1931 年 5 月，国民党黄冈县政府调集地方武装，对将军山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因力量悬殊，游击根据地解体，大多数党员干部撤到李紫苏区。

1932 年 9 月，红四方面第四次反“围剿”失利，李紫苏区失陷，刘天元、周德顺等先后回到将



新洲徐古街将军山



刘天元（画像）

军山。此时，将军山、大崎山革命形势陷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鄂东，国民党在大崎山、将军山一带部署了1个正规营、1个地方保安团和乡保武装，主要目标就是捕捉漆先庭、刘天元、周德顺、陶子玉等知名共产党人，彻底瓦解中共组织，动摇人民的信念。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漆先庭和刘天元、周德顺等在贾庙召开秘密会议，传达鄂东北道委常委郑位三的指示信。郑位三在信中说，今后大别山的局势将会更加恶劣，“你们要注意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坚信革命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成功。”会议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决定开展秘密斗争，稳妥发展党组织，恢复重建游击根据地。

会后，刘天元、周德顺等把恢复重建党组织作为首要工作。经过考察甄别，重建横坡坳党支部，刘天元任书记，周德顺任副书记；陶子玉对油麻岭党支部进行整顿，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入党；王福堂在王兴寨、利子河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若干个党小组和党支部。到1933年，新洲东部地区共有党员100多人。

为恢复将军山游击根据地，刘天元、周德顺、王福堂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从革命斗争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们吸取游击根据地创建初期血的教训，不搞“轰轰烈烈”“大张旗鼓”，而是进行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发动工作，筑牢基础。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以某种特殊身份作掩护。如刘天元“皮影戏”唱得非常好，有“皮影戏”大王之称，为了充分发挥“皮影戏”的宣传效果，刘天元剔除了传统“皮影戏”的封建糟粕和黄色内容，大量增加革命思想和反封建的元素。他声音洪亮圆润，词调清晰，男女声都会唱，尤其善于提影子，人物动作活灵活现。在戏中，他把豪绅地主阶级勾结国民党政府欺压鱼肉百姓的罪行、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唱了出来，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许多贫苦农民看后触景生情，流下了心酸的泪水，戏场一片哭泣声。他把

唱“皮影戏”与宣传革命有机结合起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取得很好的效果。

左靖斋曾读8年私塾，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学会了算命、测字、卜卦，还会说书。他白天化装成道士或算命卜卦先生，晚上则变成说书先生，在旧街、柳林一带开展宣传工作。在说书过程中，他大讲水泊梁山，还自编了一些劳动人民反抗官府的故事，鼓励贫苦农民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此外，陶子玉扮成乡村货郎，王福堂化装成江湖艺人，周德顺拿着钓鱼竿钓鱼，他们走村串户，访朋问友，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鼓励党员和革命群众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继续坚持斗争。他们还到新集、徐古、旧街、柳树河、柳林、打石河一带，到处张贴标语，甚至贴到土豪劣绅家门上、国民党乡政府和乡保长门口以及国民党驻军据点。

在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的基础上，党组织把建立红色村庄作为工作重点。刘天元、周德顺以横坡坳为中心，把刘家湾建成红色村庄；陶子玉以道观河为中心，把油麻岭建成红色村庄；王福堂以王兴寨为中心，把新屋湾建成红色村庄。在此基础上，他们不断向外扩展。1935年夏天至1936年春，刘天元在程远里、熊家寨等村进行秘密工作，唱了几个月“皮影戏”，把这两个村子及周边一些村子变成红色村庄。

刘天元、周德顺、王福堂等还成立了一批秘密农会，组建了几支秘密武装，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捐斗争，袭击国民党地方民团武装，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乡保长，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

经过3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36年春，以横坡坳为中心的将军山游击根据地得以恢复并得到扩大，大致范围北到麻城夫子河，西到打石河，南到旧街、柳林一带。新洲东部山区革命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打造红二十八军后方基地

1936年春，红二十八军与新洲地方党组织恢复了关系。5月下旬，军政委高敬亭率手枪团达到大崎山、将军山一带活动，漆先庭、刘天元、周德顺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先后赶来汇报工作。高敬亭听完汇报后认为黄冈



高敬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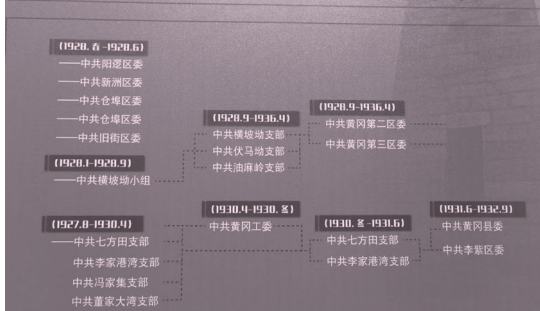
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决定成立黄冈便衣队，汪少川任队长；组建中共黄冈中心县委，汪少川任书记，漆先庭、刘天元、周德顺等为委员。随即，中心县委决定成立4个区委，第二区委在横坡坳成立，刘天元任书记，周德顺、陶子玉为委员；第三区委在旧街王兴寨成立，王福堂任书记，王寿堂任副书记。

红二十八军进入大崎山和将军山后，新洲革命斗争形势出现新的局面，将军山游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

发展。中共黄冈第二、三区委在刘天元、周德顺和王福堂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把新洲东部山区建成红二十八军的后方基地。

按照红二十八军和中心县委的要求，1936年5月第二、三区委成立的同时，黄冈二区、三区便衣队也宣告成立，共50余人枪；二、三区委所辖各支部亦组建便衣队，少则数人，多则十几人，两区便衣队共有100余人枪。便衣队成立后，主要是侦察敌情，救护伤员，运送物资，配合红军作战。1937年3月底，国民党军突然袭击进驻胡家山的红二十八军军部，便衣队及时将情报送给高敬亭，同时在将军山一带开展伏击战，骚扰、迟滞国民党军的行动，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和转移。5月，三区便衣队将驻守新洲城的国民党军诱骗出城，红二十八军一部乘机发起突袭，共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200余人。6月中旬，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在便衣队的支持配合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乡党组织沿革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乡党组织沿革表

袭击了余家寨、李家集国民党军据点，歼敌 200 余人。此外，便衣队还袭击国民党乡保武装，处决反动乡保长和叛徒。1936 年下半年，陶子玉带领便衣队乘虚袭击了驻烟墩塆、仙姑庙的国民党地方民团，全歼守敌，炸毁碉堡 2 座。新集街地头蛇陶喜生敌视革命，欺男霸女，多次向国民党密报便衣队的行动，罪大恶极。1936 年 6 月，王福堂率三区便衣队在新集街将其处决。梅家河一恶霸地主反动透顶，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恶贯满盈。1936 年夏的一个晚上，王寿堂带领便衣队员潜入村里，将其处决。刘天元也带领便衣队处决了恶霸地主包老谷等人。这些都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黄冈中心县委和二、三区委还动员组织青年参加红军。统计资料表明，到 1937 年八九月，黄冈县 4 个区共有 500 多人参加红军，共组建 2 个战斗营。

黄冈二、三区委成立后，把为红军提供粮食、银圆、药品等物资作为首要工作，抓紧布置和落实。二、三区委通过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开明地主和富商的同情与支持，筹集资金和各种物资，支持红二十八军。艾家山的余福泰在沙河开有多家商铺，在武汉、上海也有产业。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十分不满，同情共产党和红军。经过刘天元等人的说服教育，表示支持革命。徐家沟的大地主陶宇成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经过党组织做工作，捐出了一批食盐和粮食。1936 年，刘天元筹集银圆数千块、粮食 1 万多公斤，全部送给红二十八军。三区委还通过打土豪筹集资金。1936 年夏，王福堂带领便衣队悄悄潜入新洲城，活捉大土豪毛竹宇，筹款上万银圆。王寿堂长期在新洲城及周边活动，通过打土豪，获银圆数千块。据统计，到 1937 年 7 月止，黄冈便衣队共为红军筹集银圆 20 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二、三区委和便衣队提供的。

对于红军急需物资，二、三区委更是竭尽全力予以支持。1936 年夏，红二十八军某部在杜皮一带活动，十分缺乏粮食。那段时间连降暴雨，山洪暴发，王福堂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群众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流，将大批粮食等物资送到杜皮孙家冲龙王山中，解决了红军的粮食困难。随着伤病员增多，药品是个大问题。虽然党组织发动群众采摘中草药，但这远远不够。



一是到了夏天，山中蚊子很多，很多战士患了疟疾，需要大批奎宁；二是缺乏消炎药品，尤其是青霉素奇缺。当时，购买药品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因为国民党控制很严，一旦发现，就有被捕牺牲的危险。熊毓南刚刚参加革命工作，年龄较小，主要工作就是到处买药品。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他想了很多办法，如不在一个地方重复购药，采取“昨天去新洲，今天上柳林，明天到新集，后天上打石河，轮换进行的办法”。每次只买一两种药，而且不多买，还要藏好，防止检查时被发现。由于小心谨慎，他没有出任何问题，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因为购买药品是一件大事，事关伤病员生命健康和战斗力，因此，漆先庭、刘天元、周德顺等县、区委负责人亲自出马，利用各种关系，买来一些西药。刘天元、周德顺通过余福泰、陶宇成等统战关系，购买了一些重要药品。县、区便衣队则捕捉大地主和国民党官员，威逼他们为红军购买药品。如漆先庭带着便衣队来到大地主杨世良家里，拿出一小袋银圆往桌上一放，两眼看看他的幺儿子，然后对杨世良说：“杨保长，你为我们做过一些好事，我们记着呢。现在麻烦你去为我们买点专治‘皮寒’（黄冈群众习惯把疟疾说成是‘打皮寒’）药回来。”过了几天，杨世良就到新洲城利民药店买回32瓶奎宁。黄冈中心县委和各区县委通过各种途径，为红二十八军提供了许多西药，挽救了许多红军官兵的生命。

随着红军和便衣队的发展壮大，枪支弹药和军服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36年9月，刘天元克服重重困难，在琵琶垸创建军服厂。他动员支持或倾向于革命的本地裁缝和进步女青年到军服厂工作，原材料主要来源于便衣队打土豪得来的布匹、皮棉，也有一部分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的棉花，经费是打土豪获得的部分银圆，这些银圆存放在细盆冲湾红军伤病员护理所里。到1937年7月，军服厂共为红二十八军缝制军服200余套，还有一些军帽、军鞋和袜子等。王寿堂则不顾个人安危，带人北上河南，一路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闯过国民党一道道关卡，购买到一批枪支，全部送给林维先。

将军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十分残酷的。为了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许多共产党员壮烈牺牲。1936年8月，因叛徒告密，国民党军为抓捕王福堂，突然包围了新屋湾，将数百名群众围在稻场上，架设机关枪准备大屠杀。关键时刻，王福堂挺身而出，怒斥敌人。他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同年11月，王寿堂在新洲城为红军筹集粮食时遭遇国民党军巡逻队而被捕。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经受住国民党的严刑拷打，壮烈牺牲于道观河。还有一批便衣队员在救护红军伤员、反“围剿”斗争中英勇牺牲。

建立红军伤病员护理所

红二十八军转战大崎山、将军山，伤病员不断增加，黄冈中心县委根据高敬亭的要求，决定在这一带建立红军医院，医治护理伤病员。1936年夏，刘天元在熊家寨、梁家湾、刘家湾等村建立了几个医疗护理点，9月，由于坏人告密，熊家寨、梁家湾医疗点被破坏。刘天元、周德顺总结教训，认为医疗点应该具有较好的隐蔽性和安全性，经实地考察后，决定在徐古细垆冲湾建立医疗点，指定周德志（周德顺弟弟）等人负责。

细垆冲湾在将军山深处，当时只有2户人家，人烟稀少，不太引起敌人注意。这里地理条件优越，山高林密，山里有个大夹山沟，地势险要，往里走还有一片原始森林，四周有许多山洞，隐蔽性好，一旦发现敌情，能够快速转移；周边一些村庄群众基础好，便于开展救治护理工作；山中还有一些中草药材，有利于救治护理红军伤病员。

刘天元把医疗点设在董金堂家，动员几个本地郎中做医生，几个进步女青年为护士。董金堂和妻子熊杏英也参加护理工作。医疗点共3间房，80多平方米。后来人们把这个医疗



红军伤病员护理所旧址位于长岗山村垆冲（今笨冲湾）



点取名为红军伤病员护理所。

护理所主要收治伤势较重的伤病员，安排医护人员专门治疗和照料。伤势较轻的或一般疾病患者，则安置在党员和革命群众家里，也就是后来的“堡垒户”，多由群众照料。平时，医护人员提着篮子以走亲访友为名，走村串户，为分散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检查伤口，送药换药。根据地人民对红军伤病员热情周到，精心护理，自己吃野菜、草根、树叶，省下粮食、鸡蛋给伤病员吃。当时，黄冈中心县委规定，群众每照顾一个伤病员，每天补助半块银圆，但群众坚决不收钱。对红军重伤员，群众进行特殊护理和照料，甚至把家里正在下蛋的老母鸡杀掉煨汤给重伤员喝。他们还用火烧粑、竹笋和野菜搭配，专门制作成“重伤病员餐”，就是现在徐古街的“红军饭”。

国民党军队“清剿”时，党组织就迅速把伤病员送到山洞里，护理所的医护人员和许多党员群众都曾冒着生命危险，为山洞里的伤病员送吃送药。如红二十八军某部王教导员负伤后，被安置在细盆冲垮陈济岩。当时，国民党军队封山封路，不许群众上山，发现后立即开枪。护理所一位医生不惧生死，利用风高夜黑或大雨天气国民党军放松警惕之机，独自往山洞里送饭、送药、治疗，坚持2个星期，王教导员治愈归队。

有时遇到突发情况，党组织就把来不及转移的重伤员安置在国民党乡保长、大地主家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望军寨战役中，有位姓夏的副排长负伤了，刘天元派张建中过来安置护理。张建中把夏排长背上山，安置在一个山洞里，这个山洞两边是悬崖绝壁，上窄下宽，便于隐蔽，但送饭送药很不方便。几天后，张建中又把夏排长转移到东岳岩山洞里，这个山洞较高，比较凉爽，空气流通，但由于缺医少药，夏排长伤口化了脓，脚肿得很大，疼得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张建中便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周德顺经过认真思考后，便带着便衣队员把夏排长送到於杨岗大地主杨世良家里，直接说我们的一个排长挂彩了，我们把他交给你，你要负责把他的伤治好。说着话锋一转：“如果你动了他一根汗毛，当心你的脑袋！你这房子也叫它化成灰！”杨世良惊恐万状，连忙回答说：“听

到了，杨某愿以全家性命担保，决不食言。”周德顺走后，杨世良把夏排长安置在北屋的楼上住下，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还派人到新洲城、新集镇去买药，过了几天，夏排长伤口的炎症逐渐消去，身体也好起来。经过20多天的治疗，夏排长伤口愈合了。不久，他随同二四五团团团长梁从学一起归队。

在护理伤病员过程中，根据地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母性群体——“红嫂群”。她们用母性的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呵护伤病员的生命健康，用自己的乳汁挽救身负重伤的子弟兵。董金堂的妻子熊杏英多次用自己的乳汁滋养伤病员。一次，便衣队送来一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正在给孩子喂奶的熊杏英立即放下自己的孩子，转身给伤员喂奶，但红军战士处于昏迷状态，张不开口。熊杏英便拿着奶头往伤员嘴唇缝隙里挤奶水，挽救了这位战士的生命。还有一名重伤员被送到党员家里，他发动村里正在哺乳的妇女每天挤出奶水送给伤员喝。1937年初，一个红军排长身负重伤落入塘中，失去知觉，刚好被一位女护士发现，她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将其救起，背回护理所，放在地铺上，立即脱掉伤员的湿衣服，用棉被将他盖得严严实实，再烧木炭升温驱寒，将这位排长救醒。

在群众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许多伤病员伤愈归队，重返战场。据统计，从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各个医疗护理点（包括漆先庭在杜皮建立的红军医院）共治疗红军伤病员约200人。此外，护理所还救治了一些负伤的便衣队员。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涂天向）



一二九运动在武汉

山雨欲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停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味镇压打击，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驱动下，武汉青年学生发出抗日救亡最强音，谱写了一二九运动在武汉的壮丽史诗。武汉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使窒息多年的武汉三镇重新复苏，为中共党组织在武汉的恢复和武汉成为抗战初期全国抗日救亡中心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首通俗易懂的民间歌谣，一语道出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执政”的“满洲国”，东北三省事实上沦为日本殖民地。在国土沦丧的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仍顽固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日本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狂妄野心，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10 月，日本策动河北省香河等县汉奸暴乱，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 月，日本又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

险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仍然坚持铁腕反共，对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妥协退让，尽量满足日本的各项无理要求。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华北上空，华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奋起反抗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江城武汉，虽不像华北那样直接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但日本的经济侵略让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在武汉，洋货充斥市场，尤其是日本的花色洋布在市场上大量倾销，让我国土产的印泥布和向来颇具盛名的阴丹士林布卖不出去，民族纺织工业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民间“抵制日货”的浪潮在持续酝酿、发酵。在政治上，武汉政府中抗日派和亲日派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何梅协定》签订后，武汉民间盛传亲日派湖北省主席张群要出任外交部长，亲日派的急先锋杨永泰要来湖北任省政府主席，激起本土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日抗战的主张。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本侵略，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提出了七项对日作战具体主张。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在日军侵入华北之始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自由、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在寻求抗日救亡之路的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武汉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文化界左翼人士张光年、孔罗荪、顾一凡等人在武汉通过办刊物、组织剧社、开设书店等宣传抗日。进步教师霍恒德、李实、黄心学等怀着对革命的向往和对



祖国的热爱，以不同方式向学生进行革命理论和爱国主义教育。有的以讲时事为名告诉学生，毛泽东、朱德正带领红军进行长征，北上抗日；有的在课堂上公开讲解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利用课余时间引导学生阅读《大众生活》《萍踪寄语》等进步刊物。各种读书会也应运而生。在生活书店有霍恒德、顾一凡等人组织的读书会，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有李实组织的读书会，在武昌省立高级中学有何功伟等人组织的读书会，在武汉女中有许立人等人组织的读书会。另外，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的王曦和湖北省男子师范学校的郭仁寿还组织了都府堤18号读书会。通过读书会，这些进步师生把分散的抗日力量集结起来，共同寻找抗日救亡真理。此时，由于武汉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各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中很少有共产党员，但他们都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们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深受党的影响，热爱祖国，追求进步。

1935年12月9日，战争阴云密布的北平终于发出了怒吼声。这天，万余名爱国学生在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领导下，冲破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全国抗日民族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救亡怒潮

1935年12月10日，东北同胞主办的《大光报》在武汉率先刊出了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消息。这则新闻消息，犹如一股从北方径直而下的劲风，吹散了武汉长期沉闷的政治空气。10日晚，武昌华中大学爱国学生陈述元、刘济安、刘夕藩等在学校“思殷堂”开会，成立了华中大学学生自治会。陈述元以该会的名义奋笔疾书，起草了致北平各学校的电文。文中高度赞扬了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并宣布在此华夏陆沉、民族沦丧之际，武汉学生愿意做北平学生之坚强后盾。

国民政府对一二九运动的沉默并没有阻断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武汉大学，一封从北京辅仁大学寄来的长信，详细描述北平游行队伍在王府

井南口与阻挡学生游行示威的国民党警察的水龙奋战的情景。武大学生将用大字抄写的这封信张贴在文学院门口，还找来一把旧菜刀置于墙沿，另纸书明：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当时的文学院大楼兼作学校办公楼用，来往人员众多，这封信就像在一锅热水下加了一把猛火，立刻开锅，广大学生情绪激昂，奔走相告，并积极商谈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另外，为争取教授和学校当局的支持，武大学生还草拟了一份《致全校教授先生书》，声泪俱下地疾呼：“吴越的故事已成史迹，别人早已做好了铁枷，使你再也不能做那‘生聚教训’的美梦。敌人侵占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而平津，而整个华北。谁能担保不再而武汉，而……而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凌迟。”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得到王星拱等教授的同情和支持。

在爱国热情的驱动下，以武昌省立高级中学、华中大学等校为首的进步学生开始串联。华中大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发表了救国宣言。武昌省立高级中学学生何功伟、姚树森等特别活跃，分头到各校串联，酝酿全市的游行示威。12月12日，武汉中等以上学校联席会议在华中大学昙华林召开，共有40余校的10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政府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以振民气；惩处一切卖国贼，声讨殷（汝耕）逆，以正法纪；保障正常的爱国运动和言论、结社、集会、出版、新闻自由，以伸人权。会议还推举华中大学、武汉大学、市一女中三校承担学生运动的领导责任。15日，华中大学、武汉大学等负责单位代表开会，决定发起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讨论开展学生运动的步骤和建立统一的学联领导机构等问题。17日，53所学校的120余名代表再次集会昙华林，正式成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救国联合会”，宗旨是“唤起同胞，共挽存亡”。会议推举许升阶为主席，省高的何功伟、市一女中的万国瑞（杨纯）、女师的王曦等一批进步学生为学联的常务干事。学联成立后，立即着手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进行了秘密的组织发动工作。次日，学联在武大召开第二次干事会，讨论学联章程和游行示威等具体事宜，决定20日在武汉三镇同时游行示威。

19日晚，武汉大学一些进步学生撕了床单，为参加游行的同学做了袖章，



同时油印传单，书写标语。预料到政府第二天必然封江，一些学生连夜渡江，登上江汉关。20日清晨，武汉三镇各校学生纷纷走向街头，“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媚敌外交”的怒吼声回荡在江城上空。10时许，汉口7所学校4000余名学生汇合起来，沿着江汉路等周边道路开始游行。与此同时，汉阳的省高工、训女中学等校1000多名学生也结队走上街头。武昌学生是此次武汉学生运动的主力，他们不但人多势众，而且行动坚决。清晨6时，武大等校学生就已整队前往省府门前集合，9时40分，各校完全到达，共计50余单位万余人，他们手执各色旗帜，向平湖门进发。宣传队、交通队在前面开路，纠察队则两边梭巡，队伍整齐雄壮，秩序井然。学生们沿途高呼口号和散发《宣言》等宣传品。《宣言》写道：“虽然我们明知许多学生已经为爱国运动而牺牲在本国军警屠杀之下了，但这不足以威吓我们，我们有热血，我们有头颅，我们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我们有与生俱来的爱国雄心，我们还会畏缩害怕吗？”字里行间，搏动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武汉爱国学生的无限赤诚。沿街围观的市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入了游行队伍。

11时，武昌游行队伍到了汉阳门，准备渡江到汉口继续游行。果然不出所料，由于国民党当局下令封江禁渡，连沿江的划子都被驱赶走了。汉口游行学生准备迎接武昌学生过江，也被阻挡于江汉关码头。游行总指挥部召集各队长开会，决定派部分学生去省建设厅请愿，要求恢复轮渡，反被视为“目无法纪”和“无理取闹”，威胁要“事后查办”。在这关键时期，担任游行总纠察的省高学生何功伟挺身而出，稳住队伍，并根据多数学生的要求，露宿长街，彻夜请愿，不达渡江目的誓不罢休。

隆冬的深夜，北风呼啸，寒气刺骨。学生们睡在马路石板上，又冻又饿，但救亡歌声此起彼伏，回旋震荡在武汉夜空。这时国民党当局派人前来说，遭到同学们痛斥。市民、商人和各界群众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深深感动，他们彻夜不闭门户，“曹祥泰”“伍亿丰”“冠生园”等商号抬出大批饼干、糕点和糖果，居民们拿出棉被、干粮，送出开水、热粥，整个长街洋溢着浓浓的爱国热情。

21日清晨，严霜未消，学生们不顾疲劳，又开始了新的斗争。他们冲向省政府，继续要求调轮渡江。交通厅长在省政府里召集各校校长开会，企图动员学生回校。在学生们坚持下，省政府将请愿代表何功伟等请进去谈判。代表们坚持：不恢复轮渡，不让过江，同学们就绝不回校。谈判一直僵持到下午，外面的几千学生等急了，以为代表们被扣留，就一起冲向省府的大门。守门的卫兵退进门里，关上大门，学生们就扛来大木柱朝大门冲撞。面对此种局面，湖北省政府代主席卢铸只好同意第二天恢复轮渡。

22日，反动当局只派了3艘渡轮，限制大批学生渡江，同学们为此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日，武大、华大、艺专、省高等19校2000余人终于渡江，来到汉口王家巷码头。汉口学生列队江边欢迎武昌战友，汉阳学生也来到汉口。三镇学生汇合后，于11时由王家巷列队出发游行。

23日，三镇学生万余人在汉口举行市民大会，成千上万的市民前来参加。学生们踊跃登台演讲，为挽救民族危亡大声疾呼；为锦绣河山被断送，爱国志士被监禁、被屠



何功伟

杀而失声痛哭。台上台下，学生市民心心相印。会后举行了万人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蜿蜒长达两公里。他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十余万市民夹道观看游行，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当游行队伍到达日租界附近时，日租界戒备森严，拉上了铁丝网，架起了机关枪；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也褪下了炮衣，炮口对准游行队伍。此情此景，学生们悲愤至极，振臂高呼：“日本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正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像惊雷炸向日本侵略者。部分学生还冲破阻拦，边喊口号边冲入了日租界。

在广大爱国学生的影响下，武汉各界民众也积极投身到这场抗日救亡运动中。12月25日，汉口30万工人电慰学生救国会，表示愿与武汉学生共存亡。汉口邮务工会为支援学生救亡运动，印发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宣言，



表示为了领土完整，民族生存，誓率湖北省两千邮工奋斗到底！商会也对学生们的救亡图存爱国运动表示钦佩。省教育会表示愿作学生救亡运动的后盾。武汉大学教职员也于24日召开全体大会，成立了“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并致电南京，要求国民政府严令各地军警当局，不得摧残爱国运动。

武汉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由省城扩展到了全省各重镇。12月25日，应城学生结队示威游行到县府请愿，遭到应城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当场致伤40余人。武汉报刊披露了“应城惨案”的真相，应城学生也派代表2人赴省城求援。武汉学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行动。12月30日上午8时，武汉41所学校举行了全体总罢课，且每校推代表2人，由学联负责人带队前往省府请愿，提出各级政府切实维护爱国运动、惩办肇事凶手、派车船让武汉学生赴应城调查事件真相、慰问受伤学生等4项要求。开始，国民党当局仅派省教育厅一官员应付，学生们极为不满，席地而坐，以示抗议。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最后终于迫使省政府答复了学生的要求，决定：应城县长刘寰新向学生公开道歉，并在应城公园建立学生爱国运动纪念匾，由县政府担负受伤学生全部医药费，同时通电全国向学生道歉，另对4名肇事士兵则处以军棍并判处有期徒刑，将值日官姚楚才押解省城，依法惩办。至此，声援应城爱国学生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学运余波

从1935年12月20日的三镇学生大游行到12月30日声援应城事件武汉41所学校总罢课，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武汉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但是，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加上学运骨干缺乏经验，武汉青年学生运动在反动当局的疯狂反扑和破坏下很快转入低潮。

一天，汉口市长吴国桢怒气冲冲地来到市一男中对全校师生训话，说：“我参加过五四运动，那是胡闹”，“学生爱国就是读书”，“读书就是爱国”。训完话后，在吴国桢授意下，汉口各校长、训导主任纷纷出动，对参加游行的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所谓的“读书救国论”教育，诱骗学生脱离运动。

另外，反动当局还动用大量军警对学生领袖进行分化恫吓，并抓捕进步学生。

蓬勃发展的武汉抗日救亡运动，让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感到如芒在背。12月28日，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电令武汉警备司令部：绝对禁止集会、游行，如有违者依法严厉制裁。紧接着，湖北省教育厅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手段，除宣布各校提前放假外，还于1936年1月底规定：对妨害课业的学生，立即开除出校；对煽动罢课或“干涉校政”的学生团体要制裁。反动当局的御用文人也“奉劝学生运用理智救国”“不要反对政府和学校当局”，等等。国民党当局还重新颁布了《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制造恐怖气氛，各校复兴社、C.C.顽固分子也乘机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身为武汉学联主席的许升阶迅速变节，听命于国民党当局，不再组织任何活动。

面对武汉学运举步维艰的困难局面，武汉青年学生的爱国之心、救国之举并没有停息。在珞珈山，武汉大学进步学生正式成立“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发布了《救中国》会刊，为抗日爱国摇旗呐喊。

1936年春，武汉学联进行改组，由省高的何功伟（后来由姚树森代替），市一女中的万国瑞、余梅青，女师的王曦，二女中的林齐凰等人组成学联委员会，推选华中大学的陈述元为主席。这时，武汉学运面临一个突出问题，即缺乏有力领导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深入。在白色恐怖中直接领导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亲身经历，使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逐步认识到，救国必须反对独裁，学生运动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爱国主义，它的光明前途在于依靠先进政党——共产党的指导和指引。

女师学生王曦是武汉一二九运动的领袖之一，她以武昌都府堤18号读书会为基础，团结省师、乡师、省一中等校的郭仁寿、王锡珍等一批进步学生和青年，于1936年春自发成立了党支部，王曦任支部书记。5月，王曦、郭仁寿先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们找到张执一，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上海临时工委承认了他们自行组织的党支部，称之为中共武汉支部，指定王曦、郭仁寿分别为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随后，王曦奉命返回武汉，将读书会积极分子分别吸收入党。中共武汉支部的成立，结束了自1932年



底以来中共武汉地区党组织的空白状态。但是，这个刚刚成立的党支部于6月18日遭敌人破坏，除郭仁寿、王锡珍外，王曦等全部被捕，组织解体。

同年夏，何伟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来到武汉，着手重建党的组织。这年秋天，何伟根据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的指示，在武汉找到党员习东光、王锡珍，成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何伟任书记。武汉临时工委受北方局领导，由何伟单线联系。

中共武汉临时工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号召广大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推动各界建立各种救国组织，扩大抗日救国运动，也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准备了干部。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陈 磊）